

# 托派第四国际資料

## 第一輯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供内部参考)

托派第四国际資料  
第一輯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門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7号)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統一书号：11017·208

---

1963年11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8 2

196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09千字

印张 13 8/1 3 印数 1—1,000 册

定价(10) 2.00 元

## 出版說明

### ——关于托派“第四国际”的一些情况

“第四国际”是在托洛茨基领导下成立的一个国际性反革命組織。1929年托洛茨基被苏联政府驅逐出国以后，即在国外繼續从事反苏和反革命的活动，并糾合欧美一些国家的托洛茨基分子，筹备建立一个与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相对抗的組織，也就是他們在1934年7月創刊的《新国际》月刊上提出的所謂“第四国际”。經过了几年的搜罗和拼湊，“第四国际”（又叫做“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在1938年9月3日在巴黎正式宣告成立。据称参加成立大会的有美、俄、英、法、德、意、波、比、荷、希等十个托派組織的正式代表和一个拉丁美洲的代表。成立大会通过了主要由托洛茨基本人起草的“过渡綱領”（全名为“資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这个綱領至今仍是各国托派組織的“基本綱領”。到1963年为止，“第四国际”先后已召开了七次所謂“世界代表大会”。

“第四国际”的領導机构是“国际执行委員会”和“国际书记处”，它在拉丁美洲設有“拉丁美洲局”。目前“第四国际”的主要领导人有：密歇尔·巴布洛（希腊）、皮埃尔·弗朗克（法国）、列維奥·麦丹（意大利）、厄內斯特·盖尔曼（比利时）、沙尔·山登（荷兰）等。它的机关刊物名为《第四国际》（季刊）。

“第四国际”自称在三十多个国家設立了自己的“支部”，但是实际上这些所謂“支部”只是由一小撮托洛茨基分子組成，其中只有錫兰的“平等社会党”和印尼的“平民党”在議会中占有几个議

席，他們一般都沒有什么群众基础，在本国政治上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各国托派是齷齪不和的，有些国家如法国、英国、日本等，一国之内就存在着好几个托派組織，有的托派組織并不属于“第四国际”。即使“第四国际”本身，也是四分五裂的。例如，1953年，以格里·希利为首的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就同“第四国际”的巴布洛派分裂，糾合了法国等几个“支部”，另成立了“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1956年，以詹姆斯·坎农为首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也同巴布洛派鬧翻；1962年，以波薩达斯为首的拉丁美洲托派（原“第四国际拉丁美洲局”）也同巴布洛派决裂，最近并且在欧洲的法、意、英等国建立与巴布洛派对立的支部，爭夺“第四国际”的领导权。1963年6月，“第四国际”曾經在意大利举行所謂“統一代表大会”，企图弥补裂痕，“重新統一世界托洛茨基运动”，但是除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表示与巴布洛派重新合作外，以英国托派为首的“国际委员会”派和拉丁美洲托派均拒絕参加。目前这三派还在自己的刊物上互相攻訐，爭吵不休。

尽管各国托派在組織上是不統一的，对当前重大国际問題的观点也不完全一致，但他們都是继承托洛茨基的衣鉢，宣传托洛茨基主义的一套反革命理論，鼓吹“世界革命”，抽象地“反对世界資本主义制度和世界帝国主义”，反对和仇視各国共产党。特別是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以来，他們利用苏共領導所掀起的反斯大林运动大肆活跃起来，极力为托洛茨基翻案，恶毒詆毀斯大林和攻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近更企图利用中苏分歧进行反革命投机，无耻地歪曲中国共产党的立場观点来为托派观点辯护，混淆是非，蠱惑群众。而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替自己的背叛馬列主义立場辯解，却別有用心地搜拣托派的某些言論来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馬列主义政党进行恶毒誹謗，誣蔑他們是“托洛茨基主义”。

因此，弄清楚托派的政治理論主张及其对当前重大国际問題的观点，对于我們辨别真馬克思和假馬克思，分清真革命和反革命，防止托派混水摸魚，以便更加有力地开展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现代教条主义的斗争，是十分必要的。

为此，我們特将托派“第四国际”公开发表的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当前国际問題的文件和言論，編印一套“托派第四国际資料”。这里先編选三輯。第一輯收集了“第四国际”成立以来到1961年历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并附录了巴布洛所写的一篇《第四国际簡介》及列維奧·麦丹所写的評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文章。

第二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第四国际”1963年6月召开的“統一代表大会”的全部文件；第二部分是拉丁美洲托派召开的“第四国际特別代表會議”的文件；第三部分是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1961年年会通过的关于国际形势的长篇決議。这三部分大致上包括了“第四国际”目前三大派系对当前国际問題的最新观点。

第三輯收集了“第四国际”所发表的关于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和苏共綱領的文件和文章，并附录了厄內斯特·盖尔曼所写的一篇評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的文章。

因时间比較匆促，而且所选編的文件和文章是从好几种国家的文字翻譯出来的，未經一一仔細校核，只能作为一种参考材料。

1963年11月

# 目 录

一、第四国际和苏联 .....	3
——第四国际第一次筹备會議通过的提綱(1936年7月)	
二、資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	11
——第四国际成立大会通过的过渡綱領(1938年9月3日)	
三、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告全世界被剥削群众书 (1948年5月11日).....	56
四、第四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宣言 (1951年8月—9月) .....	102
五、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 .....	118
——第四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決議(1954年)	
六、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文件: (1957年10月).....	170
1. 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书 .....	170
2. 斯大林主义的衰落和垮台(決議) .....	185
七、第四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文件 (1961年1月): .....	229
1. 宣言 .....	229
2. 世界形势和我們的任务 .....	236
3. 世界經濟的趋势和前景 .....	259
4. 殖民地革命.....	304
5. 苏共二十大以来的斯大林主义危机 .....	349
附录:	
一、密歇尔·巴布洛: 第四国际簡介 (1958年8月).....	374
二、列維奧·麦丹: 对莫斯科會議的綱領的革命性的批判.....	396



# 一、第四国际和苏联

## ——第四国际第一次筹备會議通过的提綱

(1936年7月29、30、31日在日内瓦召开的  
第四国际第一次国际會議通过的綱領)

1. 共产国际<sup>①</sup>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一項決議說，社会主义已經在苏联“最后地和不可动摇地”胜利了——他們不顾与先进資本主义国家比較还处于低下水平的劳动生产率，也不管世界其他各地的发展道路——，這項決議是一个露骨的和危险的謊言。认为苏联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这一說法更不能决定這一問題，因为全人类只有8.5%的人口住在这个地区上。这仍然是一个两种不可調和的制度——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之間的斗争的問題。这一斗争在苏联領土內还未见分晓，而且也不可能见分晓。它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最后地和不可动摇地”决胜負。

2. 苏联工业的主要生产資料已經大大增长了，而且是掌握在国家手里；而在农业方面，主要生产資料則掌握在介于国有財产和私有財产之間的集体农庄手里。但是，甚至**国有財产**也还不算是**社会主义財产**，因为社会主义的前提是消灭作为財产保卫者的国家，减少不平等現象，并逐漸消除財产观念(甚而在社会中的道德和习俗上)。近年来，苏联的发展道路事实上恰恰相反。不平等現象在滋长；随之而来的，产生了国家压制。如果國內外的形势很好，那么，从目前国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可是，如果形势

---

① 1935年8月，最后的一次。

不好，倒退到资本主义去也有可能。

3. 每个工人国家，在初期，都将为了提高生产力而保留工资制，或者像马克思所说的，保留“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不过，这问题要由全面的发展方向来决定。如果先进国家卷入革命，如果社会财富增长得快，那么，不平等现象就会消除得快，国家也就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保卫”了。如果苏联处于孤立状态和落后状态，那么，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就将带有一种粗俗的和低级的性质（工资悬殊、红利、头衔、等级，以及更多的这类现象），并且产生后退倾向，而这种倾向具有危害国有制这一根本制度的危险。

4. 低生产力，加上大量投资、巨额军事开支和无人管理的机器的巨大浪费，意味着人民大众最重要的日用品的不断的奇缺。经济上的成果本是显著提高全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必不可少的，现在却成了产生广大的特权阶层的温床。社会的对立在第二个五年计划过程中并没有缓和，而是大大加剧了。**不平等现象正以惊人的速度在滋长。**“幸福生活”的赞歌只是由上层人物来唱，而下层人物则继续被迫地保持沉默。

5. 苏联的官僚主义利用多方面的社会对立（城乡之间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个体农业、集体农庄与集体农庄庄员的细小的个人务农之间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与工人阶级其他成员之间的），**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劳动者。**跟每个官僚主义一样，它为了强有力者、为了享受优惠的人、为了有特权的人的利益来调整各种对立。它跟每个官僚主义一样，最终将为了自己而征求大量的国民收入，从而变成整个特权阶层中最有特权的。

6. 苏维埃社会，就其个人生活状况而说，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个**差别极大的等级：**从流浪儿、妓女、流氓无产阶级到过着西欧大资本家生活的、拥有“万贯”的统治阶级。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

大会的論調相反，社会主义還沒有取得胜利；在苏联的客观的經濟状况（劳动生产力的标准）方面，沒有取得胜利，在劳动大众的觉悟方面（个人消費的标准）也沒有取得胜利。

7. 不过，苏联的全部社会关系，包括苏联寡头政治的特权在內，最后还是以国有財产和集体农庄財产为基础，这两种財产都是从資产阶级手里征用来的，与资本主义財产不同，它可以提供条件发展工业和农业，以上这种情况仍然是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十月革命所掘的历史鴻沟仍繼續隔离着蘇維埃計劃經濟与資本主义的“国家主义”；資本主义的“国家主义”意味着国家为了节省私人財产而进行干預，并且对专制的經濟体系进行“調整”，办法是限制生产力的发展和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把苏維埃經濟与法西斯（意大利、德国）經濟等同看待是无知或疏忽的一种結果，那是自由派经济学家习以为常的看法。苏联的拿破崙式的官僚主义战胜无产阶级先鋒队絕不等于說資本主义反革命取得了胜利，虽然官僚主义在給資本主义反革命作指路标。

8. 认为（像无政府主义者和各式各样的极左派那样）苏联，在革命的无产阶级方面，应当承受像帝国主义国家承受的那种看法，就等于說，下列情况对工人阶级是一件无关重要的事：苏联国营工业和集体农业要保存下来并进一步发展呢，还是把經濟拖入瓦解状态，并通过内战办法把它交给法西斯資本主义。这种态度按理說是苏联的业已失望的唯心主义“朋友”所持的，也就是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类型的外行和政治空談家所持的，絕不是馬克思主主义的革命家所持的，因为他們从沒有忘記历史的基本因素：发展生产。

9. 上边已經說过，苏联社会中的社会阶层主要是在分配方面有所发展，而在农业上，在生产上，则只是局部有所发展。但是，分

配与生产之間并不是隔着一道无法通过的牆壁。官僚主义有意地刺激个人和集体的欲望并使这种欲望发展到一种不可收拾的地步，借此来直接地消除对社会财产的观念。經濟特权的泛滥在群众中产生一种合理的怀疑：**整个制度最后倒底是为誰服务。**“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已經远远超过所允許的限度，因而最后将破坏計劃經濟的社会紀律，从而也就摧毁国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

10. 资产阶级制度复辟的可能途径，在家庭問題上表现得特別明显。官僚主义是由国家低下的物质和文化水平造成的，也是由群众首创精神遭受到压制造成的，由于它沒有完成社会保险和社会教育的任务，于是它便开始**重新建立和重新美化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其中包括家庭狭小的私有經濟——撫养各种各样社会白痴的土壤。但是，家庭极其尖銳地提出了继承权的問題。官僚主义本身一心要自己在政治上建立在保守的家庭基础上，因而感到自己的統治頗有成效，但还不完善，因为它不能把它的物质特权遺留給自己的后代。可是，**继承权的問題引起了进一步扩大私有財产范围的問題。**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渠道之一。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官僚主义都在危害着苏維埃制度中的每一种进步的事物。它不負起保卫“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角色，反而成了它的掘墓人。

11. 苏联新宪法的政治意义与官方的解釋直接矛盾。“斯大林宪法”并沒有，像官方权威厚着臉皮所說的，“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前进一步，恰恰相反，后退了一步，从无产阶级专政退到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在政治方面，应当表现在国家消亡上面。消亡的程度就是衡量社会主义发展成功与否的最为可靠的尺度。国家消亡的开始，应当是全部消灭站在社会之上的官僚主义。

但是，事实上，新宪法却恰恰把相反的发展过程制成了法律。不这样，也不成。特权的泛滥需要一个宪兵来监督。

12. 根据新宪法来看，国家强制并没有缓和，恰恰相反，它取得了一种高度集中的、公开的和嘲讽的性质。各级苏维埃被毁了。地方的和中央的，即建立在投票表决制度基础上的“市的”和“議会的”制度，与作为劳动群众战斗机构的苏维埃毫无共同之处。此外，这种制度已事先被剥夺了全部的真实意义。新宪法公开地把管理经济和文化生活各方面的权力都交给了斯大林的“党”，而这个党却是脱离人民、脱离自己党员的党，它代表着统治阶级的一个政治机器。

13. 此外，宪法在法律上取消了无产阶级在国家里的统治地位，而事实上，这个地位早已被剥夺了。接着，宪法声称，专政是“没有阶级的”，是“全民的”，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这种说法是纯粹的胡说八道。“人民”对自己专政应当意味着国家已经解体为社会，也就是，国家已经死亡。实际上，新宪法把苏联社会特权阶层的专政加在劳动群众头上了，从而使国家和平消亡成为不可能，给官僚主义开辟了进行经济反革命的“合法”道路，也就是说利用“冷击”的办法恢复资本主义，而这个“冷击”乃是官僚主义利用“社会主义胜利”的骗术直接准备的一种可能。我们的任务是号召工人阶级起来用自己的力量反对官僚主义的压迫——保卫十月革命的伟大征服。

14. 新宪法与官方的谎言直接矛盾，不仅不发扬苏维埃“民主”，而且恰恰相反，肯定了它的彻底死亡。它在每一段落都宣称，目前形势的主人将不会自动地把地位让给人民。新宪法中的寡头和专制性质清楚地表现在公布宪法那天所宣布的新十字军上——“消灭人民公敌托洛茨基主义的妖魔鬼怪”的十字军（1936年6月

5日《眞理报》)。官僚主义很清楚，致命的危险将从何方来威胁它，因此，它使用拿破崙式的恐怖手段，鎮压无产阶级先鋒队的代表。

**15. 苏联工人阶级已經被剥夺了合法改造国家的最后可能。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必然要变成一場革命性的斗争。**第四国际忠于馬克思主义的传统，坚决反对个人恐怖，就像它反对其他一切政治冒险主义手段一样。官僚主义，只有采用群众在反对篡位者、寄生虫和压迫者时进行的那种目的明确的运动才能被消灭。如果一个社会反革命，即推翻生产資料和土地国有化以及重新建立私有制，是苏联回到资本主义所必要的，那么，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一場政治革命已变得不可避免了，也就是說用暴力推翻腐敗墮落的官僚主义的政治統治，同时保存十月革命所建立的所有制关系。苏联的无产阶级先鋒队，依靠全国的劳动群众和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必須用武力打倒官僚主义，恢复苏維埃民主，消灭猖狂的特权，保証一个走向社会平等的真正进步。

**16. 在战争問題上，像对其他一切問題一样，第四国际各政党，不許自己用形式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想法和同情来指导，只能用馬克思主义的标准来指导。**例如，如果他們支持阿比西尼亚，不管那里还存在着奴隶制，也不管那里有野蛮的政权，这首先是因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代表一个前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进步的历史阶段；其次，因为意大利的失敗将意味着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的开始。

**全世界无产阶级先鋒队将在战争中支持苏联，**虽然那里有寄生的官僚主义和克里姆林宮的无冕的尼各斯<sup>①</sup>，因为苏联的社会制度，尽管它丑陋不堪、腐敗成风，与腐朽的资本主义比較起

---

① 尼各斯(Negus)是阿比西尼的皇帝称号。——譯者

来，则是象征着一个巨大的历史步伐。在新战争中，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敗北将不仅引起它的国家形式崩潰，而且还要引起資本主义基础动摇，最后国有制还将代替私有制。苏联的失敗不仅意味着苏联官僚主义的垮台，而且还意味着資本主义的混乱代替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政治路綫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世界无产阶级先鋒队在战争中坚决而勇敢地支持苏联，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将变成苏联的帝国主义的同盟。“一个与苏联結盟的資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将充分而全部地保留它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无罪的敌对态度。”（《第四国际和战争》，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維克—列寧主义者〕国际书记处綱領，第44款）“无产阶级无罪地反对苏联的帝国主义盟国，一方面必須在国内阶级政策方面展开；另一方面，还必須在下列几方面展开：揭露各有关政府的帝国主义野心、它的‘联盟’的背信本质、它梦想搞資产阶级暴动打击苏联的国家等等。因此，处于‘盟国’和敌国的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必須以采取革命方式推翻資产阶级并夺取政权为目的。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才能跟苏联結成真正的同盟，第一个工人国家才能免于遭受失敗。”（同上，第45款）

17. “极左派”害怕苏联的胜利将造成进一步巩固拿破崙式的官僚主义的地位，这种心理是由于对国际关系和苏联国内发展情况的錯誤了解造成的。各个阵营的帝国主义者，在沒有把生产資料的私有制恢复以前，是不会跟苏联妥协的。不管組成集团的国家在战争开始时态度如何，但帝国主义者在战争进行时会知道如何永远牺牲苏联而互相达成諒解并重新組成集团。苏联将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在战争中不吃敗仗，那就是，要看它是否能夠得到西方或东方的革命的援助。但是，国际革命，即拯救苏联的唯一办法，将同时意味着对苏联官僚主义的致命打击。

18. **苏联是一个工人的国家嗎？** 苏联是一个以十月革命所創造的所有制关系为基础并由一个代表新兴特权阶层利益的劳动官僚主义所管理的国家。苏联可以叫做一个接近名副其实的工人国家——虽然程度上还很不同——,在这个国家里,被机会主义者即資本家走狗所领导和出卖的工会,可以叫做一个工人組織。正如革命者保卫每个工会,哪怕是最彻底的改良主义的工会,使其不受阶级敌人破坏,同时坚决反对叛徒领袖;同样,第四国际各政党将保卫苏联,使其不受帝国主义的打击,但一刻也不能放弃反对反动的斯大林的机器的斗争。他們将在战时和平时捍卫批評苏联的統治阶级的充分自由,捍卫反对他們牺牲苏联和国际革命而与帝国主义达成協議进行斗争的充分自由。

## 二、資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 第四国际的任务

第四国际成立大会通过的过渡綱領  
(1938年9月3日)

(編者按：这个綱領是目前各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基本綱領，在托派文件中一般称之为“过渡綱領”)

### 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先决条件

整个世界政治形势的主要特点是无产阶级的领导发生了历史性的危机。

总的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經濟先决条件已經成熟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的最高程度。人类的生产力已陷于停滞。新的发明和改进已經不能提高物质財富的水平。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发生社会危机的情况下，时机性的危机使广大群众日益貧困和痛苦。日益扩大的失业反过来加深了国家的財政危机，損害了本已不稳定的貨币制度。民主政权和法西斯政权都同样跌跌撞撞地从一个破产走向另一个破产。

资产阶级本身一无出路。在已經被迫把最后的賭注押在法西斯主义这张王牌上的国家里，资产阶级现在正閉着眼睛冲向一場經濟和軍事的灾难。在历史上享有特权的国家，也就是說在一定时期內资产阶级仍然經得起牺牲国民积累而推行民主政治的国家里，所有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都处在几乎濒于意志瘫瘓的窘困状

态。“新政”尽管在初期貌似坚决，其实不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政治窘困，只有在一个资产阶级积累了无穷财富的国家里它才有可能出现。目前的危机虽然还远没有发展到最严重的阶段，却已经说明“新政”政治（如法国的人民阵线政治）并没有能开辟一条走出经济死胡同的新出路。

国际关系也同样不美妙。在资本主义分崩离析日益紧张的形势下，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一种无法解决的地步，到局势严重时个别的冲突和局部的血腥骚乱（如埃塞俄比亚、西班牙、远东和中欧发生的情况）势必就会汇合成为一场世界规模的燎原大火。资产阶级当然知道一场新战争会给它的统治带来致命的危险。但是，比起 1914 年的前夕来，这个阶级现在更没有能力避免战争了。

一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还不“成熟”的说法，都是出于无知或有意识的欺骗。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先决条件不仅已经“成熟”，而且已经开始有些腐烂了。尤其是在下一个历史阶段，如果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人类的整个文化就有遭到浩劫的危险。现在，危机轮到了无产阶级——主要是它的革命先锋队头上。人类的历史危机已经化为革命领导的危机。

### 无产阶级及其领导

革命前的社会状态所特有的社会危机完全摧残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国家和政治，以及它的国际关系。在把革命前的状态改变为革命状态的道路上，主要障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机会主义性质：它在大资产阶级面前表现的小资产阶级懦弱性，以及甚至在大资产阶级垂死呻吟时还同它有不忠实的联系。

在所有国家中，无产阶级都由于严重的动荡不安而遭到破坏。

亿万群众一再走上革命的道路，但是每一次他們都受到了他們本身保守的官僚机器的阻挠。

1931年4月以后，西班牙的无产阶级曾经进行了一系列的英勇活动以图夺取政权和支配社会的命运。但是，它自己的政党（社会民主党、斯大林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各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起了阻碍作用，从而为佛朗哥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在法国，特别是1936年6月静坐罢工的巨大浪潮说明无产阶级已经完全准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居于领导地位的组织（社会党、斯大林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在人民阵线的招牌下至少暂时将革命的潮流引导到了便于控制的方向，并且挡住了这股潮流。

在美国，史无前例的静坐罢工的浪潮和产业工会主义（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惊人的迅速发展，最无可辩驳地表现了美国工人为了胜任历史交给他们的任务所作的本能的努力。但是，在美国居于领导地位的政治组织（包括新建立的产联在内）也千方百计阻挡群众的革命压力，并且使这种压力归于无效。

由于共产国际明确地倒向资产阶级秩序的一边，由于它在全世界，尤其是西班牙、法国、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扮演的无耻的反革命角色，为世界无产阶级造成了特别的新困难。“人民阵线”在十月革命的旗帜下推行的妥协政治活动注定无产阶级必然要无能为力，从而为法西斯主义廓清道路。

一方面是“人民阵线”——另一方面是法西斯主义；这是帝国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最后的政治手段。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这两个手段都只能权宜一时。在法国，在自由帽<sup>①</sup>者的标志

---

① 古罗马解放后奴隶所戴圆锥帽，共和政体的标志。——译者

下，正如在德国在卍字旗的标志下一样，資本主义在繼續腐朽下去。唯有推翻資产阶级才能找到出路。

群众的前进方向首先决定于日趋腐朽的資本主义的客观条件，其次决定于旧工人組織的背叛的政治活动。在这些因素中，第一个因素当然是决定性的，历史发展规律比官僚机构要有力。不論社会主义的叛徒所用方法可能多么不同——从布魯姆的“社会”立法到斯大林的审判阴谋——它們决不能摧毁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随着时间的过去，他們为倒轉历史車輪所作的绝望掙扎会更清楚地使群众看到，只有第四国际才可能解决已成为人类文化危机的无产阶级領導的危机。

### 最低綱領和过渡綱領

下一个阶段——进行鼓动、宣传和組織的革命前阶段——的战略任务是解决革命客观条件的成熟与无产阶级及其先鋒队的不成熟(老一代混乱和失望，青年一代則缺乏經驗)之間的矛盾。有必要帮助群众在日常斗争过程中找到沟通目前的要求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綱領之間的桥梁。这座桥梁應該包括一整套过渡要求，这种要求是从今天的条件和工人阶级广大阶层今天的觉悟情况产生的，它无可改变地导向一个最后結果：无产阶级取得政权。

在一个进步的資本主义时代起作用的标准的社会民主主义把它的綱領分成两个互不相关的部分：只限于在資产阶级社会范围内进行改革的**最低綱領**，和预定在无法确定的将来由社会主义来代替資本主义的**最高綱領**。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之間是不存在桥梁的。事实上，社会民主主义并不需要这样一座桥梁，因为社会主义这个字眼只是被用来在节日发表堂皇的演說而已。在一个資本主义日趋腐朽的时代里，共产国际却开始走上了社会民主主义的

道路：可是在这个时代，一般說来根本談不到进行系統的社会改革和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而无产阶级的每一項重大要求，甚至是小资产阶级的每一項重大要求势必都超出了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和资产阶级国家的范围。

第四国际的战略任务不在于改革资本主义而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它的政治目的是无产阶级为沒收资产阶级的財产而夺取政权。但是，如果不最慎重地考慮所有問題，甚至是微小和局部性的战术問題，完成这一战略任务是不可想像的。革命运动應該吸收无产阶级的所有阶层、行业和集团参加。目前的时代所以突出，不在于它使革命政党能够摆脱日常工作，而是因为它使得這项工作可以同实际的革命任务不可分离地同时进行。

只要旧的“最低”要求至少还有一部分生命力，第四国际并不抛弃这种綱領。它不倦地捍卫工人的民主权利和取得的社会成就。但是它是在正确的实际前景——也就是革命的前景的范围内进行这种日常工作。在群众的旧的、局部的“最低”要求与腐朽的资本主义毁灭和墮落的趋势发生矛盾——在每一步驟都发生这一情况——的范围以内，第四国际提出了一整套过渡要求，其实质在于：这些要求将日益公开和决定性地針對资产阶级政权的根本基础。旧的“最低綱領”被过渡綱領代替了，这一綱領的任务在于有計劃地动员群众参加无产阶级革命。

### 工資和工时的活的計算法

在资本主义日趋瓦解的情况下，群众仍然过着被压迫者的貧困生活，现在更面临着被投入貧穷深淵的空前危险。如果他們不能增加或改善糊口的面包，至少必須保住它。这里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机会一一列举根据具体情况一再提出的那些个别的、局部的

要求——全国、地方和工会的要求。但是，有两种根本的經濟苦惱，即**失业**和**物价高昂**（它概括地反映了資本主义制度日益不合理）要求有統一的口号和斗争方式。

第四国际毫不妥协地对資本家的这样一种政治活动宣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种政治活动与他們的代理人——改良主义者的政治活动一样，目的在于把軍国主义、危机、貨币制度的崩潰以及从資本主义的垂死痛苦中产生的所有其他灾禍的全部负担加在劳动者身上。第四国际要求让所有的人**就业**和有一种过得去的生活条件。

不論是通貨膨胀还是稳定都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口号，因为它们只不过是同一根棍棒子的两端。在随着战争的迫近，物价飞涨日益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只能在活的工資計算法的口号下战斗。这就是說，劳資双方的集体協議應該保証工資隨着消費品价格的上涨而自动按比例增加。

无产阶级面临着本身要瓦解的威胁，所以不能容許把越来越多的工人变成长期失业的貧民，在一个搖搖欲墜的社会里，落到靠残湯剩飯生活的地步。在一个建立在剥削之上的社会里，**就业权**是工人仍然还有的唯一重要权利，可是今天这种权利正逐渐被剥夺。现在时机已經成熟，應該与要求兴办公共事业的口号一道，針對**失业**——“结构性”和“临时性”的失业，提出活的工時計算法的口号了。工会和其他群众組織應該使工人和失业者在共同的責任下團結一致。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按照对工作周长短的规定，把现有的工作分配給目前所有的工人。每一个工人的平均工資仍然同旧工作周的时候一样。在一种有严格保障的**最低限度工資制度**下，工資会随物价的改变而改变。处于目前的灾难时期，不可能接受任何其他的綱領。

有产者和他們的法学家会證明这些要求是“无法实现的”。此外，較小的資本家，特別是破产的資本家会提到他們的底帳。工人断然指責这种結論和借口。现在問題不是对立的物质利益之間的“正常”冲突，而是保护无产阶级，使它不衰退、敗坏和灭亡。这是唯一有創造性的进步阶级的生死存亡問題，因此也就是人类前途的問題。如果資本主义无法滿足它自己造成的灾难势必会产生要求，它就只有毁灭。在这种已定情况下，“可以实现”还是“无法实现”是一个只能由斗争来决定的力量对比問題。通过这一斗争，不論其直接的实际成就如何，工人就会充分懂得消灭資本主义奴役制度的必要性。

### 过渡时期的工会

在为局部和过渡性要求进行的斗争中，工人现在空前需要群众組織，主要是工会。法国和美国的工會主义的强大发展最有力地駁倒了有些极左派的教条主义說教，駁倒了他們所宣揚的工会“已經沒有用了”的論点。

布尔什維克—列宁主义者一貫站在各种斗争的最前列，即使这些斗争只是牵涉到工人阶级非常有限的物质利益或民主权利。他积极地参加群众性的工会，以便加强它們并提高它們的战斗精神。他毫不妥协地反对想使工会从属于資产阶级国家以及想用“强制仲裁”和各种各样的警察監視——不仅是法西斯的、还有“民主的”監視来束縛无产阶级的任何企图。只有在工会内部进行的这种工作的基础上，才可能对改良主义者，包括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的改良主义者在内，进行胜利的斗争。建立或保存“革命性”小工会作为第二个党的宗派主义企图实际上意味着放弃爭取工人阶级领导权的斗争。有必要确立这样一条坚定的規則：自动与群

群众性工会作投降主义性质的隔离等于背叛革命，这和第四国际的成員身份是不相容的。

\*

\*

\*

同时，第四国际坚决反对和譴責同样是工会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所特有的工会偶像主义。

(一) 工会并不提出、而且根据它們的任务、組成和征收会员的方式也不能提出一个完全的革命綱領，因此，工会不能代替党。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建立作为第四国际的支部的全国性革命政党。

(二) 即使是最强大的工会，会员最多也只占工人阶级的20%到25%，而且其中主要还是比较熟练和工资較高的阶层。只是在劳工运动特別高涨的时期，更受压迫的工人阶级大多数才偶而被吸收到斗争中。在这样的时候，就有必要建立包括全体战斗群众的特別組織：罢工委員會、工厂委員會，最后則是苏維埃。

(三) 作为代表无产阶级上层的組織，从过去的所有历史經驗（包括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工会的新經驗）可以看出，工会发展了一种同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妥协的强烈趋势。在进行尖銳阶级斗争的时期，工会的领导机构想要成为群众运动的主宰，以便使这个运动不造成危害。在举行简单罢工的时期，特别是在动摇了资产阶级所有权原則的群众性靜坐罢工中，已經发生了这种情况。在战争或革命时期，当资产阶级处境特別困难的时候，工会领袖常常成为资产阶级政府的部长。

因此，第四国际各支部應該經常效力于不仅是补充工会的上层领导，在危急时期勇敢而坚决地提拔新的有斗志的领袖来代替一般的职员和野心家，而且尽一切可能建立更能胜任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群众性斗争这个任务的独立的有斗志的組織，如果必要

的話，甚至在可能同工会的保守机构直接决裂的情况下也不退縮。如果說为了助长宗派主义的臆說而不去管群众組織是罪过的話，消极地听任革命性的群众运动受公开反动或伪装的保守（即所謂“进步的”）官僚主义集团的控制也同样是罪过。工会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們只不过是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上的手段。

### 工厂委員会

在过渡时期，工人运动并不具有系統的和非常平衡的性质，而是狂热和爆炸性的。口号和組織形式应从属于运动所指的方向。领导應該像防范瘟疫一样，謹防对形势作老一套的处理，而應該敏感地对群众的主动性有所反应。

这种主动性的最近的表现——靜坐罢工，超出了“正常的”資本主义程序的范围。对工厂的暂时的占有（这与罢工、工人的要求无关）打击了被人奉为偶像的資本主义的财产。每一次靜坐罢工都实际提出了这样一个問題：誰是工厂的主人，是資本家还是工人？

如果說靜坐罢工只是偶然提出了这个問題，工厂委員会就是这个問題的有組織的体现。工厂委員会由全体工厂雇員选出，它立即形成了和工厂管理当局的意志相抗衡的力量。

改良主义者只批評像福特这类所謂“頑固的实业家”类型的老板，把他們和“善良的”“民主的”剥削者分开，对于这种批評，我們提出这样的口号作为对抗：以工厂委員会作为中心，来对第一种人和第二种人同时进行斗争。

工会的官僚主义分子总是会反对建立工厂委員会的，正如他們反对在动员群众的道路上采取的一切大胆步骤一样。

但是，运动的声势越是广泛，就越是容易压倒这种反抗。在

“和平”时期已經实行封鎖工厂制度的地方，委員会将正式相当于一般工会机构的地位，但是会补充新的工作人員和扩大它的职能。不过，委員会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成了工人阶级中工会通常沒有能力动员的那一些阶层的战斗性机构。革命的最有牺牲精神的队伍正要从这些更受压迫的阶层产生。

从委員会出现的时候起，在工厂里就建立了事实上的双重权力。从委員会的本质来看，它代表着过渡时期状态，因为委員会中包括两种不可調和的制度：資本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制度。工厂委員会的根本意义正是在于它們打开了虽然不是通向直接的革命、却是通向革命前时期——資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权之間的时期——的大門。在几个国家中广泛展开的靜坐罢工的浪潮充分証明，宣传建立工厂委員会的主张既不是为时过早的，也不是不自然的。在不久的将来，势必还会掀起这种新浪潮。有必要及时开展一个爭取建立工厂委員会的运动以免到时候措手不及。

### “营业秘密”和工人对工业的监督

以竞争和自由貿易为基础的自由的資本主义已經完全成为过去。它的继承者垄断資本主义不仅沒有減少市場的无政府状态，反而使市場具有了波动特大的性质。今天，几乎是所有当代的資产阶级和小資产阶级趋势——从法西斯分子到社会民主党人——都承认有必要“监督”經濟，有必要由国家对工业进行“指导”和“策划”。对法西斯分子說来，这主要是——为了軍事目的“有計劃地”掠夺人民的問題。社会民主党人則准备用几調羹官僚主义“計劃”来竭干无政府主义的汪洋大海。工程师和教授紛紛发表关于“技术統制”的文章。民主政府在“調节”方面进行的懦怯的試驗遭到了大資本的难以抵禦的破坏。

剥削者与民主的“监督人”之間的实际关系最突出地表现在这样的事实：文质彬彬的“改革者”仅止于毕恭毕敬地在托辣斯和他們的营业“秘密”的大門口发抖。在这里，“不干涉”企业的原則占支配地位。資本家个人与社会之間的帳目仍然是資本家的秘密：它們与社会无关。就如在自由資本主义时代那样，为保守营业“秘密”的原則提出的公开理由是为了自由“競爭”。实际上，托辣斯彼此之間是什么都公开的。当代的营业秘密是垄断資本主义危害社会利益的一貫阴谋的一部分，只要社会生产資料的私人所有者能够不让生产者和消費者知道剥削、搶劫和欺騙的个人奧秘，种种限制“頑固的实业家”的方案将仍然是可怜的滑稽戏。取消“营业秘密”是实际监督工业的第一步。

工人与資本家一样有权力知道工厂、托辣斯、全工业部門和整个国民經濟的“秘密”。首先應該把銀行、重工业和集中的运输业放在观测鏡下。

工人监督的直接任务應該是从各企业开始，弄清楚社会的借方和貸方从何而来；确定資本家个人和全体剥削者在国民收入中占去的比例；揭发銀行和托辣斯的幕后交易和騙局；最后向所有社会成員揭露由于資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和赤裸裸地追求利潤而不合理地浪費的人力。

資产阶级国家的公务人員，不論人們願意賦予他們多大权力，都沒有能力进行這項工作。全世界都看到罗斯福总统和布魯姆总理对他们本国的“六十”或“二百”家族是多么束手无策。为了压倒剥削者的反抗，无产阶级必須施加集体的压力。只有工厂委員会才能建立对生产的真正管理——同时招請对人民特別忠誠的专门人材、会計員、統計員、工程师和科学家等等作为顧問而不是“技术統制者”。

\* \* \*

如果要求广泛而大胆地組織公共事業就很难談得上进行消灭失业的斗争。但是只有使公共事业成为需要进行相当年代的总的計劃的一部分，它对失业者本身說来，正如对社会說来一样才有持續的进步意义。在这个計劃的范围内，工人将要求作为公用事业，恢复由于危机而倒闭的私人企业中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监督将被工人的直接管理所代替。

但是，如果沒有工人的监督，也就是說，工人的眼睛如果不看透資本主义經濟的一切公开和隐秘的本源，从被剝削者，而不是剝削者的观点看来，就不可能制訂那怕是最基本的經濟計劃。代表各企业的委員會應該舉行會議来选举托辣斯、整个工业部門、經濟地区以及最后整个国家工业的相应的委員會。因此，工人的监督成了訓練掌握計劃經濟的學校。根据在监督中取得的經驗，无产阶级将准备在时机到来的时候直接管理国有化的經濟。

有些資本家——主要是中下层的資本家有时候自动表示願意向工人公开帳目——常常是为了說明有必要降低工資，对于这些資本家，工人回答說，他們对于个别破产者或半破产者的簿記不感兴趣，他們感兴趣的是所有剝削者的底帳。工人不能、也不願意調整他們的生活水平来适应資本家个人的危机，这些資本家本人就是他們的制度的牺牲者。任务是要在更有尊严和可行的基础上改組整个生产和分配制度。如果說取消营业秘密是工人监督的必要条件，那么监督就是走向社会主义領導經濟的第一步。

### 沒收个别資本家集團的財產

社会主义的沒收財产綱領，即在政治上推翻資产阶级并取消它的經濟統治，在目前的过渡时期絕不應該妨碍我們在需要的时

候要求沒收一些对于国家生存至关紧要、或者是属于最有寄生性的资产阶级集团的关键性工业部门。

因此，为了回答那些正人君子似的民主主义者发出的有关美国“六十家族”和法国“二百家族”专制统治的可悲哀叹，我們要求沒收这六十个或二百个封建性资本主义霸主的财产。

我們以完全同样的方式要求沒收垄断战争工业、铁路和最重要的原料来源等等的公司的财产。

这些要求与糊涂的改良主义者提出有“国有化”口号之间的差别在于以下几点：(1)我們反对赔偿；(2)我們告诫群众注意人民阵线的哗众取宠，他們空谈国有化，其实仍然是资本家的代理人；(3)我們号召群众依靠他們自己的革命力量；(4)我們把沒收财产問題与工农夺取政权問題联系起来。

我們有必要在日常**鼓动**的过程中局部提出沒收财产的口号，而不仅仅是在我們的宣传中比較全面地提出，这种必要性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决定的：不同的工业部门的发展水平不同，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不同地位并且经历着不同的阶级斗争阶段。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高涨，才能把完全沒收资产阶级财产这个問題列入日程。过渡要求的任务是要使无产阶级准备好来解决这个問題。

### **沒收私人銀行和信貸体系国有化**

帝国主义一詞意味着金融資本的統治。**銀行**与托辣斯和辛迪加一道（常常还凌驾于它們之上）实际上集中掌握了經濟控制权。銀行的結構以集中形式表现了现代資本的整个結構：銀行把垄断的趋势与**无政府状态**的趋势結合了起来。它們造成了工艺学的奇迹、組織了大企业和强有力的托辣斯；可是高昂的物价、危机和失业也是它們造成的。如果銀行的领导职位仍然由掠夺成性的資本

家掌握，在对垄断資本专制主义和資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它們的破坏性是相輔相成的——进行的斗争中便不可能采取任何重大步骤。为了按照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利益的合理計劃，建立起統一的投资和信貸体系，必須把所有銀行合并成为一个統一的全国性机构。只有沒收私人銀行和把整个信貸体系集中在国家手里，国家才有实际的、即物质的力量——而不仅是紙面上的和官僚政治的力量——来进行經濟规划。

沒收銀行絕不意味着沒收銀行存款。相反地，統一的國家銀行能为小存戶創造比私人銀行有利得多的条件。同样，只有国家銀行能为农民零售商和小商人創造有利的信贷、即低息信贷的条件。但是，甚至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情况：由統一的財政机构領導的整个經濟——首先是大工业和运输业——符合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切身利益。

但是，只有在国家权力本身完全从剥削者手中轉到劳动者手中的时候，銀行的国家化才会产生这些有利的結果。

### 糾察綫——警卫——工人民兵队——武装无产阶级問題

靜坐罢工不仅是工人对资产阶级、而且是对工人組織(包括第四国际在內)发出的严重警告。在 1919—20 年，意大利工人自动占領了工厂，从而向他們的“领袖們”通知了社会革命来到的消息。“领袖們”沒有理会这个信号。結果是法西斯主义取得了胜利。

靜坐罢工还不是意味着以意大利的方式占領工厂；但是靜坐罢工是向着占領工厂前进的一个决定性步骤。目前的危机能够使阶级斗争极端尖銳化，使結局时刻更快到来。但是这並不意味着革命形势会一下子就出現。实际上，它到来的标志是一系列不断

的波动。波动之一就是靜坐罢工浪潮。第四国际各支部的問題是帮助无产阶级先鋒队理解我們时代的总的性质和发展速度，并且以越来越坚决和富有战斗性的組織措施及时使群众的斗争取得結果。

无产阶级斗争的尖銳化也意味着資本家反攻方式的日益厉害。新的靜坐罢工浪潮可能而且无疑将引起资产阶级的坚决的反措施。大托辣斯的心腹已經在做准备工作。如果这一次再毫无准备，革命組織和无产阶级就要吃苦头了！

无论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都不会以官方的警察和军队为滿足。在美国，甚至在“和平”时期，资产阶级也在工厂里豢养着武装的工賊队伍和私人武装起来的暴徒。除此以外，现在还必須加上各种美国納粹分子集团。法国资產阶级在危险刚发生的时候，就动员半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法西斯分遣队，包括军队中的所有法西斯分子。英国工人的压力刚刚再一次变得比較强大，法西斯就两倍、三倍乃至十倍地增加，来对工人进行血腥的鎮压。关于这样一个事实，资产阶级始終了解得十分正确：在目前这个时代，阶级斗争不可抗拒地倾向于变成内战。意大利、德国、奥地利、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例子給予大資本家和他們的仆从的教訓要比給予无产阶级的正式領袖的多得多。

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政客以及工会的官僚們有意識地閉起眼睛不看资产阶级的私家軍，不然的話，他們就不可能同它那怕是保持二十四小时的联盟。改良主义者有計劃地灌輸給工人这样的概念：当资产阶级武装到牙齿而工人沒有武装的时候，民主制度的神圣性才最有保証。

第四国际的責任是一劳永逸地結束这种奴隶政治。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包括社会民主党人、斯大林主义者和无政府

主义者——在实际上越是厚顏无耻地向法西斯主义投降，就越是大声叫嚷要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只有感到背后有千百万劳动者支持的工人武装分遣队才能战胜法西斯。反法西斯斗争不是在自由主义的編輯部而是在工厂里开始的——并且在大街上告終。工厂里的工賊和私人雇佣的歹徒是法西斯军队的基本核心。**罢工糾察队**是无产阶级大軍的基本核心。这就是我們的出发点。就一切罢工和街道示威來說，必須宣传有建立**工人自卫队**的必要。必須把这一口号写入工会革命派的綱領。在凡属可能的地方，必須从青年人开始，組成自卫队来訓練和使他們熟悉武器的使用。

群众运动的新高涨的作用不仅應該是增加这种单位的数目，而且應該按照区、城市和地区把它們联合起来。必須有組織地表現工人对于工賊以及流氓和法西斯匪帮的正当憎恨。有必要提出建立**工人民军队**的口号，作为工人組織、集会和報紙的不可侵犯性的重大保障。

只有在始終以群众自己的經驗为基础的、这种有計劃的、一貫的、不倦的、勇敢的鼓动和組織工作的帮助下，才可能根除群众意識中的屈从和逆来順受的传统；訓練出能够为所有劳动者树立榜样的英勇战士的队伍，使反革命的武装暴徒遭到一系列的战术上的失敗，提高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自信心，損害法西斯主义在小資产阶级眼中的威信并且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鋪平道路。

恩格斯为国家下的定义是“武装的人”<sup>①</sup> 的集体。**武装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爭取解放的斗争的一个必然的附隨物。当无产阶级有这种願望的时候，它就会找到进行武装的道路和手段。在这方面，领导权自然也落在第四国际各支部身上。

---

① 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64 頁。  
——譯者

## 工农联盟

工人在农村中的战友和与他同等身分的人是农业工人。他們是同一个阶级的两个部分。他們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产业工人的过渡性要求綱領在进行一些修改后，就同样是农业无产阶级的綱領。

小农(农民)代表另一个阶级：他們是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由各阶层組成的——从半无产阶级到剥削者。根据这种情况，工业无产阶级的任务應該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农村去。只有这样才能够把他的盟友和敌人分开。

每一个国家的民族发展特点最古怪地表现在农民的、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說来还有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艺者和小店主)的地位上。这些阶级不論人数是多么多，基本上是资本主义以前生产形式的具有代表性的残余。第四国际各支部應該尽量具体地按照每一个国家的情况，制訂出有关小农(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过渡性要求的綱領。先进的工人應該努力对他們未来的同盟軍提出的問題作明确而具体的答复。

虽然农民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小生产者，他却需要低息信貸、农业机械和肥料(以他出得起的价钱购买)、有利的运输条件以及謹慎地为他的农产品組織市場。但是，銀行、托辣斯和商人从四面八方掠夺农民。只有农民自己在工人的帮助下，才能制止这种掠夺行为。應該在全国成立由**小农选举出来的委员会**，会同工人委员会和銀行雇員委员会控制与农业有关的运输、信贷和商业活动。

大资产阶级虛伪地举出工人的“过分”要求，从而巧妙地把商品价格問題变成离間工人和农民以及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工具。小农、手工艺者、小商人不像产业工人、职员和文职雇員，不可

能要求工資隨物价上涨作相应增加。官方对管制高昂物价所作的斗争只不过是欺騙一下群众而已。但是农民、手工艺者和小商人以消費者身分，可以与工人一道并肩参加稳定物价的政治活动。对于資本家对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和經營費用的抱怨，消费者的回答是，“把你們的帳本給我們看；我們要求监督对物价的稳定。”监督机构應該是管制物价委員会，由工厂、工会、合作社、农民組織、城市“小人物”、家庭妇女等等的代表組成。工人通过这一手段就能够向农民証明，物价高昂的真正原因不是工資高，而是資本家的过高利潤和資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間接开銷。

在制定土地國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綱領时，最根本的應該是排除沒收小农財产和强迫他們集体化的可能性。只要小农认为有可能或者有必要，他就仍然会是他那一块土地的主人。为了恢复社会主义綱領在农民眼中的威信，有必要毫不容情地揭发斯大林主义的集体化方法，这种方法不是根据农民或者工人的利益，而是根据官僚机构的利益决定的。

剥夺剥夺者同样并不意味着强制沒收手工艺者和小店主的財产。相反地，工人对銀行和托辣斯的监督——甚至还有这些机构的國有化，可能为城市小資产阶级創造比在壟斷資本暢所欲为的控制下要有利得多的信貸、购买和銷售条件。对私人資本的依靠将被对国家的依靠所代替。劳动者本身越是把国家牢牢地掌握在手里，国家就越是注意它的小同事和代理人的需要。

受剥削的农民实际参加对經濟各方面的监督以后，就可以自己决定把土地改变为集体耕作以后是否有利——并且决定在什么时候和以多大规模改变。产业工人應該认为自己有責任在农民走这条道路的时候，給予他們充分合作——通过工会、工厂委員会以及最重要的是通过工农政府。

无产阶级提出建立的反对所有剥削者（包括“中产阶级”剥削者）的联盟——不是向整个“中产阶级”提出而是向城乡小资产阶级中受剥削阶层提出的——不能以强制、而只能以自愿为基础，这个联盟应该以一个特别的“合同”巩固下来。这个“合同”就是双方自愿接受的过渡要求的纲领。

### 反帝和反战斗爭

整个世界前途，因此也就是各国的内在政治生活都被世界战争的威胁笼罩着。迫在眉睫的浩劫已经使非常广泛的人们感到深切的忧虑。

第二国际更有把握地重复了它在 1914 年从事的那种不名誉的政治活动，因为今天在沙文主义方面领头的是共产国际。战争危险刚具有具体轮廓，斯大林主义者就大叫大嚷地要求加强所谓“国防”，在这方面，他们做得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还要过火得多。因此，反对战争的革命斗争责任就完全落在了第四国际的肩上。

第四国际书记处的纲领（《战争和第四国际》，1934 年）制定的有关这个问题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政策今天还保持着它原来的力量。在下一个阶段，革命政党要取得胜利将主要依靠它在战争问题上的政策。正确的政策包括两个因素：对帝国主义及其战争采取的毫不妥协的态度以及将纲领建立在群众经验之上的能力。

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在战争问题上，比任何其他问题都更多地利用抽象概念、空泛的俗套语和拙劣的辞令来欺骗人民，比如：“中立”、“集体安全”、“为保卫和平而武装”、“国防”和“对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等等。所有这种空谈最后都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战

爭問題，也就是人民的命运，是被帝国主义者、他們的統治人員、他們的外交家、他們的將軍掌握着，而这些人是对人民怀有种种阴谋的。

第四国际厌恶地反对所有在民主陣營和法西斯陣營起了同样作用的抽象概念：“荣誉”、“鮮血”、“种族”。但是单单厌恶是不够的，必須帮助群众用鉴别真伪的标准、口号和要求来辨认这些欺骗性抽象概念的实际本质。

“解除武装嗎？”——但是整个問題在于誰解除誰的武装。唯一能够避免或結束战争的解除武装是工人解除資产阶级的武装。但是要解除資产阶级的武装，工人必須先武装自己。

“中立嗎？”——在日本与中国的战争中，或者在德国与苏联的战争中，无产阶级一点也不会中立。“那么是不是指保卫中国和苏联呢？”当然！但是并不是由会扼杀中国和苏联的帝国主义者来保卫。

“保卫祖国嗎？”——但是資产阶级提出这一抽象概念意思是保卫它的利潤和掠夺。如果我們先把我們自己的(資本家的)手脚綁起来，使他們不能进攻外国人的祖国；如果我們国家的工人和农民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如果国家的財富由少数人的手里轉到人民的手里；如果军队成为被剥削者而不是剥削者的武器，我們就准备保卫祖国不受外国資本家侵略。

有必要按照事态发展和群众思想的方向，把这些根本概念划分成为更局部和具体的概念，来解释它們。此外，有必要严格地区別外交家、教授、新聞記者与木匠、农业工人和女帮工的和平主义。前面的一种和平主义是帝国主义的烟幕；后面的一种和平主义是不信任帝国主义的混乱表示。当小农或工人談到保卫祖国的时候，他是指保卫他的故乡、家庭和其他类似家庭不遭受侵略，

不受炸弹和毒气的危害。資本家及其新聞記者所謂的保卫祖国是指占領殖民地和市場，掠夺性地增加在世界收入中所占的“民族”部分。資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和爱国主义充滿了欺騙。在被压迫者的和平主义、甚至是爱国主义中，有一些因素一方面反映了对毁灭性战争的憎恨，另一方面紧紧抓住他們认为是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为了得出必要的結論，我們必須知道如何利用这些因素。

第四国际利用这些考慮作为出发点，来支持一切要求（即使是非常充分的要求），只要这种要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群众参加积极的政治活动、喚起他們的批評并且加强他們对于資产阶级阴谋的监督。

从这个观点出发，比如說我們的美国支部就有批判地接受就宣战問題进行公民投票的建議。人們都知道，任何民主改革本身都不能防止統治者在他們需要的时候挑起战争。有必要就此提出坦率的警告。但是尽管人民群众对于打算进行的公民投票存在幻想，他們对公民投票的支持反映了工人和农民对于資产阶级政府和国会的不信任。在不支持和不散佈幻想的情况下，必須以最大力量支持被剥削者对剥削者逐渐产生的不信任。要求举行公民投票的运动越是广泛，資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离开这个运动就越快，給予共产国际的背叛者的損害就越彻底；对帝国主义的不信任就越深。

从这个观点出发，有必要要求給予十八岁以上的男女以选举权。那些奉召在明天为祖国牺牲的人應該在今天有投票权。反对战争的斗争必須首先以对青年的革命动员开始。

必須从各个角度，从群众在一定时期将会碰到的那一方面來說明战争問題。

战争是一桩大买卖，对軍事工业說来尤其如此。因此，“六十

家族”是第一線的爱国者和主要的战争煽动者。工人对军事工业的监督是对战争“制造商”进行的斗争的第一步。

对于改良主义者提出的口号：对战争利潤征稅，我們提出这样的反口号：沒收战争利潤和剥夺战争工业中的掮客。在把战争工业“收归国有”的地方，如法国，工人监督的口号保持着它的充分力量。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政府正如对于资本家个人一样沒有信心。

不給资产阶级政府一个人，一分錢！

不要軍备綱領，而要兴建有用的公共事业的綱領！

工人組織完全脱离宪兵的控制而独立！

我們必須一劳永逸地剥夺背着人民玩弄阴谋的貪得无厌和残酷无情的帝国主义集团支配人民命运的权力。

根据这一点，我們要求：

完全废除秘密外交；让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知道所有的条约和协定；

給予工人委员会和农民委员会直接管理的工人和农民以军事训练和武装；

成立訓練由工人組織推选出来的劳动者指揮官的军事学校；

以与工厂、矿山、农場等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的民兵队来代替常备軍。

\* \* \*

帝国主义战争是资产阶级掠夺性政治的延续和尖銳化。无产阶级的反战斗爭是它的阶级斗争的延续和尖銳化。战争的开始改变了阶级斗争的形势并且部分改变了斗争的手段，但是并不能改变它的目标和基本路綫。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統治着世界。因此，日益迫近的战争就其

基本性质說来将是一場帝国主义战争。因此，国际无产阶级政治的根本內容将是一場反帝和反战的斗争。在这場斗争中基本原则是：“主要敌人在你自己的國內”，或者“打倒你本国的（帝国主义的）政府是較輕的危害”。

但是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恰恰相反，大多数国家是帝国主义的牺牲品。一些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国家毫无疑问将設法利用战争来摆脱奴役的束縛。他們的战争不是帝国主义战争而是解放战争。国际无产阶级的责任是帮助被压迫国家来进行反对压迫者的战争。对于帮助苏联或者是在战争以前或战争期間可能出现的任何其他的工人政府來說，也都有这样的责任。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在同工人国家或者一个殖民地国家的斗争中的失敗是較輕的危害。

但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不可能通过他們自己国家的政府来帮助一个反帝国家，不論在一定的时间內，这两个国家的外交和軍事关系可能如何。如果政府之間有一个暫时的并且从問題的本质来看，必然也是不可靠的联盟，那么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将继续与它本国的政府形成阶级对立，并且用它自己的方法，支持非帝国主义的“盟友”，即用国际阶级斗争的方法（不仅进行反对它們的背信弃义的盟友的鼓动，而且进行贊成在殖民地国家建立工人国家的鼓动，有的时候进行抵制、罢工，有的时候拒絕抵制和罢工，等等）。

无产阶级在战争中支持殖民地国家或者苏联，絲毫也不等于支持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或者是苏联的官僚机构。相反地，它对两者都保持着完全的政治独立。由于在一場正义而进步的战争中提供援助，革命的无产阶级得到了殖民地和苏联工人的同情，加强了第四国际在那里的威信和影响，并且加强了它的帮助

推翻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和苏联的反动官僚机构的能力。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第四国际各支部势必会觉得自己陷于孤立：每一場战争都使全国群众猝不及防，并且迫使他們站在政府机构一边。国际主义者不得不逆流而行。但是，新的战争带来的破坏和灾难（在头几个月就会远远超过 1914—1918 年的血腥恐怖）会迅速証明有使人头脑清新的作用。群众的不满和他們的反抗会迅速增加。人們会发现第四国际各支部領導着革命的潮流。过渡要求的綱領会具有迫切的现实性。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問題会完全显现出来。

在精疲力尽或使人类浸沉在血泊里以前，資本主义以民族和种族仇恨的毒气毒化了世界气氛。今天，反犹主义是資本主义在垂死呻吟中更恶性的痉挛之一。

毫不妥协地揭露种族歧视和各种各样的民族偏见和沙文主义（特别是反犹主义）的根源應該成为第四国际各支部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把它看作是反帝和反战斗爭的最重要部分。我們的基本口号仍然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工农政府

“工农政府”这个公式最初出现于 1917 年的布尔什維克鼓动中，在十月革命以后被明确接受。最初它只不过是已經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名称。这个名称的意义主要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它强调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結成联盟的思想，而苏维埃政权就是以这种联盟为基础的。

当后来的共产国际想要复活被“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历史埋葬掉的公式的时候，它給予“工农政府”这个公式以完全不同的、純民主的、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內容，与无产阶级专政相抗衡。

布尔什維克—列寧主义者坚决反对資产阶级民主形式的“工农政府”的口号。他們在当时和现在都确认，当无产阶级政党拒絕走出資产阶级民主的范围时，它与农民的联盟便完全变成了对資本主义的支持，1917年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1925—27年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及现在西班牙、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陣綫”的情况就是这样。

从1917年4月到9月，布尔什維克要求社会革命党人及孟什維克和自由資产阶级决裂而自己掌握政权。在这一条件下，布尔什維克答应給予作为工人和农民的小資产阶级代表的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革命的援助以反对資产阶级，但是断然拒絕参加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政府或者为它負政治責任。如果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真正与立宪民主党(自由主义派)和外国帝国主义决裂，那么，他們所建立的工农政府就只能加速和有利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小資产阶级民主派的領導才用最大力量来反对建立它自己的政府。俄国的經驗証明，西班牙和法国的經驗再一次証实，即使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下，小資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斯大林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不可能建立一个工农政府的，即不依靠資产阶级的政府。

尽管如此，布尔什維克向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提出的要求“与資产阶级决裂，自己掌握政权！”对群众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在七月危机中很戏剧性地暴露出来，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頑固反对掌握政权，这肯定地在群众輿論面前注定了他們的命运，为布尔什維克的胜利鋪平了道路。

第四国际的中心任务在于使无产阶级擺脫旧的領導，它的保守主义是同正在瓦解的資本主义的灾难性崩潰完全矛盾的，它是

历史进展的主要障碍。第四国际对无产阶级的传统組織提出的主要指責是它們不願意同資產階級的半政治僵尸脫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有計劃地向旧領導提出的要求“与資產階級決裂，夺取政权！”成了揭发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各政党和組織的背叛性的极为重要的武器。因此，“工农政府”的口号只是在它于 1917 年作为布尔什維克的口号时所具有的意义上才可以为我们接受，即作为一种反資產階級和反资本主义的口号，但是我們絕不接受后来一代人所賦予它的“民主”意义，——它把这个口号从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桥梁变成这条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我們要求所有依靠工农和代表他們說話的政党和組織在政治上与資產階級決裂，并且走上为工农政府而斗争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們答应充分支持他們反对資產階級反动勢力。同时，圍繞着我們认为應該形成“工农政府”綱領的那些过渡要求，我們进行不倦的鼓动。

传统的工人組織可能建立这样一个政府嗎？如已經說过的那样，过去的經驗說明，至少这也是非常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不能事先就断然否认这样一个理論上的可能性：在非常特別的环境的影响下（如战争、战敗、財政崩潰、群众性的革命压力等等），包括斯大林主义者在内的小資產階級政党在与資產階級決裂的道路上可能走得比他們希望的更远。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无可怀疑的：即令在某时某地这种非常不可能实现的变化因素成了现实，而真正建立了上述意义的工农政府，那也只不过是无产阶级建立实际专政的道路上的一段短短的插曲。

但是，没有必要一味进行猜測。围繞着工农政府的口号进行的鼓动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巨大的教育意义。而且这不是偶然的。这个概括性的口号完全沿着我們时代的政治发展路綫发展

(旧资产阶级政党的破产和瓦解，民主制度的垮台，法西斯主义的滋长，工人加速向更积极和进攻性的政治前进)。因此，每一个过渡要求都應該导致同样的政治結論：工人必須同资产阶级的所有传统政党决裂，以便与农民联合起来建立他們自己的政权。

不可能事先預见对群众革命动员的具体阶段。第四国际各支部應該在每一个新阶段有批判地确定自己的方向，提出口号来帮助工人争取独立政治，加深这种政治的阶级性质，消灭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幻想，加强先锋队与群众的联系，并且准备进行革命来夺取政权。

### 苏 维 埃

如已經指出的，工厂委员会是工厂内双重权力的因素。因此，只有在群众压力日益加大的情况下，它們才可能存在。为进行反战斗爭而建立的特別群众組織，物价管制委员会以及运动的所有其他新的中心，情况也同样是如此，这些事物的出现这件事本身就證明，阶级斗争已經超出了传统的无产阶级組織的范围。

不过，这些新的机构和中心很快就会开始感到它們缺乏团结和力量不足。在保留资产阶级政权的情况下，沒有一个过渡要求可以得到充分滿足。同时，社会危机的加深不仅会增加群众的痛苦，而且会使他們更加无可容忍，更加不屈不挠和增加压力。越来越多的被压迫阶层将抬起头来提出他們的要求。改良主义者的领袖从来没有加以考虑的千百万劳苦的“小人物”将开始坚决地敲击工人組織的大門。失业者将加入运动。农业工人、破产和半破产的农民、城市的被压迫者、女工、家庭妇女和知識分子的无产阶级化的阶层——所有这些人都将寻求团结和领导。

即使只是在一个城市內，如何調和不同的要求和斗争形式呢？

历史已經回答了这个問題：通过苏維埃。苏維埃会把战斗組織的代表联合起来。还没有人为这个目的提出一个不同的組織形式；事实上也几乎不可能想出一个更好的組織形式来。苏維埃不仅限于一个既定的党的綱領。它們向所有被剥削者敞开大門。各阶层的代表通过这些大門投身到斗争的总潮流中。随着运动而扩大的組織在成长中一再得到补充。无产阶级的所有政治流派都可以在最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为担任苏維埃的领导而斗争。因此成立苏維埃的口号在过渡要求的綱領中最为重要。

只有在群众运动进入公开革命阶段的时候，苏維埃才能建立。苏維埃从一成立的时候起就是千百万劳动者对剥削者进行联合斗争的中心，因此它先成了地方当局，然后又成了中央政府的竞争者和对手。如果说工厂委员会在工厂内建立了双重权力，那么苏維埃就是在國內开始了一个双重权力的时期。

双重权力則又是过渡时期的最高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种制度是不可調和地相对立的。它們之間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社会的命运取决于冲突的結果。如果革命失敗了，随之而来的将是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独裁。如果胜利了，苏維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設社会主义社会)将建立起来。

### 落后国家和过渡要求的綱領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就其本质說来是落后国家。但是落后国家是帝国主义統治的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它們的发展具有綜合性质：最原始的經濟形式同最新的资本主义技术及文化結合了起来。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內容与此相同：争取实现最基本的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斗争与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斗争結合了起来。在这个斗争中，民主口号、过渡要求和社会

主义革命問題沒有分成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是彼此互为因果的。中国无产阶级刚开始組織工会就不得不动手組織苏維埃。在这个意义上，目前的綱領完全适用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至少适用于无产阶级已經能够进行独立政治活动的国家。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土地革命**（即消灭封建残余）和**民族独立**（即摆脱帝国主义束縛）。这两項任务彼此密切相关。

单单是反对民主的綱領是不可能的；群众必須在斗争中擺脫它。对于像中国或印度这样的国家，爭取成立国民（或制宪）議会的口号仍然还具有充分的力量。这个口号必須不可分割地同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問題結合起来。作为第一步，工人必須以这个民主綱領武装起来。只有他們能够号召和團結农民。根据革命性的民主綱領，有必要以工人来同民族資产阶级对抗。于是，在建立革命的民主政体的口号下动员群众的某一个阶段，苏維埃能够而且應該建立起来。在每一个特定时期，他們的历史作用，特別是他們同国民議会的关系将取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水平、他們同农民的联系以及无产阶级政党政策的性质。苏維埃必然迟早会推翻資产阶级民主政体。只有他們能够使民主革命結束，并且开辟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个别的民主和过渡要求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相对重要性、它们的共同联系和提出要求的次序，决定于每一个国家的特点和具体条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它的落后程度。尽管如此，在所有落后国家中，革命发展的总趋势可以在俄国的三次革命（1905年、1917年5月和1917年10月）所明确闡明的意义上，由不断革命的公式来决定。

共产国际已經為落后国家提供了一个标准范例，說明如何有

可能断送一次强大的、有前途的革命。在 1925—27 年中国的暴风雨般的群众暴动中，共产国际沒有能够提出建立国民議会的口号，同时又禁止建立苏維埃。（按照斯大林的計劃，由資产阶级政党国民党来代替国民議会和苏維埃。）在群众遭到国民党鎮压后，共产国际在广州成立了一个不成样子的苏維埃。在广州起义不可避免地失敗以后，共产国际走上了进行游击战和建立农民苏維埃的道路，而产业无产阶级則完全保持消极态度。共产国际像这样走进死胡同以后，就大笔一揮利用中日战争消灭了“中华苏維埃”，不仅使农民的“紅軍”而且使所謂“共产党”都从属于同一个国民党，即資产阶级。

共产国际为了“民主的”奴隶主的友誼而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以后，不能不同时背叛爭取殖民地人民解放的斗争，其无耻程度甚至超过它以前的第二国际。人民陣綫和“国防”政治的任务之一是把亿万殖民地人民变成“民主的”帝国主义的炮灰。上面大书为解放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即人类的足足一半）而斗争的旗帜肯定已經落到第四国际手里。

### 在法西斯国家里的过渡要求綱領

同共产国际的战略家宣布希特勒的胜利只不过是向台尔曼的胜利前进的一步的时候比較起来，今天情况已經大不相同了。台尔曼被希特勒关进监狱到现在已經五年多了。墨索里尼使意大利处于法西斯束縛下已經有十六年以上。在这整个时期內，不仅是在进行群众运动方面，而且甚至是在认真建立一个非法組織（那怕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沙皇統治时期俄国各革命政党相比拟的組織）方面，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各政党都是无能为力的。

絲毫沒有理由根据法西斯思想体系的力量来解释这些失敗。

(从本质上說來，墨索里尼始終沒有提出任何思想体系。)希特勒的“思想体系”从来沒有对工人有任何重大吸引力。人民中有一个时期陶醉于法西斯主义的那些阶层(主要是中产阶级)，經過这一段时期以后已經完全清醒过来。只有新教和天主教会集团的反对力量比較明显，这并不是由于一半是胡說八道、一半是騙人的“种族”和“血統”的理論具有威力，而是由于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思想体系可怕地崩潰了。

在对巴黎公社进行大屠杀以后，黑暗的反动势力統治了将近八年。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敗以后，在一个几乎同样长的时期內，劳动人民茫然若失。但是，这两次的现象都是由力量对比关系决定的外表的失敗。此外，在俄国，它所关系到的还是一个几乎是处子般的无产阶级。在那个时候布尔什維克派成立甚至不到三年。在德国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在那里，领导来自强大的政党，其中一个党已經成立了七十年，另一个党也成立了差不多十五年。这两个有千百万选民支持的政党在战争以前，精神就已經瘫痪，还没有經過战斗就投降了。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灾难。德国无产阶级并不是在战斗中被敌人击潰的。它敗于自己的政党的懦弱、卑鄙和不忠实。因此，难怪，它对于差不多九十年以来它一向相信的东西失去了信心。而希特勒的胜利又加强了墨索里尼。

西班牙或者德国的革命工作的长期失敗完全是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国际的罪恶政治活动造成的后果。非法的工作不仅需要群众的同情，而且还需要它的先进阶层的自觉热情。但是可以指望在历史上已經破产的組織有热情嗎？以流亡領袖姿态出现的人大多数不是沮丧到了骨子里，就是克里姆林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代理人，要不然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前部长，他們梦想出現某种奇迹，

工人会使他們官复原职。有可能(那怕只是一分钟)想像这些先生們能成为“反法西斯”革命的未来領袖嗎?

世界舞台上的事件——奥地利工人被鎮压下去、西班牙革命的失敗、苏維埃国家的墮落——不可能有助于意大利和德国的革命暴动。由于德国和意大利工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无线电广播获得政治新聞，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說，莫斯科电台成了使极权国家的工人士气沮丧最强有力的因素，莫斯科电台一方面散布热月党人式的謊話，又很愚蠢和傲慢。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斯大林完全成了戈培尔的助手。

同时，促成了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而且在法西斯主义下还繼續起作用的阶级对立正在逐渐危害法西斯主义。群众感到空前不满。成百成千的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工人不顾一切，正繼續进行革命的一点一滴的准备工作。沒有直接体验到旧的传统和巨大希望的粉碎的新的一代活跃起来。在极权主义的沉重墓碑下，无产阶级革命正在不可抗拒地进行着一点一滴的准备工作。但是，潜伏的势力要爆发成为公开的反叛就需要无产阶级寻求新的前途、新的綱領和新的、純洁无疵的旗帜。

主要的障碍就在这里。法西斯国家的工人要选择一个新的綱領是极为困难的。綱領需要得到經驗的証实。在极权主义的专制国家里所缺乏的正是群众运动的經驗。要推动法西斯国家領土上的革命运动，非常可能需要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无产阶级取得真正的胜利。一次財政的或軍事的大灾难也可能产生类似的作用。目前，必須进行主要是宣传性的准备工作，這項工作只有到将来才会产生巨大結果。但是即使就这一点而言，也可以确定不移地指出一点：法西斯国家中的革命浪潮一旦突破，将立即具有巨大声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停止于使某种魏瑪僵尸复活的实验。

第四国际与早就破产的旧政党正是从这一点上开始发生不可調和的分歧的。在一切可能建立的“人民陣線”中，流亡的“人民陣線”是最恶毒和最不忠实的。它基本上标志着无能为力地渴望与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自由資产阶级联合。如果它成功了，也只不过为无产阶级准备了一系列西班牙类型的新失敗。因此，无情地揭发“人民陣線”的理論和实践是进行反法西斯革命斗争的最重要的条件。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第四国际反对以民主口号作为动员群众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手段。相反地，在一定的时候，这种口号能够起重大作用。但是，对我们說来，民主的公式（出版自由、組織工会的权利等等）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独立运动中的偶然的，或者插曲性的口号，而不是資产阶级代理人套在无产阶级脖子上的民主套索（像西班牙那样！）一俟运动具有某种群众性，民主口号将与过渡性的口号交織起来；可以假定，在旧事务主义者从他們的办公室匆匆跑出来組織工会以前，就会出现工厂委员会，在新的制宪議会在魏瑪开会以前，德国各地就会紛紛建立苏維埃，意大利以及其余的极权主义和半极权主义国家情形也一样。

法西斯主义使这些国家建立了野蛮的政治制度。但是它并没有改变它們的社会結構。法西斯主义是掌握在金融資本手中、而不是封建地主手中的工具。革命綱領的基础應該是阶级斗争（法西斯国家也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的辯証法，而不是被吓坏了的破产者的心理。第四国际厌恶地駁斥政治假面具的种种状态，这种假面具迫使斯大林主义者——以前“第三时期”的英雄們，依次戴着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人、德国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种种面具出现，只是为了掩盖他們自己的丑脸。第四国际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它自己的旗帜下出现的。它公开地向法西斯国家中的

无产阶级提出自己的纲领。全世界的先进工人已经坚决地相信，只有在第四国际的领导下，才会推翻墨索里尼、希特勒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和模仿者。

### 苏联和过渡时期問題

十月革命后建成了工人国家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先决条件——生产资料的国有提供了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工人国家的机构在同时发生了彻底的退化：它从工人阶级的武器变成了对工人阶级采取官僚主义的暴力手段的武器，并且日益成为破坏国家经济的武器。一个落后而孤立的国家的官僚主义化和官僚机构变成一个十分强大的特权阶级制度的现象最令人信服地驳斥——不仅是在理论上，而且这一次是在实践上——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

因此，苏联是可怕的矛盾的体现。但是它仍然是一个退化的工人国家。对苏联的社会诊断就是这样。政治预测具有非此即彼的性质：要么是日益成为工人国家中世界资产阶级机构的官僚阶级推翻新的所有制形式而把国家拉回资本主义，要么是工人阶级粉碎官僚阶级而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第四国际各支部看来，莫斯科审讯不是意外，也不是克里姆林的独裁者个人疯狂的结果，而是热月政变的合法产物。审讯是从苏维埃官僚阶级内部的无法忍耐的冲突产生的，而这种冲突又反映了官僚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人民”内部日益加深的对立。审讯的血腥的“异想天开的”性质说明了矛盾的激烈程度并且还预示结局的迫近。

拒绝回莫斯科的前克里姆林驻外代表的公开言论无可辩驳地以其独特方式证实官僚机构中间存在各式各样的政治思想：从真

正的布尔什維主义(如伊格納斯·里斯)到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如 F. 布登科)。在官僚机构內只占少数的革命者反映了(虽然是消极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利益。法西斯反革命分子人数不断增加，他們越来越一致地表现了世界帝国主义的利益。这些未来的买办不无理由地认为，只有以吸收“西方文明”(即资本主义)的名义，反对国有化、集体化和垄断对外貿易，新的統治阶层才能保障他們的特权地位。在这两个极端之間，还有中間、趋向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各式各样的孟什維克——社会革命党——自由主义的流派。

即使在所謂“无阶级”社会的下层群众内部，无疑也存在着与官僚机构内部所存在的完全一样的集团，只是表现得不那么鮮明而且人数不多，自觉的資本主义趋势主要是集体农庄的繁荣部分的特色，突出代表的只是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但是这个阶层为自己提供了发展积累个人財富而使人們普遍貧困的小資产阶级趋势的广泛基础，并且受到官僚机构的有意識的鼓励。

今天主要变成了斯大林的拿破崙主义集团的热月党人式寡头們依靠恐怖方法苟延残喘，他們居于这个对立日益加深的制度的頂端，越来越妨碍社会的平衡。最近的审判阴谋是为了打击左派。对于清扫右翼反对派的領袖說来，情况也是如此，因为从官僚机构的利益和趋势看来，老布尔什維克党的右翼集团是一种左的危险。拿破崙主义集团由于同样害怕它自己的布登科类型的右翼盟友，为了自我保存而被迫把老布尔什維克一代几乎全部处决，这个事实无可爭辯地証明革命传统在群众中間的活力以及群众的日益加深的不滿。

西方的小資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昨天刚鉴定莫斯科审訊是道地的真貨色，今天就一再坚持說“苏联既沒有托洛茨基主义，也沒有

托洛茨基分子了”。但是，他們沒有解釋为什么所有清洗都是在恰好是同这种危险作斗争的旗帜下进行的。如果我們把“托洛茨基主义”当作一个完全的綱領(甚至更貼切一些，当作一个組織)来检验，那么毫无疑问，“托洛茨基主义”在苏联是极为羸弱的。但是，它的不可毁灭的力量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它不仅表现了俄国工人阶级革命传统，而且表现了今天俄国工人阶级的实际反抗力量。从克里姆林集团的观点看来，工人所蓄积的对官僚机构的社会仇恨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它完全有理由极为害怕工人的深刻而沒有表示出来的愤怒与第四国际的組織之間的联系。

消灭旧布尔什維克一代以及中間一代和青年一代的革命代表起了破坏政治平衡的作用，使这种平衡更有利于资产阶级右翼、官僚机构和它在全国各地的盟友。我們可以預料他們，也就是右翼，在下一个阶段会作更坚决的努力来修正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且使它更接近于法西斯形式的“西方文明”。

这种前景使“保卫苏联”問題具有了有推进作用的具体內容，如果明天资产阶级法西斯集团(比如布登科派)企图夺取政权，“里斯派”必然会在街垒对面排成陣势。虽然它会暂时成为斯大林的盟友，但是它保卫的不是拿破崙主义集团而是苏联的社会基础，即从资本家手中夺取来的财产变成国家的财产。如果事实証明“布登科派”是希特勒的盟友，那么“里斯派”就会在国内以及全世界保卫苏联不受军事干涉。任何其他做法都是背叛行为。

虽然因此不容許事先否认有可能在特定情况下，与官僚机构的热月党人一派建立“統一战線”，来对付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公开进攻，苏联的主要政治任务仍然是推翻同样的热月党人官僚机构。它多統治一天，将有助于破坏社会主义經濟因素的基础，并且增加资本主义复辟的机会。正是在这一方面，共产国际作为斯大林集

团的代理人和同謀者扼杀了西班牙革命和瓦解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士气。

正如法西斯国家的情况一样，官僚机构的主要力量不在它本身，而在于群众的失望，在于他們缺乏新的前途。正如法西斯国家的情况一样(除了野蛮統治更无节制这一点以外，斯大林的政治机构与这种国家并沒有两样)，今天在苏联只可能进行准备性的宣传工作。正如法西斯国家的情况一样，国外的事件可能成为推动苏联工人革命高潮的动力。全世界的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今天是反对斯大林独裁的斗争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有許多迹象說明，共产国际由于在国家政治保卫局中沒有直接的基础，将比拿破崙主義集團和整个热月党人的官僚机构先垮台。

\* \* \*

毫无疑问，苏联在为反对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压迫而斗争的旗帜下开始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打倒官僚机构的特权！打倒斯达哈諾夫运动！打倒苏維埃貴族和它的等級！对各种形式的劳动給以更为平等的工資！

在爭取恢复和发展苏維埃民主的斗争中，开展爭取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自由，爭取集会和出版自由的斗争。

官僚机构以希特勒—戈培尔式的普选权的鬼話代替了作为阶级机构的苏維埃。必須使苏維埃不仅恢复它的自由民主形式，而且恢复它的阶级內容。就如一度不容許资产阶级和富农参加苏維埃一样，现在必須从苏維埃中把官僚和新貴族清除出去。在苏維埃中，只容納工人、普通的集体农庄庄員、农民和紅軍軍人的代表。

沒有各苏維埃政党的合法化，苏維埃的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工人和农民将通过他們自己的自由投票来表明他們承认哪些党派

是苏維埃政党。

从头到尾修改經濟計劃以符合生产者和消費者的利益！必須恢复工厂委員会管理生产的权利。必須由一个按民主原則組織起来的消費合作社来控制产品的质量和价格。

改組集体农庄以符合农庄劳动者的意志和利益！

必須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策来代替官僚机构的反动的国际政策。公布克里姆林的全部外交文件。打倒秘密外交！

一切由热月党人的官僚机构进行的政治审判必須从全部公开、任人爭論和公平正直的角度来重加审查。只有被压迫群众的革命起义获得胜利才能恢复苏維埃政权，并且保証它向着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只有一个党能够領導苏联群众起来叛乱——那就是第四国际的党！

打倒該隱<sup>①</sup>般的斯大林官僚集团！

苏維埃民主万岁！

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 反对机会主义和无原則的修正主义

法国里昂·布魯姆的党的政治活动再一次証明，改良主义者甚至从最悲惨的历史教訓中，也吸收不到任何东西。法国社会民主主义生搬硬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結果走向同一下場。在不过几十年內，第二国际就与資产阶级民主政权糾纏到了一起，成了它的一部分，并且正在同它一起腐烂下去。

在资本主义危机肯定使无产阶级革命列入日程的时候，第三

① 源出聖經旧約創世紀第四章，曾杀其弟亚伯。——譯者

国际走上了改良主义的道路。共产国际今天在西班牙和中国的政策——即奉承“民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证明，共产国际同样没有能力吸取任何进一步的教训或者是有所改革。在苏联成了一支反动力量的官僚机构不可能在世界上起革命作用。

一般说来，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经历了同样的发展。在法国，里昂·石乌的工团主义官僚机构早就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资产阶级代理机构。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脱下了它的革命外衣，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战车上的第五个车轮。

以伦敦局为中心的介于中间的中派组织只不过是社会民主主义或共产国际的一个“左翼”附属物。他们表现得完全没有能力弄清政治形势的来龙去脉，并且从中得出革命的结论。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它们当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它在革命条件下证明完全没有能力走革命路线。

\* \* \*

多年来世界无产阶级遭到的惨败注定官方组织要更为保守，同时驱使失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去追求“新方式”。在反动和衰退时期，总是四面八方出现各式各样的骗子，他们想要修正革命思想的整个路线。他们不从过去吸取教训，反而“抛弃”过去。有些人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相矛盾，有些人宣布布尔什维主义垮台。有些人要革命理论为背叛革命理论的人的错误和罪行负责；有些人怪药不好，因为药没有保证药到病除，立见奇效。更大胆的人说是一定能找到一种万灵药，而要人们在找到这种万灵药以前停止阶级斗争。许多“新道德”的预言家准备借助于伦理上的顺势疗法来复活劳工运动。这些宣传家大多数还没有到战场上就成了道德上的病人。因此，在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故纸堆中埋藏已久的旧药方在改头换面称作“新方式”后，向无产阶级提了出来。

第四国际宣布与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阿姆斯特丹国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国际作毫不妥协的斗争；此外斗争的对象还有：它们的中间派的卫星，不改革的改良主义，与国家政治保卫局结成联盟的民主派，没有和平的和平主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对革命十分恐惧的革命者。所有这些组织都不是未来的保证，而是过去的衰败的残余。战争和革命的时代会把它们化为灰烬。

第四国际不追求、也不发明万灵药。它完全坚持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使人能够懂得现实，追究失败原因和有意识地为胜利作准备的唯一的革命理论。第四国际继承着最初告诉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第四国际清除了各式各样的骗子和不请自来的宣扬道德的老夫子。在一个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里，最高的道德是社会革命的道德。不论什么方法，只要能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加强对他们自己的力量的信任并且使他们更加愿意在斗争中作自我牺牲，都是好方法。不能容许的方法是：对被压迫者灌输对压迫者恐惧和顺从的情绪，破坏抗議和愤怒的精神，或者以领袖的意志来代替群众的意志，以强制来代替信仰以及以哗众取宠和阴谋陷害来代替对现实的分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出卖马克思主义以图利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正好相反的东西——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道德的死敌。

应该正视现实；不应该寻求进行最小抵抗的路线；实事求是；向群众说真话，不论情况可能多么糟糕；不要害怕障碍；对小事情就像对待大事情一样一丝不苟；以阶级斗争的逻辑作为纲领的基础，在行动的时刻到来时要勇敢——这些就是第四国际的章程。第四国际已经表明它可以逆流而行。临近的历史浪潮将把它推向高峰。

## 反对宗派主义

在无产阶级的历史组织背叛的影响下，在第四国际周围产生或者重又产生了某种宗派主义的情绪和各种集团。它们的基本态度是拒绝为今天所存在的那种局部和过渡性要求（即劳动人民的基本利益和需要）斗争。对宗派主义分子来说，准备革命就意味着使他们自己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打算掉头不理“旧”工会，即千百万有组织的工人——仿佛群众能够设法生活在实际的阶级斗争条件以外似的！他们对于改良主义组织内部的内在斗争漠不关心——仿佛不过向群众的日常斗争就可以争取到群众似的；他们不肯把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区别开来——仿佛群众可以用不着分辨出各方面的差别似的！

宗派主义分子只能区别两种颜色：红色和黑色。为了避免引诱，他们把现实简化了。他们不肯把西班牙的两个战斗阵营区别开来，因为两个阵营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基于同样原因，他们认为有必要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他们否认苏联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有原则区别，由于苏联官僚机构的反动政策，他们反对保卫十月革命所创造的新的所有制形式不受帝国主义侵害。他们由于无法接近群众，因此就大事指责群众没有能力接受革命思想。

这些没有思想的政客一般不需要以过渡性要求作为桥梁，因为它们不打算经过这座桥梁达到彼岸。他们只是呆在某个地方混日子，满足于翻来复去作千篇一律的肤浅空想。对他们来说，政治事件是一个发表评论、而不是行动的机会。由于宗派主义者一般说来就如各种犯错误的人和盼望奇迹的人一样，每走一步都被现实所动摇，他们生活在一种永远恼怒的状态中，抱怨“政权”和“方法”，总是沉迷在琐屑的计谋中。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他们一贯

推行独裁制度。宗派主义在政治上的衰弱像影子一样，和机会主义的衰弱是相辅而行的，它没有显示革命的前景。在实际政治中，每一次在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宗派主义者都是同机会主义者、特别是同中间派联合起来的。

大多数依靠第四国际的饭桌上偶而掉下的面包屑过日子的宗派主义团体和集团都以一种“独立的”组织形式存在，它们尽管抱负很大、成功的希望却十分渺茫。布尔什维克一列宁主义听任这些团体自生自灭，不想为它们浪费时间。但是在我们自己队伍里也有宗派主义倾向，并且对于各支部的工作产生了极有危害的影响。此后哪怕是一天也不可能再同他们有任何妥协。奉行正确的工会政策是参加第四国际的基本条件。不去寻求和找到接近群众的道路的人不是战士而是对于党的沉重负担。制订纲领不是为了编辑部或者讨论俱乐部的领袖们，而是为了千百万人的革命行动。从第四国际的队伍中清除宗派主义和不可救药的宗派主义分子是革命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 开辟通向女工的道路！

### 开辟通向青年的道路！

西班牙革命的“领袖们”策动的革命的失败、法国人民阵线的可耻的破产以及对莫斯科的审讯骗局的揭发——这三个事实共同给予了共产国际以无可弥补的打击，而且附带给了它的盟友——社会民主党人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以严重创伤。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组织的成员立即就会投向第四国际。老的一代在遭到惨败以后会大批脱离运动。此外，第四国际肯定不会努力使自己变成一个革命伤兵、失望的官僚和野心家的避难所。相反地，为了防范目前在旧组织机构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小资产阶级人物大批

參加我們的黨，必須採取嚴格的預防措施：對於並非工人的候補黨員、特別是前官僚分子的候補黨員，延長他的候補期；在頭三年不讓他們擔任任何負責工作等等。在第四國際中，現在和將來都不容以往各國際的瘡痏——野心存身。只有那些願意為運動生活而不是靠犧牲運動生活的人才能到我們這裡來。革命工人應該感到自己是主人。我們的組織是向他們敞開著大門的。

當然，甚至在一度站到最前列的工人中間，也有不少精疲力盡和感到失望的人。至少在下一階段，他們將仍然是旁觀者。當一個綱領或者一個組織衰竭，負責其工作的一代人也隨之衰竭。運動將被不對過去負責任的青年復活起來。第四國際特別注意無產階級的青年一代。它的所有政策都是努力啟發青年對他們自己的力量和未來的信心。只有青年的新的熱情和進取精神能夠保證鬥爭取得初步勝利；只有取得勝利才能使老一代人中的最優秀的人回到革命的道路上來。過去是這樣，將來也將是這樣。

機會主義組織由於它們的根本性質主要集中注意工人階級的上層，因此忽視青年和女工。但是資本主義的衰退最嚴重地打擊了作為工資工作者和家庭主婦的婦女。第四國際各支部應該到工人階級中最受剝削的階層里（因此也就是到女工中間）去尋求支持的基礎。在這裡他們將發現無限的熱忱、無私和準備犧牲的精神。

**打倒官僚機構和野心！開辟通向青年的道路！面向女工！站到第四國際的旗幟下來！**

### **站到第四國際的旗幟下來！**

懷疑派問道：但是，建立第四國際的時候已經到了嗎？他們說，不可能“人为地”建立一個國際，國際只能從大事件中產生云

云。所有这些異議只不过說明，懷疑派对于建立新國際是沒有用处的。他們簡直就什么也干不了。

第四國際已經从大事件中產生了，那就是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最大的失敗。失敗的原因在于旧領導的墮落和背信弃义。阶级斗争是不容中断的。对革命說来，第三國際继第二國際之后已經死亡。第四國際万岁！

但是已經到了宣布第四國際成立的时候了嗎？……懷疑派的言論還沒有平靜下来。我們回答說，第四國際沒有必要“宣布成立”。它实际存在着而且在斗争着。它很弱嗎？是的，它的队伍人數不多，因为它还很年轻。到现在为止，它們还主要是干部。但是这些干部是未来的保証。除了这些干部以外，在这个星球上不存在任何名副其实的革命潮流。如果說我們的国际人數还不多，它在理論、綱領、传统以及对它的干部的无可比拟的锻炼方面是很強的。誰要是在今天还看不见这一点，让他站到一旁去。明天，情况就会更明显。

第四國際今天已經理所当然地遭到斯大林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資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的憎恨。在任何人民陣線中它都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存身的地方。它毫不妥协地与所有为資产阶级所左右的政治集团战斗。它的任务——取消資本主义的統治。它的目标——社会主义。它的方法——无产阶级革命。

沒有內部民主就沒有革命教育。沒有紀律就沒有革命行动。第四國際的內部民主是以**民主集中制**、充分的討論自由和行动的完全一致为基础的。

人类文化目前的危机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在第四國際中團結起来的先进工人向他們指出了脱离危机的道路。他們提出了

一个以无产阶级斗争中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斗争中的国际经验为基础的纲领。他们打起了一面纯洁无瑕的旗帜。

各国的男女工人，站到第四国际的旗帜下面来。它是你们的就要来到的胜利的旗帜！

### 三、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 告全世界被剥削群众书

(1948年5月11日)

——反对华尔街和克里姆林宫！

拥护《共产党宣言》的綱領！

拥护世界社会主义革命！

第四国际在紀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时于巴黎召开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三十三个支部的代表。本届大会认为有必要根据它的共产主义思想、目的和傾向，对革命先鋒队和全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問題作出答案。

人类在经历了两次世界战争、一次史无前例的經濟危机和在专政制度下的痛苦經驗之后，现在又面临着新的經濟灾难和新的世界战火的威胁。

目前的形势是資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必然結果。一个世紀以前，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无比明晰地說明了資本主义的运动规律。他們揭露了資本主义的无限扩张的趋势和按照它的想像来改造整个世界的需要。今天，資本主义生产已經滲入到地球上最落后的国家。它解放了奇迹般的生产力。它不断革新技術，用內燃发动机和电力来代替蒸汽，并分解物质以供应人类对于能量的永远不能滿足的需要。

資本主义是在經濟危机之間的間隙时期依靠它自身的矛盾而

取得这些进展的。工业资产阶级先破坏了旧的生产方式，以后，随着它的进展，又不断破坏它自己的最无效的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在完成了它整个的生存的周期之后，开始排斥伴随它一起誕生的那些原則。托辣斯和卡特尔的合并成为真正的工业和金融壟斷組織，消灭了一个国家內、或甚至許多国家間在許多工业部門里的自由競爭。正当资本主义的疯狂发展看来毫无阻碍时，資本的扩张給生产加上了人为的限制。在已經达到走向建立世界市場的自然界限之后，资本主义的全部爆炸性力量就轉向資产阶级本身了。于是资本主义制度就如《宣言》的两位作者所預言的那样开始衰落下来。

經濟危机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接踵而至，使整个国家的生活陷于瘫瘓，使社会各个阶层淪于完全破产。社会危机震撼了一切国家，損害各国政府并促进革命、反革命和內战。

巨大的技术成就不用于一般用途或竟完全用于破坏目的。在生产上仍然能够定期出现的突然的跃进不再能使人类大多数富有反而使他們貧穷。世界規模的劳动分工的日臻完善动摇了世界市場。历史的演进完全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资本主义不再把文明帶給世界上落后的民族，而是在它自身的衰落中破坏了那些在比較先进的国家里标志着资本主义上升的政治成就。資产阶级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障碍，因而在各个領域內都成了一种反动勢力。

战争代表着日趋衰落的资本主义的一切破坏性的和野蛮的特点，并支配着今天一切人类的活动。技术、科学、工业生产、政治和文学，都越来越完全为战争服务。

## 全面毁灭的危险

今天帝国主义战争的全球性是产生自资本主义生产及其危机的世界性。1914年到1918年的战争基本上仍然是一个欧洲战争。在谈到没有蔓延到北美、中美、南美和非洲与亚洲的大部分地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托洛茨基在1938年说，只有南极会被划在战争基地之外。具有深刻意义的是，目前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略准备指向一个不顾一切控制南极洲的斗争。在这样一种战争中，没有一个民族或大陆能够幸免，没有一个国家的首都能够安然无恙，没有一块文明乐土能够被放过。漫无限制的破坏力量会在几年之内毁灭掉几百年的劳动成果，使全世界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

人们甚至在签订和平条约正式结束上一次战争以前，就已经结成军事同盟准备作下一次的屠杀，人类对于这种结盟的迅速感到恐惧。这种恐惧特别集中在原子弹上。正如战争看来迥非人类所能控制，它不受有思想的人类的活动的约束，而总是按照它自己的罪恶的逻辑发展一样，原子弹的无限牵连也超出了专家和外交家们的计划，推翻了将军们和股票市场老手们的估计。人类从来没有这样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吃惊过，工人从来没有被如此一个可怕的东西支配过，活的劳动力从来没有这样被死的劳动成果征服过。但是，原子能在把矛盾重重的资本主义引向人类文明全面毁灭的同时，也在一个工人阶级支配的社会里开辟了一个和平幸福的新时代的远景。

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学者们正力图以“世界政府”来缓和这种给人类带来恐怖时代的永久性威胁。某些人的这种提议不过是为华尔街的权力渴望找出一种理论上的根据。另一些人是在真诚

地寻求一种神奇的公式，以控制在衰落中的资本主义所不斷放出的破坏力。他們誰也沒有領会世界战争与资本主义衰落的真正关系。

今天，只有为战争而生产才能为在自己的世界市場上遭到抑制的資本找到新的出路。战争不过是衰落的资产阶级試图克服它本身矛盾的一种特別的手段。这种做法不但远不能成功，而且只能在力图消灭旧的矛盾的同时引起新的矛盾。垄断資本不但远不能消灭竞争，反而使竞争更加尖銳化，这在垄断資本之間的斗争中和經紀人(他們正在为这个过程所毁灭)之間的竞争中都有同样的表现。四大国、三大国、两大国的时代不但远不能結束国际冲突，反而使处于支配地位的列强之間的冲突更为严重。

要把德国和日本排除于独立强国之外，美帝国主义就不能不容許俄国崛起，不能不容許以前被排除的国家(如法国和中国)复兴。要有效地和俄国斗争，就不能不在明天恢复德国和日本的独立。这并不是罗斯福犯了什么錯誤或者麦克阿瑟性喜权謀术数的問題，而只是說明了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像美国这样一个据說可能独自残存下来的唯一的世界强国也只能使全世界淪于毁灭，成为在民族和殖民地冲突中的无穷变乱的牺牲品。伯恩罕(Burnham)今天提出的“結束一切战争的战争”和威尔逊昨天所领导的战争一样，不会导向美洲的和平而只能导向普遍的混乱。

正如资本主义在它的全盛时期不能控制生产力一样，在它的极端衰落时期也同样不能控制破坏力。在这两个阶段的中間时期，它已自掘了坟墓并制造了自己的掘墓人——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是要給社会指出一个自觉的方向，以反对那种不可避免地把资本主义世界拖向世界战争的盲目力量。資本主义命运已定，它的丧钟已經响了。总之，它如果不化为原子灰尘，就必

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面前灭亡。

一百多年以来，资本主义表明了对于人类一切关系的最野蛮的否定。它的統治完全是通过它的生产法則的結構而扩展的。国家只是在尽量少干涉这些法則的自由作用的情形下才受到資本家的拥护。一切奴役和一切自由都分別强加于和体现在那个唯一的貿易自由——人类最大的束縛——上。

这种資本主义生产法則的結構本身容許資产阶级在它的商品还起有革命作用的时候否定一切人类关系，但是，一旦这些法則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这种結構就立刻迫使資产阶级拚命改变这些法則的运用。在“不干涉主义”口号下产生的資本主义现在却主張一种最富有寄生性的組織化了。資本主义在和专制主义的激烈斗争中兴起，可是今天它却在力求建立极权主义的国家了。

### 資本主义的极权主义性质

垄断資本家在破产和繁荣之間的危岩上度过了四十年，他們由于不断地受着被新的革命所推翻的威胁而提心吊胆，从他們的貸借对照表上感觉到他們的經濟崩潰的反响，所以他們不可避免地要把各方面的社会活动放在他們的严格控制之下。国家的逐漸消失在一世纪以前曾經得到資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辯护人的贊頌，而现在这个国家却正在变成一个庞大的机器，既控制人于生前，又在死后把他們的尸体鑄成金币。继自由主义的議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民主主义之后而来的是极权主义的专政时代。

通过資本主义国家机构的不断扩大，垄断資本家把一切經濟生活放在他們的严格控制之下。通过强制托辣斯化、国家分配原料、国家統制信貸和某些薄弱工业部門的国有化，他們对資产阶级和小資产阶级同样地加以专横的控制。通过使工会成为国家組

織，通過強迫仲裁、限制或者完全取消罷工權利、御用工会、賄買、奸細和恐怖主義，他們在不能徹底消灭工人運動的時候試圖對它加以限制。通過控制教育制度並依靠著他們的亲密盟友——教會的帮助，他們試圖阻止工人階級儿女們的階級覺悟的發展並為了他們自己卑鄙的利益對工人儿女進行教育。報刊、電影、無線電廣播成了製造公共輿論的庞大組織，也就是說，成了為壟斷資本家的利益來欺騙和敗壞公眾的庞大組織。他們不以把醫生、律師、詩人和科學家列為工資劳动者為滿足。而且還命令這些人接受他們自己的關於公共衛生、法律、文學和科學的概念，在他們的社會保守主義壓力之下窒息文化生活。上升的資本主義把人的價值降低為交換價值。衰落的資本主義却在它的極權主義警察制度的高壓下破壞了人的價值。

### 德国和中国的例子

今天，資本主義的極權主義性質在法西斯專政上表現了它的完備的形式。德國的壟斷資本主義把絕望的和貧窮化了的中產階級組織起來，利用一切鄙陋陳舊的偏見，建立起一個野蠻國家，在集中營里公然對七百萬囚犯進行屠殺。但是，正如第四國際所預言的，“消滅法西斯主義的戰爭”本身也導致了在其餘的民主國家里採用極權主義的手段。英國的工黨因為用可憐的改良方法不能解決社會危機，正在把成千上萬的小資產階級分子投入法西斯政治煽動家的懷抱。在艾德禮、貝文和摩里遜領導之下，曾經以國內自由主義非常自豪的英國政府竟解除了被懷疑為同情共產主義的科學家的職務。美國軍人進入政府擔任主要職務，外交機關里的“六十家族”與“高級將領”的緊密的結合，反對共產主義的歇斯底里，特務恐怖，甚至於教會在工會內部的反動進攻——所有這些現

象都标志着資本主义国家极权主义化在美国的发展。各国残存下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日益采取一种腐朽堕落的形式，勾結为大資本家服务的將軍和冒险家，給民主政治以最后的打击。

資本主义的极权主义化最清楚地証明，今后的社会矛盾不容許資本家“正常地”取得他們的利益。它不但不表明資本主义的一个新的稳定阶段，而且最有力地表现了資本主义制度临終时的痛苦。

### 极端混乱的体制

在沉悶的表面現象掩盖之下，資本主义內部的一切分解的力量不断地起作用。社会問題的爆发动搖了資本主义制度并导向一場国际性的灾难。資本主义組織的“最高”阶段表现为一种血腥的混乱的組織，它把共产主义革命提到了日程上来。

如果資本主义繼續存在下去，人类在德国和中国这两面鏡子里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命运。

今天的德国已經不再是一个政治的、經濟的和社会的实体。五个省既被割走，全国复分成为四个占領区。城市毁灭，土地荒废，千百万居民到处流浪以逃避饥饿和恐惧。經濟組織崩潰，全国財富遭到破坏或被搬走；劳动力感到不足，商业陷于停頓。

大約二十年前，德国尽管在战争中遭到失敗和接着受到革命的打击，然而它在欧洲大陸上仍然拥有最强大的工业、最合理化的农业、最有技术的工人和最发达的商业。德国的工人阶级曾經有三次显然要把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它取得政权，它一定会使德国的技术和俄国的广大經濟資源和平地結合起来。阻碍它把巨大的生产力量用在建設上的障碍一定会被粉碎。把这种力量主要用于滿足人类的需要上，一定会在这块古老大陸上开辟

一个和平幸福的时代。但是，每一次都是由一个沒有能力或者叛变的工人領導无益地消耗了德国劳动群众的巨大战斗力量。工人們經過十五年徒劳无益的努力被弄得精疲力尽，最后无抵抗地被交到納粹独裁政权的魔掌里。于是資产阶级为了自己貪婪的目的組織起强有力經濟机器，并把它发展成为这样一种可怕的和爆炸性的力量，以至于最后把整个德国埋葬在废墟中，同时也搅乱了整个欧洲，使每个国家都遭到蹂躪破坏。

中国在一个失敗的革命动乱中間掙扎了二十年。除了自然灾害的无数牺牲者之外还有千百万社会变乱的牺牲者。战争、内战、暴动和征討不断地蹂躪这个广闊的国家。旧日的手工业日益沒落而现代工业却并未得到发展。高利貸吞沒了农业收成而資本却沒有开辟出道路。通貨膨胀破坏了城市，但是成千上万的无地的和饥饿的农民却繼續涌进城市。政府的职位卖給出价最高的投标人，而蒋介石大元帅却把国家經濟当作一家的私产来經營。到处都可看到破产、停滞和腐朽。

在形成中国新社会的熔炉中，在帝国主义渗入的震动之下，誕生了一个迅速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年輕的工业无产阶级。依靠渴望解放的千百万貧苦农民的支持，工人有一个大好的机会来推翻中国社会的整个腐朽組織，同时使这个国家摆脱外国帝国主义和國內資产阶级的統治。通过統一全国和合理地利用全国的广大資源，中国革命本来可以成为整个殖民地世界革命的信号，并且在各国敲响帝国主义的丧钟。这样人类本来可以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它的悲惨后果。但是，斯大林主义者的領導使非常有希望的中国革命遭到失敗，因而使这个国家进入一个无穷变乱的时代，而国家的有生力量也遭到了破坏。

在德国和中国，我們看到衰落的資本主义发出来的破坏力所

造成的可怕的后果。它使最先进和最文明的国家堕入一种兽性的野蛮状态，同时也阻碍落后民族走向发展的道路。在资产阶级兴起时期，从先进国家可以看到落后国家的将来。今天，社会如果不从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德国和中国就可以看到全世界的命运。

如果说现代社会的一切衰落趋势似乎集中在德国，那么一切还没有使用的抵抗资本主义衰落的力量似乎就是集中在美国。在美国资产阶级从两次世界大战当中变为巨富的同时，旧欧洲大陆却由于战争而沦为贫困。欧洲国家的败落造成了美国工业、农业和金融的空前发展。今天美国掌握着全世界黄金和资本投资的三分之二。全世界的一半商业要经过美国的手。美国的金元统治着股票市场。美国的空军控制着天空，美国的海军支配着七大洋。从南京到巴黎，从雅典到里约热内卢，所有的政府都依靠美国的贷款来维持自己。美国的银行家分割了拉丁美洲，同时美国的石油公司也收买了阿拉伯的酋长。美国的军事顾问指挥着土耳其和格陵兰的军队，美国的商人分配着罗马和东京的口粮。教皇和英国的工党政府、佛朗哥的独裁政权和澳洲的民主政府都互相竞争以取得华尔街的宠爱和白宫的恩赐。美国的影片、跳舞、书刊和罐头决定着一切国家的生活方式。

### 美国革命的远景

但是，如果说美国的势力和财富是从其余资本主义世界的停滞和衰落中取得的，这种衰落不可避免地要反过来对美国发生作用。今天，处在一个穷困欲死的世界当中的美国资产阶级有被它自己的财富所窒息的危险。整个世界作为美国工业的市场仍不能满足其需要。世界每一部分的每一个震动都对华尔街有影响。使

人难以相信的是，不到十年以前，美国的资产阶级还在认真地讨论孤立主义。今天，意大利的选举、巴勒斯坦的纠纷和日本的罢工对于美帝国主义都成了切身利害的问题。正如垄断资本主义趋向于使一个国家的生活极权主义化一样，处于支配地位的美帝国主义积极努力使世界美国化。“或者一个世界或者没有世界”——一个政客的这种说法特别意味着世界危机最后将变成为美国危机。

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表现出一个行将到来的危机的一切迹象。公债的沉重负担吞没了这个国家的储备金。往往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到来以前出现的通货膨胀、投机和非生产性投资的狂潮支配着全国。利润的下降很快就会阻碍生产，它反过来又会遭到一种和以前的空前上升一样猛烈的下降。此外，两党制的危机、工人运动政治发展的迟缓、天主教会日益扩大的影响、充满了亲法西斯的紧张的空气（极端的沙文主义、反共产主义、种族偏见），所有这一切都预示在未来十年内将彻底推翻众所公认的美国政治的传统观念。刚从地方主义挣脱出来的美帝国主义者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在五大洲上保护资本主义的艰巨任务。他们的巨大财富永远无补于他们政治经验的明显不足。英帝国主义者过去能够单靠经济力量统治世界。今天的美帝国主义者却不得不在每一个国家里装备雇佣军。英国的资本家在他们的上升时期能够用从全世界得来的利润的一小部分破坏国内的工人阶级运动。但是，美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衰落时期，如果不使国家彻底军国主义化和粉碎国内的无产阶级，就不能建立它的世界统治。这就是为什么美帝国主义对全世界的进攻，同时也就是对于美国无产阶级在世界政治上的一种教育。美国的危机所解放出来的力量将联合起来直接反对华尔街的帝国主义政策。美国的工人阶级将第一次看到自己面临着共产主义的必然到来。

美国资产阶级把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集中在纽约和加利福尼亞之間，已經制造出一个数目非常庞大和具有高度技术的工人阶级。美国的无产阶级面对着一个使它的工人运动的传统的落后性得到克服的急剧的发展。在 1929 年的严重危机的鞭策之下，工人阶级向前跃进了一大步并且达到了一种很高的工会觉悟的水平。随着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庄严的出现，美国的工会运动成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强大的运动。在下一个经济危机的鞭策之下，美国工人的觉悟将有一个新的跃进并将提高政治觉悟。美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政治化将是俄国革命以来对资本主义的最具有爆炸性和威胁性的一种发展。从现在起，美国的资本主义就面临着这种发展。勇敢地准备担当起这一运动的领导工作是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责任。美国不存在有力的改良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的传统，对他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这个今天在它的内部集中全力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明天将给革命运动以最高的表现。美帝国主义势力的遍布于全世界一定会使美国革命成为明天世界革命的信号和动力。

### 苏联的作用

今天只有一个国家和美帝国主义相对抗。这个国家就是苏联。苏联的富源既不受美帝国主义的控制而苏联的公民也不受它的剥削。旧的腐朽的沙皇帝国已经被消灭。代之而起的是世界上第二个最强大的国家——苏联。

如果仍然需要证明十月革命在历史上的正确性，比较一下俄国和中国的命运就足够了！最后三十年的历史已经表明，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产生许多不可控制的离心力量相比，这个革命给苏联带来了特别牢固的新的社会关系。如托洛茨基所说的，计划经

济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鋼鐵、煤炭和混凝土的生产上，而且也在和集中起来的欧洲的整个資本主义勢力相对抗的戰場上得到了証明。

但是，同时历史也表明，在这些远比資本主义优越的社会关系的內部，墮落和反动发展到了一种可怕的程度。苏联生活的各方面都受到了官僚制度的传染。

官僚制度的欺騙、寄生和侵吞(公款)，給集体生产加上了越来越难以忍受的負担，不断地降低国家基本資金的积累。

随着这些官僚主义暴发戶們的貪欲的增长，社会的不平等和一小撮人霸持特权的现象越来越加重。革命时期軍事独裁政权用最野蛮的警察恐怖来对付日益增加的社会不安，把工人束縛在工厂里，用血腥的手段粉碎农民的反抗，并用大规模的清党运动来清除一些官僚制度本身的建立者。

在群众的墮落和不幸当中，官僚制度恢复了已經被革命废除了的一切风尚。十月革命曾經带来一种严格的平等、一种革命的忠誠和为集体利益而牺牲的精神，而苏联的官僚制度却設置了官銜、軍服、金裝綬帶和一种卑鄙貪婪的风气。

官僚制度用大俄國民族主义和神秘的泛斯拉夫主义的丑恶的混合物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样，在俄国也同样看到了世界无产阶级失敗的可怕的后果。

资本主义的极权主义化和斯大林主义的极权主义专政并不是相同的东西。它們具有不同的物质基础和不同的阶级性质。但是它們都同样地表现了人类为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迟延所付出的代价。

斯大林受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論的残酷的报复。苏联官僚制度的小资产阶级保守主义首先导使它扼杀欧洲的革命以换取

一个和世界資产阶级訂立的轉瞬无效的暫定條約，接着官僚制度以一种不可調和的邏輯，把它的統治扩展到俄国的边界以外，目的是为它的經濟困难找到一种临时解决方案和为它的反对帝国主义包围找出一种同样轉瞬无效的保护办法。

官僚制度在它控制下的国家里所采取的政策能够說明它的矛盾性质。因为官僚制度不能把特权分給資产阶级，所以它排除了資本家对于政府和經濟的控制。在这些国家里边所采取的措施，如国有化、土地改革等，并不是出自对社会主义的热爱，而是出自官僚制度希望加强它对于緩冲国家的經濟和政治生活的絕對控制以取得它自己的特权。一旦达到了这个目的，它必然要反对群众，压制他們的活动和組織，并对他们实行专制的統治。

在抓到了緩冲国家的一部分重要工业和促成大企业国有化之后，克里姆林宮就要把每一个国家的最大一部分資源占为己用而不考慮群众的利益。在遇到民族資产阶级的頑强抵抗时，它就采取動員一部分群众的方法和大规模的警察行动来使他們就范。

因此，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就采取了一种軍事独裁的形式，一方面針對資产阶级軟弱无力的抵抗，給右翼以打击，一方面針對工人的迟疑不决的維持生活标准和保卫基本民主权利的努力，給左翼以打击。

某些在很久以前就已經对无产阶级革命失去一切信仰的眼光短浅的小資产阶级“理論家”，看到了官僚制度的扩张的結果，就对“斯大林主义者的现实主义”的“成功”表示惊叹。他們說：“整个东欧不是都已經实行国有化了嗎？”

另外一些人，受到斯大林主义者的“日益强大的力量”的严重的恐吓，认为它是走向世界統治的一个新的可怕的剥削社会的代表。这两方面的歇斯底里都非常奇怪地与斯大林主义者的宣传相

符合，都是最鄙俗的印象主义的产物。

### 官僚制度的罪恶

斯大林的在东欧的“社会主义成就”实际上是在德黑兰、雅尔达和波茨坦让給它的。为了换取这些“成就”，斯大林出卖了在印度的一九四二年八月的起义，命令在希腊的游击队解除武装，把法国的群众运动交给了戴高乐，使一切西欧国家里边的搖搖欲墜的資产阶级重新掌握了政权，并且帮助粉碎了德国的无产阶级。

由于他慣用丑恶的拆散、掠夺、放逐和恐怖的手段，斯大林甚至在世界工人运动内部引起了希特勒从来没有能够引起的对于苏联极端敌視的感情。这就是斯大林主义者“胜利”的一篇令人难忘的賬目。

因此，斯大林政策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把苏联导向和 1939 年一样的絕路。苏联官僚机构因为不能依靠群众的革命斗争精神，所以采取了扩张主义和实力政策。因此，它只是使一般局势严重化，从而促成一場不可避免的和帝国主义的实力比賽；因此它只是帮助了帝国主义勢力在华盛顿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

斯大林利用了他所得到的那个靈驗的符咒来解釋那些万恶的罪行。无论他进一步的成就如何，他正在奔向自我的毁灭。

只要斯大林的政策一直因处在必須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制度和美帝国主义二者当中选择其一的窘境里，只要它不能上升到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水平，整个世界所面临的前景将不是复兴和发展，相反地，是加速瓦解和衰落。

在过去四十年里，欧洲的历史一直是生产力反抗民族国家界限的历史。两次世界大战不过是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組織”这种反抗使其对自己有利的一种拚命的努力而已。

法帝国主义在 1918 年不具备把这种組織掌握在自己手里所必需的工业力量和政治活力。通过凡尔賽体系，它用传统的外交政策来“組織”欧洲：訂立和約、締結軍事聯盟和設置財政貸款。在第一次經濟恐慌之后，这一体系就完全瓦解了。

接着，建立在优越技术和高度生产能力的基础之上的德国帝国主义，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目的是要把这个旧大陆組織起来，使其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軍事上和經濟上符合于自己的需要。尽管它在軍事上获得了压倒的胜利，然而这个“欧洲新秩序”甚至于比它以前的凡尔賽体系瓦解得还快。它的組織不过是一个掠夺性和破坏性的巨大企业，它榨取人民的一切經濟資源来填滿它的战争机器的永不滿足的需要。

今天的美帝国主义，受它的統治地位的不可調和的邏輯所驅使，力图用它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个老問題。它所使用的政治和經濟手段(馬歇尔計劃和西方集團)似乎和前述两个国家的手段具有不同的性质。美帝国主义表面上不是要拿走一些东西而是要給一些东西。它不是要組織一群破产的卫星国而似乎是要由感恩图报的債務人結成一个团体。这就是为什么像丘吉尔那样狡猾的冒险家和像居伊·摩勒那样的小資产阶级分子，在“美国制造”的“欧洲联邦”的口号之下聚集在一起，希望美国賜給的食糧能够使他們把对旧欧洲的記憶保持得更长久一些。

实际上，在华盛顿保护之下的欧洲組織所追求的目的与法德两个帝国主义所追求的目的基本上并沒有什么不同，而为了同样的理由，也不可避免地要失敗。的确，美帝国主义要取消壁垒，要使財政上軌道，要穩定币制。但这完全是为了“組織”它的顾客的购买力和它的債務人的偿付能力。同时它不得不“組織”他們收縮市場和增加債務。沒有會議能够把它从这种政策的內在矛盾中挽

救出来。馬歇尔計劃下的欧洲和凡尔賽与希特勒的欧洲一样，只能是一个軟弱无力的和貧穷化了的欧洲。

在如果得不到贷款就要被困死的威胁之下，欧洲資产阶级今天接受美国的一切条件，正如在 1940 年接受希特勒和国防軍的荒謬的命令一样。但是，一旦美国发生危机，美元来路断絕，每一个資产阶级都将拚命地寻求自救之道，而那些“联合”将瓦解得比建立它們的时候还快。

正如现代国家的統一要通过一个胜利的革命阶级的帮助来实现一样，欧洲的統一（由于高度的技术水平现在已經被提到日程上来）只能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革命胜利的結果来实现。正如必須肃清专制主义和一切半封建的残余才能使法国成为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国家一样，必須消灭資产阶级国家和它的追求利潤制度才能建立一个統一的社会主义的欧洲。

### 建立欧洲社会主义联邦

現在的問題是怎样制定一个重建旧大陆的統一計劃，以便在合理的基础上把西里西亚的煤、洛林的鐵、卡特兰的錫和羅馬尼亞的石油聚集到一起。問題是怎样把魯爾的鋼鐵厂和捷克的建筑机械业以及瑞士的精密仪器工业联合起来，以共同努力对全欧洲提供最现代化的技术。必須使波兰的农村电气化，兴修南意大利的水利和使法国的农业合理化，以使維也納、柏林或馬德里不缺少面包。

这个計劃的制定必須以滿足群众需要为目的，而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战争机构。不仅必須取消資本家的利潤，而且还必須取消寄生的官僚机构和过于庞大的国家机器的沉重负担。必須依靠群众的創造力而不是用饥饿的压力来强迫他們或者用机关枪来

恐吓他們。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唯一能够真正組織生产为大众謀福利和消灭貧困、掠夺与債務的歐洲計劃，是一个由群众自己(他們在整个欧洲成立了千百个工人委員會) 制訂、实行和試驗过的計劃。这就是为什么沒有工人和貧农真正行使权力，歐洲的統一是不可想像的。

这样一个由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所統一起来的欧洲，将使各民族的文化得到最自由的发展。它将一举而解放所有殖民地人民，从而开辟一个各大陸自由合作的历史时代。它将促进原子能在建設方面的应用，并且将向苏联和美国的劳动群众指出一条代替軍备竞赛(这种軍备竞赛只能造成战争)的积极的道路。它将为了世界經濟的和諧发展而对这两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提供一个具体的方案，并且单凭經驗就能摧毁帝国主义資产阶级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官僚机构的势力。

这就是为什么第四国际今天坚决地提出**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綱領来对抗馬歇尔計劃和“保卫民族工业”以及一切騙人的补救方案，絕望的資产阶级、丧失斗志的小資产阶级和腐化了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官僚机构想要用这些方案来医治欧洲經濟和政治的恶疫是徒劳无益的。

如果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崩溃鼓舞着殖民地解放运动的爆发，那么反过来，殖民地革命的发展也会加速建立在殖民地基础之上的帝国主义体系和資产阶级“民主”的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的巨大变动，滿洲、印度和中东的加速工业化，无可挽回的“統治民族”的威望的下降，千百万苦力的痛苦和使人发狂的饥饿，所有这些都在粉碎着殖民地剥削的結構，四百年来这个結構依靠对四分之三的人类进行疯狂的掠夺来促成資本家的財富和欧洲的进步。

由于殖民地开始革命动摇了老牌帝国主义国内社会的基础，这些国家就倾向于改变它们的统治形式以保持它的基本内容，也就是保持它们的高度利润和战略控制。“托管制度”、“法兰西联盟或荷兰联盟范围内的平等”、自治领地位的批准，甚至于如伊拉克或缅甸的宣布独立，巴勒斯坦和印度的分治，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代表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在殖民地继续撤退的防线。它继续用千百种经济和军事奴役的枷锁来统治殖民地人民。为了在行动上证明它们怎样在“自由的”形式之下继续起传统的教化作用，帝国主义剥削者进行野蛮的镇压（越南）或者卑鄙的挑拨（印度尼西亚的“警察行动”、犹太—阿拉伯的斗争等等）。殖民主义的新的手段是放弃直接的统治，但和原来的侵入手段一样，它的特点是暗杀、饥荒和流血的暴乱。

在这个殖民体系瓦解时期，生下来就带有这个腐朽制度的烙印的本国资产阶级力求和帝国主义作有利的合作。今天充当帝国主义主子代理人的这个资产阶级不断地和殖民地群众发生冲突，为维护它的切身利益而挣扎着。它一方面想要取得新的特权，一方面又担心失掉旧有的特权。这就使它的行动具有一种特别贪婪和卑鄙的性质。匍匐在腐朽的王党之前并按时把国家出卖给伦敦银行家的埃及资产阶级同时在梦想合并苏丹、利比亚，甚至厄立特里亚。卑鄙地向王公和穆斯林大地主投降的印度资产阶级同时在梦想霸占远东市场。

### 殖民地的动乱

在震动殖民帝国的动乱当中，只有美帝国主义能够在不冒风险的情形下获得利益。殖民地资产阶级和宗主国断绝关系，结果只是受美帝国主义的统治。但是同时华盛顿当然担心，殖民帝国

的最后崩溃会在这些国家的内部造成不可避免的社会变动。美国资产阶级知道，它不能一方面按时更换殖民地机构的骨干，一方面又支持旧日的欧洲政府。

美帝国主义相继利用经济榨取、军事压力和联合国机构以努力促成它的资本渗入，同时也利用当地的资产阶级来粉碎人民群众的暴动，和支持帝国主义者维持旧帝国体制的企图。例如在印度尼西亚和苏丹，美帝国主义有意地起殖民主义保护人的作用。它比谁都更清楚地了解到，今天帝国主义对全世界的统治是不可分割的，任何局部地区的崩溃都有使整个制度开始走向崩溃的危险。

一切实利主义者以殖民地的独立会使它们屈服于美帝国主义或苏联的官僚制度作为借口，反对支持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他们的理由是完全不值一驳的。一切宗主国的无产阶级的神圣责任是无条件地支持殖民地的一切革命运动。必须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公开地斥责“民主主义者”每天在起义国家里所犯的罪行，号召工人反对军事讨伐和侵略战争，在帝国主义的军队里进行与殖民地人民群众互相友爱的理智的宣传，并强迫资产阶级停止敌对行为和报复。

只有在宗主国和在殖民地同时展开革命斗争的结果，才能使帝国主义完全放弃它的一切殖民主义立场。第四国际可以这样讲，它的许多支部（法国、荷兰、大不列颠）是今天进行这种斗争的工人阶级的唯一组织。同时，第四国际已经表明，在宗主国家里的革命者准备无保留地帮助殖民地国家的工人和进步学生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建立他们自己的布尔什维克组织。

在所谓“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斯大林主义者的政党埋葬了争取殖民地独立的斗争。在现阶段，它们的倒退政策已经使它们在

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面前完全投降。第四国际的各个支部相反地一直在殖民地国家里进行反殖民主义压迫的不妥协的斗争，同时在殖民地资产阶级面前保持着殖民地无产阶级的组织上的、政治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完全独立。在印度、越南和埃及，托洛茨基主义者都是站在反帝国主义的人民大众的前列。因此，他们是殖民地工人利益的唯一的一贯的拥护者。他们的政策受到了经过四十年革命斗争考验的不断革命论的鼓舞。

无产阶级大胆地把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当作自己的要求，它必须站在一切被剥削群众的前头，领导他们进行解决土地问题的斗争，赶走帝国主义者，没收外国资本并取得革命的政治民主。只要它能够消灭本“民族的”剥削者，没收本国资本，并以工人阶级政权实行社会主义计划，它是能够使这个斗争获得成功的。

### 保卫殖民地革命

由无产阶级取得革命政权是第四国际在殖民地国家和宗主国的战略目的。如果没有取得这个成就或者不在国际规模上发展革命，夺取这个运动领导权并且正在试图滥用群众革命力量的各种党派集团，如印度的资产阶级政党、印度尼西亚的小资产阶级集团和越南的斯大林主义者，就只会把殖民地革命引向软弱无力的游击战争的绝路或者引向与帝国主义进行卑劣的妥协。

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几乎只限于欧洲。列宁是第一个了解到殖民地国家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上的极端重要性的人。但是，远在第三国际能够在殖民地完成建立革命政党的任务之前，这些党的斯大林主义领导的蜕化变质，使它们变成了官僚机构，变成了殖民地工人走向共产主义的严重障碍。

现在，在殖民地国家建立最初的真正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的

任务已落在第四国际的身上。它依靠工人阶级运动过去的全部經驗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它和《共产党宣言》为欧洲所规定的那个任务是相同的。它必須使殖民地无产阶级避免遭受欧洲工人过去所不能避免的悲惨失敗。这就是为什么第四国际是第一个大胆地宣布殖民地国家在世界革命斗争中起着主要作用的組織。这就是为什么它是第一个真正拥有年輕的殖民地无产阶级当中最有資格的成員参加其領導机构的国际。这也就是为什么它的思想今天正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透过鉄幕，越过丛林和海洋，从北非到日本，从朝鮮到埃及。今天第四国际在四分之三的人类——人类最受剥削的部分——当中获得了初步的成功。在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是工人阶级的失敗的基础上，第四国际准备进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扫蕩一切的革命。

### 华尔街在拉丁美洲

四个世紀以来，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一直是国际强盜所中意的榨取膏血的場所，它是他們的財富的最重要的来源。继西班牙征服者之后，自由貿易时代的英国在該地发现了一个无限广闊的市場和廉价食品与原料的产地，这无异于在該地发现了一个金矿。其次是美帝国主义，它的代理人、銀行家、油矿勘探者、橡胶种植人潮涌般地来到这块大陆。在排除德国和日本的竞争者与迫使它的英国伙伴把自己限制在阿根廷之后，美帝国主义是今天統治拉丁美洲人民的絕對的主人。通过“善邻”和“保卫西半球”的會議，依靠統一軍备和狡猾地分配貸款的手段，华尔街和美国国务院与半独裁者（如在巴西）或純粹的“民主主义者”（如在智利）勾結了起来，因为这最符合于它們的利益。通过外交代表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工賊，它們野蛮地干涉当地的工人运动，大批收买新聞記者、

議会代表和政客，組織对共产党的政治迫害事件并对于工会进行有力的分裂活动。

可怜的和落后的拉丁美洲资产阶级，由于局限在狭隘的民族界限之内，不能建立起国内市场，缺少适当的人口基础，并且由于他们通过大规模的国外贸易和地主们有着联系，同时通过银行和外国资本有着联系，所以他们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庞大的印第安人和黑人社会像许多落后的孤岛一样地点缀着整个大陆，资产阶级没有能够把这些社会纳入资本主义生产的轨道上来。他们不能使各个国家摆脱单一作物生产的束缚，因而使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容易受到来自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打击。它们不但没有能够认真地抵抗帝国主义，而且一个世纪以来通过当地的各种政治集团对帝国主义提供了无数的奴颜婢膝的代理人。它们没有能够把所有那些说同一种语言和在经济上互相依存的国家统一成为一个单一的拉丁美洲国家。这些国家目前的分裂和互相争吵只能使人民受到奴役和加强国际资本主义。

在每一个拉丁美洲国家里，无产阶级的比重都远远超过本国资产阶级的比重。这些工人，如矿工和农业工人常常是在最难忍受的条件下过着艰苦的生活。他们不断从事于激烈的革命运动。资产阶级受到了这些群众运动的基本力量的威胁，发现它自己一再被迫于短期的民主政治（卡德纳斯<sup>①</sup>、美洲人民革命联盟、贝坦科尔特<sup>②</sup>）之后建立起独裁的政权。在民主政治时期，当地的资产阶级时常利用工人阶级运动对外国帝国主义进行敲诈和施加压力。拉丁美洲国家最常采取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革命时期的军事独裁形式，它在以下两方面力量之间随风转舵：一方面是软弱的、

---

① 指三十年代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在墨西哥执政的拉萨罗·卡德纳斯。——译者

② 指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领袖罗慕洛·贝坦科尔特。——译者

成分复杂的然而却貪得无饜的資產階級、外國帝国主义和小資產階級的广大阶层；另一方面是人数和自信心日益增长的年輕的无产阶级。

解决資產階級所沒能解决的历史問題的任务就落在这个年轻的拉丁美洲无产阶级的身上。

玻利維亞的革命、智利和巴西的大罢工、委內瑞拉的工人运动的高涨，最近在波哥大发生的群众武装大暴动，都證明，拉丁美洲的工人群众不願意再作資本主义商販的永久的牺牲者。拉丁美洲的无产阶级通过提出竞选政府，将会取得每一个国家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并且——围绕着它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綱領——将会把城市貧民和渴望从大地主統治下解放出来的农民联合在一起。每一个特定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鋒队将在每一次社会危机中和每一次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的冲突中，学会大胆地提出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联邦的方案。美国无产阶级的责任是用他們所有的力量来帮助拉丁美洲的弟兄。就在美帝国主义竭力想取得世界霸权的同时，它在拉丁美洲的勢力的基础将会遭到粉碎。在美国工人阶级在国内同美帝国主义进行决战之前，美帝国主义将会受到格兰德河以南的工人的最出乎意料的打击。

### “第三种勢力”

如果人类仍然为生产力的猛烈发展所带来的混乱和恐怖包围着，如果人类还没有解决它的困难問題，其过錯不在于工人。他們已經一再对旧的生产制度进攻，已經很久就使人信服地証明了他們的忠誠的品质、牺牲的精神、克己的作风和創造的能力。这应由工人阶级的背叛的领导負責，并且完全由他們負責。

社会民主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要負責的。社会民主党人于

1914年变节为资产阶级服务；1918年造成了德国革命的失败；从那以后，用列昂·布魯姆的话来说，他们已经证明是资本主义的“忠实的代理人”。斯大林主义也是同样要负责的。在造成第三国际的各国党的解体之后，斯大林主义改变了整个一系列的策略来领导这些党采取阶级合作的方式，这些方式有时是较笨拙的有时是较高明的，但是不论什么时候，它总是和社会民主党的阶级合作方式同样地有害和背信弃义。

今天，这两种运动都在避免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必要的牺牲”的借口下，各以它自己的方式采取了“第三种势力”和“新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者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只能把劳动群众引向新的灾难。

在世界帝国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官僚制度两方面的压迫之下，社会民主党的可怜的英雄们表现出被激怒了的小资产阶级的一切传统的愚蠢。简单说来，他们的愚蠢表现在试图和今天互相敌对的世界两大势力“划清界限”。

事实上，支持“第三种势力”的那些讲演和文章不过是掩护改良主义者的头子们实际参加两大敌对阵营之一的一种烟幕。莫克和范·艾克斯之流为大公司所有人的利益而破坏罢工；费林格和西伦凯维兹之流在压制工人仍然保有的权利方面是斯大林主义者的同谋者。这是“第三种势力”内部的根本矛盾，因此产生了社会党的“情报委员会”。今天，华盛顿和莫斯科都有“它们自己的”社会党人，正如旧日的帝国常常有“它们自己的”耶稣会会员，每一个中世纪的君主都有“他自己的”弄臣，等等。

正因为今天的战争越来越采取一种总体战的形式，所以战争的准备过程也就越来越牵涉到对于工人运动建立绝对的控制。美帝国主义既依靠教皇也依靠社会民主党来达到它的目的。在它的

慷慨的卵翼之下，一切工人运动中的軟弱分子也把他們自己“重新組織”起来。他們联合在一起是因为对于斯大林有盲目的恐惧，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輕”，都接受了美国的統治。在華盛頓的思想战綫由于小資产阶级的恐惧而获得加强的同时，完全不加选择的专家們組織馬歇尔計劃的宣传，使“赤化分子”被逐出工厂和公共机关，从而破坏工会的統一。

不过，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完成它的任务，只是因为斯大林主义者的大得多的罪恶不断地把新的工人阶层赶往社会民主党方面。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官僚主义与腐化相比，这些改良主义的背叛者并不代表一种更多的“民主”。他們不过是非常紧密地糾合在他們各国資本家机构之内的一种官僚主义者而已。

像 1919 年一样，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今天試图用“經濟民主”的神話来牵制群众自发的革命高潮。这一次在斯大林主义者的头子們积极支持之下，他們向工人宣教說：只要工人能够占据像經濟事务部长那样的位置，只要使煤矿国有化——給以全部赔偿——建立工人管理委員会并用合法手段进行其他改革，就沒有革命的必要。像希法亭想要拿德国的资产阶级政体和苏維埃相比一样，貝文和摩里逊之流正在欢呼在大英帝国体制之內的“社会主义”經濟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某些历史上有条件的国家里，資本主义仍然能够为工人們规定每周工作四十八小时和其他社会立法以作为使他們离开革命道路的手段。今天，“經濟民主”的拥护者却着手于强迫工人接受可耻的超剥削，整个欧洲經濟复兴现在就建立在这种剥削上面。英國工党政府的政策最清楚地說明了工人官僚制度今天的使命，也就是让工人流汗来重新建立他們以前曾經用流血斗争破坏过的資本主义制度。

改良主义的領袖們的把他們自己完全糾合在复兴运动当中和帮助大資本家重新在物质上和在意識形态上武装起来的可耻的方針，只能在他們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群众方面，特别是在青年当中繼續引起不滿和反抗。

斯大林主义不能吸引那些今天正在寻求一个新的有吸引力的领导的工人阶层。第四国际的各国党，坚定地以它們的綱領——唯一的对于年轻一代工人提供一条新道路的綱領——为基础，要接近这些正在脱离社会民主党的既沒有偏见也沒有宗派主义的进步力量。通过紧密地合作和耐心的同志式的教育，各国党将根据自己的經驗引导他們克服一切中間主义的矛盾，并拥护布尔什維主义—列宁主义的組織和政治原則。

### “新民主”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在欧洲和亚洲同时爆发的强有力革命浪潮使斯大林主义者的政党达到了权势的高峰。如在以前的一切革命运动中一样，广大群众潮涌一般地参加了政党。这些政党由于它們的传统、它們过去的活动、它們的干部，在它們的本阶级当中有牢固的基础并且在工人阶级广大阶层中間最符合于彻底改革的标准。斯大林主义者的組織在十五个国家內一举把这些政党变成了执政党。正如社会民主党对于 1918 年以后的革命运动的消灭應該負責一样，斯大林主义者的組織对于这个第一次战后革命浪潮的消灭應該負責。那时候的改良主义者的背叛是以“經濟民主”的名义进行的；1945 年的斯大林主义者的背叛用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名义。

旧路線的改良主义者的直接的目的，名义上是在帝国主义民主体制內部保卫已經获得的“營壘”，实际上は保卫工人官僚机构

的特权，并以此名义放弃无产阶级的传统目标。斯大林主义的目的，在名义上是保卫“俄国的营垒”，实际上是保卫苏联官僚机构的特权，并以此名义放弃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但是，經驗一貫地證明：放弃最終目标的結果无可避免地是失掉被认为正在保护中的营垒。这并不是領導者那方面对于这些本身极为明显的历史教訓缺乏“了解”，而是这些領導者要保护他們自己的特殊利益。正如改良主义的任务是把工人官僚制度的存在和现有的民族資产阶级調和起来一样，斯大林主义者的官僚制度的任务是把现有的苏联官僚制度和世界帝国主义的存在調和起来。

苏联的扩张措施使“新民主主义”理論看起来好像是克里姆林宮在它支配下的国家里所犯的一切罪行的一种正当的辯护。“新民主主义”理論在苏联勢力范围以外的国家里的应用却只能使它完成它的基本任务：公开地放弃列宁主义者的夺取政权的战略，而代之以一种妥协和冒险的政策，以抓取“資本主义国家权力的杠杆”。所有这些都是公开地表示，在完全按照斯大林主义者的官僚机构的精神来运用苏联外交、苏联军队和苏联的警察—密探制度当中，要把世界无产阶级降低到一个小卒的地位。

### 斯大林主义者叛徒

根据这个总的方針，斯大林主义的政党更加不能采取一种始終一貫的政治路線。像过去一样，它們的策略是从最下乘的机会主义轉变到另一极端的最可怕的冒险主义，常常是把这两个极端的特点結合在一起。昨天解散了共产国际；今天又重新建立起共产国际。昨天它們号召“生产第一”；今天号召抵制馬歇尔計劃。昨天它們斥責罢工为“托辣斯的工具”；今天它們又官僚主义地煽动罢工行动。所有这些使工人阶级失去方向和感到茫然的动摇和

轉变，都表明了斯大林主义的领袖們的同一个願望——和帝国主义达成一种有利的妥协。它們还表现极端輕視工人以及他們的感情、利益和他們的誠实。

斯大林主义在工人阶级当中的权力，是它的机构的物质力量与在广大群众心目中仍然代表着的过去的革命传统相結合的产物。如恩格斯在一世纪以前指出的，传统代表着历史上的一种最大的惰力。要夺走斯大林主义对于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有必要从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所沒有做的事情上做起。必須建立起强有力的工人組織，必須教育革命的工人干部的新的一代，他們通过在斗争中的无数次的經驗，将在工人阶级当中扎下根基，并获得他們的尊敬和信任。必須建立一个真正的党，通过越来越广泛的活动，最后真正代替了已經破产的领导而出现在一切群众运动中。坚决地依靠革命的綱領，以社会上最受剥削的阶层为对象，对于无产阶级的无限的革命战斗力量保持着完全的信任——这就是第四国际将怎样在工人阶级运动内部最后消灭斯大林主义这个障碍。

三十年来，人类以可怕的危机——战争、反革命、极权主义专政、国家灭亡、文明墮落——为共产主义革命的迟延付出了代价。但是，这一整个悲剧时期，絲毫不能說明无产阶级生来就不能对于它的历史使命有任何認識。相反地，从俄国内战到西班牙内战，从广州起义到雅典起义，千百万工人都在行动上表明了一种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热情、战斗意志和革命的忠誠。

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特定任务上产生的一切品质——突然表现出巨大創造能力、对于自觉紀律的敏感、完全无私的精神(它最清楚地表明它对于历史是十分关心的)，所有这些都已經銘刻在二十世紀历史的最感人的篇頁上。《共产党宣言》关于这个問題的分析和預言不仅已經得到了証明，而且已經被公认为

是我們时代的主要现实。

## 领导的危机

但是，无产阶级自发的革命高潮面对着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社会，这个社会随着它的每一步衰落都表现出注定要消灭的阶级所特有的一种新的防御性反应。军队、警察、间谍、工贼、报纸、广播电台、学校和教会，在受到威胁的资本主义堡垒周围，构成了许多防御工事；面对着这些，无产阶级的自发而不协调的攻击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极大的失败。反革命力量集中的和科学地组织起来的领导，几十年来就指导着一切无论是什么政治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这样的领导相对抗，除非无产阶级这方面选择一个甚至更称职的领导——本阶级的党的领导——它是不能取得胜利的。今天，人类的危机就是革命领导的危机，因为和这个无产阶级的自发的革命运动一起存在的还有它的领导的公开反革命的性质。

年轻的欧洲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受过更多的教育和更好的训练，可是在它那个时代，经过两个世纪的摸索才完成了选择领导的工作。因此，只有那些对历史的估价失去一切比例感的人，才会对于无产阶级三十年来没有能够选择出一个适当的世界领导感到惊讶。资产阶级花费了大量的财富和经验，才比它以前的统治阶级更有效地使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成为这个时代的支配一切的意识形态和道德。

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历届的工人阶级领导逐渐地为无产阶级赢得了一些微小的改革和为他们自己赢得一些真正的特权。但是，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超出了本阶级，并因此而成为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输送到工人运动中来的主要代理人。只是在资本主义的衰落在欧洲和亚洲促成第一次强有力的革命高潮时，才建立起选

择一个不受統治阶级意識形态影响的真正的革命領導的物质条件。但是，那些最早斗争由于缺少适当的领导，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从那以后，革命领导的选择就是在那些失败的压力之下进行的。唯一领导工人取得了政权的俄国的布尔什維克党本身由于缺少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維克国际而成为了第一个受害者。在衰落时期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建立起这样一个組織——这就是第四国际的历史使命。

### 一个世界运动和一个国际领导

无产阶级的世界总参谋部必须领会共产主义革命的全部綱領。它必須用充分的革命經驗来丰富这一綱領以使自己能够应付一切形势的突然变化。它必須用一种和工人阶级有紧密联系的組織向广大的劳动群众进行关于这个綱領和經驗的教育。在第四国际誕生时期，这三項任务只是在克服最大困难之后才完成的。

只有在群众斗争中才能领会革命綱領。只有在一个整个历史时期的多种多样的活动中才能取得政治經驗。只有在工厂里和在工人的邻近地方进行不间断的工作才能建立起工人組織。但是下降的资本主义条件以一种难以置信的残酷一次又一次地破坏着革命思想、革命后代和革命組織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选择一个真正的世界领导証明是这样一种长期而艰巨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必須有意識地担当起这个工作并有意識地作出計劃和付諸实行。

历史的辯証法是这样的：建立一个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政党感到非常困难的那些客观条件，同样也是使它的建立成为可能的唯一的条件。第四国际幸好是建立在这样的时代，所以它不具有改良主义者的幻想、議会的白痴病、宿命論、冒险主义、产生悲观失望的天真的信仰——总而言之，不具有那些曾經形成和糟蹋了革

命前輩的許多思想感情。

第四国际已經克服了工人阶级斗士的民族成分与无产阶级运动的世界使命之間的矛盾；它是第一个开始建立一个真正的国际领导的組織。第四国际是第一个把彻底革命的綱領和过去革命运动所取得的經驗結合起来的无产阶级的世界組織。这就是为什么从历史的尺度来看，过去无产阶级的失敗是形成一种科学的革命技术的必要条件，正如传染病是发展一种科学的治疗技术的必要条件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們正在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悲剧时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証明它不过是为了鑄造解放人类的适当工具的一个历史停頓时期。

第四国际的干部只是通过不屈不挠地和有組織地参加一切群众斗争和一切群众运动——真正阶级斗争的战略学校——来取得担任无产阶级真正革命领导所必需的經驗。为了参加这些斗争和运动，第四国际用它的过渡綱領——过去一切工人斗争所取得的教訓的总和——来武装自己。

第四国际活动的第一个目标是清楚地和有意識地說明被剥削群众的深切然而混乱的願望。如果群众起来反对通貨膨胀或失业的罪恶，如果群众认为战争或者國內压迫的負担难以忍受，如果群众要求和平、更多的面包或更多的自由，第四国际就站在他們一边，鼓励他們的批評精神，加深他們的不滿，使他們走上社会主义觉悟的道路，并教育、組織和指导被剥削者，使他們从对于資本主义制度的后果的潜在的反抗过渡到对于造成灾难的原因——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公开的反抗。

面对着群众的每一种渴望和每一种要求，第四国际提出适当的口号來动员他們，目的是为了解决那些使他們感到激动的問題。这就是为什么第四国际认为怀疑主义、宿命論和消极被动是提高

无产阶级觉悟的最大障碍而全力与之展开斗争。这就是为什么它一再阐明，在工人阶级面前提出的有关重大问题的一切决定，最终还是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无产阶级在工厂中和在街道上都会是胜利者。

资本主义除了依靠加重被压垮了的劳动群众的贫困负担之外，已无法再生存下去。不論是通貨收縮或通貨膨胀，不論是物价政策或稅收政策，不論是鼓励出口或限制消費，不論是粮食不足或生产过剩——在一切国家里，尽管形式千变万化，都不外是对于群众购买力的一种同样的进攻。根据工人家属的消費需要，通过按物价計算工資、薪金、失业补偿、养老金和社会保险的制度，保証最低生活工資——这就是第四国际各支部为工人斗争提出来的当前目标。日本、朝鮮、意大利、法国和美国的例子清楚地証明，这个口号已为千百万工人所接受，他們曾經举行巨大的罢工以促其实现。

在四分之三的人类普遍消費不足当中，已經到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现象。这在今天只是一个次要的威胁，明天失业将成为压在无产阶级身上的主要负担。第四国际不断警告群众，这种危机正在不可避免地迫近，并号召工人为强迫已关闭的工厂重新开工并在工人管理之下恢复生产而斗争，为逐渐减少劳动时间而不减少实际工資而斗争，为防止解雇并由一切工人分担现有的工作并保証他們的最低生活工資而斗争。

### 爭取工人管理权

但是，物价、工資、利潤、营业量和就业量等問題都决定于国家的整个經濟生活。如果工人想要以有效的方式解决购买力和充分就业的問題，他們就不能把决定生活費指数或者就业与失业比率的工作交给那些老板或者他們的政府。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口号

如果不同工人管理联系起来就沒有什么价值。第四国际各支部不忽視任何一个机会以喚醒工人不要相信資本家和他們的政府的信用和能力。工人必須会看賬目，以便他們能活生生的觀察到資本主义經濟的真正作用，并认清整个剥削机器、卑鄙的寄生主义和造成工人穷困的浪费，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为当前的經濟目标而斗争才能实际上成为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动员的桥梁。

广大工人群众在体验到巨大的經濟危机、大批人失业和黑市之后，今天了解到，任何程度的經濟保障都是与在生产手段上的私有财产的保全不相容的。一群数目有限的垄断資本家統治着一切国家的經濟，现在已經成了人所共知的事实了。不过，面对着資产阶级国有化的試驗，特別是英國和法國的国有化，我們有必要再度說明：**沒收銀行和重要工业**的革命要求与鄙陋的改良主义者对于腐朽的資本主义的掩飾是根本不同的。要求在除了对小股东外不作任何补偿的条件下实现国有化；要求工人管理国有化企业；要求把一切沒收了的工业納入由工人委員会制定并执行的复兴計劃的范围内；把为实现这种国有化的斗争和为建立一个工农政府的斗争联結起来——我們以这种方式提出共产主义的和革命的改造社会的綱領，以反对資产阶级想在改头换面的形式之下保全它的統治的頑固意图。

### 劳动群众的团结

腐朽的資本主义的时代同样也是中等阶级不断貧困化的时代。在仔細地划分城市和农村的資产阶级的剥削阶层和被剥削阶层之后，第四国际各支部提出适合于在行动上把劳动群众團結起来反对大資本家的口号。和斯大林主义者与改良主义者的政党不同(这些政党主张与中等阶级“联盟”是一种沒有价值的遁辞，目的

是放弃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纲领，以便与实际上出卖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领导人和政党结成联盟）。第四国际各支部在受到最严重打击的中等阶层（薪金使他们吃不饱的职员、没有土地的农民、被捐税压垮了的手工业者、破了产的小商人等等）的深刻不满上寻求支持，以便把他们的愿望引向一个沿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的社会革命。在意大利、日本或法国这样的国家，这是避免新的半法西斯组织依靠失望的中等阶级的支持来取得发展的一条最可靠的道路。

今天，一切经济问题、工会问题和社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无产阶级通过罢工能够强迫老板阶级交出来的每一件东西，都是由政府有计划地从无产阶级那里取去的。这个政府无论它是什么形式，都一直是统治阶级的真正的管理委员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出工农政府以与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相对抗，不论这个资产阶级政府是一个彻底的反动政府或者是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人与资产阶级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

### 建立无产阶级国家

除了为这一口号进行不懈的宣传外，在政府发生剧烈变动或工人阶级展开普遍斗争时期，我们还对于那些自认为属于工人阶级并且仍然为群众所信任的政党提出明确的倡议。第四国际对这些政党发出这样的呼吁：“**和资本家决裂！把一切权力拿到手里！**”以便在已经动员起来的群众的支持和监督之下，实行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的纲领。

但是，要使政府成为真正的工人政府，只有那些“工人”政党是不够的。此外还必须有一个真正反资本主义的纲领和对于充满在资产阶级合法组织中的群众进行革命的动员。这里就提出了国家问题。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和澳洲的工党部长的权力只是一种幻

影。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听命于全能的垄断资本家的官僚管理机构的手里。政府更换了，但是警察、将军、法官和高级官员，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整个官僚机构却原封不动。只有建立起群众的真正权力，组织工厂、区和村镇的委员会，才能打破这种障碍。

国家官僚机构的开支以及它的军事预算、浪费和舞弊行为，对于遭到极端剥削的国民经济日益成为沉重的负担，并且是造成吞没一般人民收入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第四国际仿效列宁进行鼓动的无可比拟的先例，不断地揭发资产阶级国家的压迫、剥削和寄生的性质。从上千个具体例子出发，我们不断提出一个和它相反的开支低的国家，一个官僚机构完全被粉碎和行政职权转移到全体劳动人民手里的国家：**无产阶级的国家，由委员会管理的国家，公社制和十月革命的国家。**

在 1947 年法国大罢工之后，1948 年的意大利选举确实地证明了：在现阶段，围绕着工人阶级的两个传统领导当中的一个再也不能建立起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斯大林主义的剧烈转变和冷酷的策略终于疏远了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级先锋队。改良主义领袖们的破坏罢工和豢养工贼使这些领袖们今后再也不能对战斗的共产主义工人群众发生影响。

这两种工人官僚在无产阶级中间划定了一条和两个国际势力集团相一致的分界线。改良主义者的领袖们有意地忽视共产主义的工人群众，把斯大林主义政党的追随者看作是“极权主义专政”的代理人。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人反过来把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看作和“美国党”阵营中的法西斯分子是一伙。

正如明天没有工人的统一行动，任何工人的进攻都是不可能的一样，现在如果不重新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要想在防止资产阶级对工人的购买力和自由的进攻中获得胜利也是

不可能的。一世纪以前,《共产党宣言》宣称,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今天,第四国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是号召工人在行动上重新建立起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唯一的力量。

### 工会官僚和国家

那些在工人运动中代表着和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的人们,今天首先要攻击的就是工会。“用统一的工会运动来对抗统一的老板阶级”这个口号一直是第四国际的工会战术的检验标准。分裂工会今天无疑地是帮助老板们施展手腕和进行挑拨。但是,只是进行一贯的反对工会分裂的斗争根本是不够的。事实上,这种分裂在大多数情形下不过是一种更严重的和更可怕的现象——背弃工会运动——的特殊的表现。另一方面,工会的统一只有在它使我们更可能实现行动的统一时,对于无产阶级才是有意义的。

但是工会官僚机构要对于工人运动建立一种越来越全面的控制,并且要加速把工会机构合并到资本主义国家机构中去。最后,这个官僚机构的背叛的政策正在瓦解士气并且构成背弃工会的最坏的因素,它力图完全窒息工会内部的民主并在实际上使最勇敢的战士没有办法向工会会员提出他们的意见。这就是为什么第四国际各支部进行一个同样的斗争,争取在一个生气勃勃的纲领要求的基础上建立工会的统一,以扩大工会活动的范围,从而把广大的还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也包括在内;争取工会的完全独立和不受国家的控制,并不断保卫工会民主。

但是,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里,限制和压迫工人自由的趋势现在是很明显的。麦克阿瑟在日本压制总罢工;舒曼和莫克在法国公布臭名昭彰的法律;而塔夫脱—哈特莱法案则把阶级“公平”的

绳索套在美国工会的身上。各地残存的资本主义統治日益和維护民主自由(甚至于最起码的民主自由)不相容。

在这种形势下，第四国际号召工人围绕着一切符合于劳动人民真正需要的民主要求展开广泛的統一行动。为了給这些要求以最统一的形式，并为它們进行始終不懈的斗争，今天就意味着要动员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在**德国**和其他被占领的国家里，为撤退一切占领军队而斗争，为国家統一和反对一切合并与赔偿、反对检查制度和欲盖弥彰的軍事独裁而斗争，为真正的自由选举而斗争，为召集立宪會議而斗争，为根据人民的意志罢免当选人而斗争，为自由选择會議地点、設立印刷厂、广播电台等等而斗争，为一切工人組織而斗争——如果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进行这些斗争并且把这些斗争同宣传各国工人与士兵應該相互友爱及宣传**欧洲社会主义联邦**联系起来，这些斗争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上的里程碑。

### 需要建立工人統一战綫

最后，由于对法西斯专政記憶犹新，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工人日益不安地注视着法西斯活动(意大利)或半法西斯活动(法国)死灰复燃的迹象。第四国际不断地使工人記起他們在**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在法西斯党徒手中失敗的惨痛教訓。它不断地宣传建立一切工人組織的統一战綫以堵塞戴高乐、摩斯萊、阿尔米朗特之流和其他为大資本家担当劊子手角色的候补人的道路。組成下层統一战綫委員会必須根据日常事件，在自认是无产阶级的組織中間不断宣传建立統一战綫。必須經常提出在工厂、工会和区委員会的基础上建立一支工人民兵队以反对背叛的工会领导人的合法主义的白痴病。这些领导人卑屈地重复着他們前任者的錯誤，要求

資产阶级国家解除法西斯匪徒武装。但是，最重要的是密切注意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群众的一切自发行动，这种行动，特别是在意大利，正在日益采取最大胆的形式。只有在革命先锋队学会采取这些自发行动并不断予以扩大和加强，才能在工人自觉斗争和自发性运动高潮中建立起一种真正的根本的统一，并且只有在这之后才能真正取得本阶级的信任。

### 建立一个新的革命青年国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的骨干们效法它的伟大的国际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光辉榜样，出来组织了欧洲年轻的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仍然是在几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的干部中间第一次和背叛的领导发生决裂并第一次寻求一个新的革命国际。青年是一切革命运动的动力，这完全不是一种简单的经验之谈。腐朽的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极沉重地压在从事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的年青一代工人身上。他们发现自己生下来前途就没有希望。现在在旧的工人组织中，官僚主义的枯燥无味和权谋与伪善的窒闷空气同样也驱使最有才能的和最忠实于工人阶级的青年作猛烈的反抗。第四国际原来产生自部分来自青年的一个反对派，现在它已是一个以各国的青年工人和学生占大多数的组织，这决不是偶然的。这同时也是它将来发展的最可靠的保证。

资产阶级青年组织（天主教徒、半法西斯主义者）和那些自称是工人阶级的组织（改良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加紧努力以促使青年工人故意脱离政治。传统组织的投降和妥协政策必然要引起的憎恶也帮着起同样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第四国际有计划地教育被剥削的青年从政治上认识他们的悲惨命运。教育革命青年干

部是保証无产阶级青年的解放斗争不离开阶级目的这个中心的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

第四国际完全反对每一种对于青年工人和他們的問題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它既不摆出保护人的架子也不贩卖那些专门的术语。它开始实行自己不断宣布的那个原則：青年工人的解放和一般无产阶级的解放一样，只能由青年工人自己来完成。这就是为什么第四国际完全承认革命青年有权成立他們自己的阶级組織，它的活动應該首先以青年工人阶级自己的問題为中心：爭取工作和受教育的权利，爭取生活和休息的权利。青年的革命方針和拥护这些方針的組織在反对軍国主义、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斗争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这个斗争本身是我們时代的一个革命中心任务。

但是，在第四国际完全承认革命青年應該有它的特定組織、方針和綱領的这种权利的同时，它要求青年工人了解到：他們自己的問題是今天摆在人类面前的一般問題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工厂中和兵营里，在制造場上和大学里，和青年工人阶级发生冲突的敌人也就是整个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敌人：垄断资本主义和它的日益极权主义化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青年的革命組織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革命組織单独行动，而必須与它密切合作。这就是为什么要建立的新的革命青年国际只能建立在第四国际的牢固的綱領之上。

### 推翻斯大林主义者的官僚制度

### 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

### 反对帝国主义

面对着难以置信的苏联的蜕化变质，一些幻想破灭了的革命家把斯大林主义者的专政和仍然残存的十月革命的成果看作是同

一的东西而拒絕保卫后者。另一方面，一切“同路人”，仅仅昨天，当問題是“把反法西斯的战争进行到底”的时候，还在歌頌“胜利的紅軍”，而现在，这些人，当它和他們自己的資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又突然感觉到斯大林主义的野蛮了。第四国际的斗士在工人运动中第一个揭露了斯大林主义政权的一切丑恶和反动。只有他們能在保卫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的严格范围内对斯大林进行认真的斗争。

华盛顿准备对苏联作战，其目的完全不是为了在苏联实行政治民主或尊重苏联人的权利。相反地如果美国军队占领了苏联的領土，美帝国主义必将面对着苏联工人和农民的猛烈反抗，美帝国主义一定会在苏联建立起一种与希特勒政权相似的恐怖制度。

帝国主义战争不仅不能把工人从极权主义专政下解放出来，而且一定会阻止他們进一步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帝国主义一定会更把追求資本主义利潤和官僚制度造成的浪费結合起来。帝国主义不但不能彻底刷新計劃机构和消灭从这个机构获利的腐敗墮落的根源，而且一定会用它的輸出品和資本猛烈打击整个机构并使它垮台。

猛烈地排斥官僚制度是今天俄国工人阶级的一项迫切任务，不然，在这种寄生制度的压力之下，十月革命成果的残余就有被消灭的危险。正是为了这一理由，所以俄国工人不能把这一任务委托給帝国主义，并且将极力保卫十月革命成果的残余，反对帝国主义，一刻也不放松推翻斯大林主义军事独裁集团的革命斗争。

斯大林通过他在俄国军队占领的国家里所实行的反动政策，主要是保卫官僚机构的特权。正如官僚机构在苏联破坏了工人国家的基础一样，它在苏联国外所实行的反革命政策对于同样的革命成果构成了永久性的威胁。第四国际完全用革命的阶级斗争方

式来保卫十月革命成果的残余。任何削弱苏联国内外的无产阶级的东西，任何毒化无产阶级思想或降低它的觉悟的东西，都是对于保卫苏联革命的直接打击。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就意味着要反对反动的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反对它压迫、掠夺和占领“缓冲地带”国家，反对它背着人民搞秘密条约和妥协。第四国际所主张的保卫苏联的唯一形式是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进行反对它“本国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粉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的斗争，即使这些障碍包括俄国占领军在内。

在缺少一个动员群众的强有力的革命领导的情况下，战争、保卫苏维埃国家以及复建工作的迫切需要，确曾使进步的工人把官僚制度当作不可避免的、弊害较小的制度来接受。另一方面，党派斗争、军事胜利和与欧洲进步国家的接触也无疑地增加了苏联工人的批判精神，增加了他们对于那些对一切欺骗和偷盗负有责任的寄生者的憎恨，使他们想要把国家的领导权重新掌握到自己手中。由于官僚主义领导的结果，复建工作越向前进行，资金积累率越降低，经济困难将越来越严重，社会不平等将越来越加深。在苏联社会将要体验到的不断变动当中，年青一代的工人将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的帮助之下，他们将找到推翻官僚制度的道路并将在俄国历史上开辟新的革命的一章。

### 推翻资本主义

第四国际并不给自己提出弥缝资本主义制度或者为“过于激烈”的革命方案寻求代替办法的任务。它的纲领是动员群众推翻资本主义。这就是为什么过渡时期的要求并不带有“适应论者”或“进化论者”精神的痕迹。这些要求跳过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

陈旧对照，相反地，把日常工作和我們时代的最紧迫的問題——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权——联系起来。一切宣传，如果只是限于把这一运动的总目标当作一个固定的公式来重复，不提供办法让工人阶级通过自身的經驗认识这一总目标，就都是宗派主义的。一切宣传，如果只是給人——即使是暗中地——一种分阶段斗争的概念，“暫时”把自己限制在当前的要求上，把每一个过渡性的口号变成为目的本身，并且认为工人太落后所以不能从一开始就对他們說明共产主义的革命綱領，就都是机会主义的。

面对着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对于共产主义的可怕的出卖和由此而产生的无数的歪曲和捏造，今天有必要重新申明共产主义革命的根本特征。

### 共产主义的綱領

它意味着沒收資產阶级的財产和資產阶级的消灭；它意味着由无产阶级接管生产資料和交換手段；它意味着消灭資產阶级的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无产阶级作为統治阶级所組織的、实行无产阶级民主的工人委員会。

生产資料和交換手段的集体化，把一切信貸机构集中起来成立集体所有的单一的国家銀行；垄断对外貿易；建立計劃經濟，这一切都不是革命的目的；它們只不过是手段，用来逐步提高群众生活和文化水平，把工作時間減少到这样的程度，使广大工人能够管理經濟和公共事务，社会不再有阶级之分，国家将随之消亡。这就是为什么必須确立和扩大工人对于生产的管理权；由群众积极参加拟定、执行和确定生产計劃；人的因素将在一种越来越有决定性的程度上对各方面的經濟生活进行干預，生产定額将越来越服从于消費的需要。这些是在推翻資本主义以后在經濟方面的不可缺

少的因素；并且是表明社会真正朝着社会主义进展的标志。这就是为什么专职官員人数的剧減，立法和行政职权的融合为一，以及由人數日益增多的受过教育的工人輪流行使这些职权是坚决肃清反革命、稳定新社会和根本减少它的内部矛盾的最明显的标志。

共产主义革命的綱領是一切民族解放的綱領，是肯定給予一切民族以自決权——包括分离权在內——的綱領。用共同消除本国的剥削者的方法消除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一切剥削和压迫；让每个民族可以自由发展本民族的文化，这个革命将同时消灭沙文主义的根源，将追击民族主义的和种族主义的神秘主义到它的最后藏身之所，并且将消灭能够阻止全世界人民实现真正普遍联合的每一种障碍。

共产主义革命不仅要在經濟方面解放群众的巨大生产能力，它还要深入社会的各个領域并到处解放群众被封鎖着的巨大創造潛力。教育科学和技术訓練、艺术和文学活动、組織公共卫生、建設城市和发展人类德行，将第一次开放給千百万无产阶级和貧农，现在这些人所遭受的經濟奴役正有計劃地摧残着他們的无数才能。因此，这一切活动的本来性质也将经历一次根本的和不断的改变。最后，在人类成为自己的命运的主人的时候，将通过批評的思想和方法深入未知世界的最后存在的奥秘，而精神的培养和人类本性的改造将成为不断革命的最終目的。人类将从必然的王国进入自由的天地。

在一个冒着陷入野蛮境界的危险但仍充滿着这一切輝煌的可能性的社会里，第四国际认为只有坚决把共产主义当作它的目标的綱領才是现实的。今天，把一个人的生命献給人类的革命解放事业是在痛苦的世界梦魘中保全人类尊严的唯一道路。悲叹文明的衰落而不对各国人民提供一条走向美好将来的途径，实际上是

把自己变成为普遍的社会瓦解过程中的又一个因素。今天，只有共产主义革命的綱領值得为它的实现作出牺牲。只有这个綱領能够使第四国际今天有权呼吁一切国家工人團結在它的旗帜下。

二十年前，斯大林用他的国家机器对这个綱領施加沉重的打击。疯狂残忍的斯大林为了追击、监禁和暗杀忠于列宁主义的宝贵的革命干部而同各国的警察联合起来。一个空前的反动高潮淹沒了整个世界。今天，在无数牺牲之后和在新的打击之前，二十五个国家的第四国际的战士們可以驕傲地說，他們已經經得起这个历史黑暗时期的考驗。拒絕向斯大林警察投降的內战中的英雄們的榜样，在西伯利亚孤寂的監牢中斗争到生命最后一息的俄国左翼反对派的斗士們的榜样，在国家政治保卫局行刑队面前临死时高呼“托洛茨基万岁”的年輕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俄国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盟員）的榜样——所有这些都不是沒有結果的。今天，布尔什維主义已在五大洲上复活，它的思想正在传播，它的組織正在加强。代替每一个死去的烈士的是十个站起来的新的战斗者。在战胜斯大林的恐怖和希特勒的狂暴之后，第四国际对于将来充滿了信心，因为我們这个时代全部馬克思主義和世界无产阶级的一切不可征服的解放意志都活在它那里。从人生如朝露这个尺度看来，它的发展似乎是緩慢的。从历史的尺度看来，它的胜利是已經确定不移的了。

第四国际在同斯大林主义官僚篡夺者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中，驕傲地接受了十月革命的传统、思想和教訓。斯大林的一切罪行都不能从各地工人的心中抹掉他們对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壮举的記憶。面对着資本主义和它越来越可恶的腐朽，第四国际在世界規模上提出布尔什維克革命的中心思想：“一切权力归于工人和貧农”。面对着工人运动内部的阶级敌人的卑鄙代理人，第

四国际鑄造了决定无产阶级胜利的工具——世界布尔什維克党。面对着战争、破坏和蹂躏，第四国际坚决地履行它的历史使命——准备世界規模的十月革命。

### 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

今天，在庆祝科学共产主义第一个百年紀念的光荣的日子里，在这个一九四八年的五一劳动节，这个世界工人示威游行的日子里，第四国际在从世界各大洲集合到它的代表大会里的最优秀的战士当中，暫停下来悼念所有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牺牲的英雄們。一八四八年六月街垒中的战斗者、巴黎公社的士兵們、第一届彼得格勒苏維埃的工人們、十月革命和俄國內战中的胜利者們、德国的斯巴达卡斯团的团员們和匈牙利、巴威利亚和广州的革命工人政府的斗士們、阿斯图里亚进行爆炸的革命党人們、巴塞罗納的民兵們、維也納防御同盟的战士們、希腊和法国的共产党游击队员們以及一切殖民地革命的数不清的士兵們——他們将永远留在人們的記憶中，作为被剥削阶级决心要把世界从剥削的深淵中挽救出来的証明。紀念所有这些战士和第四国际的无数先烈，第四国际把这个任务付托給年青一代的世界工人阶级。要想无愧于他們的榜样，今天就要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站好自己的崗位。

**第四国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号召各国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在反对一切形式的奴役、反对一切政府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中联合起来。今天全世界工人所进行的是同一个斗争——为共产主义革命而进行的斗争。

巴黎旧日革命堡垒中的工人們和在反抗中的不可战胜的越南青年革命者联合起来！

烏拉尔的矿工們和美国的战友們联合起来！

德国的工人们，从你们的废墟中站出来，和英国的工人们联合起来！

中国、印度和一切殖民地的工人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奴役的单一的战斗中同宗主国的工人们联合起来！

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这个旧日的战斗口号明天将成为共产主义胜利的最高标志！

# 四、第四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 大会宣言

(1951年8月—9月)

## 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以堵塞帝国主义战争 制造者的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了三十几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了还不到十年，而帝国主义战争的不祥阴影又籠罩着全世界。重整軍备支配着每一个国家的社会活动。国际會議未能达成任何协定，这預告将在戰場上解决問題。在世界許多地方一再燃燒起来的“局部”战争的烽火将造成一場普遍性的战争灾难，預示着将来的恐怖和野蛮。

向第三次世界大战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两个“强国集团”为統治世界而进行的斗争，也不是一小撮軍火制造商的“渴求利潤”，而是資本主义制度內部的不可抗拒的邏輯。从人类总的的利益的观点看来，这种战争趋势好像是一种集体疯狂的发作。政治家、将军、科学家，全都深信人类文明在这次冲突中冒着毁灭的危险，千百万生命将遭到牺牲，整个城市和国家将被消灭。假如他們仍然亲自帮助准备这次战争，那是因为战争并不决定于他們的了解或願望。把人类拖入这一变乱的是拥有庞大生产系統的整个資本主义社会，不消灭这个社会，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

資本主义如果不經常扩张它的基地，就不能生存，也就是說，不能繼續給統治阶级提供“合理的”利潤。两个世紀以来，这种扩

張是在牺牲东欧、亚洲、非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的“落后”人民的情况下实现的。我們整个地球被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了。从这个世界被瓜分完了时候起，資本主义要扩张就必然毁灭自己。

在为了重新分割世界而进行两次全球战争之后，均势的局面已經彻底被推翻。所有以前的主要强国本身都成了美帝国主义者扩张和集中的对象。这种新形势不但远不能解决现代資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而且还进一步加深了这个矛盾。美帝国主义的巨大生产机器正在遭到残存的資本主义世界市場的抑制。它需要整个世界作为市場，以稳定它的經濟体系。但是世界已經不再向它开放。

### 日益縮小的世界市場

由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东欧資本主义的崩潰，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和伟大的中国革命，国际資本主义市場已經減少了八亿顾客。战后第一阶段的經濟复兴工作刚結束，美帝国主义就由于不再能扩展它的經濟領域而受到严重危机的威胁。它的唯一的出路是通过重整軍备以創造一个人为的市場，以便用这些武器使取得真正的新市場成为可能。

像它的一心想要統治世界的前人——德日帝国主义集团——一样，美帝国主义出場太晚，所以不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

正当美帝国主义开始准备下一次世界战争时，沿着亚洲大陆的周围，从远东到近东，爆发了新的革命运动。殖民地人民不再让帝国主义国家把他們仅仅当作是財产来看待。他們的主人对他們进行的战争和被迫在殖民地土地上建立的工厂使他們意識到了自己的力量。

千百万殖民地的奴隶正在站起来，擺脫白色暴君們加在他們身上的饥饿、强迫劳动和有組織的暴行的枷鎖。殖民地革命的发

展威胁着要进一步缩小仍然受帝国主义掠夺的那一部分世界。因此，帝国主义重整軍备不仅是出于經濟上的考慮，而且也是出于想用軍事干涉来粉碎群众起义运动——无论爆发在什么地方——的非常明显的政治目的。由于这个原因，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仅是一个要消灭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而且是一个反对一切殖民地革命的战争，一个反对全世界革命工人运动的战争。它将是一个最名副其实的反革命战争。

次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之下結成了一条統一战綫，以防止威胁着它們的致命的危险。但是，美国的生产力越是在一个压縮了的世界市場里遭到抑制，美帝国主义所垄断的那一部分市場就越大，而那些次要的国家在他們所能支配的狭窄的生存空間里就越感到窒息。

### 經常存在的社会危机

由于經濟平衡基础的消失而在这些国家里引起的不断的社會危机使它們的資本家阶级的权力极端不稳固。它們被迫依靠它們美国大叔的恩賜来生活，而这个大叔同时也就是統治它們的工人的高級警察。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来，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沒有从美帝国主义得到不斷的支持，一定早就在整个欧洲和亚洲絕迹。

那些次要的国家(德国、日本、意大利)完全沒有自己的保护地，它們的复兴是由于美帝国主义的經濟的和战略的需要，所以它們最坚决地和毫无保留地支持华盛顿。对于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來說，建立一条統一的帝国主义陣綫就意味着它們的殖民地越来越受到华尔街的控制。不管它們是否願意，都不得不采取这种解决办法，因为走任何其他道路就等于立刻自杀。

庞大的帝国主义軍备計劃已經推動了一个不可挽回的走向戰爭的趋势。即使这种重整軍备的速度緩慢下来，也会促使資本主義經濟陷入一种比重整軍备所要避开的危机还要严重的危机。战略原料的大批堆积一定会引起物价的迅速下降。今天，每一个“和平的威胁”都已經在股票市場上引起价格的立即跌落。

自然，帝国主义者偽称他們武装自己仅仅是为了恢复均势。但是，整个历史証明——人們的常識也証实——人們武装自己从来不是为了維持和平而是为了进行战争。資产阶级的战争准备越成熟，它就越要改变国际商談的途径而把它的軍备力量計算在內。

任何征集签名、任何“和平人士”的集会都不能絕對阻止帝国主义伸出杀人的手。帝国主义已經决定和世界反帝国主义力量决一死战。这个为工人、殖民地人民和革命者所痛恨的战争，如果要爆发的話，是避免不了和阻止不了的，除非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資本主义制度。只有从資本家手里夺取制造杀人机器的工厂，粉碎为資产阶级军队动员士兵的国家，劳动人民才能制止絕望的帝国主义者把劳动人民的解放希望淹没在血泊之中的企图。

最近半世紀以来，資本主义一直掙扎在不断的痛苦中。資本家阶级拚命地防止本身不可避免的灭亡，为了这个目的，使用了仍在它支配中的巨大的財力。大批的暗杀、大规模的白色恐怖、整个民族和大陆的軍国主义化、最残忍的法西斯和軍事独裁，不断地发动世界战争——所有这些，最后分析起来，都不过是一个感觉到历史已經注定了它的灭亡的阶级为了保全自己而进行的斗争的各个步骤。資产阶级离开这个世界时正如它进入这个世界时一样，“每个毛孔里都渗透了血污”。

如果人类消极地接受腐朽的資本主义所造成巨大变乱，整个世界就会墮入野蛮时代。但是，现代社会中有一个能够决定世

界命运的阶级，一个已经在行动上证明了它的英勇和忠诚并准备为一个新社会而进行斗争的阶级——这就是工人阶级。

无产阶级争取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革命斗争，以前有过两个二十五年时期的间断并且局限在一个单一的国家里或者甚至在一个单一的城市里（1848年、1871年、1905年）。紧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斗争扩展到了沙皇帝国和中欧，但是除在俄国外，到处都遭到了失败。因此，也是最后一次，在国际资产阶级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它似乎是非常强大的。

### 革命的规模更大了

今天，为消灭帝国主义和把世界导向社会主义的工人斗争与起义比以前的规模大得多了。整个亚洲、整个欧洲、英国以及拉丁美洲的和甚至非洲的某些国家都正在这些乱纷纷的斗争的冲击之下发展着，不论这些斗争是自发的、自觉的或者是有组织的。这些斗争的产生，是由于帝国主义把难以忍受的负担强加在各国人民身上，由于它不能满足群众的基本需要以及由于它无力挫败劳动人民的战斗精神。

从这些斗争中，将出现一个能够消灭资本主义的革命力量。人们没有理由因为帝国主义威胁着要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破坏，而为世界命运悲伤失望。相反地，必须为无产阶级斗争尽快地取得社会主义胜利而努力，以缩小资本主义制度正在为人类准备着的严酷的考验。

帝国主义者正在准备战争，希望用武力粉碎它的敌人的力量。但是，当各地人民的力量正在使资产阶级陷于困境的时候，战争将以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极不稳固的均势开始。

在全面战争爆发时，每一个地方，反对重整军备、通货膨胀和

破坏工人权利的斗争将会继续扩大。每一个地方，无产者和被压迫者都将公开地向资本主义剥削者挑战。

中国人民、在解放道路上的殖民地人民、甚至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尽管他们憎恨可恶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将顽强地保卫他们的革命成果，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复辟企图。

在拉丁美洲和近东，群众将利用他们的帝国主义统治者的削弱，相继站立起来挣脱掉身上的枷锁。

美国无产阶级，面临着本国历史上的最大的危机，将在战争冲击之下起而采取政治行动，并参加决定性的斗争以促使资产阶级在它的最后堡垒中灭亡。

因此，下一次世界大战，由于它本身的逻辑，将会是一个全球性的内战。华尔街将对之发动战争的亚洲革命高潮在这个战争中将扩展到五大洲。帝国主义准备粉碎起义人民，但是它将收获到世界革命作为它的罪行的惩罚。

为击败帝国主义而战斗，并不意味着为人们所想像的“克里姆林宫的胜利”，或者为人们所想像的“斯大林主义的扩张”和它的警察制度以及对一切无产阶级民主的破坏而战斗。苏联的官僚制度是一九二三年以后反革命在世界各地(除了苏联以外)胜利的附带产物。世界革命的发展将带来苏联官僚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结束，正如它将带来帝国主义的结束一样。

### 人类的最大考验

一个在像南斯拉夫那样小的国家里，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革命也证明与斯大林主义者的官僚制度的控制是不相容的。人们能够相信，千百万无产者在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之后，会愿意听命于克里姆林宫么？世界重要国家的无产阶级越快地站起来反对资本

家和擺脫它的剝削者，帝國主義者就越快地減少对于苏联的威胁，苏联的工人也就会越快地和那个寄生的官僚机构清算一切，这个机构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掠夺了他們的胜利果实和他們在建設工作中的巨大努力的果实。

人类面临着决定性的考驗。工人的資本主义敌人正在瘋狂地准备武器，以便用他們的鐵蹄来粉碎渴求自由的人民。一种日益加重的貧困、强制組織化和低下的生活标准的重担正落在各国工人的身上。千百万青年被赶出来为資本家作炮灰。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些自认为替工人阶级說話的組織，对于正在站起来維护它的面包和自由的无产阶级提出了一些什么建議呢？

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者的工会官僚机构重建了国际中心：所謂的法兰克福国际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这两个組織卑劣而公开地把自己拴在美帝国主义的战車上。它們号召人民接受重整軍备的全部負担，只是請求在社会的各阶级中間对于这个負担作一种“平等”的分配。

它們极力宣传的不是反对斯大林的罪恶而是反对苏联本身，反对共产主义工人的每一次罢工，把它說成是“政治性的”，反对殖民地奴隶的每一次起义，把它說成是“俄国帝国主义的扩张”，反对朝鮮、中国和越南的人民大众爭取自由的伟大斗争。

社会民主党的法兰克福国际的声明列举資本主义的矛盾，只是为了得出資本主义必須改善和加以监督和限制的結論。英國工党的領導以在議会里占絕對的多數执政，但它并沒有利用这个特別有利的机会把英國这个工业国家变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堡垒。相反地，它努力挽救資本主义，防止英帝国的崩溃；并且投降于帝国主义，它正在积极参加准备战争以反对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的力量。社会民主党无论在那里参加政府，它們正如在英國一样，对

劳动群众实行資产阶级的掠夺政策并指导屠杀起义的殖民地人民。

斯大林主义者的党，在斯大林卑鄙地解散第三国际之后，重新集合成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看来好像是站在反对准备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前列。它们忘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列举许多关于美帝国主义进步和民主的证明，现在却愤怒地谴责它是主要的战争煽动者。但是，它们提出来的解决办法却不是推翻这个帝国主义而是和它订立一个新的同盟条约！

它们在很多国家里拥护的“和平政府”并不是一个工农政府而是一个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派联合在一起的政府。这是因为这一运动的指导者克里姆林宫的目的不是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只是和帝国主义成立一个有利的暂时协定。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主义者的党一再重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可能”，即使这种“共处”意味着给几亿热烈盼望结束一切剥削的被剥削者带来奴役。

### 斯大林主义和战争

尽管如此，在许多国家里仍然保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党，不能在一切情况下都把它们的政治活动限制在恭顺地执行克里姆林宫的命令上。面对着强大的群众反抗运动，像中国和南斯拉夫的情形那样，它们可能在群众的压力之下看到自己不能不筹划一个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样，它们一定会为将来不可避免地和苏联官僚机构决裂准备余地。

斯大林主义者的党在最严重的革命危机当中可能经历的转变，也许使列宁主义先锋队不得不重新调整它对于这些党的战略。但是，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除无产阶级建立新的革命领导的任务。

今天在日程上的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单独的国家在特殊的情况下筹划夺取政权的斗争問題，而是在一切国家里尽快地推翻帝国主义的問題。斯大林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是胜利完成这一任务的最大的障碍。

諾斯克和謝德曼之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以重建資产阶级祖国的名义，在中欧背叛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之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西欧作了同样的背叛。但是，这些背叛的客观可能性，是为各个国家里孤立的革命运动的局限性，以及为站起来的人民群众缺少真正的革命經驗所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建立新的革命領導證明是一項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现在正在发展中的革命斗争将不停地从一个大陆扩大到另一个大陆。参加这些斗争的群众将取得从来没有过的新的經驗。特别是在先进国家里边，这将减少破了产的旧领导操纵和背叛的可能性，并且将为建立新的革命领导創造极为有利的条件。不断革命的时代将是第四国际的全盛时代。

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以外的一切中間派的組織，已确实證明不能在工人运动中間形成一种国际的流派，甚至不能准备出类似綱領的东西，也不能建立干部和維持真正的組織。只有第四国际坚决遵循着依靠无产阶级和貧苦大众的阶级斗争来消灭資本主义制度的道路。

### 利用每一个危机

第四国际号召工人利用他們本国資本家阶级不能不遭遇到的每一个重大危机，依靠工人阶级民主选举出来的委员会树立起他們的直接政权。

它号召被压迫的人民完成他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

它号召革命斗士到处深入眞正的群众运动，參加他們的日常斗争，分担他們的遭遇，并向他們証明自己是最勇敢的战斗者、最优秀的組織者、最有觉悟的指导者和最有耐心的革命教育家。

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现实必須与之相符合的理想，而是克服垂死的資本主义的矛盾现实的眞正运动。革命者除了本阶级的眞正运动的利益之外，沒有任何其他利益。他們超出于一切集团的或民族的狹隘利益之上，代表着无产阶级的普遍利益，和对于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明确认識。

**第四国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聚集了来自二十六个不同国家的七十几名代表，他們有着在各大洲进行各种工人斗争的几十年經驗。大会向为自己阶级利益而战斗的全世界工人致敬。工人們尽管思想意識和觉悟不同，然而他們組成了一个单一的反帝統一陣綫，这个陣綫将推翻資本主义的統治和建立起社会主义共和国世界联邦。

代表們热烈地向被关在帝国主义和斯大林监狱里的革命斗士以及一切被鎮压的工人阶级的受害者致敬。胜利的无产阶级不久将打开他們的牢門并給他們的看守者以应有的惩罚。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向中国的无产阶级、貧农和正在朝鮮同帝国主义战斗的他們的勇敢的儿子們致敬。中国革命第一次震动世界的胜利是 1917 年 10 月以来世界历史上的最重要的事件。第四国际号召一切国家的工人，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保卫受到帝国主义干涉威胁的中国革命。它号召中国工人繼續斗争，直到资产阶级势力完全消灭，以工人和貧农民主选举出来的委员会为基础的眞正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向英勇的朝鮮无产者致敬。尽管帝国主义向他們傾注大量的炮火炸弹，然而他們并沒有丧失解放和統

一国家的頑强意志。第四国际号召一切国家的工人給朝鮮的无产者以最大限度的物质和政治援助，直到最后一个帝国主义兵士离开这个受难的国家。

### 撤退帝国主义军队

第四国际的世界代表大会向越南、緬甸、馬来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殖民地革命战士們致敬。他們今天正战斗在世界反帝斗争的前列。英国、法国、美国和荷兰的无产阶级的最大責任是帮助和支持这些阶级弟兄的斗争，这是一个給国内資产阶级統治以极沉重打击的斗争。

第四国际的世界代表大会向印度、日本和錫兰的工业和农业工人致敬。他們已經建立起强有力的工会和本阶级的政治組織，并且正在試圖从資产阶级手中夺取他們国家的领导权。只有工农政府才能和帝国主义割斷最后的联系，才能实行真正的土地改革，才能沒收大地主和大資产阶级的財产，并在这些国家里为真正的經濟上升創造必要的条件。

代表大会特別向第四国际的錫兰支部，錫兰平等社会党致敬。这个党将領導本国的群众推翻腐朽的資产阶级。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向伊朗的工人和貧农致敬。他們通过强有力革命动员已經迫使本国的資产阶级采取某些走向反帝斗争的步驟。

无条件地支持伊朗、埃及、伊拉克、北非的群众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石油与矿产公司的斗争：拥护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在“法兰西联邦”以外完全独立：拥护苏丹的完全独立：給埃及以苏伊士运河的全部主权：撤退一切帝国主义军队：建立中东国家的社会主义联邦：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向非洲的黑种工人和貧农致敬。他們在过去几年中已經有了反帝斗争的觉醒。第四国际号召他們在各地建立自己的工会和本阶级的党，对帝国主义想把非洲大陆变成未来战争基地的一切企图展开斗争。

打倒“有色人种的差別待遇”和一切种族歧视！非洲人民在他們爭取政治民主和摆脱外国帝国主义掠夺的目标上大团结万岁！

### **推翻资本主义专制**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向玻利維亚的无产阶级和它的勇敢的先锋队（革命工人党）——第四国际的玻利維亚支部——致敬。玻利維亚矿工們多少年来就在努力推翻矿产公司在他們国家实行的血腥专制統治。由于和他們一起取得了伟大的反帝统一战綫的共同經驗，革命工人党将能使他們了解到，只有依靠貧农的支持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获得这种解放。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向拉丁美洲的无产阶级和一切貧苦大众致敬。他們不想作充当美帝国主义工具的资产阶级和军事集团的走卒。在一切国家里建立起它的阶级組織并同这些国家里正在发展的真正群众运动結成一体的拉丁美洲工人阶级先锋队，将会知道怎样在它的綱領里把反帝、反资本主义以及民主和民族的要求结合起来，并且将会高举起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联邦的旗帜。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向南斯拉夫的无产阶级致敬。由于它在大战期间的英勇的斗争和由于它对于克里姆林宮的大胆的反抗，它已站在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进军的最前列。今天，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人正在向帝国主义压力投降，并且正在危及到南斯拉夫工人以很多牺牲为代价赢得来的一切。代表大会号召一切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在他們的党内建立一个列宁主义的反对

派，更換現在的機會主義領導，同在全世界發展中的革命力量聯合起來，並把他們的反抗克里姆林和反抗华尔街的戰略建立在同這些力量緊密結合的基礎上。這些力量將會保卫無產階級的南斯拉夫來反對它的一切敵人。

### 進行獨立的階級戰鬥

第四國際世界代表大會向西歐的工人致敬。他們面對著資產階級的進攻，保持住了他們的一切階級陣地，並且甚至已經開始轉入反攻。為反對降低生活標準、反對損害工人權利、反對備戰而鬥爭，必須由下而上建立起一切工人組織的統一戰線，必須利用每一個為改善生活條件而鬥爭的高潮提出政權問題——建立工農政府問題。

代表大會特別向站在本階級的前列進行鬥爭的法國、意大利和希臘的共產主義工人致意，並對他們堅決抵抗資產階級的反共運動表示敬意。第四國際的鬥士將和他們並肩作戰，反對大西洋公約，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保衛蘇聯、“人民民主國家”和中國。這樣就可以揭露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對托洛茨基主義進行譴責的誹謗性質，而共產主義工人也將從自己的經驗中知道，只有第四國際的綱領才能對共同敵人進行有效的鬥爭。

第四國際世界代表大會向德國的工人致敬。他們正在克服1933年的失敗、納粹專政、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經濟的繼續衰退所加在他們身上的可怕的考驗的後果。今天，德國的無產階級已經重新組成為強有力的工會組織。如資產階級自己所承認的，這些組織能夠致波恩政府於死命，但是它們遭到了外國的占領和本國的分裂。德國的無產階級正在周密地考慮獨立的階級戰鬥所要採取的步驟。歐洲的整個未來可能決定於這些戰鬥行動的發展。

通过反对本国資产阶级重整軍备，要求撤退一切占領軍，要求由統一的、自由的和民主的工人委員會組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斗争，德国工人能够对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建立作出有力的貢献。这是阻止旧大陆解体与衰落并保証它有一个新的复兴的唯一手段。

第四国际的世界代表大会向西班牙的工人致敬。他們用今春的伟大罢工高潮表明他們正在开始克服內战失敗的后果。同西班牙无产阶级彻底團結起来！打倒劊子手佛朗哥！一切国家的工人，阻止你們的政府延长西班牙人民在佛朗哥独裁政权下的苦难！推翻佛朗哥，坚决走工农政府道路，走新的西班牙革命道路的工农联盟万岁！

### 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权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向英国的工人致敬。他們今天正在他們的全欧洲最强大的阶级組織中，准备着进入一个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新阶段，为工人管理生产和反对帝国主义重整軍备而斗争。英國的工人們，要認識到你們的巨大能力！站在使欧洲摆脱資本家控制的斗争的前列！把你們国家的强大工业潜力变成为同正在从帝国主义手里解放自己的殖民地人民結成自由同盟的堡垒。向全世界无产阶级証明，怎样可以建立起一个既沒有官僚統治也沒有特权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权。

第四国际的世界代表大会向加拿大、澳洲、新西兰的工人致敬。他們正在他們的群众組織中猛烈地反抗資本家的压力，并且正在反对資产阶级的进攻和反共歇斯底里，維护他們的生活水平和工会权利。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向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人、农

民和士兵致敬。代表大会保証，在未来的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复辟的斗争中，他們将得到全世界的革命运动的完全的和无条件的支持。保卫集体财产、计划经济和保卫工人国家(即使已經变形和蛻化)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项紧急任务。

同时，第四国际坚决支持一切反对苏联官僚制度的警察专政的无产阶级运动，并为在这些国家里建立新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党而斗争。这样的党将领导必要的政治革命以使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受官僚制度的束缚。反对帝国主义，保卫苏联和保卫“人民民主国家”万岁！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乌克兰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打倒斯大林主义专政！苏维埃民主万岁！

### 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向美国的一千六百万有组织的工人——世界最大的和最有力量的工人阶级的先锋——致敬。向社会主义工人党致敬，这个党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堡垒中反对一切压迫，维持着列宁主义的纲领和组织。美帝国主义向统治世界进军所引起的世界性破坏行为，不久将会开始在它自己国内摧毁美帝国主义的统治。那将是美国革命到来的时刻，这个革命将解放出无限的创造力量并在这整个地球向社会主义转变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宣布它自己是世界无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形形色色的运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它在本阶级的队伍中为它的革命纲领而战斗。在未来的动乱的年月里，它将取得这个运动的领导权，指导勤劳的人类努力建成一个没有阶级的、没有任何剥削或压迫的社会——一个实现普遍和平和实行以需要为

基础的經濟保証人人富裕的社会，一个使全人类都能享受到文明福利的社会。代表大会号召一切国家的工人联合起来，为这个伟大目标而斗争。

打倒帝国主义和它正在准备的杀人战争！

共同努力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 五、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

### 第四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決議 (1954年)

1917年以来苏联和世界工人运动的发展基本上决定于世界规模的阶级力量对比的实际作用。这个发展已經经历了几个主要阶段：1917—1923年的革命高潮、1923—1943年的世界革命的低潮和1943年以来的新的革命高潮。

十月革命在許多方面都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起点：

——它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工人国家。

——它在理論方面推动了一部分工人运动并通过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建立而有利于这个运动的独立組織工作。

——它給予殖民地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初期斗争以巨大的推动力。

1917到1923年这一时期首先是一个为爭取这个新国家的生存、为爭取在全世界建立和巩固共产主义先鋒队而斗争的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革命的失敗在苏联造成的結果是苏維埃民主遭到了一种建立起独裁政权的官僚制度的破坏。苏联的經濟和文化，在过去三十年中，就是在这个政权之下发展的。通过这个国家的活动和压力，苏联官僚制度对于全世界的群众运动，首先是对于那些由于受到俄国革命的推动而产生的組織和运动，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本来應該使它們的活動适合这个新阶

段，也就是說，本来應該在理論上和政治上巩固自己，加强和群众的联系并借此为将来的革命高潮作好准备。但是，第一个工人国家和它的墮落的官僚机构对于刚脱离社会民主党而还没有可靠干部的各个組織的压力，导致了这些組織的墮落。共产国际成了把克里姆林宮的命令传达給各国共产党的主要工具。因此，这些党的政治的和理論的发展就越出了常軌，在选择干部和中央机构时，也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方式。这些党利用群众和群众运动，不是为了促进世界革命而是为了官僚机构的利益。

这种利用各国共产党为克里姆林宮的外交服务的做法，有助于造成工人运动一系列慘重的失敗，最后促成納粹主义在德国的胜利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主要資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內部的少数派。斯大林主义、即使世界无产阶级利益从属于苏維埃官僚制度利益的运动，是通过一个比較簡單的体系起作用的：

——一个实行警察专政的工人国家；  
——在本身受到严密控制的共产国际指导下的軟弱的工人組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时和战后几年里，一些十分重要的事件产生了一种情况，那就是在现在的斯大林主义軌道以內集合了以下这样一个复杂的集体：

1. **苏联**。这个国家依靠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的力量和群众对于这些关系的爱护，于战争期間进行了特別出色的抵抗。其后，它又繼續取得了经济发展，因而事实上现在已經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

2. **东欧的新的工人国家**。这些国家基本上是靠官僚主

义行动建立起来的，克里姆林宮事前并沒有計劃；

3. 中国。在那里，中国共产党在势如燎原的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取得了政权；

4. 在斯大林主义者或亲斯大林主义者領導下的一系列的殖民地运动；

5. 資本主義世界的共产党。西欧的这些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結束时，由于“抵抗运动”取得了重要的发展；在以后几年里，共产党又失去了它們在一系列国家里已經贏得的地盤；但是在重要的国家如法国和意大利，这些党具有左右工人阶级大多数的力量，并且尽管局势有某些变动，以后仍然一直保有这种力量；

6. 1948年6月以前的南斯拉夫也可以列入此类。南斯拉夫共产党依靠它曾經領導的英勇的群众斗争取得了政权。

使苏联官僚机构和它对于各国共产党的严密控制得到发展的根本条件，即革命的低潮、苏联的孤立和它的經濟的落后状态——这些条件已經不存在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保証这种控制的平衡状态——这种平衡在同一时期以它自己的方式反映了全世界相对的平衡——已經遭到了破坏。

斯大林主义的“扩张”不但远不能构成一个巩固的因素，而且其中还含有造成本身解体的趋势；这些趋势从下列事实得到了証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脱离；“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員中的多次清洗；承认与中国共产党对于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共同领导；实际上几乎等于消灭的某些共产党的削弱；苏联国内政治不复稳定和在周围防垒中开始发生革命騷动。

这种新形势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克里姆林宮不能重建一

个能以任何方式維持下去的国际中心，以代替 1943 年解散的共产国际。

最后，尽管有群众性的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和苏联作为一个强国的吸引力的增加，群众在此战后期间仍然形成了大批向斯大林主义势力范围以外的左派（比万主义、亚洲社会党……）发展的趋势。

但是，各种因素仍在发生作用，使克里姆林宫仍有支配世界工人运动和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能力。这些因素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苏维埃国家对于实力较弱的伙伴的控制；群众利用他们所掌握的组织来解决革命形势所提出的問題，因而首先集中在现有领导周围这一事实。最后还有，在斯大林主义兴起期间所获得的概念和方法由于惰性和传统而继续发生作用，尤其是因为这些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以及它们与苏联的关系一直存在下来，所以更是如此。

除南斯拉夫外，在共产党拥有群众基础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产生群众与克里姆林宫决裂的现象；同样地，在这些党的内部也没有任何群众性分裂的现象。斯大林主义的解体最初采取的形式是一种与克里姆林宫官僚机构的利益对立的想法渗入到这些组织中去，以及以前建立起来的官僚机构等级关系逐渐发生了改变。斯大林主义的解体在整个时期内将首先并特别以这种方式发展起来：具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组织将继续存在，但是在这些组织形式的内部，无论关于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或者关于代表苏联官僚机构紧密控制的现存的组织关系，都将有向新内容发展的趋势。

在共产党构成工人运动中一个人数不多的少数派的国家里，革命高潮由于沿着其他组织的道路发展而使这些共产党更加陷于孤立，从而引起它们内部的深刻危机。

斯大林逝世以后在苏联出現的事件一方面使苏联发生政治革命的客观和主观条件开始成熟。另一方面，这些变化也使人們以最保守、甚至最反动的方式对某些組織施加的压制得到了緩和。这些組織今天即使在共产党最沒有力量的許多国家里也仍然把大多数的革命战士團結在一起。結果，这就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共产党和非資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上开辟了一个新阶段，从而在上述的意义上加速斯大林主义的解体。

第四国际是为保証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和組織的繼續以便为无产阶级建立一个新的革命领导而創建的。它負有任务插手于这个解体工作，把到现在为止为斯大林主义所影响的健全的共产主义力量團結在它的旗帜之下。

## I 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兴起和衰落

1. 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革命浪潮只是动摇了最沒有力量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并沒有波及到那些殖民帝国，因而容許那些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靠着对群众作重要的让步（八小时工作制、普选权等等），把革命运动高潮在它刚掀起的时候就加以扑灭。在这个革命浪潮发生时，經過了半个世紀的急剧經濟发展的美国还没有经历过一次深刻的社会危机，足以使美国的不断地从移民群得到补充的工业无产阶级群众具有工会的或政治的觉悟。因此，革命浪潮起作用的范围就只限于中欧和东欧，基本上只限于世界大国中間的俄国、德国和意大利。但是，俄国是一个經濟上和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它的工业无产阶级不但人数很少，而且技术和文化的水平也比較低，所以这个国家总是被几千万不識字的农民压得喘不过气来。只有俄国的革命和德国与意大利的革命融合为一，才能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一种足以保証苏維埃民主的物

质的和社会的广闊基础。1922年意大利革命的失敗和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敗标志着革命浪潮的結束，使革命被孤立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这种孤立使俄国无产阶级遭受到重大的物质牺牲，导致它的战斗潜力和战斗热情的逐渐消竭而使它越来越抛弃政治活动和政治兴趣。这样就为它的受到苏維埃官僚制度的政治掠夺創造了客观条件。

2. 尽管如此，1917—1923年的革命浪潮的結束并不意味着国际工人运动的深广的长期的失敗。世界无产阶级中在1918—1923年革命高潮期間一直比較平靜的那些部分，开始在以后几十年里相继活动起来：英国在1925—1926年；中国在1925—1927年；西班牙在1931—1938年；法国在1936—1938年；美国在1934—1937年。在德国本身，1929年世界經濟危机为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創造了有利的条件。如果最后，尽管有这許多机会而革命仍日趋衰落，其原因并不在于群众运动所固有的动力，而在于工人的领导人所起的有害作用。在許多場合下，特別是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招致了这些运动的失敗。如果斯大林主义的出现和兴起归根到底决定于世界革命衰落的加甚，那么这种发展就既不是致命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苏联和全世界革命力量（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維克—列宁主义者）为扭轉这种趋势和靠着工业化和在世界规模上取得的胜利（即使是部分的胜利）以加强苏联无产阶级力量的努力，随着这些事件的成为过去，都已經被証明是完全现实的。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合在这整个时期一直是可能的。如果这种联合沒有实现，那首先就是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所起的作用。斯大林主义是1923—1943年这一整个时期的革命低潮的結果，同样也是它的原因。

3. 革命孤立在一个落后国家中，农民占压倒优势的比重，无

产阶级人数不多和文化水平低，以及它缺少民主传统——所有这些因素使苏联的无产阶级民主软弱无力，群众日益消极，政权越来越完全为党和国家的官吏所掌握。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间，这样一群官吏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在人数上和在重要性上应该减少，使社会和社会主义革命后的经济得到巩固，使阶级、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矛盾归于消灭。这种消灭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的消亡是一致的。在这种消亡实现以前，应该由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当权的工人阶级对这些官吏实行严格的监督以尽量限制他们滥用职权。在苏联发生的情况是完全与此不同的。在普遍匮乏和贫困的情形下，管理和分配全国财富的政权很快地成了分配的节制者，把重要的消费特权霸为已有。官僚主义分子把自己组织成为一个特殊的和保守的官僚阶层，与剥削分子或小资产阶级分子（富农、新经济政策下的商人等等）联合起来，维护与无产阶级利益相反的物质利益。以后，他们又组织成为一个意识到自己享有特殊社会利益并决心在任何其他社会阶层面前维护这些利益的官僚阶级。这个官僚阶级的建立和巩固主要反映在政治领域内，反映在使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国家唯一的进行政治斗争的场所——分裂的派系斗争中。斯大林主义派在这个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因为它得到了官僚机构的支持。这个胜利终于破坏了党内民主——苏联无产阶级民主的最后堡垒，完全推翻了这个国家除了所有权关系以外的社会上层建筑，并且建立了基本上以苏联官僚机构的利益和从根本上对这些利益的维护为基础的斯大林主义者的拿破仑式独裁政权。

4. 革命高潮最明显地表现在十月革命的胜利上。革命低潮基本表现在苏联的苏维埃官僚制度的胜利上。但是这种低潮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极端衰落的体制之内发生的。资本主义制

度已經十分衰落，在这个衰落基础之上的帝国主义者的对立十分尖銳，世界規模的工人运动仍然十分强大，以前俄国有产阶级的微不足道的残余或者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核心在苏联本国还十分脆弱，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低潮还不能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反革命活动大体上仅限于上层建筑的范围。以生产資料国有化为特点的生产方式、对外貿易垄断、全面的經濟計劃——由十月革命产生的使苏联經濟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脱离并与之相对立的这一基础，在苏联的历史过程中得到了維护、加强和巩固。按照列宁的公式被认为是过渡时期特点的資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間的斗争，在苏联国内从生产領域——这里实际上消灭了一切資本主义形式——进入了分配領域。因此，苏維埃官僚制度的拿破崙式独裁是政治反革命的产物；要推翻它就必须进行一次政治革命。但是，苏維埃国家是十月社会革命的产物，它在繼續保卫（虽然是以一种特殊的和常常不恰当的方式）这个革命的經濟的和社会的成果。除非由社会的反革命重新建立起（即使仅仅是逐步地）資本和生产資料私人所有制的統治，这个国家是推翻不了的。我們說苏联是一个墮落的工人国家，这个說法包括现代苏联社会现实的两个根本因素：一方面是从十月革命产生的社会基础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是建立在同样基础之上的一种政治反革命的胜利。我們无条件地保卫苏联的方針与这种矛盾的苏联现实是相符合的：通过推翻官僚独裁和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証苏联的发展；防止苏联的失敗，以免它的社会基础被推翻和重新建立起資本主义。

5. 在这同一的苏联现实的体制的内部出现了一种矛盾的性质，即苏联官僚机构的两重性：

(1) 一方面，这是一个从苏联的特殊社会結構取得其特权的寄生阶级。因此，为了存在下去，它就不能不以自己的方式保卫这

一結構，反對企圖破壞這一結構並重新建立起資本主義經濟（無論是什麼形式）的國內和國際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力量。

（2）另一方面，這個寄生階級除非剝奪無產階級的政治權利，依靠無產階級政治上的消極態度和它的缺乏革命遠見，否則就不能擴張它的特權和使它們暫時保持穩定。因此，官僚機構就不能不違背無產階級的意願，力圖維持那種足以防止蘇聯無產階級的新革命高潮和新革命活動的國內和國際形勢。

蘇聯官僚機構的矛盾性質同樣反映在下面的事實上：只要它能保衛蘇聯及其社會基礎以抵抗帝國主義和各種復辟勢力的進攻，它就明確地幫助蘇維埃民主在國內的復活；相反地，只要它能暫時遏制蘇聯無產階級或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高潮，它就明確地破壞或瓦解它自己的特權所由產生的社會基礎。

6. 1923年以來，蘇聯官僚機構的這種兩重的和矛盾的性質一直反映在它的整個國內的和世界的方針上。但是，這種兩重性表現自己的具體方式基本上決定於蘇聯官僚機構所不能控制的情況：全世界的和蘇聯國內的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從這一點來看可以分成兩個主要階段：

（1）從1923到1943年：與資本主義制度的普遍危機和帝國主義內部矛盾的嚴重化有關的革命和工人運動在國際範圍內的撤退，容許蘇聯官僚機構在國際革命運動和帝國主義之間、在不同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在蘇聯國內各階級之間**保持平衡**，以鞏固它的權勢。蘇聯的拿破崙式獨裁就是這些平衡的產物。蘇聯官僚機構的方針所追求的目的是維持現狀，保持平衡。在這種意義上，蘇聯官僚機構的國際方針的一篇全球的總賬是改良主義的，因為這個官僚機構的目的不是推翻世界資本主義，而只是在保持現狀的框框里維持蘇聯。

(2) 从 1943 年开始，与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加剧和美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确立了它的压倒优势有关的新的革命高潮，破坏了国际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間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平衡。这些因素迫使这些国家——无论它们是否愿意——参加一个世界帝国主义统一战线来同革命和反资本主义力量相对抗，并且使每一种骑墙的和维持现状的方针越来越成为不现实的。斯大林主义者军事独裁的平衡基础的崩溃，也破坏了苏联官僚独裁的基础本身。同时，苏联生产力的高涨、无产阶级在人数上和文化上的增强以及国际革命浪潮在这个国家內的反响，也破坏了这个国家的社会力量的平衡(以它们的政治上的软弱性为基础)，并且正在为无产阶级重新争取苏维埃民主的斗争預作准备。

7. 从 1923 到 1943 年期間，苏联官僚机构的两重的和矛盾的性质在国内外表现在一些突然的轉变上：

(1) 1924—1927 年：苏联官僚机构与富农和新經濟政策下的商人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国际上，采取右傾路線，与蒋介石、英国工会官僚、巴尔干各农民党等实行无原則的联合。

(2) 1928—1934 年：消灭富农和商人；实行强迫的农业集体化和冒进的工业化。同时，摧残工人残存的从十月革命得来的权利，給每一个企业的經理以无限的权限，加速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平等现象的发展。国际上，在帝国主义由于經濟危机而遭到削弱和陷于瘫瘓时，采取极端左傾的路線。

(3) 1935—1939 年：在苏联国内采取右傾路線，恢复农民的一部分牲畜和小块土地的私有权；废除旧苏联宪法；消灭整个老一代的布尔什維克；反动势力在道德、文化等領域內取得胜利并一般地鼓励了新兴资产阶级倾向。同时，国际上也采取右傾的路線：和帝国主义的“民主国家”联合，承认这些国家和它們的殖民地的国

防；实行人民陣線政策；压制西班牙和法国的革命。

(4) 1939—1941 年：在苏联作战争准备，包括停止大规模清洗在內，并巩固个人在官僚机构中的地位。在国际上，由于对外联合的突然改变方向，斯大林主义者領導的各国共产党采取了极端左傾的路線。

(5) 1941—1943 年：战争期間采取右傾路線。在国内：以“伟大卫国战争”相号召，优待农民，准許大批集体农庄土地为私人占用，解散共产国际，恢复教会作为宣传国家政策的工具，进行大斯拉夫主义的宣传，等等。在国外：和帝国主义紧密联合，采取民族陣線的方針，反对殖民地要求解放的起义，反对保卫盟国工人的經濟利益，等等。

8. 从 1943 到 1947 年期間，苏联官僚机构的权势似乎达到了頂点。这一期間看来是世界革命低潮和新的高潮中間的过渡时期。为了同一理由，它也是斯大林主义兴起时期和衰落时期中間的过渡阶段。世界革命高潮的力量还不足以战胜斯大林主义；一般說来，它还被限制在官僚机构及其代理人能够通过若干传统的方法对它加以控制的范围以内（法国、意大利、印度支那、馬来亚，以及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一部分）；唯一的例外是南斯拉夫。但是，这个革命浪潮却足以威胁帝国主义，使它力求和苏联官僚机构訂立一个临时协定。后者着手阻止或試图压制革命以换取領土上的和經濟上的让步。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的协定，德国的被肢解和欧洲的被分成为两个势力范围，同一时期的西欧共产党和远东殖民地国家的采取反革命方針，在东欧对資产阶级残余的維持，美国將軍馬歇尔和斯大林使中国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的共同努力——所有这些事項的用意就在于此。促成这一趋势的是：苏联的国内形势，战争的可怕破坏，消費品的极端缺乏，1945 到 1947

年在恢复战前生活时遭到的經濟危机，官僚机构为了在某种程度上緩和这种形势对于緩冲国家的掠夺。

9. 但是，国际革命浪潮、尤其是中国革命的胜利破坏了苏联官僚机构与帝国主义达成全面妥协的可能性。帝国主义被窒息在过于狭窄因而不能滿足其需要的生活空間以內，遭到了一个可怕的經濟震动的威胁。它以前企图依靠在西欧恢复資本主义經濟而轉入攻势，借以減輕苏联对于緩冲地帶的緊密控制(馬歇尔計劃)。在此以后，帝国主义受到了殖民地革命的包围，轉而采取了武力行动(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馬来亚和朝鮮等地的战争)，并开始准备和一切反資本主义力量作最后的清算(大西洋公約、共同安全條約、巴尔干公約、中东公約、太平洋公約、重新武装日本和德国等等……)。苏联官僚机构因处在帝国主义威胁和中国革命之間，看到自己不能不与从这次革命中出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意味着在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自主，承认中苏两国共同領導亚洲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这就标志着苏联官僚机构所处的世界形势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这种形势的特点是国际間阶级矛盾加剧和阶级力量的对比以越来越有利于革命的方式向前发展。这种新形势日益限制苏联官僚机构玩弄反革命花招的可能性。苏联官僚机构不再能利用整个殖民地革命作为找付的零錢以换取和帝国主义达成全面的協議。它将继续努力利用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正如它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印度、阿根廷、印度尼西亚)阻止群众反資本主义的斗争，企图在这些国家动员包括“民族資产阶级”在內的一切阶级来反对帝国主义，从而继续努力取得这些国家某些資产阶级的支持一样。这个官僚机构还将继续努力和帝国主义达成暂时的和局部的协定，并继续努力起一种阻碍殖民地革命发展的作用(在朝鮮战争期

間援助不力)。但是，这些努力的**实际效果**将随着一方面是群众(尽管想对他們加以压制)革命高潮另一方面是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走向战争的程度的加深而越来越有限和不能持久。

#### 10. 同时在苏联国内也引起了一种同样的发展。

从 1945 到 1947 年的經濟复原的危机(这一危机已为馬林科夫对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所确认)以来，苏联經濟的重大成就已經大大改变了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的地位。如果說在主要产品的生产方面按人口計算仍然落后于最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它却已經超过了如法国和意大利这样一些生产陷于停滞的資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另一方面，总生产量大大地超过了美国以外的一切資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并且在一些主要产品方面甚至于超过了两个或三个最重要的資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德国、日本的**加在一起**的产量。苏联已經成了世界上的第二个工业强国，第二个拥有最多机器的国家，并且正在以除了美国以外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快的速度提高它的生产率。如果說苏联的农业還沒有能够以同样的速度发展并且还落后很多，它的进步依然足以消灭任何饥荒或长期营养不足的现象。对于大工业中心的人口，工业消費品的供应虽然还很不充分，但已經正常化并且超过了以前苏联任何时期的供应情况。

#### 11. 由于这些經濟发展，正在发生一种重要的社会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这个国家的主要社会阶层的組成和力量的改变上。

(1) **无产阶级**在人数上和技术上已大为增强，产业工人的数目以每一个五年計劃几百万人的比率在增加着。它已經从 1917 和 1927 年的苏联社会上的少数变成为人数最多的社会阶层。文盲已經从它的队伍中絕迹。过去七年来的苏联經濟的惊人的机械化，使熟练工人的人数和作用有了很大的发展。粗工不再是苏联

工人的典型，而是逐渐变成例外。因为这一点，无产阶级中间的收入差别虽然比过去为大，但不致再把大多数工人阶级压到饥饿的水平。

(2) 最受到打击的是农民。每年都从它的队伍中抽调工业的补充劳动力。这个阶层的人数和社会重要性不断地趋于减低。它的上层继续被调走并被转化成为集体农庄的官僚和贵族(经理、会计、农学家、拖拉机手)。农民没有能够恢复他们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不久取得的比较有利的地位。劳动生产队制度的采用和集体农庄的扩大标志着沿农业逐步工业化的路线前进的重要步骤，但是它们遇到了农民的消极抵抗，没有能做到真正提高农业生产。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远不如城市，农业和工业之间的不平衡逐渐在增加。

(3) 官僚在人数上和重要性上也有所增加，但不如无产阶级增加得快。在官僚上层集团的构成上发生了两种重要的变化。首先是关于社会出身，以前的资本家或资产阶级专家和商人的数目，以及 1917 年以前革命团体的老革命战士(热月党人<sup>①</sup>)的人数，已经越来越减少，大批的官僚是从革命以后成长的享有特权的那些人当中得到补充的。其次，在他们的心理状态方面：官僚机构的上层人物大多数不再是一个年轻的贪婪的社会阶层，想要在普遍的贫困当中在消费的领域内取得特权；他们大多数属于达到成熟年龄或者进入老人的人所构成的那个阶层，想要保持尽量高的生活水平。

12. 虽然苏联拿破崙式独裁的兴起和巩固是政治反革命的产物，然而官僚机构已经在苏联社会各方面的社会生活上盖上了它

---

<sup>①</sup> 原指法国共和二年(1794 年)热月推翻雅各宾专政的反革命的大资产阶级代表，这里系借用。——译者

的特殊烙印。

(1) **經濟**: 过渡时期整个經濟的特点是非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残存的资产阶级分配标准之間的矛盾。但是苏联官僚机构由于大大发展了它的特权和社会的不平等而加深了这个矛盾。官僚机构在計劃方面实行中央集权,取消工人对生产的一切监督,工厂官僚享有无限权力,作事专断,渴望获得特权——所有这些在生产領域內引起了新的矛盾和新的不平衡。这些矛盾和不平衡隨着經濟取得重要发展的程度而日益加甚。

(2) **政治**: 苏維埃民主的最后痕迹的消灭和党内民主的絕迹,事实上造成了一個独裁的政权。在这个政权下,大部分官僚本身,包括上层集团在內,也无法行使他們的政治权利。軍事独裁基本上建立在鎮压机构和按时清洗的恐怖手段之上,而且另外还控制着一种公民投票的“选举”制度。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盛行一时,对于肯定自己历史和自己权利的少数民族則斥之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3) **军队**: 曾經宣誓效忠于苏維埃宪法和共产国际的旧日紅軍已經为独裁政权严密控制的“爱国的”苏联军队所代替, 而在这个军队中也看到了在整个社会上盛行的同样巨大的不平等、专斷和官僚机构的无限权力。

(4) **意识形态**: 馬克思主义学說已經变成一种实用主义的理論,以符合官僚机构政策的实际要求。对党、国际和国家的历史不断地作有計劃的修正、改写和歪曲。科学的研究和自由的学术討論在一切社会科学領域內都遭到压制,甚至在某些自然科学領域內也正在开始“决定方向”。由于这种压制,就有必要产生一个永无錯誤的无所不知的教主, 在每次改变政策时提出符合于官僚机构当时利益的教义。

(5) 道德：在十月革命占优势的年代里曾经实行的妇女解放和青年解放已被推翻。妇女平等成了使用从工人身上榨取来的超人体力劳动的平等，而不是一种自由安排她们自己生活的权利。离婚法规定得越来越严格，堕胎权已被取消。青年组织的章程特别郑重其事地规定青年不得参加政治。

13. 但是，苏联群众在战争期间吸取了巨大的经验（他们同时看到了官僚机构能把他们压制到什么限度和西方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如何）。苏联群众、尤其是先进的工人阶级青年，开始越来越认识到苏联社会和拿破仑式独裁制度中所包含的矛盾。他们特别注意到经济矛盾，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投入了他们的一切力量和创造性劳动而更是如此。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开会以前、开会期间和开会以后所进行的讨论，揭露了下列事实：

(1) 大多数苏联人民认为：苏联取得的巨大经济力量与仍然很低的群众消费水平越来越有更大的矛盾。房荒的危机尤其是这些群众感到无法解释的，这个问题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期间受到了普遍的批评。

(2) 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党和工会工作者的下层——认为苏联官僚机构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成为一种障碍。官僚机构上层集团在为他们自己取得了高级消费特权以后，就不大对生产的最大发展感到兴趣。企业经理人的贪利欲望曾经被认为是积累资金的主要动力，而现在则变成了限制和妨碍这种积累的因素。指标完成的情况主要决定于这些官僚阶层的兴趣，只要这种情形继续存在，这些阶层将给计划加上另外一种破坏的力量（牺牲生产计划来优先完成财政计划）。官僚机构在制定计划上的集权与日益复杂的经济发生冲突。

14. 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官僚独裁的矛盾终于成为严重的理

論上的危机，这不仅反映在政治經濟学的討論上，而且也反映在圍繞着“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其他一些意識形态問題的討論上。

(1) 克里姆林宮的統治阶层已經被迫同时既承认阶级在苏联的消灭，又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和甚至于尖銳化。

(2) 他們被迫強調，随着向共产主义发展的程度，社会矛盾不是消灭而是加深。

(3) 他們被迫同时既坚持国家不但远不能消亡，而且随着向共产主义过渡会“更为加强”，又主张随着“社会主义在世界上主要国家里取得胜利”，国家将以消亡而告結束。

(4) 他們被迫同时既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法則”是滿足人民的需要，又承认繼續支配这个社会的經濟的是“生产資料的生产优先于消費資料的生产”。

(5) 他們不得不同时既把个人致富的傾向說成是苏联社会中主要的“資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又保持这个同样的傾向作为实现計劃的主要手段。

15. 这样，苏联拿破崙式独裁在历史上的不稳固性就明显地暴露出来。随着国际规模的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随着同时发生的苏联国内力量对比的变化，独裁政权的客观基础正在迅速消失的过程中。从传统上看，苏联拿破崙式独裁的历史上的过渡和暂时的性质在下述意义上得到了正确的分析，即这个独裁政权能够把社会发展引向两条相反的道路：或者是在农民和官僚机构内部重新加强复辟主义派系，这样它們就会靠着帝国主义的帮助，用内战方式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或者是靠着世界革命的发展以及世界无产阶级給与苏联无产阶级和官僚机构左派的帮助（这个左派将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保卫苏联的社会基础），推翻拿破崙式独裁，重新建立苏維埃民主。但是这二者必居其一的不同变化显然意味着

世界規模的階級斗争力量的特殊变动。第一种变化的出現是世界革命撤退的最后結果，第二种变化的出現是革命在国际范围内胜利的結果。现在的世界規模的階級斗争力量的变动很清楚地指出哪一种变化更有可能发生。苏联整个國內形勢的发展也同样說明了这个問題。在苏联，面对着生产力的高涨，曾經存在和不断复活的小規模的小商品生产单位在整个經濟生活中将只是占极小的比重。社会矛盾的加深、帝国主义压力的加大和无产阶级觉醒的迹象，可能在官僚机构的极为有限的阶层中引起逃往和投降資产阶级陣營的反映；但这不过是这种发展的附帶結果而不是它的主要特点。因此結果是：因为在苏联本国力量对比的变化趋向于对工人阶级有利，而同时在世界規模上也发生一种类似的变化，所以未来的决战将不是发动进攻以恢复私有制的复辟力量和保卫十月革命成果的力量之間的决战。相反地，它将是保护官僚特权和官僚机构的力量对于从事斗争以求在更高标准上恢复苏維埃民主的工人阶级革命力量的进攻实行反抗的作战。

16. 斯大林的死亡加深了上述一切趋势，并且給了这些趋势以直接的和引人注目的表现。这可以从斯大林在苏联所起的特殊作用上来說明。斯大林是各阶级之間的調停人，是各阶级与官僚机构之間的調停人，是官僚机构各阶层之間的調停人。他本人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基础和它的官僚主义上层建筑之間的桥梁。他是經濟官僚和知識分子的一个主要保証，保証他們一定能够繼續享有特权；同时他也是官僚机构下层(党和工会的次要人員、斯达哈諾夫工作者、后起的青年干部)的一个主要保証，保証生产資料的社会所有制不遭到破坏。他的突然死亡使这个政权失掉了一个主要的稳定因素，尤其是因为社会力量的平衡在此以前已經逐漸发生了动摇。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即拿破崙式独裁的上层人物感到

疑慮和不安。这些人习惯于遵循“领袖”规定的路綫，在群众中沒有个人威信，不能預測出斯大林的死亡对于苏联社会各阶层的态度会有什么影响。这种上层集团的疑慮和甚至于恐惧无疑地加深了正在向独裁政权的专制主义挑战的趋势。

17. 苏联官僚机构并不是一个性质單純的社会阶层。它包括来自工人阶级(斯达哈諾夫工作者)和农民(集体农庄职员)的几百万人；这些人从政府和經濟机构(检查員)的次要职员上升为上层专家和工程师、有名的艺术家和作家、高級軍官和警官，一路升迁为經濟机构(大工厂和托辣斯的經理)、军队(將軍和元帅)、国家和党(各苏維埃共和国的和苏联的党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各共和国和苏联的部长、国家和党的中央行政机关的成員)的头面人物。最保守同时也是最享有特权的集团无疑地是工厂和中央經濟机关的领导人阶层，此外，計劃部門的总工程师和重要专家以及军队里的將軍和元帅也属于此类。

18. 和官僚机构最享有特权的头面人物成为对照的，是官僚机构的实行拿破崙式独裁的极峯人物。这些人已經掌握政权二十多年，成为軍事独裁政权的化身并代表着党和国家上层之間的私人联系。这一阶层受斯大林死亡的打击最甚，在全体人民不滿的声势之前起了恐慌，主动采取戏剧性的措施使这个政权“自由化”(实行大赦、宣布修改刑法、释放医生、攻击警察专横和民族种族歧視，清洗国家政治保卫局并对之进行攻击，把对领袖的崇拜推向不重要的地位，苏联报刊采取一种新的論調，修改五年計劃以增加消費資料生产的比重)。

这些措施所追求的目的如下：

(1) 向广大的官僚机构的各部分保証反对专斷的清洗，使它們更直接地参加行使权力，借此在一个更广泛的基础上建立起独

裁政权。

(2) 采取全体人民欢迎的措施，答应恢复比較安逸的和不太痛苦的生活条件，暗中推翻斯大林时代的最残忍的恐怖局面，在人民不滿的三个主要問題上——低下的消費水平、警察制度和民族压迫——表示让步，借此在一个更得民心的基础上建立起独裁政权。

从历史上看，馬林科夫政权这样就預示着拿破崙式独裁的开始衰落。这个政权的“自由化”和它的加紧控制只不过是官僚机构交替使用的两种自卫手段。这个官僚机构認識到它的权力和特权遭到威胁，将无论如何試圖使用它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在苏联群众的反对高潮面前保卫自己。但是，历史已經證明，注定灭亡的独夫无论用两种手段的任何一种或者是两种并用都不能挽救自己。苏联的拿破崙式独裁的灭亡已为历史所注定。群众将用他們的政治革命粉碎这个政权并消灭官僚机构的权力和特权。

19. 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个最初迹象表明无产阶级能够在斯大林死亡所造成的新情况下进而采取有組織的行动（沃尔庫塔罢工）。这是不足为奇的。二十多年以来，警察恐怖已經在政治上粉碎了无产阶级和消灭了它的先进骨干。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来国际革命的发展應該在苏联的工人中間重新喚起旧日的希望，但是直到斯大林死去为止的頑固的独裁不准許他們直接表示这样的意见。最多也只能在党、工会和青年組織的下层小职员中間看到他們的心事、要求和希望的一些間接的表示。馬林科夫宣布这个政权“自由化”，也不能产生有利于工人采取政治行动的直接效果。但是从现在起，苏联无产阶级内部的分子力量将开始發揮作用。在工厂和工会里，現在正給予他們的力量以考驗的机会，这些考驗无疑地将从技术問題的討論开始，工人阶级可以借此加

強对自己力量的認識和信任而不必和拿破崙式独裁直接发生冲突。为了应付这种威胁，已經削弱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新政权就不能不更多地依靠大概帮助过清除貝利亚的軍队。同时，在党内，特别是在青年中，正在发展起一种批評精神，对于斯大林时代的理論“遗产”发生怀疑，大胆地对政治問題提出意见，在与斯大林时代最頑固的代表进行思想斗争方面取得最初的鼓舞。**这样就宣布了苏联无产阶级客观的和主观的力量的重新結集。**

20. 在这种危机的恐慌之下，指导核心——拿破崙式独裁的上层——的最初的自卫反映并不专限于这个政权的“自由化”。它的最初的反映中也有它本身的改組和极端的集中化。官僚机构的实行拿破崙式独裁的头面人物暫时試图重新團結在新領袖——馬林科夫、貝利亚、莫洛托夫、赫魯曉夫——的周围而不要有重大的冲突和分裂，因为他們全都感到共同受到了威胁。但是这种團結和集合的局面只能是瞬息即逝的。**在这个独裁政权中出现的为“自由”制度所加强了的离心的力量正在开始压倒統治集團本身的一尊主义。** 貝利亚的倒台和国家政治保卫机关遭到了政府和軍队机构的削弱就都含有这种意义。“自由主义”被认为能使人民的各个阶层都感到滿意：群众滿意是因为他們受警察专政之害最大；官僚机构上层滿意是因为他們感到从一个新的任意清洗的浪潮的恐怖中解放了出来；官僚机构的下层滿意是因为他們希望更密切地与掌握政权发生关系。但是，如果说官僚机构认为这些措施能够更好地巩固自己的基础以保护自己的特权，无产阶级却在利用这些措施向那些特权挑战。在一个期待、希望和高兴的最初阶段之后，这相反的两派已經开始发生冲突。官僚机构的头面人物被迫随着群众压力增加的程度而越来越多地要求有合法的保障。这些要求和不安正通过貝利亚的被消灭和給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重大打击

而表现在指導核心中間。同时，已經為这个政权的“自由化”所加強了的日益增长的群众压力也将表现在这个政权的上层中間（即使是間接的和变相的）。这种黨內和它的上层集團中間的分化過程受到了緩冲地帶开始发生革命高潮的影响。它还将受到国际形势发展的更深刻的影响。战争的加速爆发能够在初期推迟这种分化。国际革命的新胜利以及外国共产党內部的尖銳分歧，一定会加速这种分化。

另一方面，如果說新的領導集團想要用对帝国主义作形式上的和口气上的让步在国际范围内爭取時間，它也可能不像以前那样作出能够和华尔街达成真正妥协的重大让步（扑灭殖民地革命，把“人民民主国家”开放給美国的貨物和資本等等）。在这种情形下，軍备競賽和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将基本上与国际执行委員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議报告中所提出来的情形相同。

21. 斯大林死后在苏联发生的事件大大地改变了世界形势。这些事件表明苏联軍事独裁政权的相对稳定性的結束。因此，世界上一个主要的社会保守主义力量发现自己遭到了反对。世界革命的发展和第四国际为了有意識地領導这个革命而进行的斗争将获得很大的便利。由此将产生一系列有利于我們的思想和組織发展的条件，我們必須借助于一种适当的策略来充分利用这些条件。

在苏联本身，为我們的运动提出了最迫切的任务。拿破崙式独裁的最初裂痕把爭取在苏联复活社会主义的斗争提到日程上来。《过渡綱領》中提出来的与此有关的行动綱領曾經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得到重申和具体化，这个綱領现在是非常切合时机的①。

---

① “毫无疑问，苏联在为反对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压迫而斗争的旗帜之下，开始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打倒官僚机构的特权。打倒斯达哈諾夫运动！打倒苏維埃貴族和

但是，这种社会主义复活的意义已經有了变化。今天的苏联，由于它的工业和它的工人阶级，已經成了世界上支持社会主义的第二个根据地。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复活，几乎和美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样，一定会决定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独裁政权的新的統治集团的躊躇、怀疑和撤退有助于为社会主义复活而斗争这一事实，把我們的国际运动置于新的历史条件之下。我們必須对这些历史条件有深刻的认识。现今正在为在苏联重新建立和复兴布尔什維克—列宁主义的党創造条件<sup>①</sup>。馬林科夫在沉默十五年

它的等級！对各种形式的劳动給以更为平等的工資！

“在爭取恢复和发展苏維埃民主的斗争中，开展爭取工会和工厂委員会的自由，爭取集会和出版自由的斗争。

“官僚机构以希特勒—戈培尔式的普选权的鬼話代替了作为阶级机构的苏維埃。必須使苏維埃不仅恢复它的自由民主形式，而且恢复它的阶级内容。就如一度不容許资产阶级和富农参加苏維埃一样，现在必須从苏維埃中把官僚和新貴族清除出去。在苏維埃中只容納工人、普通的集体农庄庄員、农民和紅軍軍人的代表。

“沒有各苏維埃政党的合法化，苏維埃的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工人和农民将通过他們自己的自由投票来表明他們承认哪些党派是苏維埃政党。

“从头到尾修改經濟計劃以符合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必須恢复工厂委員会管理生产的权利。必須由一个按民主原則組織起来的消費合作社来控制产品的质量和价格。

“改組集体农庄以符合农庄劳动者的意志和利益！

“必須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策来代替官僚机构的反动的国际政策。公布克里姆林宮的全部外交文件。打倒秘密外交！

“一切由热月党人的官僚机构进行的政治审判必須从全部公开、任人爭論和公平正直的角度来重加审查。阴谋陷害者必須受到应有的惩罚。

“不推翻靠着暴力和伪造来維持自己的官僚机构就不能实现这个綱領。”（摘录自《过渡綱領》。）

他們将为一切苏联境內的少数民族要求实行包括脱离权在内的民族自决的民主权利，为独立的乌克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脫維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斗争。

① 这也就是《过渡綱領》中所說的意思：只有被压迫群众的胜利的革命起义才能够复兴苏維埃制度并保証它进一步向社会主义发展。只有一个党能够领导苏联群众起义——第四国际的党！

（摘录自《过渡綱領》。）

之后，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提到了苏联共产党內“异端分子的、反列宁主义的”集团（政治革命的胜利就靠着这些集团）的活动，这并不是偶然的。馬林科夫的大赦特別把政治犯除外，这并不是偶然的！第四国际必須找出办法，帮助我們的苏联弟兄从有利于他們重新團結的条件中获得利益；这将是我們运动的世界高潮中的一个决定性步驟。

同时，我們的各支部應該坚决地和任何为苏联现在政治制度辯解或辯护的傾向作斗争。这种傾向将表现在想要与馬林科夫政權取得和解的小資產階級集團中間。拿破崙式独裁虽然使自己“自由化”，但仍然是一个独裁政权。无产阶级在苏联仍然遭到政治掠夺。正如到现在为止一直靠着专橫的警察来保护官僚特权一样，将来将靠着那部新刑法——真正的人身保护狀——来保护这些特权。粉碎这个官僚机构的独裁和特权的任务，在苏联发动一次新的政治革命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最近整个发展表明，准备和促成这样一次革命的条件正在成熟。

22. 未来的战争将不是和国际革命的低潮而是和它的一个新的跃进同时发生。所以这个战争只能基本上使苏联拿破崙式独裁的解体现象和苏联无产阶级复活与发生革命高潮的现象更为严重。革命向其工人具有高度文化水平、专门技术和民主传统的西欧国家扩展；苏联軍队与惯于享受相对地高于苏联劳动者生活水平的人民之間的接触；对帝国主义的胜利；各种各样的困难以及官僚机构在战争中的一般态度——所有这些因素都将导向这个方向。这些因素将加强苏联群众对于自己力量的确信，更加降低任何压迫机构的威信，坚定群众获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与社会主义理想更为相近的生活条件的意志，削弱和瓦解官僚机构对群众抵抗和反抗的能力，加重官僚队伍内部的意见分歧和离心的趋势。

革命高潮的公开的、外部的表现是不是甚至在战争的最初阶段就将加重和加速，或者这些表现是不是开始时在帝国主义的威胁面前退让，其目的只是为了在战争的最后一阶段，当这种威胁看来已經不存在时，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力地重新出现——这将决定于革命发展的速度，决定于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在他們自己領導之下实现这个革命的能力，决定于苏联国内政治条件的成熟程度，决定于一个新的革命领导的存在。在任何情形下，在与帝国主义作最后清算的过程中，苏联无产阶级靠着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将学会也和苏联官僚机构进行清算并推翻它的独裁政权。从 1943 年到第三次大战結束这一整个期間，正是一个包含一連串的局部战争和临时武装停战的时期，在这期间，列夫·托洛茨基的預言——官僚制度將經不起和帝国主义与世界革命进行决战的考驗——将得到証实。

23. 苏联的官僚机构今后将处于和这个机构的兴起和发展时期的情况根本不同的衰落和最后灭亡的新情况之下。了解到这一点并不在任何方面意味着改变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于这个机构在苏联和全世界所起的客观和主观作用的一貫的估价。苏联生产力的高涨并不是官僚机构活动的結果而是与它絲毫无关。这个官僚机构在最初五年間阻碍了工业化的实行；接着就在破坏整个国民經濟的情况下投入工业化，在农业和群众消費方面造成了需要用二十年時間加以克服的可怕的危机。直到今天，它还在阻碍靠着計劃力量在这个国家建成的庞大生产机构的彻底的和合理的利用。同样地，世界革命高潮在任何方面也不是由于苏联官僚机构的領導而出现的，而是在不顾它对世界工人运动进行干涉的情况下发生的。官僚机构起初造成无产阶级从 1923 到 1943 年历史上惨重的失敗。其后，它推迟了和部分地遏止了 1943 到 1947 年的革命

浪潮。直到今天，它还在五大洲阻碍群众巨大革命潜力的彻底的和合理的利用。如果帝国主义的統治在半个地球上繼續存在，那是由于这个官僚机构和它的代理机关所起的作用；今天这样說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正确。在一个主要国家——中国——这种統治已經被消灭，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使自己摆脱克里姆林宮命令的束縛。这种形势当中的一个新因素是：我們已經達到了《过渡綱領》所預料的那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历史法則”表现得“比官僚机构更有力量”。决定群众方向的两个因素——在世界規模上解放出巨大革命力量的資本主义的临終痛苦以及对于群众起阻碍作用的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的政策——当中，越来越重要的是第一个因素。苏联官僚机构不再能压制和遏止的革命高潮，甚至正在从这个机构用来自卫的某些手段上得到助力，正在为苏联无产阶级推翻这个机构准备着条件。

## II 斯大林主义在其他非資本主义国家 里的兴起和衰落

24. 自 1943 年的革命浪潮爆发以来，在欧洲和亚洲出现了新的非資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可以分成两类：

- (1) 由于在这些国家中的革命胜利而产生的国家，例如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 (2) 由于苏联官僚机构的扩张主义而产生的国家。它占领这些国家并用拿破崙式官僚的手段使这些国家的机构和苏联同化，在某些情形下也动员一部分群众作为支持。例如欧洲緩冲地带的国家和北朝鮮人民共和国(在这里，順便提一下，动员群众的规模要大一些)。

在这些国家之外，还必須加上：1)越南这个民主国家，这个国

家是从与中国相似的一个革命浪潮中产生的，但它仍在继续进行反帝国主义战争和内战，以便控制全国领土；2)阿尔巴尼亚，这里也有过一个强有力群众革命运动。

这些国家的出现代表世界形势的一个根本变化，在地理方面，把地球上脱离资本主义统治的地区从六分之一扩大到三分之一，在世界人口方面从十二分之一扩大到三分之一。

25. 南斯拉夫和中国革命的胜利——1917年以来第一批的革命胜利——给苏联官僚机构对这两个国家共产党的直接控制以一个致命的打击，并且给斯大林主义带来了世界的危机。这样，列夫·托洛茨基的预言就得到了证实：“不能从国家政治保卫局得到直接支持的共产国际（也就是使各国共产党服从于克里姆林宫的机构）的解体，将先于拿破仑式独裁集团和整个热月党人官僚机构的灭亡。”南斯拉夫和中国革命胜利给与斯大林主义的打击——虽然这些革命是由共产国际派生出来的共产党领导的——本身说明了这个胜利是从它们对克里姆林宫“破坏纪律”的行动中产生的。受到为群众革命浪潮压倒的威胁，面对着除了在政治上和物质上为反抗所粉碎以外别无其他办法的处境，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就越出了克里姆林宫的命令范围，向夺取政权的目标迈进。从这方面它们取得了与苏联官僚机构关系上的真正的实际独立地位，而这也为政治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建立了客观基础。共产党对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指示必须绝对服从的制度，对每一次发表的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斯大林修正主义的意见必须卑顺地自动加以重复的制度，就这样遭到了破坏。

26. 但是，无论在南斯拉夫的情形下或在中国的情形下，胜利的共产党都没有主动地决定和斯大林主义方针作公开的政治上的决裂。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是：

(1) 这些国家的领导和它们的大多数骨干具有斯大林主义的出身和传统。这些骨干大部分企图在他们的狭窄的圈子内原谅莫斯科的“错误”，并把这些错误在自己的党员和群众面前隐瞒起来。

(2) 这些党在革命胜利以后，通过和苏联进行外交、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联合，在帝国主义封锁的事实面前得到了客观的支持；虽然这种克里姆林宫的支持被认为是不充分的和带来很多麻烦的，但在这些党看来比放弃一切援助更有价值。

(3) 这些党的机会主义领导认为除了克里姆林宫和帝国主义外没有吸引他们的目标，他们低估或者无视世界革命高潮和国际工人运动。

27. 南斯拉夫的情形是克里姆林宫采取主动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决裂。它感到这个党对于官僚机构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因为这个党是插入它的党的系统中的一个具有独立基础的共产党，不仅能在国家关系上(南斯拉夫的关于和各种不同国家交往的政策、巴尔干联盟、与意大利的关系等等)而且能就其他共产党的政策(南斯拉夫共产党对于希腊游击队活动的态度、对于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在“解放”期间采取的政策的态度等等)表示独立的反应。克里姆林宫宁可把南斯拉夫推入帝国主义怀抱并因此在它的巴尔干防御战线上造成一个可怕的缺口，也不愿意冒险让南斯拉夫这样一个榜样来破坏它对周围堡垒和共产国际的整个控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使用了它的每一种力量：断绝外交关系，实行突然的经济封锁以破坏南斯拉夫的经济，挑起边境事件，企图在南斯拉夫国内组织恐怖活动，通过报刊、广播长期进行恐吓等等。但是，它之所以能最初采取这种反革命态度，首先是因为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还仅仅是在初步阶段，其次更重要的是因为南斯拉夫是一个小国，基本上不能改变世界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对比。中国革命

的情形就与此不同了。克里姆林宮不能容許代表它的軍事防卫系統的基石和在实际上突破了帝国主义对苏联包围的那个联合的破裂。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情形下，虽然克里姆林宮抱有和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相似的忧虑，它仍然不得不接受在平等基础上和甚至在与中国共产党共同領導整个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上的合作。

28. 南斯拉夫国家和中国国家都是从消灭了資产阶级政权及其国家的革命胜利中产生的。它們都很快地趋向于对同一的資产阶级进行全部的經濟剥夺。在最初的迟疑和妥协之后，随着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的程度，这两个国家的結構也按照新的社会基础得到了調整，它們的非資本主义的和工人阶级的性质也很清楚地得到了表现。虽然南斯拉夫国家和中国国家是从一次胜利了的革命中产生的，但它们仍带有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工人领导的烙印。在南斯拉夫的情形下，这些特点特別表现在 1945 到 1948 年对于苏联的作风、手段和制度的奴性的模仿上，也表现在对于国内的和党内的一切工人民主的压制上。在 1948 到 1950 年一度做过使这个政权真正民主化的努力之后，从这个国家的結構上又看到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机会主义性质的表现；这表现在最近对于宪法和党章作了修改，这些修改不但远不能保証工人的民主而且是企图消灭无产阶级先进阶层在处理公共事务方面的影响。这就是解散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利用人民陣綫作为唯一的掌握政权工具的意义。在中国的情形下，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性质同样在宪法上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的发展上留有印記。它希望和“民族資产阶级”的重要部分合作，因而一开始就在城市里破坏和阻碍无产阶级的革命动员，連带着在华北破坏和阻碍农民的革命起义。其后，这个同样的希望引导它把旧国民党的全部

国家机关接收过来，并把这些机关并入新建立的国家机构之内。在中国干涉朝鮮以后，在向資产阶级展开进攻并对貧苦大众进行某种动员时(在南方动员农民群众以完成土地改革；在“五反”运动和“三反”运动中动员工人)<sup>①</sup>，中国共产党尽一切可能限制这种动员，阻止和妨碍这个动员，以免在城市中产生工人阶级群众的自治机关；它甚至利用同一机会对先进的革命分子使用恐怖手段。中国的情形像南斯拉夫的情形一样，新的工人国家并不是建立在自治机关(苏維埃、委员会)的基础上的，就是有这种机关正式存在，它们也因为缺少政治自由和替各派工人說話的自由而并不具备革命内容。因此，就这两个国家來說，这是工人国家被官僚机构改变了形态的問題。

29. 在这样的事实中并没有矛盾，即一方面，南斯拉夫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能够不受克里姆林宮的支配，把一次革命导向胜利，并在这种情形下不再是名实相符的斯大林主义的党，而另一方面，这两个党却一直遵循着并将继续遵循使革命成果受到限制、遭到破坏和处于危险境地的机会主义路綫——基本上来自这两个党的领导部門的斯大林主义历史的一种机会主义路綫。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論根本没有表示过，不論在什么情况下，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义領導，革命就永远不能胜利。南斯拉夫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摆脱了克里姆林宮的保护，但是它们这样做是从实利出发，是在事实的压迫下，是在威胁着要把它們压倒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压力下。这里有它们的优点，但也有它们的缺点。我們这个时代所要求的不是一个机会主义領導，可以容許自己随波逐流，以便好像莫名其妙地完成革命，而对于革命的全面任务和完成革命的

---

① 反盗窃、反貪污、反官僚主义等等的运动。

手段却沒有一种明确的看法。我們这个时代所要求的革命領導必須充分認識自己的使命，必須認識汹涌的国际革命浪潮中所固有的巨大可能性，能够協調国际革命力量并尽快地把它們导向胜利。在这种意义上，我們可以說，革命越是发展和越是接触到先进的工业国家，就越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以取得胜利。在同样的意义上，我們可以說，南斯拉夫和中国的經驗并不說明第四国际是不必要的，相反地却証明不仅在全世界而且就是在这两个国家里也需要有第四国际。

30. 由于中国革命給中国本身和全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的新的非资本主义国家中就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中国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是殖民地革命的一个主要动力，是国际革命高潮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帝国主义具有特殊的关系；在现阶段，美国集中它的主要火力来进行攻击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正是朝鮮战争的意义，也正是亚洲事务今后在美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和軍事战略上占首要地位的意义。因此，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來說，只要革命还没有在其他先进工业国家中取得胜利，确知自己能够得到苏联的援助并与之結成同盟就成为一个与切身利益有关的問題。在现阶段和未来的整个阶段，并不是克里姆林宮把同盟“强加”在中国身上，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保証把这个同盟維持下去。殖民地革命越向其他亚洲国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克里姆林宮所能施加的压力就越为强大。但是，中蘇軍事同盟的維持和巩固本身与克里姆林宮对于中国共产党影响的程度无关，也就是說，与斯大林主义在中国衰落的程度无关。斯大林主义的衰落是中国共产党和克里姆林宮之間的力量对比的作用，基本上是殖民地革命发展的作用，是中国經濟建設的作用，是

无产阶级在包括苏联本身在内的世界其余各地获得发展的作用。

31. 从这方面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和克里姆林宫的关系到现在为止所经历的几个实际阶段：

(1) 从毛泽东的胜利到美国以鸭綠江为目标的进攻：中国共产党肯定它事实上的独立，包括意识形态領域里的独立在內。强调两个盟邦的平等和毛泽东对于一切殖民地国家革命的指导作用。

(2) 从美国以鸭綠江为目标的进攻到斯大林的死去：中国共产党肯定它和克里姆林宮結成同盟的重要性，肯定它在軍事、經濟、技术、文化和其他方面从苏联取得的和必須取得的决定性的援助。强调苏联的伟大榜样和經驗，强调斯大林作为包括中国无产阶级在内的世界无产阶级的指导作用。

(3) 从斯大林死去到现在：毛泽东的威信在整个非資本主义世界和在所有共产党中已經大为提高。國內的經濟困难迫使中国在朝鮮停战。再度强调两个盟邦的平等。苏联的經濟援助在宣传中占首要地位。

这一整个发展过程的不可避免的部分是世界客观形势当中所固有的，另一部分則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路線，来自它的领导缺乏革命胆量和它对亚洲革命动力缺少信任。

32. 毛泽东的胜利只是表明了第三次中国革命的开始。这次革命的任务不过是正在开始完成。在这个国家統一之后，建立了一个全国統一的粮食和工业消费品市場；取得国家独立的工作大体上已經完成；土地改革已經扩展到中国全部地区并已获得成功。多年的社会关系(农民与地主和高利貸商人之間的关系、男女之間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間的关系)在地方上已經被推翻，这代表着一个巨大的进步。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于首先被在华北压倒它的农民群众推向革命行动之后，看到自己不能不在南方动员农民群众以完成土地改革。这导致它第一次对资产阶级的地位和所有权展开大规模的进攻。但是，资产阶级到现在为止还保持着百分之二十的重工业、百分之六十的轻工业和大部分的零售商业；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剥夺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尤其是商业部分，因为这一部分是依靠千百万小规模的个体农民的经营来维持的。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既然把重要的经济部门——重工业和运输系统的主要部分、银行、对外贸易和批发商业——掌握在手里，就能够而且必须甚至在完成对资产阶级的剥夺以前开始国家工业有计划的发展。由于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并明确地指出将来的发展动向，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性质。在苏联，左派反对派也曾要求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而不必取消一切新经济政策措施。不过，只要形势继续像现在这样，中国共产党就将像过去两年那样能够限制它对于群众的号召和动员。这种对工人阶级的号召虽然没有在城市中造成工人运动的巨大高潮，但也使政府不得不修改它对工人的政策，用新的社会保险制度、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形式和提高生活标准等办法来改善工人的地位，因此就为工人运动的新高潮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气候条件。与战争的爆发、阶级矛盾的严重化、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必须对资产阶级进行剥夺的任务相联，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高潮，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

33. 第四国际在南斯拉夫和中国的任务决定于这两个国家和南斯拉夫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质。因为牵涉到工人国家，我们当然赞成保护它们，反对要推翻它们和要改变南斯拉夫和中国革命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基础的任何企图。因为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是、而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官僚主义的中间派政党，

可是它們都仍然能够看到自己是处在本国革命的压力之下，所以我們並不号召这两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組織新的革命政党或者在这两个国家內准备一次政治革命。我們正努力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內部和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建立一个左派，这个左派一定会随着世界革命高潮的发展，把这两个国家的革命导向一个新阶段。在中国我們将把力量特別放在提高无产阶级觉悟和組織的水平上，并利用政府政策所提供的每一个机会使工业无产阶级做好准备和尽速地参加革命。在南斯拉夫，我們将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克里姆林宮以无条件地保卫包括 1948—1950 年期間 的成果在內的革命成果的基础上，致力于建立一个目的在于代替现在的党領導的反对派，借此打破南斯拉夫与帝国主义集团之間的把革命导向失敗的軍事和外交上的联合，正式改組南斯拉夫共产党，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使工人阶级的一切派別都能自由地发表他們的各种政见，并在理論上和政治上把这种政见导向革命的馬克思主和国际革命运动。无疑地，斯大林死后苏联形势的发展、这个国家的革命高潮的迫近以及它开始在緩冲地带国家里的爆发，将大大有利于这样的方針。

34. 中國、南斯拉夫和越南这些新国家里的群众革命高潮的声势超出了克里姆林宮的政策和組織控制的范围以外，迫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不顾莫斯科的命令并违反这些命令而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东欧緩冲地带的非資本主义国家和这些新国家不同，它們不是这种群众革命高潮的产物。相反地，它們是苏联扩张主义的产物，是苏联严密控制的产物。克里姆林宮之所以能够維持它对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群众的控制，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时在这些国家里沒有发生革命高潮，或者发生了革命高潮而范围极为有限。这些国家的資产阶级被战争削弱了，这使苏联官僚机

构得以在組織上同化这些国家，而不必大规模地动员群众，也不必受到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威胁。在资产阶级仍然很强大因而不能以这种冷靜的方式来加以消灭的地方，如在芬兰和奥地利，在組織上同化的企图就遭到了失败，而这些国家就回到了资本主义轨道上去。从缓冲地带的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起源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南斯拉夫的起源之間的这种根本差别上，产生了关于这些共产党与克里姆林宮之間的相互关系和关于这些共产党与群众之間的相互关系的重要差别。

35. 苏联官僚在缓冲国家中采取的态度和追求的目的经历过三个阶段：

(1) 从 1944 到 1947 年：根本目的是对缓冲地带进行直接的经济掠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苏联官僚机构以订立赔偿条约、没收前德国财产、建立苏联股份公司和建立混合公司等等方式，利用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济改造一直以土地改革和基本工业的国有化为限。一般是维持和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政党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但是，共产党在这些政府里一定要掌握大权(军队、警察、司法等等)。

(2) 从 1948 到 1950 年：面对马歇尔计划的开始实行和帝国主义的企图瓦解缓冲地带的经济，苏联官僚机构的答复是：把资产阶级政党排除于政权之外，普遍实行国有化，通过两年和三年的复兴计划为全面的经济计划打下基础，开始发展农民合作社并改变国家组织。

(3) 从 1951 年到现在：五年和六年计划发展了缓冲地带的工业并且越来越把它和苏联的工业紧密地结合和束缚在一起；农业集体化进行的速度各国不同。军备计划使经济和工人遭到很大的牺牲。苏联对于这些国家的直接控制和各个共产党的“俄国化”的

更为加甚，說明社会的和經濟的矛盾将要在这些党的內部得到反映。加强对于这些党的控制已經成为苏联官僚在緩冲国家里的最重要的和最困难的工作。

36. 各国工人运动和群众情緒在緩冲地帶的发展有所不同。判断这种发展的主要标准，一方面是 1948 年以后的工业化实际上把以前存在的經濟、文化和技术的落后状况改变到了什么程度，另一方面是各个国家里的共产党能够取得和保持无产阶级重要阶层的信任到什么程度。

就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匈牙利的一部分來說，工业化的速度相对地比苏联本国还快一些；并且在这些国家里正在引起的社会变化方面，趋向于产生和苏联正在产生的相类似的效果。虽然在企图复辟的那些农民阶层方面遇到的困难、带进到这些国家生活中来的民族压迫和恐怖因素以及群众的仍然低下的生活水平正在这些国家中阻碍一个新的工人运动，但这个运动作为同样原因的产物最后是会在这些国家中发生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本来能够在推动这个革命高潮方面起主要的作用；今天，它的投降主义路線所起的却是一种阻碍作用。

就东德、波兰、西部捷克斯洛伐克和一部分匈牙利來說，工业化——虽然在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基本上沒有改变已經达到較高水平的工人阶级的重要性、技术和文化程度。在这些国家中，在第一阶段，工人对于生活标准的相对的或絕對的降低的抵抗、对于正在形成中的斯大林官僚机构的独裁和专断的抵抗并没有停止加剧，而是越来越成为苏联官僚机构实现它的計劃一个更大的障碍。在匈牙利和一部分在波兰，这种抵抗之所以能受到限制是由于共产党领导的相对稳定性。在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这种抵抗和领导机构内部的激烈震动結合起来，正在产生一种非常严重的长期

危机，标志着革命高潮的开始（1953年5月到6月的罢工和工人示威）。在这些国家中，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像在苏联一样，或者甚至在更迅速地成熟中。

37. 要預測革命高潮在每一个緩冲地帶国家中将要采取的確定的組織形式，仍然为时过早。可能有两种不同形式：

(1) 自发的群众活动扩大到当地的共产党中去，在那里发展起能够领导革命高潮的左派。这种形式对于那些保有广大工人基础和具有长期传统的共产党最有可能：匈牙利、保加利亚，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的一部分。

(2) 独立的群众运动，通过新的政治派别的出现或者社会民主党組織的复兴，发展到现存的合法組織以外去寻求协作关系。这种形式对于其共产党只有短期的传统或薄弱的群众基础的国家來說，最有可能实现：阿尔巴尼亚、罗馬尼亞、波兰，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的一部分。

这里也不能把两种組織形式的結合除外。我們必須对于未来革命高潮的两种可能的組織形式都有所准备，以便在群众运动爆发时永远站在真正的群众运动中。自然，我們必須仔細地分清什么是真正的工人阶级反抗运动——不論这些运动最初可能采取什么混乱的形式——和什么是为以前的有产阶级残余分子与帝国主义所煽动起来的并由它們来领导的复辟运动；我們必須对这种复辟运动进行斗争。此外，革命高潮的爆发越迟延，除共产党外不知道有其他政治組織形式的青年一代越是奋起参加政治生活，共产党就将越成为当然的政治論坛，在那里将产生出新的革命高潮的领导。由于这种原因，我們的队伍将力求完成和我們在苏联担负的任务大致相似的任务。这些任务的完成要求通过对各国共产党采取参加进去的策略建立起布尔什維克—列宁主义的党，一方

面始終准备迅速參加任何其他可能在革命高潮开始时出現的群众組織。我們在緩冲地帶中的基本任务是对这个革命高潮保証一种布尔什維克的領導,防止它落在改良主义的、半复辟主义的勢力支配之下。这个革命高潮必須导向真正独立的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馬尼亞、保加利亚和类似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它們可以隨意在它們自己中間自願地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巴尔干—多瑙河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

38. 斯大林主义在緩冲地帶国家中衰落的一般動向可以明确地概述如下:

(1) 在所有这些国家里,除了把大部分政治和經濟权力交给当地共产党外,組織上的同化并沒有其他办法能够实现。因此,即使在这种权力由于缺乏群众的支持而非常不稳固和必須靠克里姆林宮来支持的情形下,这些党也获得了一种比較独立的基础。

(2) 在所有这些国家里,本国的共产党领导曾企图——先是违背克里姆林宮的意旨,斯大林死后也許一部分得到克里姆林宮的鼓励——避免重复斯大林政策在苏联造成那种十分不幸的局面,特別是强迫集体化。

(3) 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工人阶级在一个撤退、消极和混乱的过渡时期以后,似乎比以前更有力地和更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

(4) 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在 1944 年阻碍革命高潮和使它受到克里姆林宮严密控制的客观因素(战争的破坏、低水平的生产力等等)和主观因素(工人組織的不存在、过去法西斯或軍事独裁的复杂历史、革命远景的缺乏、民族感情的加深等等)正在开始消失,并且只是部分地被专政造成的精神沮丧、民族压迫以及在过去整个时期中生活水平的相对降低等等因素所补偿。

39. 斯大林逝世后在苏联发生的变化在所有这些国家里都有相当大的反响。这也同时影响了这些党的内部制度、它們与克里姆林宮的和群众的关系。

特殊的經濟情況——捷克斯洛伐克的币制改革、东德的发行定額的增加——引起了群众对于官僚独裁的反对，終於在这些国家里造成无产阶级公开的反抗。这种反抗无非就是群众将用来推翻斯大林主义独裁的政治革命的开始。它給我們关于这个問題的活动的預測带来了最有力的証明。它也証明了——德国統一社会党由于群众革命起义的压力，在 1953 年 6 月 17 日从上到下陷于分裂，并且其中一部分打算向工人投降，就是一个例子——官僚机构的多种多样的性质以及这种群众行动在官僚机构中造成的解体的效果。

这种反抗无疑地阻碍了“新方針”在政治方面的实施，并且在某些情形下，例如在东德，已經为一种政治上的倒退政策所代替。但是，即使在这些情形下，“新方針”在經濟方面一般还是得到了实行，并且由于苏联官僚机构在 6 月 17 日以后所作的让步（放弃赔偿、把国营股份公司移交給德国的斯大林主义当局）而进一步得到加强。

匈牙利政府的改变方向是代表这种“新方針”的最好的例子。这种新方針包括有下列值得注意的特点：

(1) 改善各阶层人民的經濟情況；降低重工业发展的速度；降低农业集体化的速度；增加对人民的工业品的供应；緩和关于“破坏劳动紀律”的高压的法律等等。

(2) 在群众組織中緩和极端紧张的空气；減少严厉的措詞，減少“事前制造的”討論，給下层干部以更多的发表他們意见的可能性等等。

这种新方針很可能是出于克里姆林宮的命令，用意在于把它当作加强斯大林主义的党对于緩冲国家的控制的一种手段，所使用的方法是使这种控制不是那么严厉而是更有伸縮性。但是，通过这种新方針将要解放出来的社会和政治力量，通过它将要帮助在共产党和青年組織內产生的分化，它甚至会比在苏联更有助于促使无产阶级起来从事政治革命。

无待贅言，革命高潮的强大及其扩展到西欧和苏联，在战争以前或在战争期間，对于緩冲地带的无产阶级从拘禁它的官僚机构的束縛中解放出来这一点，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40. 在所有緩冲国家里提到日程上来的政治革命的綱領包括下列值得注意的各点：

- (1) 释放工人囚犯。
- (2) 废除高压的反劳工立法。
- (3) 工人政党和組織的民主化。
- (4) 一切工人政党和組織的合法化。
- (5) 选举群众委員会并賦予民主职权。
- (6) 确定工会同政府关系上的独立地位。
- (7) 由群众民主地制定为群众設想的經濟計劃。
- (8) 切实給予各民族以自決权。

### III 斯大林主义在資本主义世界共产党中的 兴起和衰落

41. 各国共产党主要是由十月革命在社会民主党内部产生的动力之下，其次是由十月革命在 1914 年以前的工人运动的其他組織內部产生的动力之下建立起来的。苏維埃官僚制度在苏联的胜利使它能够在世界无产阶级先鋒队中間利用十月革命的威信。这

就是斯大林主义在各国共产党中間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这些党的內在弱点有利于这一过程。1914 年以前的社会民主党内部缺少一个在明确的綱領上組織起来的左翼，因而在共产国际的初期造成了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上的和理論上的軟弱。这一方面使布尔什維克党在共产国际中占压倒的政治优势，另一方面使其他党的领导人对于认真应付 1923 年开始爭論的那些問題缺少准备。既然布尔什維克党被官僚主义化，斯大林派在把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移植到共产国际中去这件事情上就很少遇到有組織的重大反抗。从 1923 到 1943 年(斯大林着手解散共产国际那一年)期間的工人运动的衰落，加速了各国共产党斯大林主义化的过程。

42.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变成了保卫苏联官僚机构的克里姆林宮的外交工具。它們放弃了爭取世界革命的斗争，力求对各民族資產阶级施加压力，迫使它們采取一种符合于克里姆林宮观点的外交方針。这些共产党目标的改变引起了从冒险主义向机会主义的轉变，导使某些共产党在某些时期(特别是在西班牙的人民陣線时期)直接采取反革命的行动。

斯大林主义者的政策給工人阶级带来了包括德国納粹党胜利(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双方面的政策所造成的結果)在内的許多次失敗。每一次这种失敗都加速了世界革命的衰落，加强了苏維埃官僚制度对于苏联和对于始終忠实于俄国革命的先鋒队的控制。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内部的官僚制度降低了共产党的理論水平。共产国际越来越不成其为制定国际政治方針的中心。共产党的领导是按照它們通过一切多种多样的轉变和搖摆不定来服从克里姆林宮命令的才能，从上边来加以选择和更換的。各国共产党是在經驗主义、一尊主义和歪曲历史的保护之下起作用的。因

此就实现了一种与正常领导相反的选择，排除了最独立自主的和政治上最有能力的分子。事实上，这种制度消灭了各国领导在政治上合作的任何可能性，而相反地是把它們变成了仅仅是克里姆林宮命令的传送带。

43. 各国共产党最初建立的目的，是成为一个世界革命政党的各該國的支部，可是在斯大林主义者領導之下，它們竟变成了墮落的工人党。这些党的官僚主义的领导依存于克里姆林宮，特別是因为它們的政治生命依存于利用十月革命和苏联在群众中間的威信。但是，各斯大林主义党的领导和苏联的共产党不同，并不代表一个掌握巨大物质資源的特殊社会阶层的利益。由于这一事实，这些党的两重性和苏联官僚机构的两重性是不同的。就它們的党员队伍(这个队伍和社会民主党截然不同，一般是由最受剥削的和战斗意志最坚强的工人阶级部分組成的)說来，它們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虽然是不充分地——反映无产阶级的利益。就它們的领导說来，它們却受着克里姆林宮的严格控制，而克里姆林宮的企图就是牺牲其他国家的革命。“在一个单一国家里”維持革命现状。

由于这些共产党受苏联外交政策的束縛，它們就在各个时期采取一种在效果上和社会民主党的路綫很相近的机会主义路綫。即使是在这种时期，这些共产党也决不能越出范围和社会党联合在一起，因为这些共产党不是本国民族資产阶级的工具而是克里姆林宮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的考驗驅散了对这一問題的一切怀疑：占压倒多数的共产党(领导以及它們的党员队伍)一直忠实于克里姆林宮官僚机构的方針，特别是在德苏互不侵犯條約期間。

44. 在战前时期，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共产党经历了不同的发

展過程：如法國共產黨這樣一些黨，看到了它們對群眾影響的擴大；其他的黨如英國共產黨，則從來沒有經歷過一個真正的革命高潮。但是在這一期間，一切動搖各國共產黨的許多危機都為斯大林主義以加強對這些黨的控制的方式所克服。

主要的原因是，在這個革命低潮期間，每一次巨大的群眾鬥爭都以失敗告終，而脫離那些共產黨的不是一個人數很少的遵循托洛茨基主義綱領的革命先鋒隊，就是放棄革命鬥爭的派系。另一方面，那些仍舊擁有戰鬥的工人干部的共產黨則完全忠實於蘇聯，不問其為蘇聯國家還是它的領導。

這些工人鬥士把每一次政策的改變都看作僅僅是為了不惜以任何代價保卫第一個工人國家而必須運用的策略。但是，應該看到的是，斯大林主義在西班牙內戰中所起的作用——公開的反革命作用——雖然沒有使那些在國際縱隊中從事戰鬥的共產黨戰士反對斯大林主義，但是也在他們中間第一次引起了如後來——和南斯拉夫決裂以後——所表現的懷疑。

結果，几乎在任何地方，斯大林主義的黨和社會民主黨相比，都一直是表面上革命的和人數上最強大的組織，而在每一次新的革命高潮期間，新參加政治活動的鬥士們就都投向斯大林主義的黨。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更是如此。在這一期間，那些共產黨由於它們在抵抗運動中的活動和蘇聯勝利的威望而得到了加強。

但是，也是在同一个戰爭期間，一個共產黨——南斯拉夫共產黨——破天荒第一次不再按照克里姆林宮方針的嚴格要求行事。在戰爭期間，由於反對占領軍鬥爭的尖銳化和南斯拉夫社會內部的緊張情形妨礙共產黨以民族陣線的名義實行階級合作政策，共產黨不得不建立了新的軍隊——群眾性的權力機關——並領導起

义群众取得了政权。在几年中間，南斯拉夫領導曾經試圖調整这种局面以符合克里姆林宮的要求，但是終于在 1948 年爆发了冲突，說明在苏联官僚机构这一革命低潮的产物和强大的革命运动之間，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同样地，在战争結束以后，中国共产党遇到了一个强大的起义，这个起义向它提出的問題是或者领导这个起义或者退出政治舞台，因此它和蒋介石展开了殊死战，通过由巨大的农民起义支持的中国紅軍的斗争取得了政权。

在战争期間，克里姆林宮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松弛了下来。共产国际的领导也与許多共产党隔离开来。斯大林选择这个时机解散了共产国际。在这同一时期，在开始发生革命高潮（法国、希腊……）的压力之下，具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领导的内部开始表现出分歧。另外一些共产党领导越出了机会主义所要求的界限，受到了莫斯科的警告（美国、荷兰……）。战后形势的发展不再允許克里姆林宮恢复战前存在过的对于各国共产党的严密控制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建立主要是为了把南斯拉夫和緩冲地带牢固地掌握在手里而不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45. 随着中国革命的战胜国民党政权，在 1943 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复灭时开始的革命高潮时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基本表现在对革命有利并越来越在世界规模上向有利方面发展的国际力量的对比方面。革命浪潮正在从一个国家扩展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大陆扩展到另一个大陆。它最近已經扩展到苏联本身和緩冲地带。

結果，資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看到自己已处在和战前时期完全不同的情况下。

在那些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当中的少数党的国家里，革命高潮

一般是通过群众大批加入多数党来表现的，这样就更进一步地孤立了共产党，同时像比万主义派这样的左派也正在这些多数党的内部开始出现。

在工人阶级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群众性政党的国家里，像拉丁美洲国家那样，共产党通常在工人阶级现有的政治运动中代表最有力的一派。这些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的堕落，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和在战争刚结束时的背叛行为，在这些党里引起了一种永久性的危机。这种危机正在随着拉丁美洲群众运动的兴起和这些党的不能给群众运动带来革命成果而日益加深。这些党的这种危机能够促使大部分的共产党干部接近第四国际，甚至加入它的队伍。实现的条件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必须完成它们的领导群众革命的任务，并在行动上寻求一种有利于这些共产主义战士向托洛茨基主义转变的共同基础，借此他们采取一种主动的和变通的态度。

至于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它们和莫斯科的关系正在受着与过去迥然不同的情况的支配：它们本国的向革命斗争方向发展的群众运动日益表现出它们本身的力量。它们和莫斯科的关系松弛了下来（在战争期间甚至在某种情形下有长期的破裂）。最后，这里要附带说明的是，由于苏联最近的发展，各国共产党领导方面已经对于克里姆林宫的方针有了怀疑，并且在党员群众方面，也有可能对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制度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

这种国际形势和它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影响，给斯大林主义在它所控制的工人运动中的衰落开辟了两个途径：

在共产党是工人运动中的少数党的国家里，群众所要拥护的那些派别（不论它是一个革命的党像在玻利维亚那样，或者是中间派像在英国和日本那样），假如它们有一个正确的革命领导和革命

方針，就越来越有机会肯定消灭斯大林主义者对于工人运动的影响。这些派別实际上是吸引一切健康的工力量的目标，能造成斯大林主义勢力的崩潰，然后促使共产党在孤立的压力之下內部发生危机甚至于分裂。但是，中間派領導的錯誤方針或背叛行为，即使在这些国家里也能在以后一个阶段重新給予共产党以机会。

在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中的多数党的国家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有产阶级事前已經瓦解)，和在非常强有力群众革命起义的压力之下，这些共产党可能制定一个和克里姆林宮的指示相反的革命方針，而不必放弃那些从斯大林主义继承下来的政治上和理論上的遺产。它們尤其会这样做，是因为群众——这些群众像他們会在未来的一个整个时期內繼續做的那样，仍在力求利用这些共产党来滿足他們的希望——对于他們的領導采取了一种比过去更为批判的态度，不再准备服从这些党的无论什么样的轉变。在这种情況之下，不應該把斯大林主义的解体理解为在即将到来的下一阶段这些党的組織上的解体或者与克里姆林宮的公开的決裂，而是要理解为由于它們中間的政治分化而逐漸发生的内部轉变。甚至可能的是，在某些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里，这种斯大林主义解体的过程可以带来某种程度的巩固或者組織上的强化，以致在环境的压力之下，它們改变政策以求更符合于群众的利益。这种前景——不是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的組織上的解体，而是这些党內的斯大林主义思想在整个时期內四分五裂的解体和从克里姆林宮直到这些党的党员为止的官僚主义关系的解体——对于决定我們如何活动来干預这个过程使它向有利于革命的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是重要的。

#### 46. 克里姆林宮与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领导之間的以及这些

党与群众之間的未来关系的发展，决定于下列几个因素：

首先决定于世界革命高潮发生的范围和速度，特别是在西欧的工业化国家里。

决定于苏联本国的无产阶级群众的重新觉醒和它对于苏联社会制度的影响。

决定于战争在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阵营之間如何发展。

决定于革命领导所表现的干預能力，以便领导群众的倾向，特别是领导在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内部或在有群众基础的社会党内部出现的那些倾向。

要准确地預见到这些基本因素的作用和相互作用是不可能的。但无论如何我們能够指出：革命高潮的范围越广，它对于先进工业国家的冲击越是頻繁，克里姆林宮就会越失去政治上的主动，同时中間派的趋势也就会在受到这种高潮影响的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內得到加强。同样地，革命高潮越是在一个坚强的革命领导下发生，它的趋势越是在苏联國內有直接的反响，这个领导就越能給斯大林主义以致命的打击，甚至在这些国家的大多数共产主义战士摆脱克里姆林宮的控制和影响以前就能給它以这种打击。

这一整个动力既不是不变的也不是始終如一的。它必須被理解为一个复杂的辯証过程，其中具有很多矛盾和局部的向后搖摆。它并不排除而是相反地包含着：（1）只要群众的压力还没有达到最高点，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实行临时向右轉的策略；（2）人数有限的党员和干部集团有可能被开除出党或脱党；（3）在战争期間，克里姆林宮有可能对群众运动、特别是对仍将被孤立的群众运动采取公开的反革命行动。

但是，重要的是了解这种发展的**总的方向**，在这个总的方向中，这些变化将越来越不占重要地位，群众革命运动——不論最初采取什么形式或有什么样的領導——将越来越能够不受克里姆林宮的控制。

这种斯大林主义解体的过程，对于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來說，并不意味着这些組織将逐漸轉变成为革命的馬克思主义政党。在第四国际旗帜之下的革命的馬克思主义政党要从这种解体中出现，不可避免地要經歷种种危机和重大的变化。但是，这些将标志着斯大林主义完全結束的变化，将作为现在就逐步开始的一个过程的高峰出現，在这一过程中，被迫和群众加强联系的共产党开始以往往是几乎看不出来的方式摆脱斯大林主义者必須服从的严格束縛。

#### IV 第四国际的任务和前途

47. 第四国际是由苏联共产党的左派反对派和第三国际的布尔什維克一列宁主义派产生的。它起源于反对斯大林修正主义，保卫列宁的綱領、保卫列宁的战略和战术、維护十月的主要教訓和防止革命在欧洲和亚洲的失敗。第四国际以及在它之前的苏联左派反对派和国际左派反对派，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論、反对“四个阶级联合”的理論、反对在“爬行的速度上”或“大踏步”建設社会主义的概念、反对与改良主义官僚、农民党和殖民地民族資产阶级进行无原則的聯合的机会主义路線以及反对“社会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极端左傾的路線的斗争。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这种坚持原則的根源代表着它的巨大力量。一个国际組織完全建立在它的干部对于明确的綱領、战略和战术的意见一致的基础之上，这在工人运动史上还是第一次。但是，这个力量当

中同时也存在着一种由于脱离工人运动而产生巨大缺点的真正危险：托洛茨基主义的組織成了討論会，成了对斯大林方針进行馬克思主張批判的空論团体。第四国际的創立者，特別是列夫·托洛茨基，深刻地認識到这种危险，因而他們早在 1933 年就集中全力在群众运动中扎下托洛茨基主义者核心的根基，在和群众运动断了联系的时候重新建立起联系，并挑选出新一代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工人干部。在有些国家，如美国，这一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已經有了巨大的发展。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里，斯大林主义者的恐怖、帝国主义者和法西斯的迫害、我們的领导和主要干部的缺乏連續性，尤其是全世界工人运动的衰落，給了我們的运动以打击，阻碍了这一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在战争期間的完成。只是在从 1943 年开始的新革命高潮当中，国际运动才充分认识到了托洛茨基主义組織不能不进入的这一新阶段——具体实施《过渡綱領》的阶段。从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和第十次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議开始，多数的托洛茨基主义組織才获得了关于它們必須怎样在本国的群众运动内部扎下根基和在那里取得领导地位的具体概念。

48. 第四国际起源于第三国际內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斯大林主义分子进行的派系斗争，这种起源在托洛茨基运动中間引起了偏差，因而把对斯大林主义的过失和罪恶进行斗争看作主要任务。事实上，第四国际的任务过去是并且一直是与此完全不同的。在托洛茨基运动刚开始时，我們就有了保卫不断革命論（这种理論对于我們这个时代社会动力是一种最清醒的說明）的斗争，这并不是偶然的。第四国际反对其他一切只是代表特殊的、自私的、官僚主义或民族主义狭隘利益的工人領導，不論它們是改良主义者、中間派、斯大林主义者或任何其他派別。第四国际反对把

工人的活动限制在維护已經取得的地位上，不論这些地位是属于資产阶级民主的、属于苏維埃国家的还是属于南斯拉夫国家的。第四国际代表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它的历史使命——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建設共产主义社会。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其他每一种革命不同的是，它要求实现这个革命的阶级的先鋒队具有高度的自觉，所以不建立起一个領会了第四国际綱領的工人领导就不一定能完成这种使命。第四国际并不想通过把自己和群众的实际运动对立起来的办法来爭取工人先鋒队和群众贊同自己的綱領和組織，而是要参加群众运动，和群众运动融合在一起，并通过政治的和实际的活动来帮助群众运动的发展和在它的队伍中选出新的领导干部。

49. 产生第四国际的具体情况——与第一、第二和第三国际不同，它不是产生于革命高潮期間而是产生于工人阶级运动低潮期間——归根到底决定了它的組織的发展速度的緩慢和这些組織在 1943 年革命高潮开始时的极度軟弱。由于这一事实，同时也由于这个革命高潮还具有局限性(特别是在西欧国家里)，第四国际不能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里成为这个革命高潮的領導力量。这也就有利于苏联的控制、阻碍和阻止这个革命高潮。但也就是在同一期間，在許多重要国家中选择出了更为可靠的托洛茨基主义的领导和干部。因此，第四国际以远超过 1939 年的紧密團結精神进入革命高潮的下一阶段，并且将特別进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在这些过程中它有多得多的真正具体的机会来表现自己并在許多国家里围绕着自己的綱領建立起真正的群众革命领导。

50. 斯大林主义的兴起是通过对苏联的左派反对派和国际的左派反对派作凶恶的斗争开始的，因为这些党派体现了与苏联官僚的保守利益相反的真正国际的和苏联无产阶级的利益。尽管世

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機器企圖粉碎這些派別，但在這一時期形成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少數有覺悟的革命者不僅存在了下來，而且在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里把與克里姆林宮的偽造相反的全部列寧主義的遺教原封不動地傳給了青年一代。斯大林主義的衰落在不同程度上給全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高潮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在革命高潮直接促成斯大林主義衰落的一切國家里，托洛茨基主義、托洛茨基主義思想和托洛茨基主義綱領正在得到人們明確的承認。我們的組織是否能充分利用這種承認，歸根到底決定於這些組織的戰略體制上的適應性。在蘇聯本國和緩衝地帶的國家里，現在正是革命高潮的準備或開始階段，這個階段表明它是一個分化、懷疑和急劇轉變的過程，甚至表明在斯大林主義領導者中間存在恐怖心理。這一階段對於我們的思想和組織在工人階級運動中重新出現是非常有利的。這種重新出現究竟是將以一種自覺的和有組織的形式發生，還是將以採取更為混亂和更為複雜的形式開始，則決定於第四國際利用國家機器的每一個微小的裂痕來灌輸它的思想的能力。至於說到將在下一階段、在戰爭剛開始的前夕或在戰爭中間被卷入革命高潮中去的那些國家，第四國際已經特別準備最大限度地利用所提供的機會來擴大我們的組織的影響和保證這些組織的出現。在斯大林主義者領導集團中間盛行着的從它們所不能解決的政治問題上和從蘇聯最近的變化上產生的混亂狀態，將在這一工作上對我們大有幫助。我們插手於正在動搖斯大林主義的世界危機的重大意義可以列舉如下：重新盡多地收回在共產黨隊伍中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努力的幹部和忠誠的革命鬥士，斯大林主義危機正在使這些共產黨發生動搖並且將使這種動搖越來越厲害；保證有一個無產階級的新的革命領導；保證在維護已有的革命成果和革命時代的延續和變動方面使無產階級以最

小的牺牲获得胜利。如果我們在参加真正的群众运动方面学会怎样把不妥协的有原則的坚定性和极端讲究策略的灵活性結合起来，我們就一定会在斯大林主义衰落和灭亡的同时取得第四国际和世界革命的胜利。

# 六、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 大会文件

(1957年10月11日)

## 1. 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书

同志們：

过去四十年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結構上的危机正在达到它的最后阶段。资本主义遭到了本身經濟矛盾的破坏，又为不屈不挠繼續向前进軍的殖民地革命所逼迫，加以面对着工人国家的日益强大的力量，它已經失去了重新征服世界的一切希望。不过，它凭借着在北美和西欧占据的最后坚固陣地，還沒有打算不經過斗争就让位給高涨的革命力量。相反地，它从来没有停止过进行一次最后决战的准备，利用美国的巨大的技术和軍事潛力来貫彻它的要求。因此就产生了仍然威胁着人类的危险——发生世界核战争的危险。这个战争給人类生存带来的后果将是不堪設想的。

### 即将到来的黃金时代

資本主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地表现出它在世界上的根本反动作用。它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証明一切人类的进步都迫切要求它的灭亡。

十年以来，人类的科学和技术一直在大踏步前进。自动化，多种多样的工业技术，核能之用于生产，乃至明天把太阳能用于生产，一定会使人类在一个較短时期內，实现多年来梦想的丰衣足食的美好境界。一旦在物质上永无忧慮，人类将着手征服空間和生

命的最后奥秘，将消灭恶劣的天气和疾病，使沙漠变为良田，并保証全世界人民終于能够过一种无愧于人类的伟大的生活。

在科学家們看来，已不再有任何阻碍我們达到这些美好目标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已不再缺少物质手段和技术。所缺少的是必須消灭社会集团之間冲突的合理的社会組織。所缺少的是已为人类所掌握的資源的合理分配，分配的目的是为了謀求幸福和进步而不是为了破坏和浪費。

我們时代的基本矛盾在于：在巨大的財富正在被用来生产人类自杀武器的同时，在同样巨大的財富正在被用来征服空間的同时，十五亿人类却食不充饥，衣不蔽体，住在非人所住的住处，并受疾病、貧穷和愚昧的折磨。在人类正在准备成为宇宙主人的同时，成千上万的人，甚至于在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里，却还没有解决合适的住房問題。

为了使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可以为全人类服务，必須取消那种荒謬的經濟制度，这种制度使生产服从于利潤，使广大群众的消費服从于托辣斯和壟斷組織的老板們所高兴賞給他們的收入。必須废除人对人的剥削以及建立在市場关系基础之上的国际貿易制度。必須把生产資料交給社会，保証由生产者管理工厂，查清二十五亿消費者的真正需要，并拟定一个**全世界經濟发展和繁荣的計劃**。这个計劃在提高先进国家工人生活标准的同时，将在最短时期內尽量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終于能够过二十世紀水平的生活。

制定这种全世界的經濟計劃是人类今天最迫切的任务，不然，以后几十年的发展将加重富国越富、穷国越穷的可怕趋势。这个計劃并不是空想的，它并不要求西方国家的工人作重大的牺牲。相反地，如果我們仅仅是从每年浪費在軍备目的上的，也就是說浪

費在破坏目的上的財富來計算，我們就可以达到全年一千亿美元的惊人数目。这笔錢能够完全用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而絲毫也不需要先进工业国家的工人們降低他們现在的生活标准。

就是这样的假設，也只是以仅仅維持資本主义国家现在生产的財富为根据的。但是实际上，苏联的例子年复一年地証明，即使稍微合理地組織一下，至少也能使先进工业国家的經濟发展的速度增加一倍，这样一方面有助于西方国家生活标准有新的实质上的提高，另一方面还能騰出新的資源，使直到现在仍被帝国主义束縛在几乎是中世紀經濟水平的那些国家的經濟和文化得到高涨。

现在人类已有能力进入普遍富裕与和平的时代。只有一个严重的障碍，那就是残存的資本主义。从世界上彻底鏟除資本主义已經成了保障人类公共安全的工作。如果不解决这一問題，資本主义就威胁着要动员科学和技术的无限力量用于可怕的毁灭。

### 必須尽速解除資本主义的武装!

美帝国主义感觉到力量的对比的确于己不利，所以已經投入了軍备竞赛。除非全世界和美国工人能够及时地通过夺取政权来解除华尔街和五角大楼的老板的武装，这种竞赛的結果就只能是战争。

苏联所取得的經濟上的和技术上的成就不但远未能減低美帝国主义的战争狂热，反而把它推向爆发的頂点。在資本主义处于垂死呻吟的有决定性意义的现阶段，帝国主义事实上只能在不战則降或者作最后掙扎以苟延残喘的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按照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謀士和领导人福斯特·杜勒斯的說法，革命的

每一个新的决定性发展，威胁着帝国主义本身的每一个重大經濟危机，苏联在技术上的每一个惊人成就，都驅使帝国主义走向深淵的邊緣。

几年以来，帝国主义走向战争的趋势好像是有些緩慢下来。經濟情况是有利于获得利潤的。殖民地革命有一个时期受到了倾向于与华盛顿达成妥協的領導的控制。克里姆林宮遭到了苏联社會內部反对勢力的揭露。因此，我們看到了日內瓦會議和伦敦的裁軍小組委員会的无休止的談判。

但是，只要中东的殖民地革命有一个新的进展，苏联的技术和軍备有一个惊人的跃进，我們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个“休战”的虛伪性质。当然，就軍备竞赛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达成局部協議仍然是可能的。但是，真正的裁減軍备将意味着帝国主义签署它自己的死亡証書。

**第四国际不願以过分乐观的預測来哄騙全世界人民，它严肃地警告他們注意威胁着人类的危险。如果国际无产阶级不及时解除帝国主义的、特別是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帝国主义将宁願把人类投入核战争也决不会向革命力量不战而降。**

有些人为騙人的“和平共处”政策辯护說，因为世界核战争威胁着要毁灭整个文明，因为任何新的革命发展威胁着要驅使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所以最好是使革命的发展緩慢下来。这样，他們就原諒了克里姆林宮和共产党对于革命运动——如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背叛行为。但是实际上，这些“消极抵抗”的支持者并没有使他們的想法变成結論。最近的事实証明，不仅革命的发展，就是苏联的經濟、技术或科学的跃进也能“触怒”帝国主义。因此，向原子訛詐投降的邏輯，不仅要求停止殖民地革命，甚至要求停止苏联經濟的发展。

但是，今天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止我們时代的上述这两种根本趨勢中的任何一种趨勢。人类的任务不是向华盛顿的原子訛詐投降，而是尽快解除核战争制造者的武装。现在在英國、挪威、冰島和其他各地正在圍繞着这一問題发展的运动表明，国际无产阶级經過短时期麻痹之后，对这个人类面临的生死問題的認識已越来越清楚了。

**第四国际号召全世界工人和各族人民一致行动起来反对疯狂的核武器竞赛。召集一切工人組織——政治組織、工会、合作社——的代表举行世界會議，起草一个一致行动反对原子弹和氢弹的方案；在全世界宣布五一劳动节为共同进行反对核武器斗争的日子；让国际无产阶级的声音在成千上万的群众大会、示威和罢工中，强有力地响遍全世界。**

**立即停止核試驗！**

**在工人組織的監督之下，立即禁止核武器并銷毀儲存的核武器！**

**不要再沿着导使当权的狂人走向核战争深淵的道路前进！**

同时，第四国际警告一切国家的工人和人民，肯定只有一种解除帝国主义武装的有效手段，那就是夺取它的財富和政权，推翻它的政府并在世界各大国建立工人政府。

**爭取殖民地革命的胜利！**

改变世界阶级力量对比的主要力量是中国革命和全世界殖民地革命的巨浪。由于受到了从几百年沉睡中觉醒过来的群众对于自由和人类尊严的自然渴望的激励，加以他們的苦不堪言的穷困生活同帝国主义国家向本国一部分人所保証的舒适奢侈的生活成

了鮮明对比，在帝国主义在中国、朝鮮、越南遭到接二連三的失敗的鼓舞之下，今天，殖民地革命正在从巴基斯坦到加薩布兰卡的所有阿拉伯国家燃起遍地烽火，正在拉丁美洲的許多国家（玻利維亞、阿根廷、哥伦比亚、古巴……）掀起强大的群众运动的高潮，正在摧毁印度的尼赫魯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諾的表面稳固的資产阶级政权，并正在开始通过千百个裂縫渗入帝国主义在中非洲的大厦。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結構、无产阶级在人数上的极端不足、大的宗主国的工人政党对于殖民地革命的背叛，克里姆林宮无保留地給殖民地資产阶级以支持并要求共产党对殖民地資产阶级卑躬屈膝的机会主义路綫——所有这些现象都有助于在革命第一阶段保持資产阶级或小資产阶级領導的支配地位。这些領導在群众和帝国主义之間玩弄花招，不加区别地从华盛顿或克里姆林宮方面寻求外交上的支持。

美帝国主义认识到，即使殖民地資产阶级和克里姆林宮之間成立一种世界规模的稍具持久性的联盟，也会給它的政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答应給这些資产阶级以經濟援助，并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它們反对欧洲帝国主义以换取它們的同情。美帝国主义者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間和殖民地資产阶级与工人国家集团共同反对巴黎和伦敦，这种态度标志着这一策略的高度运用。

但是，这一策略遇到了一系列的客观障碍。在群众起来反对的帝国主义恰好是美帝国主义本身的情况下，这种策略就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运用（例如现在在玻利維亞給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右翼的支持）。美帝国主义由于本身的社会性质，尽管它的經濟后备力量比苏联远为雄厚，仍不能鼓励殖民地国家的真正工业化。它自己的財富使它成为农业和工业产品的輸出国家，因而使它不

能促进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市場生产的发展（例如埃及的棉花生产）。最后，殖民地革命的规律本身将使这个革命超越由动摇的或背叛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领导的现阶段。群众运动越开展，无产阶级干部（即使不是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干部也是具有工人思想的干部）就越会为控制殖民地革命而和旧的领导进行斗争。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建立从民族主义运动或工会运动中产生出来的独立的工人政党已經被提到日程上来了。这将迅速排除美帝国主义的操纵。

自奠边府战役以来，在最近这几年发生的一切殖民地革命事件当中，现在对于世界帝国主义构成最直接的威胁的就是阿尔及利亚人民英勇的革命起义。阿尔及利亚革命越来越使法帝国主义与摩洛哥和突尼斯资产阶级所达成的不稳固的妥协成为問題，使法国本国的經濟、財政和政府动荡不定，使革命在中非洲的側翼得到新的发展，并且正在粉碎着法帝国主义在生产石油的沙哈拉沙漠建立“权勢”的最后希望。阿尔及利亚革命應該受到全世界工人的尊敬和贊頌，因为参加革命的群众具有牺牲的精神和无与伦比的克己美德，因为它的战士具有旁若无人的气概和走向胜利的不可动摇的意志。面对着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爆发在法国引起的深刻不安，面对着法国军队中的年轻新兵的拒絕服从命令和第一次兵变，法国工人运动是能够給阿尔及利亚革命以认真的帮助并利用这个大好机会給自己的第一号敌人——法国大資本家——以决定性的打击的。然而法国工人运动的群众組織不但沒有这样做，反而由于怯懦、伪善和对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消极——即使不是公开的背叛——而給自己蒙上了羞耻。

居伊·摩勒的改良主义領導把它竞选时的諾言抛在脑后，在殖民主义者在阿尔及尔发动的暴乱面前投降，而以在阿尔及利亚

組織了反革命鎮压而夸耀。它违背良心进行的屠杀达到了种族灭絕的地步，实行的恐怖和折磨可以与希特勒相比，建立集中营制度已經根据所謂“特別权力”法案而被搬运到法国。至于共产党，不久以前还准备动员它的战士反对“美国”將軍李奇微，或者反对“德国”將軍斯派达尔，但是，它还没有看到有一种办法可以組織一次阶级行动、一次罢工、一次任何规模的示威以迫使法国军队和帝国主义撤出阿尔及利亚。它沒有理由指責在全法国掀起的沙文主义高潮，因为它曾經和社会党同謀助长——即使不是发动——这个高潮。它也不能指責工人的消极态度，因为它自己过去的罪行对此負有責任。可是，一九二五年力量还很薄弱的法国共产党，却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开展了一个具有不同动力的反对摩洛哥战争的运动。

第四国际法国支部有責任作为这个国家唯一的工人組織，驕傲地举起列宁的旗帜，举起法国工人和阿尔及利亚人民为击败法帝国主义而共同斗争的旗帜。这样，它就在波旁王宮的凡尔賽主人进行犯罪的大屠杀面前保全住工人阶级的荣誉。

在拉丁美洲，玻利維亚的革命已經进入了决定性的阶段。西萊斯的反动政府沒有任何稳固的社会基础。它在美帝国主义的全力支持和左翼官方領導——雷欽之流和其他前任“工人”閣員——的怯懦的鼓舞下，正准备从群众手中拿走一九五二年四月革命的一切成果，并建立一种残暴的軍事独裁。

但是英勇的玻利維亚群众、加达維和西格罗等地的矿工、农民，他們的組織和他們的民兵，这些人的战斗精神和过去一样高涨。在“革命工人党”（第四国际的玻利維亚支部）领导之下，他們不久将着手于强迫玻利維亚議会召开特別代表大会并在这个会上决定成立真正的工农政府，把全国群众从他們现在所受的經濟压

迫和从专制独裁的威胁中解放出来。

在玻利維亚的任何胜利都将在整个拉丁美洲得到反响，而面对着軟弱的資产阶级政府的非常不稳定和它們所处的經濟混乱状态，一个革命的热潮将再度席卷整个拉丁美洲。从阿根廷到哥伦比亚，甚至到古巴，拉丁美洲群众将向玻利維亚革命的成功致敬，并且一定能够沿着同样胜利的道路奋起前进！

**殖民地革命胜利万岁！**

**給各国人民以充分和完全的独立！**

**从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撤出帝国主义的占领軍队。**

**光荣属于英勇的阿尔及利亚革命！**

**法帝国主义是法国无产阶级、阿尔及利亚人民和法兰西联邦的所有被压迫民族的共同敌人，打敗法帝国主义！**

### **向資本主义的西方堡垒作新的进攻**

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时，改良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在它們把篡夺来的权力握在手里的时候，号召工人重建已經破烂了的資本主义經濟和国家。由于这些领导的背叛，資本主义在西欧的大部分国家里边经历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誠然，沒有一个结构上的問題得到解决。南意大利沒有工业化；西班牙仍处在低到不能維持生活的工資和半封建的土地所有权的压迫之下；英國經濟的衰敗越来越明显；法国并沒有在它的工业现代化或在实现財政平衡方面获得成功；德国也沒有恢复統一。尽管如此，在最后这几年期間，資本主义工业还是毫无疑間地經歷了一次显著的繁荣，在多數国家里实际工資有了一定的增长。

但是，因为这种繁荣是在資本主义制度之下取得的，所以它照

例具有隨着資本主义制度一起产生的一切现象的特点。生产能力的发展远远超过广大群众的消費能力。有人由于投机和黑市买卖而暴发橫財，另一方面，千百万工資劳动者，特別是妇女和儿童，虽然劳动强度大大增加，而所得工資却不够維持最低的生活。到处都有豪华的建筑，但是千百万家庭却遭到了房荒的危机，它是道德墮落和个人不幸的根源。在普遍追求利潤的竞争中，局面日益严重，通貨膨胀现象开始出现，欧洲再次发生美元不足，国际貿易的不平衡日益加剧。这样就聚集了已經在一些国家里开始了的新經濟衰退的一切因素。

在美国，它的繁榮基本上是靠巨大的軍事开支来維持的。在这个世界上最繁榮的国家里，区域性的物价波动已造成了可悲的社会状况和更为严重的經濟不平衡。紡織工业多少年来一直在衰落中。汽車工业的衰退已經繼續了两年，造成了在工业最发达的地方有大批群众失业。除了这些失业者以外，还有由于修改軍备計劃而被飞机工厂解雇的工人。南方的工业化不但远不能以和諧的方式解决种族問題，而且使黑人群众与白人优越論者的“核心”之間的紧张关系更为加剧。黑人越来越坚持他們爭取解放和真正平等的权利，而那些白人优越論者則为了保持他們的特权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这对于美国資产阶级政府的稳定产生了一种特別严重的政治危机。这种危机不过是世界規模的殖民地革命所取得的发展在美国国内的反映。

这就是說，虽然有西欧和美国的繁榮，工人运动仍然处于給它的阶级敌人以非常沉重(即使不是决定性的)打击的地位。这就是說，仍然有許多发生激烈变动的机会可以供工人运动利用來大胆地向全世界人民提出**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改組社会的解决方案**，以解决資本主义的混乱和剥削所造成的浪费。如果沒有利用这些

机会，其过錯就不在于“客观条件”，而在于传统的“社会党”，和“共产党”领导的軟弱与怯懦，这些領導对于必須在某一点上跨出資产阶级民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体制之外的想法，比以前抱有更大的恐惧。

一个新的經濟衰退达到什么程度，最后还是决定于新的軍事开支的重要性(它将进一步破坏币制的稳定)。今天，在这种經濟衰退即将到来的时刻，第四国际号召一切先进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充分利用資本主义的垂死痛苦給社会主义带来的机会。

**不准雇主关闭依靠你們的辛勤劳动建立起来的工厂。不准到处发生失业现象。銀行和一切基本工业国有化，其經營管理应受工人监督！一切由业主关闭的企业应由政府沒收！在工会监督之下制定并确立經濟发展的全面計劃！反对托辣斯化的“欧洲”，拥护成立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由这个联邦拟定一项共同經濟計劃并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与“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一体化！目前实行每周劳动四十八小时或四十四小时的国家应一律减少为四十小时，目前实行每周劳动四十小时的国家应减少为三十五小时，工資一律不得照减！在工人监督之下采用各种自动化技术，并在全面經濟計劃的范围内保証充分就业！**

### **在苏联重新建立起苏維埃民主**

在資本主义的垂死痛苦进入决定性阶段时，苏联开始有了官僚制度。动摇着資本主义世界的同样的力量，也在粉碎着克里姆林宮的独夫专政。殖民地革命的兴起和苏联技术与經濟的惊人发展正在破坏着这种专政的客观和主观的基础——无产阶级的相对軟弱和它害怕資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苏联工人阶级现在确信社会

主义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对于将来抱有信心，并为他們在工业上取得的无比成就而自豪，他們正在重新抬起头来，譴責警察鎮压、日益发展的社会不平等、官僚主义者过分的特权和与国家經濟的巨大发展显然不相称的平凡的日常生活。

在斯大林逝世之前，人們已經感觉到了这种越来越大的群众压力。斯大林的逝世加强了这种趋势。面对着群众不满情緒的日益增长，斯大林的继任者恐慌起来，他們为了安定人心，不断地对群众作經濟上的和政治上的让步，抛弃了对斯大林的迷信，承认了（虽然是轉弯抹角地）那个可恨的独裁者的大部分罪行并应諾回到列宁的道路上来。克里姆林宮的让步和苏联社会所取得的新的成就，不但远不能平息怨恨的声音，反而已經激起并且还要进一步激起人民的要求和願望。

在“人民民主”国家里，为什么群众对于当政的官僚主义領導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除了上述这些原因之外，群众还感觉到他們是民族压迫的受害者和看到他們的国家遭到了克里姆林宮的掠夺。这些感觉的力量和工人的难以忍受的經濟地位，引起了东柏林和波茲南工人的巨大反抗。它們同共产主义运动內部反对官僚独裁的一股政治反抗潮流結合起来，終於导致了波兰和匈牙利的革命。

在波兰，群众运动由于同官僚机构的自由派結成联盟而战胜了斯大林主义者的抵抗。这个运动在胜利的中途暫时停了下来。在匈牙利，面对着动员苏联軍队前来援助的斯大林官僚机构的凶猛的抵抗，革命迅速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几乎全体人民都起来反对官僚独裁的可恨的工具。革命刚一发动，匈牙利的无产阶级，按照一切无产阶级革命的传统，建立了他們的苏維埃，他們的工人委员会，要求掌握国家的一切权力。面对着这种威胁着要烧毁它的

整个“防堤”和甚至苏联本身的情况，苏联官僚机构作了无情的回击。但是，它不能粉碎工人阶级的英勇抵抗，因为各国的工人，包括共产党工人在内，都是和这个工人阶级团结在一起的。在中国和甚至于在南斯拉夫，人们也已经都感觉到了在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和在苏联发生的政治革命的影响。

反对在苏联国内和在“人民民主国家”里的苏维埃官僚制度的政治革命，尽管有它的高潮和低潮，有时受到阻遏有时甚至是暂时的退却，但它已经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推动力量。它受到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先锋队（国际革命运动应尽力协助这项工作）的鼓舞，将在与世界革命互相密切影响的情况下发展起来。勇敢地站在群众前列的苏联和东欧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将能避免过渡的混乱阶段并把政治革命的不必要的牺牲以及反革命分子可能在各处从政治革命中得到的暂时利益减少到最低限度。

**匈牙利革命万岁！它必将再度爆发，并且是不可战胜的，直到政权归于劳动人民的民主委员会！**

**打倒克里姆林宫在匈牙利进行的血腥的反革命干涉！  
将以战胜哥穆尔卡中间派的一切犹疑、后退和背叛告终的波兰十月革命万岁！**

**苏联的政治革命万岁！它必将在苏联重新建立苏维埃民主，改组计划经济，排除官僚主义的控制，鼓舞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创造热情，使苏联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不可战胜的堡垒！**

**苏维埃政权万岁！使工人国家的再生成为可能的工人和贫农委员会的政权万岁！**

**同最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相比，标志着全人类一大**

**进步的苏维埃民主万岁！**

**所有工人国家在平等基础上的联盟万岁！**

**工人同志，共产党员同志！**

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是在伟大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前夕召开的。第四国际向你们讲话，是把你们看作十月革命思想的合法的继承人，看作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的合法继承人，看作早期共产国际思想的合法继承人。今天，当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自己承认斯大林的罪恶时，他们就是默认：苏联的老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和国际的左翼反对派，以及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进行的，反对工人国家堕落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在最近三十年里，国际工人运动所以遭到一切失败和挫折，其隐因必须从官僚主义的堕落和工人国家上层存在着强大的特权阶层这方面去寻找。如果说今天各国共产党正处在危机中，在许多西方国家里，共产党即使不是解体也是在全面撤退中，这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强大，因为资本主义垂死的痛苦是每一个人都能完全看得到的，而是由于克里姆林宫所强加给各国共产党的错误的、罪恶的和背信弃义的政策。这一政策无助于保卫苏联。相反地，却引起今天本来可能成为工人国家的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苏联。

**当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说他们要回到列宁的道路上时，必须要他们实现这个诺言：要求对最近这些年来的斯大林主义政策作出全面的和相反的修正。要求在共产党内部恢复讨论的自由和成立派别的自由。要求重新组织一个共产国际，在这个国际里，全体共产党要在严格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制定**

## 一个能夠引导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共同路綫

由于提出这些要求，你們一定会再一次遇到你們的官僚主義領導人的抵抗和阻撓，如果不是压制的話。你們不久將會看到，雖然他們想安定人心，但仍準備為他們的地位和特權作一番苦斗。

为了糾正共产主义运动，必須在全国的和国际的規模上組織一个反对他們的左翼反对派。研究列寧、老布尔什維克、托洛茨基和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著作：你們將会在这些著作里看到关于斯大林的罪惡和关于你們党的錯誤的唯一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的說明。同第四国际的支部保持接觸。它們正在耐心地和不屈不撓地准备建立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新的领导，你們在这个新的领导里将占有重要的位置。

使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成为可能的，明天也会使全世界十月革命的胜利成为可能。这就是：必然要进行到底的革命；由工人和貧农委員会掌握的政权；用社会科学和革命的全部理論——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武装起来的、无私地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党。

这次代表大会反映了我們的运动正在大大加强了，聚集在这次世界代表大会里的有来自将近三十个国家的革命組織的一百名代表和观察員，他們代表着一支已經行动起来的先鋒队，他們各自在他們的本国并且共同在全世界范围内起着教育者、協調者、統一者和真正的群众运动的推进力量的作用，他們在群众运动中是完全結合在一起的。最有觉悟的无产者将和他們一起并團結在他們的周围，建立起世界性的布尔什維克党，以保証全世界范围内的十月革命的胜利。

为人类开辟胜利的共产主义时代的不朽的十月革命万岁！

国际无产阶级的光輝指針，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綱領万岁！

斯大林主义者的官僚机构用泥浆和鮮血汚染了工人的宝贵旗帜，把一部分卓越的国际无产阶级导入了歧途，打倒斯大林主义者的官僚机构！

第四国际过去保全了共产主义的荣誉，明天将重新集合一切忠实的共产主义者作最后的战斗，以击败资本主义，取得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第四国际万岁！

## 2 斯大林主义的衰落和垮台(決議)

### 序 言

第四国际曾經在它的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重新估計了世界形势，从而得出了一般的結論；它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提綱——《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把这些結論应用到对苏联社会动力的分析上。

苏联的官僚机构专政、对于苏联无产阶级的政治掠夺和原子化，是全世界革命力量在反动势力面前退却的結果，也是苏联內部經濟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关系对于无产阶级非常不利的結果。

国际形势和苏联國內形势的根本变化的特点，一方面表现在 1943 年以来、特別是中国革命胜利以来全世界革命力量的高涨上，另一方面表现在使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的計劃化的惊人成就上。这种根本变化破坏了苏联官僚机构取得支配一切的力量的客观基础。

国际力量相互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反资本主义的社会阶层；苏联國內力量相互关系的发展也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官僚机

构。这两种发展是并行的。后一种发展不断地增加群众对于官僚独裁政权的压力，使它不得不对群众作出重要的让步，首先只是在经济方面，其后也逐渐推而及于政治方面。

因此，我们认为克里姆林宫的“新方针”不是官僚机构的自我改造运动，而是它的自卫运动。只要这种“新方针”的客观结果，特别是它所造成的官僚机构各阶层的从上到下的分裂，促成和甚至加速群众运动的觉醒，我们就认为“新方针”不但不能替代群众反对官僚机构的政治革命，而且相反地是这种政治革命的一个准备阶段。

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后，在苏联本国、“人民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中相继发生的越来越多的戏剧性事件，已经证明了这种分析的正确性。这种分析使我们的运动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唯一能够预见并正确解释斯大林主义世界危机的发展的力量。

铁托的恢复名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惊人的决议，赫鲁晓夫报告中的轰动一时的揭露，几个“人民民主国家”中“加速民主化运动”的爆发，意大利、英国、美国等共产党的“危险的”发展，波兹南起义，波兰和匈牙利的政治革命——这些都是斯大林主义不断衰落的许多阶段和它的垮台的开始，是《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那篇提纲曾经详细分析过的过程中的很多跃进。

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面对着在昨天还为苏联官僚机构所统治的整个区域内显然已经开始的这一过程的最后阶段——特别有必要说明造成斯大林主义垮台的具体条件，即革命的无产阶级在崩溃的独裁政权的废墟上发动革命高潮和取得胜利的条件。

因此，现在的提纲既不再作《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那篇

提綱中的历史性的叙述，也不作它的結構上的分析与說明。现在的提綱不是那篇提綱的代替品或者修正物，而是它的一种当然的繼續，因此是它的一个組成部分。

## I. 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衰落和垮台

1. 1953年以来，苏联工业发展的速度远超过最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的速度。在許多方面(燃料、一部分石油、机器制造、自动装置、核能的工业用途)，苏联已經克服了斯大林时代末期的落后和不平衡状态，并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53年实行的有利于某些耐用消費物品(钟表、自行車、电视机、縫紉机、洗滌机等等)生产的第一次重工业的部分改造，使以前被忽視的这一方面，也能在几年之内超过除了美国以外的一切資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和可观地提高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

但是，苏联經濟仍然受着在斯大林时代所造成的两种不平衡的遺害：一方面是重工业与輕工业之間的不平衡，另一方面是工业与农业之間的不平衡。这两种不平衡是下面这一事实的主要原因：尽管在过去几年內，毫无疑问地在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上获得了成效，可是和在比例上具有与苏联差不多的工业无产阶级的資本主义国家比起来，消費量仍然低得很多。在高級食品(肉类、奶制品、进口水果)、耐用消費品(家具、小型摩托車、收音机、汽車等)和半耐用消費品(衣服和鞋)的质量方面，尤其是如此。房荒問題仍然存在，而且更加使劳动人民普遍感到不滿。

和經濟的一般繁荣相較，农业是落后的，这是现在苏联官僚机构領導人的主要苦恼。他們試圖用越过集体农庄农民而另寻出路的办法(所謂“处女地”政策)，或者用刺激农民私人利益的办法(例如提高馬鈴薯的价格)，或者以消灭私人剥削的最后痕迹来恫吓农

民(要取消以銷售为目的的果菜园和牲畜)的方式来消灭这种落后状态。但是，由于缺少正确的前后一貫的全面政策，这些不同努力的零零碎碎的和常常互相矛盾的效果，并沒有使真正的农业危机得到解决。

虽然在工业方面最初采取了一些緩和的管理分权化的措施，但过分的官僚主义中央集权的恶政仍然折磨着苏联的經濟。官方承认的生产工人在苏联全部人力中所占的百分比，概括地說明了这些恶政。这个百分比不超过 25%。

所有这些矛盾和不平衡对于苏联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巨大的障碍。用民主的工人管理代替官僚主义的管理，在群众监督之下拟定、通过和执行計劃，一定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开支和浪费，并保証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有較高的生活水平而不必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

2. 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在 1953 年和 1954 年特別显著)，不同的社会阶层不但远沒有减少經濟的和社会的要求，而且以一种越来越明确和越公开的方式提出这些要求。这些阶层不但提出当前的要求——更好的食品供应；更好的工业产品；更好的工人住宅；更高的国家收购价格；更多的貿易自由；給农民以更便宜的工业产品——而且进一步提出能够表现苏联社会是由各阶级或各阶层組成的这一社会理論的那些要求。因此，那种在群众压力下实行让步的政策，虽然在馬林科夫倒台后暂时受到阻碍，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开会和会后期间又重新得到了推行。

两种根本上互相对立的派別在苏联社会中出现了，并且得到了平行的发展；它們正开始提出它們的要求：

(a) 一派是工人阶级中最积极和最有觉悟的部分，他們越来越趋向于提出工厂管理的問題。这些工人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

取得了重要的让步(提高工薪，恤金平等化等)。工人們巧妙地利用“反对个人迷信”来攻击工厂內部的“一长制”(也就是厂長有无限专斷权力)的原則。他們也在原則上得到了應該修改劳工法——世界上最严厉的劳工法——的承认。有些改革工薪制度的企图，借口反对过分的斯达哈諾夫运动和等級奖金制度，实际上是降低最有技术的工人的总报酬；工人們在反对这种企图上也得到了成功。无产阶级这一派将从波兰和匈牙利工会的例子中得到鼓舞，要求工会回到它們的真正历史使命上去：保卫工人的特殊利益——在必要的时候反对行政部門和墮落了的官僚主义国家。

(b) 一派是官僚机构中最有特权的阶层的最有自知之明的代表(托辣斯和工厂的經理、总工程师、將軍等)，他們正在为他們的特权寻求进一步的法律保障，因为这些特权由于群众的压力和他們开始采取行动而越来越不稳固。这一派特別于 1955 年在莫斯科工业會議上得到了好处(替經理們要求并且取得了模范地位；增加工厂中监督人員的特权)，但是，目的在于修改劳工法的工人压力要消灭一部分这样的优越地位。官僚机构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要求把奖金制度推广到管理人員身上，并且获得了成功。它现在正要求在經濟問題上放宽刑法，并且正在特別为每一个工业企业爭取出售某些生产品的权利，这将扩大这些貨物的半黑市并使之合法化，給經濟計劃带来一个解体的因素。

至于农民，他們簡直沒有机会明确地提出任何范围广泛的社会要求。但是，我們可以认为，他們总是想死守在一小块私有的土地上，在那上边集中他們的大部分劳动力，并从之得到大得不成比例的收入。赫魯曉夫給予农民自由出售这些小块土地产品的权利，是对他們作出的一个重要的让步，将誘使他們提高蔬菜和飼料的生产。

因此，“新方針”的繼續，乃是为无产阶级和官僚机构的更有特权的阶层之間的最后摊牌做着无情的准备工作，这一摊牌是以工厂管理問題为其主要賭注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一切关于經濟和关于工人国家的結構和管理問題。

3. 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准备时期起，人們已經清楚地听到在苏联知識分子工作者陣線上正迴蕩着一种反抗的声音。电影、戏剧、文学、艺术、建筑、科学和哲学作品相继受到恶毒而有道理的批評；这既表明了日丹諾夫主义的可悲的失敗，也表明了新一代艺术家、作家和科学家要把自己从不懂和不符合于他們的工作的真正要求的那些“指示”中解放出来的热烈願望。苏联知識青年要求批評自由、思想自由和創作自由，而且要求得如此强烈，以致不能不对他們作某些认真的让步。

但是，給艺术家和科学家以公民特別是工人所享受不到的政治上的和經濟上的批評自由，必然使艺术創作和科学硏究成为社會批評的工具。这种范围广泛的批評，即使来自身为官僚机构忠实部下的那些艺术家（爱伦堡），也会使官僚机构的上层感到吃惊和忧虑——因此他們努力阻止这种趋势，甚至使这种趋势倒退，退向更为“忠实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們只能容忍那些“尊重党的正确总路綫”的批評家。苏联历史撰述的一再改变方向——直到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前夕都墨守斯大林主义的大部分传說，此后好像是脱离了这个方向，实际不过是在官僚統治的鞭策之下更后退了，不論实行这种統治的是一个莫洛托夫或者是心胸更为狹隘的官僚——清楚地說明了一个面对着知識分子要求批評自由的官僚机构的搖摆不定。

但是，尽管这个官僚机构拚命反抗，尽管有后退，有迟延，甚至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表现出反动，苏联国内为思想自由而进行

的斗争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赢得了巨大的胜利，它的影响是不能抹杀的。通过今后动摇的独裁政权所显露出来的一切裂痕与罅隙，批判精神和反抗精神将渗透到政治领域中去，并且将爆发出政治革命的火花。

4.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标志着斯大林死后一直动摇着苏联官僚机构中上层拿破仑主义者的危机的高潮。这个危机本身是无产阶级与官僚机构之间在力量对比方面的根本变化的反映。苏联官僚机构的领导核心，在群众的和开始具有政治面貌的一种不满情绪的压力之下，分裂成为几个派别：一派赞成对群众作重大的让步（馬林科夫—米高揚？）；一派主张加强专政（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一派是“中间派”（赫魯曉夫—布尔加寧）。“自由派”对死去的独裁者的权威作第一次公开的攻击，公开企图把群众对斯大林的怨恨当作资本。赫魯曉夫面对着这种情况，力图在他的秘密报告中，由他自己对斯大林进行更为猛烈的攻击，以使这种谋略归于无效。这样，官僚机构在试图使貝利亚担负过去的集体罪行的责任而没能成功之后，就把它自己的领袖当作了替罪的羔羊，因而在不得不对付政治反抗以前，取得一时的苟安。

这一真正具有历史规模的巨大谋略，从一开始产生时就显露出仓促和甚至恐慌的迹象。官僚机构的领导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控制，或甚至不能预见到他们这样解放出来的力量。虽然他们也许能在苏联共产党内部暂时不让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出现，也许在某些知识分子集团和官僚机构的下层中间暂时贏回某些同情，但他们却推动了一个真正滚雪球的运动，直到把他们压碎了为止。

由于以如此彻底地破坏了斯大林的威信——一切官僚专政的化身——他们无疑地在各方面破坏了官僚统治的威信和精神。由

于冷酷地暴露了他們曾經參預过的斯大林的重大罪行，他們也破坏了共产主义战士对于他們的領袖的盲目的服从，同时也損坏了他們自己的名誉。他們用一种本末倒置的“个人迷信”来解释这些暴露了的恐怖行为，不能使任何人滿意，并将引起人們对苏联社会和它的官僚主义墮落作批判的馬克思主义分析。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就这样使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在几个国家里，特别是在群众即将进行反抗的“人民民主国家”里达到了高潮。由于发动了一个加速政治革命爆发的运动，这次大会把无产阶级和官僚机构之間的斗争重心暫时轉移到了苏联国境以外。这种得到解放的革命力量之强大使苏联官僚机构大为吃惊，因而試圖采取倒退步骤来阻止“肃清斯大林主义影响”（1956年夏），但是无效。这种倒退步骤的結果是更激怒了群众，特别是在波兰和匈牙利。最后，克里姆林宮不得不在这些国家里使用武力以鎮压群众的革命运动。通过和这个强大的革命运动发生接触的苏联士兵，政治革命的浪潮将由这个“堡前斜堤”向苏联本国泛滥，从而为陷于絕境的官僚机构签定死刑判决书。

而且，波兰和匈牙利革命的头一个反响是克里姆林宮領導中心的派系斗争的加剧。赫魯晓夫受到了由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两派組成的反对他的临时集团的威胁，在中央政治局（主席团）沒有得到多數票。他是靠越过中央政治局直接向中央委员会申诉并把他的政敌排除于“集体領導”之外才得繼續当政的。由于使用典型的斯大林主义的手段（毀謗、罗織、伪造历史）来达到这一目的，他在官僚机构下层和无产阶级的越来越有意见的人們中間更进一步地降低了他的威信。通过使党的一部分干部更直接地参加解决这一爭論，他以身作則地帮助群众关心政治，并为下一阶段做了准备，因为在这一阶段中，反对他的人很可能向代表大会

和一般党员提出反对他的控訴。

5. 因此，革命的客观和主观的先决条件在苏联迅速地成熟起来。克里姆林宮头頂上失去了全知的光輪之后，现在又失去了全能的光輪。官僚机构在脫去了独裁的袈裟之后，现在又正在失去开明的自由主义的假面具。历史正在以前所未聞的速度迫使斯大林的继承者放下所有的計謀，来赤手空拳地面对着群众的攻击。

群众的压力越加大，上层的分歧就会越加扩大。新斯大林主义派将认为已經作出的让步是引起群众运动的原因，并且将試圖停止“自由主义化”，甚至对 1953 年以来所作的让步都发生怀疑。“自由派”相反地将认为，如果独裁政权不至少部分地承认人民的渴望，来自下边的运动将继续扩大；这一派将准备一次“肃清斯大林主义影响”的新高潮，也許甚至比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那次高潮更为惊人。但是，这两派都不过是企图保持和維护整个官僚机构的特权。两派都将越来越要依靠军队——在拆散了特务組織之后唯一存在的有效的鎮压工具——来裁断它們的紛爭。

暂时排除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不但远未能結束派系斗争，反而使这个斗争更为激烈。目前的情况是，力量的对比正在向不利于苏联官僚机构的方向发展，社会上互相敌对的派別有在领导集团本身內部間接地反映出来的傾向。在这种情况下，官僚机构的軍事独裁上层不可能再度接受一个高高在上的公斷人的鐵的統治。当領導人員繼續互相傾軋，并由于一再地和迅速地改变方向而在群众眼前失去威信时，公斷人的任务就越来越轉移到軍事領袖的手中。同时在党的中下层干部，在工会，特別在青年中間，将引起以重建苏維埃民主为目的的半无产阶级派别的最初的形成。只有在群众直接采取行动时，巨大的社会力量才能在互相对立的政治集团中間表现出它們的政治态度。

群众与官僚机构之間的，官僚机构內部各派別之間的和紅軍士兵的苦恼与指定給他們的鎮压任务（匈牙利）之間的这种日益紧张的关系——所有这些都越来越接近于爆发。假使官僚主义領導内部的一个集团被导向于訴諸群众；假使群众上街来解决他們所最关心的經濟、社会或政治問題；假使青年、工人阶级或者甚至军队中的先进分子开始自发地提出一个政治要求的綱領，或者假使这些不同因素互相发生影响或者联合起来——被提到日程上来的，将是要保持独裁的根本制度（一党专政的官僚組織；为政府服务的工会；厂长的无限权力；形式主义的代表机关；收入的巨大差別）的力量和要对国家与經濟实行民主管理的群众之間的公开冲突。群众压力轉化成为群众的直接行动，将以这种方式宣告政治革命在苏联的开始。

## II. 斯大林主义在“人民民主国家”里的衰落和垮台

6. 近年以来，“人民民主国家”的經濟，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和苏联是不同的。苏联的生产、生产率、实际工資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过去八年中不断地虽然是不平衡地在提高着，可是作为苏联的“堡前斜堤”的那些国家里的经济发展則矛盾甚大。这主要是由于苏联官僚机构对于这些国家进行了特殊形式的掠夺（赔偿、苏联公司、混合公司、规定片面特惠关税的商务條約等等）；这种掠夺对于“人民民主国家”的經濟是一种极大的負担，并且部分地抵消了它們在工业化方面的毫无疑问的进展。虽然在 1953 年 6 月 17 日柏林暴动之后，这种掠夺中最粗暴的形式受到抑制，但是这种掠夺政策的后果一直延續到今天，特别是在商业政策問題方面。

企图把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化計劃（重工业的絕對优先加上自給自足）应用于每一个所謂“人民民主国家”，造成了最不幸的后

果，特别是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这样的国家里。这些国家以前和世界市場紧密地結合在一起，直到朝鮮战争和帝国主义进行“封鎖”的时候，这种情况也还存在着。把“堡前斜堤”国家的經濟統一为一个整体的努力，甚或是一个共同計劃的发展，是迟延不决和顾虑多端的，而且表现了一种“完成”比較自給自足的国民經濟的思想，而不是一种为了“堡前斜堤”国家的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制定共同計劃的精神。

工人們，特别是德国人、捷克人和一部分波兰人与匈牙利人所习惯了我的較高的生活水平；有着古老传统的农民对于小块田产的更为强烈的依恋；比俄国人数更多并具有更为牢固的政治和社会傳統的城市中等阶级的存在；最后，实际上在所有这些国家里成为小資产阶级和資产阶级反对“民主”制度的主要集合点的天主教会的势力——所有这些因素从一开始就使“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比苏联社会有一种更大的不稳定性。

在这些国家里，反对党派被消灭刚刚七八年；工人們一直保持着一种工会传统，他們常常用消极抵抗、怠工、甚至直接罢工来反对工作定額的过分提高；农民田产和私人企业在“堡前斜堤”国家的农业中一直占有优势。如果把这些事实加到前述那些情况之上，那么，官僚計劃必須面对着比在苏联远为危险的紧张局势，并且甚至在遇到一部分由它自己造成的困难时也会遭到失敗，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因此，工业生产是以痙攣性的节奏发展的，有几年在某些部分表现出停滞或者甚至倒退现象。工人的实际收入在某些时期（1951 到 1952 年在波兰、1952 到 1953 年在匈牙利和东德、1953 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甚至下降了，而在許多情形下是停滞不动的。波兰和匈牙利 1955 年的生活水平不见得高于 1949 年，并且至少

对于工人來說，无疑是低于 1938 年的。在最近几年內，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水平已經有所提高，但并沒有超过 1947 年和 1936 年。东德自 1949 年以来，也有很大提高，但仍低于 1936 年的水平，特別是低于西德的水平。如果說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亚大大超过了战前水平，那一部分是以食糧供应困难为代价換来的；这种困难是所有这些曾經是欧洲谷仓的国家所共有的，这就說明了斯大林主义农业政策的完全破产。

7. 由于客观条件和苏联有很大的不同，劳动群众与当权的斯大林主义政党之間的关系以及群众与国家之間的关系，和苏联比起来，是有很大的差別和矛盾的。因此，虽然苏联共产党不能再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被看作是工人的党（第十九次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会时公布的統計数字証实，这个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官僚們組成的），但“堡前斜堤”国家中的共产党却不是这种情形。在这些共产党中，大多数先进工人仍然是积极的（特別是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保加利亚，1956 年以前的波兰和匈牙利也是如此，虽然程度差一些）。这些国家的工会仍然具有一种矛盾的性质，官僚机构把工会看作是它們自己的胳臂的伸展，工人却常常抱有能够再次利用工会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希望——这証明是正确的，特別是 1953 年 6 月 17 日在东德，在波茲南和在匈牙利。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在这些共产党里边发动派系斗争就比在苏联共产党里边更为容易，尤其是这些斗争能够在一般党员和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中間引起远为广泛的反应。由于他們的客观生活条件远不如苏联工人阶级，这些派系斗争就变成了群众行动的准备阶段。这些全盘的客观条件，以及国家和党的官僚机构相对說来远为軟弱的情况，大大地縮短了从这些派系斗争——在一切社会矛盾的压力之下——的爆发到群众政治革命开始之間的时间

距离。

此外，官僚机构离开整个社会而孤立的情况，在“人民民主国家”里比在苏联远为严重。在国外势力扶植下建立起来的官僚机构，发现自己所面对着的是仍然活跃着的自主的阶级的力量；它还能够在自己周围集结起一个广泛的工人贵族阶层；它所能支配的物质资料还非常有限；它由于 1948 年到 1953 年的一系列清洗而失去了活动能力。所以这样的机构，在由于担心群众反对而感到威胁时，除了采取公开镇压手段以外，就再没有真正的自卫办法，并且死守着“与苏联友好”（也就是屈从克里姆林宫）及“一党制的原则”，不容许有丝毫的裂痕，否则就有失去政权的危险。

这就说明了这样一个矛盾的事实：“肃清斯大林主义影响”的最初动力来自苏联，那里官僚机构的地位是比较稳固的，可是这种“肃清斯大林主义影响”却在“人民民主国家”里产生了最革命的影响，在那里它成了直接政治革命的出发点。

最后，必须注意到，民族問題在这些“堡前斜堤”国家里所表现出来的更大的严重性。这些国家里的斯大林主义政党领导人一般都被看作是为外国力量所扶植起来的傀儡。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就利用民族感情作为资本。因此，在这些国家里，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而斗争就具有非常进步和革命的意义，它和西方国家里共产党的这种斗争完全不同，因为在那，这种斗争一般是由转向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掩护的。波兰的哥穆尔卡、匈牙利的纳吉、也许明天还有东德的赫尔恩斯台特或者艾克曼，由于在群众看来是民族解放斗争的象征，正在为共产党的恢复声誉（通过党的民族倾向）创造着有利条件，并且容许在共产党反对派领导之下的政治革命动员民族感情来作为它的支持。这已经特别以一种标准的形式发生在波兰了。

8. 1948 年南斯拉夫共产党对于克里姆林宮的反抗是斯大林主义国际危机的第一阶段，也是“肃清斯大林主义影响”的远因。这种反抗一直影响着“堡前斜堤”国家和苏联之間的关系以及这些不同国家的内部发展。但是，在最近这个时期，这种影响也表现出它的极端矛盾的性质，它本身就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矛盾性质的表现——一个停止在斯大林主义和革命的馬克思主义中間的机会主义和实利主义路線上的中間派政党。

在苏联官僚机构发动“肃清斯大林主义影响”以作为在群众压力之下的一种自卫行动的过程中，苏联共产党领导迟早必須重新提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問題。轰动一时的赫魯晓夫到貝尔格萊德去的旅行；使人惊奇的鐵托的恢复名誉；荒謬地以“叛徒貝利亚的阴谋”作为产生苏南危机的原因——这些是官僚机构的新領導不能不給予斯大林威信的第一次重大的打击，可是倒过来也給它自己的威信和共产主义运动中任何官僚机构的威信以重大打击。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自己坚决认为：破裂的真正責任不在貝利亚身上，而在斯大林身上和斯大林时代苏联实行的整个政治制度上。在准备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整个严酷期間內，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又一次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起了非常进步的作用。

与此同时，“叛徒鐵托”的恢复名誉——突然比契尔文科夫、拉科西、貝魯特、烏布利希之流受到了更大的重視——甚至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前，就給斯大林时代所設想和建立起来的各共产党与各工人国家之間的相互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危机。一切共产党和一切工人国家根本平等的思想、关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陣營內部起领导作用”的那种小資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观念必須火速加以修正的思想、其他工人国家决不应重犯苏联官僚机构在苏联國內

曾經犯过的暴行和錯誤的思想——所有这些思想很快地滲入“堡前斜堤”国家里，帮助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迅速发展。赫魯曉夫报告的影响和鉄托恢复名誉的影响結合在一起——而且这两种轉变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系着的——这些傾向在各国共产党内部就起了一种非常进步和甚至在客观上是革命的作用。

但是，当上层的这些分歧越来越在党员中間引起激烈的行动，而群众本身又开始參預政治斗争时，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本身立刻就对群众的反应规模感到恐惧，从“肃清斯大林主义影响”的发动者一变而为阻止者，力图使它只限于由一群领导人員代替另一群领导人員(保加利亚)，或者甚至只由当权的领导簡單地承认一下“所犯的錯誤”(罗馬尼亞)。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堡前斜堤”国家的政治革命准备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有了变化，这种变化可以說是在鉄托第一次和第二次訪問苏联之間发生的。

南斯拉夫共产党不仅在主观上而且也在客观上成了东欧革命力量充分发展道路上的一种障碍。虽然南斯拉夫的由工人管理工厂的試驗，在一切維持着严密官僚制度的情形下，仍不失为一个进步的鼓舞力量，但是南斯拉夫国家和共产党的缺乏充分的政治民主，使正在寻求工人运动全部民主化的“堡前斜堤”国家的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感到很大失望，在波兰共产党中尤其如此。毫无疑问，由于还没有胜利的民主工人国家的榜样，革命的成熟期被推迟了；特别是在匈牙利，这使 10 月 23 日群众起义所造成的危机不能得到迅速的革命的解决。匈牙利革命的范围和大胆也使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感到畏惧，并且使它在布达佩斯的关键性的日子里采取迟疑不决的态度。

相反地，当苏联官僚机构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发动一个巨大的挽回“肃清斯大林主义影响”的运动时，当它努力譴責一切东欧共

产党的或多或少的独立趋势时，南斯拉夫共产党认为这是針對着它自己(这是很有根据的)，因而感到必須再度表明和强调反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官僚机构的立場。它猛烈攻击在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罗馬尼亞等国家重新出现的警察恐怖；它始而吞吞吐吐地(铁托在普拉的演說)，继而更为明确和更为大胆地(卡德尔在南斯拉夫国民議会上的演說)反对苏联干涉匈牙利革命；它給予波兰革命以无条件的支持；它为匈牙利提出(虽然是在事后)“一切权力属于工人委员会”的口号——所有这些在这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并且使南斯拉夫共产党所采取的立場在各国共产党内部的分化上再一次起推动思想的作用。

南斯拉夫共产党反抗斯大林主义諭旨所起的进步作用，决不是因为上述分析而又成为問題。这一作用已經載在史册。但是历史也用南斯拉夫的例子証明：一种在每天的基础上把一些暫时的“成功”湊攏在一起而制訂出来的实用主义的机会主义政策，在群众革命高潮要求作出另外一种大胆的和合乎原則的决定时，会突然变成为一种历史上的消极因素。这在朝鮮战争时得到了第一次的証明，在波兰和匈牙利革命的严酷日子里得到了第二次的証明。

9. 波兰政治革命的根源不仅在于官僚独裁的全部客观条件和克里姆林宮加于这个国家的民族压迫，而且也在于半世紀以来不断表现出来的波兰工人运动的严肃的革命传统。由于迅速地打破了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和教条(这些从来没有为波兰共产党所吸收过，因此这个党在 1938 年为斯大林所解散)的鐵鎖，波兰的政治革命再一次把自己和这种只有布尔什維主义才能与之相比的传统联系了起来。因此老一代和新一代波兰工人都有特別高的觉悟水平，这种觉悟水平使政治革命从最初阶段就凌駕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最好的理論和行动之上，其程度正如后者凌駕于真正的斯大

林主义之上一样。

共产主义觉悟曾经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得到最初的鼓舞，并且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发生的一次领导的危机(贝鲁特的死去)中得到了助力。当权的斯大林主义者所犯的特别严重的经济上的错误也助长了这种觉悟，因而迅速发生了争取党的领导地位的派系斗争，与此同时还展开恢复哥穆尔卡领导地位的斗争。

这时，思想自由和批评自由猛烈地爆发在工人组织的内部，鼓励着工人公开地表明他们的不满情绪。如果群众压力是“民主化”的原因，“民主化”就为群众把压力转变成为直接行动提供了根据。因此就发生了波兹南的罢工，这是无产阶级对于破坏工人切身利益的一种愚蠢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答复。

波兹南罢工直接提出了关于争取党的领导地位的斗争的问题。对于罢工者采取的镇压手段尤其是毁谤手段，引起了一次群众反对的风潮。斯大林主义派把罢工看作是有限度的“民主化”所造成的，并试图靠着克里姆林宫的帮助来限制工人阶级内部“过分”的政治自由。这时出现了一个左派反对派，他们决定在一切社会生活民主化的运动中坚决负起领导责任，借此和工人阶级重新接近并团结起来。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1956年8月)在这个反对派的压力之下通过了重要改革方案，但是克里姆林宫的压力却足以给波兰共产党加上一个同等的领导，它在实际上破坏了第七次全体会议的方针的实施。

从1956年8月到10月，从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到第八次全体会议，在一切工人组织中都展开了斗争，并且越来越采取激动而猛烈的形式，转化成为一种派系斗争，每一派在这个斗争中都试图动员无产阶级来支持自己。斯大林主义的右派求助于最卑

劣的反犹太人的和沙文主义的冲动，并且提出純屬政治煽动性的要求；自由主义的左派求助于工人的阶级觉悟和解放的愿望。这一派开始动员工人来反对官僚制度。

此后，群众运动达到了一个长期没有看到过的新高潮。工厂工人开始自发地要求工人管理工厂。工人和青年学生站在政治民主化和回到列宁理论上去的运动的最前列。当哥穆尔卡在 10 月初参加了左派时，它的胜利看来是必然的了。作为最后的手段，斯大林主义派向克里姆林宫求援；斯大林主义者代表团在第八次全体会议上的蛮横干涉，激起了无产阶级的总动员，他们占领了工厂，武装起自己并建立起委员会。在四天的革命热狂之后，反对派取得了党的领导地位。波兰的政治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初步胜利。

左派和哥穆尔卡的中间派联合起来推翻了波兰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这个左派经过六个月的激烈政治斗争，在无产阶级中间扎下了深根并和它发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它对于斯大林主义作了十分近似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透彻的批评；它的纲领是动员工人取得经济方面的领导地位。根据这些，我们可以把它——特别是它的先进部分，青年们——看作是波兰无产阶级现在正在形成中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领导的核心。这一派和哥穆尔卡的联合一直是不稳固的，因为中间派受到了两种互相冲突的力量的影响，一方面是群众的压力每一次都把它推向更左，另一方面是波兰官僚机构和苏联官僚机构的压力不断地把它拉回去。社会力量的对比，特别是左派的大胆和正确的策略无疑地将决定这种发展。左派是否有能力来彻底完成波兰工人阶级的列宁主义领导的任务，将决定于它是否忠实于它的纲领、是否实施这个纲领和是否与无产阶级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10. 与波兰革命得以获得初步胜利的那些条件相比，匈牙利的政治革命是在远为不利的条件下爆发的。这些不利的条件中有下列各项：

(1) 工人运动中缺乏馬克思主义的传统，共产主义运动一貫存在着弱点和內部分裂。

(2) 斯大林主义独裁政权的警察橫行的恶劣性质十分严重(拉伊克审判)。

(3) 由于在全党和工人运动内部缺少一个广泛組織起来的派系而缺少一个可以替换的领导。

这一事实使一群不完全是共产主义者的知識分子和学生——“裴多菲俱乐部”——在民主化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納吉—拉科西(格罗)派的斗争不能在党的领导机构里得到反映。

(4) 1953 年一度当权的“自由主义”分子在馬林科夫失敗之后被赶下台，因而使許多左派分子被清洗出党，并且使斯大林主义分子地位更为巩固。

(5) 缺少波茲南那样的警告信号，因而推迟了一个广大的納吉派的建立，使斯大林主义分子直到最后一刻还拒絶对群众作任何实际的让步(拉科西辞职的推迟、对于裴多菲俱乐部的干涉等等)。

(6) 斯大林主义者当面对着虽然十分强大，但仍是和平的，并且沒有越出“人民民主”范围的群众运动时，他們进行了使他們犯罪的真正罪恶性的挑衅：格罗的 10 月 22 日的演說，10 月 23 日的开枪射击，要求苏联軍队干涉。

这些不同的因素說明了为什么群众运动的高潮——这一高潮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拉科西下台，甚至到波兰革命第一阶段的胜利，一直是和波兰群众运动高潮平行发展着的——

突然变得更为激烈，并且从 1956 年 10 月 23 日起泛滥成为一种反对官僚独裁的起义性的总罢工。

匈牙利政治革命的这种更为自发的性质，使它的斗争手段和组织具有一种典型的无产阶级的形式：街头游行示威和占领工厂；军队走向人民的一边；工人普遍武装起来；在全国建立工人、士兵和学生委员会。

这样就为一个能够把全世界革命运动提到更高水平的迅速而光辉的革命胜利，集合了一切客观因素。促使克里姆林宫——在几经迟疑和一再改变政策之后——对于威胁着要扩大到所有“堡前斜堤”国家和苏联本国的匈牙利革命采取军事干涉的，主要就是这种革命胜利的危险，而不是反革命的危险。

但是，10 月 23 日的起义基本上是自发的，并且缺少一个能够迅速地把无产阶级力量统一起来、并能够领导它们迅速在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民主的独立共和国的革命领导。这就使人民中间的一切派别得以自由表现，使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得以重新出现，甚至使反革命分子也得以开始活动，从而使克里姆林宫的干涉行为有了好像是理直气壮的理由和凭空而来的借口。

站起来从官僚主义者手中夺取工厂和政权的武装革命人民，永远不会容忍自己被重新交到旧日的资本家和地主的手里。人民的强大足以阻止任何反革命的胜利。但是，他们越是缺少一个可以为他们支配的能够胜任的革命领导，过渡的混乱时期就会越延长，在这期间反动派就能够组织起来从事活动。苏联官僚机构从匈牙利撤退军队越慢，对匈牙利革命的直接干涉越积极，民族感情就会越激动和越在群众心里占首要地位。纳吉和他的伙伴渴望把这个运动的领导权重新抓到手内，就只能使他们自己适应这种群众感情的发展，并与苏联官僚机构的甚至最“开明”的派系发生公

开的冲突。

苏联对于匈牙利革命进行軍事干涉的罪行，对于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这种干涉对于匈牙利共产党本身是一个严重的挫折，这个党现在已經完全和它本国的无产阶级断絕了关系。可是，这种干涉却不能破坏匈牙利工人的坚强的战斗意志。他們仅仅是在政治革命的第一回合中失敗了。这种政治革命会从克里姆林宮造成的流血中再起，并且是不可战胜的。卡达尔政权已經被迫維持一部分 10 月 23 日的革命成果。在猛烈的消极抵抗和再接再厉的群众压力的鼓舞之下，政治革命将再度向前进軍，并将以充分而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重新在匈牙利建立起共产主义的榮譽。

11.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魯晓夫報告和波兰与匈牙利的政治革命，对于所有工人国家的共产党都有深远的影响——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內。中国在“非斯大林化”方面表现了某种迟延，这特別可以从这个国家的落后状态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必須面对的巨大客观經濟困难上得到解释。但是，“非斯大林化”一派的压力强大得足以硬要使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作出一些重要决定，特別是贊同組織派系的权利、少数人即使在多数作出決議以后仍在共产党内部有維护他們的意见的权利和甚至贊同在一个工人国家里有必要容許几个“民主”党派存在的决定。这些意见，即使在中国沒有见諸实行，但在許多共产党内部，特別在亚洲共产党内部，将引起騷动。

其后，国际规模的和甚至是中国内部的革命的与保守的两种互相矛盾的社会压力，似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部引起了严重的分歧。这个领导的一派似乎一方面对于匈牙利革命的鎮压給以公开的支持，一方面也对于官僚主义現象，沿着“非斯大林化”

的道路，作了比克里姆林宮任何一派到现在为止所作的都更为深刻的分析（毛澤东关于“整风”运动和关于人民內部“矛盾”的口头报告）；另一派似乎主張对于鎮压給以坚定的支持，并获得了暫时的胜利（毛澤东的口头报告和公开印行的文件之間有差別、鎮压浪潮等等）。中国本身所遇到的社会困难、罢工浪潮、农民反对农业集体化和学生的反抗，无疑地使这个官僚机构的大多数领导人认识到，任何“哥穆尔卡主义”的路綫都一定会在短期内引起群众的起义。

即使在官僚独裁沒有直接遭遇到群众运动的国家里，也出现了騷动（东德的哈利希集团、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和学生运动、保加利亚的清洗运动等等）。官僚机构的领导人不得不对群众作出让步，特別是經濟方面的让步，并不得不同样地答应进行民主的政治改革。虽然匈牙利事件由于迫使群众运动更順从整个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意旨而不可避免地将在这些国家里推迟群众运动的爆发，但是这些事件的长远影响将使必然要爆发的反对官僚机构的运动更为猛烈。

匈牙利革命的一个最引人注意的結果，是苏联 10 月 30 日的声明。这个声明說是要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关系，因此就默认了克里姆林宮曾經帶到各工人国家相互关系里去的民族压迫的成分。

虽然克里姆林宮对于匈牙利革命的野蛮的干涉行为，和苏联官僚机构的善意的声明是完全相反的，但是，每当“人民民主国家”想要有效地摆脱克里姆林宮的保护时，都要引用 10 月 30 日的声明来反对克里姆林宮。因此，这个声明将成为（这是苏联官僚机构所沒有想到的）一顆新的定时炸弹，会彻底破坏共产党和工人国家之間的从属关系。

匈牙利革命的直接反响，可能促使暂时在克里姆林宮占优势的派別重新对“堡前斜堤”国家采取“严厉”的态度。但是，这些国家里的群众压力一定会繼續增加。民族独立和各国共产党脱离苏联共产党而自主的激昂情緒一定会“驅散”一大部分青年和共产主义斗士。把各工人国家之間的关系、民族压迫和經濟掠夺的关系改变成为平等和兄弟般合作关系的过程是不可扭轉的。苏联官僚机构越認識到这个过程的重要性，就越不能不用給“堡前斜堤”国家以有效的經濟援助的政策来代替旧的掠夺政策，以力图至少和这些国家的官僚领导集团联合起来，不論这种联合多么不稳固。任何要回到对“堡前斜堤”国家进行罪恶压迫和經濟掠夺的旧关系上去的企图，都冒有在短期内引起反抗的危险——这是克里姆林宮不惜一切代价要避免的。

12. 《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那篇提綱，曾經把斯大林死后和苏联官僚机构发生严重危机的时期，描写为有利于重建第四国际苏联支部的条件迅速成熟的时期。波兰和匈牙利革命的經驗完全証实了这种預測。这两个国家的左派共产党人的核心，根据自己的經驗，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真正的列宁主义传统重新联系起来，自发地在綱領上采取了和第四国际相近似的立場。如果说这样的核心在苏联还没有出现，将来也是必然要形成的。通过帮助这些核心彻底澄清它們对于官僚独裁的分析和它們的政治革命的綱領，向它們指出怎样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和怎样与在克里姆林宮統治下的一切国家里存在的或正在形成的多少属于中間派的共产主义反对派的广大派別統合在一起，第四国际将試图于最短时期內在这些国家里建立起真正的支部，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組織。这将最好地保証可以在革命的烈火中鍛炼出新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領導，并保証可以把产生混乱的危险和反革命力量

在群众起义的过程中暂时取得控制权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

### III. 第四国际的政治革命綱領

波兰和匈牙利革命的发展、苏联本国政治革命的客观和主观条件的迅速成熟、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斯大林主义政党中反对派的出现以及由官僚独裁的目前危机所引起的整个国际間的爭論，使第四国际有迫切的必要提出一个更为詳尽而明确的政治革命綱領。这并不是一个关于可能引起反对官僚独裁的最初群众行动的当前的或者过渡时期的要求的問題。这样的要求一般要遵循《过渡綱領》中为苏联所规定的要求的路線，必須由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些国家现有的具体条件来加以拟定。下边草拟出来的綱領，是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革命爆发的前夕、爆发期間和爆发的次日，向已經觉醒了的和在政治上积极的群众提出来的一个綱領。这是一个在政治方面和在經濟方面建立苏維埃民主的綱領，而建立这种民主正是政治革命中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問題，如波兰和匈牙利的例子所証明的，先进工人曾經圍繞着这一問題进行过集中的討論。

这样的綱領不能再仅仅以十月革命以后最初几年的民主工人国家的經驗總結为根据。它必須同时以后来的工人阶级运动所积累的許多經驗为根据：苏联官僚国家墮落的經驗；第三国际和共产党的經驗；西班牙革命的經驗；南斯拉夫、中国、波兰和匈牙利革命的不論是正面的或反面的經驗；所謂“人民民主国家”的經驗；以及为建立一个真正的苏維埃政权而和官僚独裁政权展开斗争的无产阶级先鋒队和革命青年所提出来的那些要求（特別是 1953 年 6 月 16 日到 18 日在东柏林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全国提出来的要求；1953 年 5 月末在捷克斯洛伐克提出来的要求；1953 年下半年以后

苏联沃尔庫塔和其他强迫劳动集中营的起义提出来的要求；1956年6月波茲南罢工提出来的要求等等）。

13. 必須依据关于这个問題的經典的列寧主義理論，也就是依据苏維埃民主的原理，来检查工人国家組織。这一理論被認為是，和全体劳动群众甚至在最民主的資产阶级国家里所能享受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比起来，要扩大而不是要限制他們可能分享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維埃民主之所以是同义語；就在于：在給劳动群众以无限的政治自由的同时，能够而且必須限制或者甚至完全取消一切敌对阶级的代表的政治自由，以及所有那些目的在于推翻以取消主要生产手段私有制为基础的工人国家的人們的政治自由。

实际說來，要真正由苏維埃，即城乡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自由选举出来的委員会——既是立法机构也是行政机构，因此是民主組織的高級形式——来行使权力，那只有在有下列保障的情形下才有可能：

- (1) 在苏維埃法律范围之内和工人国家的宪法范围之內的有組織政党的自由。
- (2) 有真正的出版和集会自由，也就是，每一个有法定的最低数目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支持着的或者由苏維埃的決議案认可的党派，都有权得到會議場所、广播和电视的放送时间，和与当时的供应情况相适应的紙張和印刷場所。
- (3) 用秘密投票和提出代表各苏維埃党派的多数候选人或候选名单的方式，选举和分期重选中央立法机关的委員，和中央的、各省和地方的主要官吏；选民并能罢免那些他們願意罢免的当选人。
- (4) 一切行政人員的薪俸，特別是国家行政人員的薪俸不得

超过一个技术工人的薪俸。

(5) 用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和分期改选法官，借以保障他們对于国家行政机关的完全独立。实行充分听取发言的公开审判，法律明文规定保証每一件案子的当事人都有辯护的权利。

(6) 解散一切常設的秘密保安机关，而代之以公开的工人义勇队，必要时依靠經常在苏維埃公开监督之下的輔助机关来行使职权。

(7) 工人普遍武装起来，并在工厂和工人居住区建立自动武器的軍械庫。

第四国际所坚持的列宁主义原則是：即使在无产阶级与它的阶级敌人之間的关系上有必要使用暴力，这种暴力也必須从工人阶级内部引起各派系在工人运动中发生冲突的那些关系中排除出去，必須从革命政党的各流派、各派別和各派系的关系中排除出去。无产阶级专政的意思是按照敌人的抵抗程度对阶级敌人使用暴力。苏維埃民主的意思是在工人运动内部拒絕使用暴力，革命的党在它与工人阶级和社会其他劳动阶层的关系上，只能利用說服的办法和依靠經驗。

因为实际上在工人阶级和他們的敌人之間并沒有划出鮮明的界限，并因为各种客观条件能够使阶级敌人在工人阶级内部最保守的派系中寻求支持，所以革命先鋒队有时就必须做一种痛苦的选择：或者在工人国家里接受一种危险局势的发展，或者为了克服这种危险而使用可能严重破坏工人对于这个先鋒队和国家的信任的手段。第四国际并不想发表絕對真理或者定論，但它想說明，根据过去的經驗，极为明显的是：只要社会主义还没有确保在全世界的胜利，一个工人国家就必须永远面对着**两种危险**：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复辟和官僚主义墮落的发展。国家越軟弱，敌人所施加的压

力越强大，大多数工人就会越缺乏信任和政治主动性，而对于各部分工人阶级使用任何高压手段就会越使他们对国家失去信心并开辟通向官僚主义堕落的方便之门。因此，革命政党的任务是服从苏维埃的民主决定，即使它们犯了严重的错误；工人群众靠着经验迟早也会认识到这些错误并予以纠正。**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的原则**，作为组织工人国家的基础，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获得它的充分意义。

第四国际在拟定政治革命纲领以在工人国家里重建工人民主的同时，毫不动摇地坚持保卫一切工人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原则。它将和帝国主义为了自己反革命的利益来利用政治革命的一切努力做斗争。随着政治革命的向前发展，帝国主义会加紧这样做。这就使我们经常向群众和共产党员干部说明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一贯立场成为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

14. 苏联官僚主义的堕落证明：官僚机构的权力的根源在于它对于国家生产机器的或多或少的独断独行。因此，国家机构、指导经济的机构和革命的党之间的关系，在保证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的加强上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关系必须受下列各原则的支配：

(1) 工人国家和革命的党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一个完全不同于并且决不从属于那一个。这特别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国家机关不能——尤其是一个保安机关更不能——干涉党内各派系的讨论或斗争。这也意味着，任何由群众(或者苏维埃)选举出来的国家机关决不能由于党的决定而改变它的组成。

(2) 由党员选举党的领导人并对他们进行民主的监督，严格遵守一切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定期举行代表大会和党的会议；用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地方的、区域的和全国的领导人；有权组织派系

和甚至印刷內部派系公報；在中央機關解決重要分歧問題以前，應尽可能讓一般黨員徹底了解情況和參加討論；不得黨員所屬基層組織的同意不能對於黨員施加任何處分；等等。

(3) 對於分別組織在地方蘇維埃和工廠委員會中的國家機構和經濟機構進行民主監督。由這些機構的組織選舉並撤回這些機構的主要成員。各不同的政治派系積極參加選擇領導人和作為替換的行動綱領。

(4) 對於擔任領導活動的人不給以任何物質特權，除了非黨員的技術專家外，不能有任何例外；這些非黨員技術專家也必須受到蘇維埃基層組織的嚴格監督。

(5) 關於在黨、國家組織或經濟組織內部發生爭論的一切問題，應採取盡量提供情況和盡量公開的原則。如果無產階級想要有效地指導國家和在最短時期內取得必要的經驗以用最大的效率來治理國家，這就是一項不可缺少的條件。

15. 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社會主義經濟組織工作是一個試金石，從此可以看出社會主義民主在工人國家中是否在擴大——直到作為國家最後形式的民主制度本身消亡時為止——或者是這個國家趨向於各種官僚主義變形和出現一些能夠導致驚人的官僚主義墮落的新社會不平等。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知道：國家的官僚主義蛻化只能是世界社會主義鬥爭史中的一個過渡階段，這一階段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为一個工人國家（或者一些工人國家）缺少充分的物質基礎以及它的（或它們的）孤立。但是，在承認這一蛻化的基本原因的同時，馬克思主義者決不接受機械的無意識的宿命論，也就是說，不認為蘇聯的那種極度的蛻化是不可避免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是承認，工人國家的物質基礎越薄弱，蘇聯的那種官僚主義變形的危險

就越大，这种变形使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遭到本来可以避免的屠杀、失败和牺牲。马克思主义者了解到，革命的先锋队必须在可能的范围内，作为主观的因素来反对自发的客观力量的作用，这些力量是贫困、周围不利环境的压力、缺少文化和技术等等条件所决定的。

在这方面，必须了解**把经济职权和政治权力分开的必要性**，这样才能够严格限制官僚主义的专断，同时能够最好地保证生产力的最协调的发展。

这种权力的分配应该按照下列方案有计划地予以确定：

(1) 就国民产品分配的主要方针(投资政策，发展速度、物价和工资政策)而言，在对于各个方案进行了民主讨论之后，由中央做出决定(在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第四国际驳斥企业完全自主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神话，认为它是反民主的和反共产主义的。这种企业完全自主的结果，只能是为取得一个有几分自由的或有几分垄断的市场而展开竞争，这种竞争将带来的一切不公平(比较现代化的工厂工人将占有比较落后的企业的工人所制造出来的一部分产品，等等)，带来计划经济解体的危险。

(2) 由全体无产阶级选举出来的代表制定一个总的计划，在这个计划的体制之内，由工人委员会管理企业。这些委员会在执行这个计划期间应该控制并在必要的时候修改这个计划；委员会应该维护生产者的特定利益(工作和工资定额的具体实施、解雇和雇用、工作的安排等)。委员会应该选举厂长，并同时成为学习管理工厂的大学校，在那里将有越来越多的工人轮流学会怎样行使管理工厂的职权。

(3) 工会的监督作用主要应该是在工人委员会(主要代表生产观点)和中央计划机关面前，保卫作为具有一定文化要求的消费

者和公民的工人的利益。工会應該討論一般的工作和工資定額，和怎样在集体的定期合同范围之内把这些定額应用到工业和工厂的各部門；工会應該监督各种形式的工人社会保险而不必担负管理的責任（这是属于国家的，也就是属于地方自治組織的責任）；工会應該力求减少劳动時間，增加假日照顧工資的可能性和让工人参加各方面的文化生活，等等。工会應該和党一样，建立在严格的自願加入原則的基础之上；它們和工人委員會与苏維埃不同，在这些組織里，每一个企业的或当地的工資劳动者都当然有投票权。

对于罢工权利的有效保証，不仅是这一部分經濟权力的正式的而且同时也是它的有效的保証。

第四国际由于坚决主张把經濟权力分开是重要的，还认为：无论一个組織机构如何理想，只要工人阶级的政治民主和由越来越多的工人切实参加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沒有得到广泛推行，这个机构就只能是一个沒有內容的空架子。在計劃經濟中，关于怎样以較大的比例来分配国民收入的决定，是給一切管理机关规定一个比較严格的范围的主要因素，如果这些机关越出这个范围，整个計劃系統就会遭到破坏。只要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沒有直接或間接（通过他們自由选举出来的代表）参加作出这个决定，只要沒有由他們自己——在充分认识到了这些事实的情况下——确定他們願意为发展生产力而牺牲的限度，就不可能具体談到一种真正的和充分发展了的苏維埃民主。只要不准許各派工人提出一般的或部分的其他可取的方案以供工人自己选择，这种参加就是虛假的而不是真实的。

16. 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富裕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組織形式。当无产阶级在任何特定国家里——包括最发达的国家在內——取得政权时，现有的生产力是不足以对所有的公民，更不足以对全世

界人民保証这种富裕的。因此，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的过渡时期无论如何只会是这样一个时期，在其中，无产阶级不以这块土地上的已有財富的一种新的和更为公平的分配为满足。无产阶级必須保証大大增加財富的日常生产和在社会支配之下的生产手段的积累，以实现它的目标：組織一个保証充分和彻底滿足所有人的需要的社会，而不是按照每一个人所貢献出来的劳动来考慮給他以多大滿足。

有的工人国家还几乎沒有开始工业化；有的工人国家是在資本主义已經保証了现代工业重要发展的地方建立起来的。依据这个提綱，人們可能认为：在对于这两类国家提出来的生产問題之間，只存在着一种数量上的差別。可是，情形并不是这样，就发展社会化工业所提出来的問題而言，这两类国家之間还有性质上的差別：

(1) 从社会观点来看，在第一类国家里，工业化——即使在能得到国际社会主义經濟援助的情形之下——是在不利的环境中发展着的(大多数人口是小农业生产者)。在第二类国家里，工人国家可以指望大多数(即使不是三分之二)人民来支持它的經濟政策。

(2) 从經濟观点来看，第一类国家的工业化必須符合于双重目的：符合于工人的特殊利益(提高他們的生活和文化水平等等)，和符合于分化农民的需要(必須划能够无拘束地併入社会主义經濟的貧农阶层和能够在反对富农原始积累的斗争中保持中立的中农阶层与农民脱离)。在第二类国家里，經濟发展可以基本上致力于滿足生产者群众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同时在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內保留相当一部分国民产品以帮助工业化較差的工人国家。

第四国际不仅承认这样的原則，即工人国家不能强迫工人作

超过他們自願接受的最大限度的牺牲；而且还认为，在一个长时期內，一貫地增加积累比例的任何企图都对于劳动生产率和对于生产者的自觉遵守紀律有消极的影响，从而造成巨大的損失和浪費，以至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可以从这种积累中获得的利益。只有在各經濟部門——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和各工业部門本身的发展之間建立起協調的比例的計劃，才能获得最后成功。这样一种制度的基础必須是在提高生产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同样提高生产者的生活水平。生产者越容易估量到这种平行的进展，他們就会越积极和越热心地参加这一協調的发展。这样一种一切經濟部門協調发展的要求，从一开始就排斥任何强迫农业集体化的政策，这种政策即使不是农业生产衰落的原因，也是农业生产停滞和城市食粮供应遭到严重破坏的原因。

另一方面，这些要求是与在农民的各阶层中間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相符合的；只要这些合作社給农民带来实际的物质利益，他們不論在社会方面和在經濟方面都将准备接受这样一种生产方式。

一个孤立在某一个大陆上的工人国家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建設社会主义經濟，这种情况是有的并且在将来也可能发生。但是，一切經驗証明，国际劳动分工和工人国家之間在平等基础之上的互相援助是促成和刺激經濟高涨的一个因素。这一因素在任何情况下，对于赶上和超过最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所达到的生产水平都是不可缺少的。这是社会主义經濟最后战胜資本主义經濟的唯一根据。在一个国家里边或者在少数国家里边完成一种自給自足的社会主义經濟建設，这种想法必須被当作一种反动的神話来反对。

## 17. 苏維埃民主是蛻化了的工人国家中的政治革命和資本主

义国家中的社会革命的目标。沒有艺术創作、科学工作和一切人类文化活动的自由发展，这一目标是不可想像的。这样一种发展越来越証明是充分和全面利用革命交給新社会支配的技术力量和生产創造力量的巨大潜力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这样一种自由发展并不意味着党和革命的先鋒队不表示它們自己对于可能在理論方面发生的許多爭論的意见。它的意思是：

(1) 革命的党通过有利于馬克思主义和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綱領的宣传与說服来从事战斗行动；它要求有最广泛的可能来进行关于这些綱領的教育，而不必由国家强迫教师团体或者青年团体采納或專門提出这些綱領。

(2) 对于任何不是革命先鋒队所认为进步的或最进步的科学、艺术或者文化流派，都不能进行鎮压或予以行政制裁，也不能妨碍它們的生产和創作活动。

(3) 国家不能以物质利益的形式，或者用分配特权地位的方法，对于科学、艺术或文化活动領域內的任何流派給以正式的贊許——这些領域对于完全应用自我管理的原則是最成熟的。

(4) 党在选定优先的社会、經濟或文化目标(例如住房問題的解决优先于城市审美者的需要)，和必須从理論方面(在制定长远計劃方面)維护属于这些目标的正确原則——即使不能立刻实行这些原則——之間，必須划出明显的界綫。

如不彻底消除今天妨碍多数公民享受物质和精神的文明之賜的一切障碍，苏維埃民主同样是不可想像的。苏維埃民主必須完全保証人民免費受到各級教育，严格依据个人的能力来录用人員；必須沒有社会歧視地保証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受到免費医疗；必須保証青年充分地和自主地參加政治生活。苏維埃民主必須完全实行“同工同酬”的原則，极力鼓励妇女从几千年的压迫中解放出

来，同时允許她們按照生理上的特点来选择职业；必須按照十月革命的精神修改婚姻法，规定离婚和自願生育的权利（自由使用避孕方法和有堕胎的权利）、儿童的权利、学校的自治，在所有这些方面必須絕對实现男女平等，彻底消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压迫。

18. 苏联官僚机构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下篡夺了政权；反对官僚机构的政治革命将在以所有国家完全平等为基础的真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之下获得胜利。官僚机构以它的野蛮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狭隘的小资产阶级偏见伤害了各工人国家之間的关系，同样也伤害了苏联內部各民族之間的关系。

斯大林主义者认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服从于克里姆林宮官僚机构的利益，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标准；第四国际譴責这种想法。第四国际也反对中間派的反列宁主义的綱領，根据这个綱領，要对一个强大的压迫国家的沙文主义和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作同样的譴責。第四国际一方面到处高举国际团结的旗帜，一方面在非常反动的大俄罗斯（和大汉族）沙文主义和受到苏联官僚机构压迫的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之間划出明显的界綫。这种民族主义常常不过是群众反对他們所受的民族压迫的一种正当反抗的变形，决不会改变他們为解放而斗争的客观进步性质。

因此，第四国际提出独立自主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馬尼亞、保加利亚、乌克兰、乔治亚、立陶宛、拉脫維亚和爱沙尼亞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口号，同时主张所有这些工人国家在严格平等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或几个工人国家的民主联邦。

一个民主的工人国家将以彻底尊重一切民族文化特点的精神来教育工人和青年，并保証这些民族得到充分发展。它将坚持不懈地和任何沙文主义的表现、民族的或种族的仇恨、反犹太主义等

等作斗争，将在可能的情形下努力增强各工人国家工人的团结，并使他们关心和自觉地参加全世界每一国家的斗争。

任何使国际革命的利益服从于保卫一个工人国家的民族主义倾向——尽管这个国家是重要的和进步的——都永远是官僚主义变形的明显标志。

19. 第四国际以看待一个革命的党的同样的精神来看待工人国际的问题。一个包括一个或几个在工人国家里掌握政权的党的国际，不能把政策“强加给”这些国家的人民或政府，正如一个革命的党不能把政策“强加给”组织在苏维埃里的工人一样。一个革命的党只能加强它提交给工人决定的那些论点的说服力和威信——即使这样做，也只能是在这样的范围内，即经验已经向工人证明，这个党一贯地维护无产阶级的集体利益，使这些利益不受特殊的或民族主义的损害。

一个抱有这种精神的革命国际，不但远不能因为无产阶级在一个或几个国家里取得政权而成为过时的或失去其重要性，而且将始终是解决建设世界共产主义所提出来的任务的一个绝对不可缺少的工具。这些任务是：

(1) 除去一个或几个工人国家必须运用的不可缺少的外交策略以外，这个国际要协调一切革命政党——包括已经取得政权的党在内——的斗争，以便在最短时期内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

(2) 在革命胜利之后，这个国际将尽一切力量调整和鼓励最妥善的国际经济计划，借以增进工人国家结成联邦或邦联的实际可能性。

(3) 直到世界共产主义实现为止，这个国际将是在不断革命过程中协调和鼓励工人国家革命先锋队一切活动的一个工具。这一点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在这方面必须有全面的理论总结，而

这不是根据片断的国家經驗所能完成的。

即使許多共产主义战士从共产国际和以后从斯大林主义时代的共产党情报局那里得到了痛苦的經驗，因而他們对于一个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之上的国际的想法感到厌倦，这种厌倦也是完全沒有根据的；对这种傾向让步，就是放弃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共产主义的世界危机并不是由于共产国际的蛻化而开始的。官僚机构首先是在一个党，俄国的党里破坏了民主，因而离开列宁主义的道路。国际越有力量，越是不受一个或者少数几个特別占优势的支部的影响，就越容易对一个党或一个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化进行斗争，把国际工人运动的最健康部分的全部压力轉移到最受威胁的国家里去。

因此，我們必須反对“多中心”的国际組織的想法和各共产党之間具有純粹“双边”关系的想法。这种机会主义理論的目的完全不是保証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而是保护本国官僚机构以免它受到国际革命的影响。

#### IV. 斯大林主义在資本主义国家里的衰落和垮台

20. 共产党危机起源于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願望和苏联官僚机构所要强加給他們的作为苏联外交政策工具的任务之間的矛盾。这种危机由于两个原因已經在过去几年之内加深。一方面，全世界革命高潮的发展已經使几个共产党面临着革命前的（或者革命的）形势，并且已經引起党内战士对領導的机会主义路綫表示不滿。在某些情形下，如在阿尔及利亚，工人或群众革命运动的压力已經如此强大，以至迫使斯大林主义的领导离开原来站在反革命方面的立場，做了一个重要的向左轉。

另一方面，在苏联本国和在“人民民主国家”的官僚机构危机

的爆发，对于一切資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危机都是一个强有力 的刺激。这种危机在斯大林死后立刻爆发，由于鉄托的引人注意的 恢复名誉而更为加剧。它随着苏联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达到第一次 爆发点，这不过是为了很快地随着波兰和匈牙利革命而达到第二 次爆发点和一个真正的决裂。說今天的共产党已經分成为两派并不 算是夸张；有些共产党（波兰、南斯拉夫、挪威和美国共产党，意 大利、比利时和瑞典共产党的一部分，以及英国、澳大利亚和巴西 共产党党內有强烈的反对派，等等）譴責第一次苏联对匈牙利的 干涉，并对于第二次干涉（即使不是譴責）表示遺憾，宣布它們和波 兰革命是一致的。另外一些共产党（苏联、捷克、东德、罗馬尼亞、 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亞和法国共产党）則卑順地宣布和克里姆林 宮的方針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大多数亚洲共产党跟随着它）似 乎在这两派当中占一个中間地位。它逐渐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一个仲裁人的地位发展，同时和克里姆林宮共同努力，以图限制 “非斯大林主义化”对于国际斯大林主义运动的分裂作用。

这种惊人发展的起因是明显的：在波兰和匈牙利革命当中，现 在促成斯大林主义危机的两个派別——客观的革命派和主观的 “非斯大林主义化”派——聚合到了一起。此外，在匈牙利，苏联官 僚机构自西班牙内战以来第一次被迫担任一个公开反革命的角色——也就是說，它自己对群众革命高潮进行了大规模的鎮压（1953年在德国的规模要小得多）。虽然在世界的某些部分，匈牙利 事件与不利于群众革命高潮的客观形势相符合，但对于殖民地和 半殖民地国家來說，情形却并不是如此，对于这些国家，匈牙利事 件可以作为它們自己斗争中的一个直接教訓和鼓舞。因此，“正統 派”的斯大林主义者的立場在这些国家里边就变得更站不住脚了。

## 21. 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一切資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这些共

产党内部危机的一般特点，可以归纳如下：

(1) 斯大林死去以后，特别是在赫鲁晓夫揭露以后，斯大林主义思想的根本基础——也就是相信领袖，相信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永远不会犯错误——已经受到了一种致命的打击。所有共产主义的根本问题都再一次被提出来讨论。自此之后，每当在一个重要问题上，苏联政府的行动似乎与一部分或整个的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战士就会公开地对于这些行动的正确性发生疑问。

(2) 信任乃是服从的基础，丧失信任就要引起一种真正的反抗，反对官僚主义共产党领导的严厉制度，反对没有言论自由，反对官僚机构的专制和它用以在共产党上层维持统治的反民主方式。有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真正地而不是形式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在召开代表大会以前在党的公开组织里进行真正的讨论；定期召开代表大会；用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领导人；有权在党内组织派系，或者至少——如中国共产党的新党章已经规定的——少数人即使在大会上失败之后仍有权保留他们的意见。

(3) 因为除了少数情形外，斯大林主义领导者不肯对于一般党员的民主压力作出让步，或者只肯作出部分的让步（为了保持他们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所以一般党员的先锋队都按照他们自己的党的官僚主义气氛的多少，建立或多或少的公开的或秘密的派系，以便根据一定的纲领强迫实现政治活动的民主化和改正过去的情况。现在正随着公开或秘密讨论在党内的发展，对于这些纲领作多方面的研究和比较。

(4) 这些派系和反对集团不可避免地要根据赫鲁晓夫报告所揭发的那些经验来修正它们和苏联的关系，并分析苏联社会与苏联国家（或者如南斯拉夫和波兰共产党那样，更普遍地分析从资本

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所提出来的一切問題)。“俄国問題”(如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曾經在一整个时期內討論过的)现在正在共产党的整个一个派別中爆发出来。

(5) 这些起来反对得到滿足的保守主义和当权的官僚机构的愚昧的反对派系,不久就发现它們的綱領不仅要包括苏联問題,而且要包括一切共产主义理論問題: 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对于现代資本主义的分析,对于殖民地革命的态度,工人委員会問題,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問題,“国际”問題等等。

22. 經驗証明: 在共产党內部形成的反对派系,根据它們对于这些具有直接重要意义的和关于理論的各种問題所采取的态度,可以分为两类: 右翼反对派和左翼反对派。

右翼反对派是許多重要共产党长时期以来(甚至最近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必然結果,但是这种机会主义在它和資本主义世界的关系上失去了主要制动器——斯大林主义的党必須无条件服从苏联官僚机构所造成的制动器。这些派別(法国的埃尔維、意大利的吉奧里蒂、美国共产党的盖茨派等)把赫魯晓夫的关于通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用和平和議会方式在資本主义国家里(包括最强大的資本主义国家在內)取得政权、与社会民主党人保持紧密接触等等說法当作真話。它們正在迅速地向“社会民主党化”发展,并且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从“和平”的观点,或者甚至更鄙俗地从他們偶然生在那个地方的“国家”(帝国主义資产阶级的国家!)的观点, 来怀疑殖民地革命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 左翼反对派起来反对赫魯晓夫关于斯大林主义現象的許多矛盾解釋和他們自己的党的根本是机会主义(时常和幼稚的宗派主义結合在一起)的政策。这一派責备共产党領導沒能

利用許多有利机会来鼓励群众运动，或把它导向胜利，沒能真正在本国的工人运动中扎下根基。这一派不是要和这个国家的帝国主义資产阶级“和平共处”，而是要和它做更激烈的和更有效的斗争。法国共产党的“馬尔提”派、奥地利和巴西共产党的反对集团、意大利共产党的各反对集团都是这一派的代表。

只要这些派別在共产党內部表示它們的意见，或者为有权公开表示意见而斗争，那末，在共产党內实行一种特有的参加进去的政策的第四国际各支部，以及这些支部所领导或者与这些支部合作的同情者，将主张共产党內部的一切派別在領導机构內有发言权和民主的代表权。在受几十年官僚主义箝制之后，下层共产主义战士的濒于危殆的心理状态，在它能够重新获得能力以在政治生活中找到自己的方向以前，需要对于各种意见作长时期的思索、討論和爭論。左派对于各派系的互相自由爭論是沒有什么顾虑的，因为这将有助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先鋒队在这些国家里的形成。而且，既已把組織派系的权利当作一个主要要求提出来，就不能再否认抱有不同政见的派系也具有这种权利。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托洛茨基主义者将站在斗争的前列，**为一切党员(无例外地)爭取共产党内部的民主**，同时号召最先进的分子組成一个左翼反对派。

**23. 在西欧国家(法国和意大利)的党员众多的共产党里边，**正在討論中的“非斯大林主义化”問題，由于这些党的官僚主义领导显然不能利用各种有利于党的发展的革命前的和革命的形势而更为严重。但是，与此同时，在这些国家现有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更大的破产(在法国是阿尔及利亚战争、对苏伊士运河問題的冒险，在意大利是和天主教民主党合作)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仍能控制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尤其是斗志最旺盛的部分。不过，在意大利，南尼的社会党的比較靠左的路綫对共产党进行了激烈的竞

爭。为此，最健全的和最左的派系将留在共产党内部；趋向于“右翼共产主义”的被逐出的集团将迅速堕落为右翼中間派或者甚至左派社会民主党。匈牙利与波兰革命的发展，和波兰与南斯拉夫共产党所作的在思想上影响其他共产党的努力，也有同样的效果。这并不是說，我們第四国际的各支部，作为原則問題，應該不屑于去在这些組織里进行工作，特別是当它們在工人阶级的各部分中拥有多數人和发生影响的时候；但是这一工作要繼續服从为我們所特有的参加进去的总策略，这一策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證明是在这些国家里建立真正革命政党唯一有效的策略。

对于西欧較小的斯大林主义党（德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瑞士、奥地利、斯堪的納維亚等国家的共产党）却不能一概而論。在这些国家里，斯大林主义的危机不仅是由“非斯大林主义化”和波兰与匈牙利革命的一般反响所促成的，而且也是由共产党对于群众影响的可悲的降低、几乎完全孤立于有組織的工人运动之外和不能——尽管时时交替地采取宗派主义的和右傾机会主义的策略——“和社会民主黨員和解”等等原因所促成的。这些共产党的右翼共产主义派特別喜欢投降，并且甚至常常提出等于完全解散共产党的建議。左翼共产主义派，在它們还没有因为对群众运动采取彻底的宗派主义而失去作用时，不久会采取与我們的行动很相近的策略。我們一方面建議这些分子繼續在共产党内部为列寧主义路綫的胜利而斗争，另一方面，作为右傾政策的代替，我們必須向他們提出，在第四国际各支部的統轄下，根据一个革命的綱領，在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工会内部进行工作的方向。这一工作的目标并不是要他們适应改良主义领导人的机会主义，而是要在最短时期內减少这些领导人对于最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人阶级的影响，并帮助以后建立一些新的群众的革命政党。根据这样一种綱

領（各支部在这項工作中所得到的积极結果使这个綱領受到了重視），我們就可以用我們的行动把共产党反对派分子爭取过来。

在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國家的共产党里边，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强加給这些党的領導人的右傾机会主义路線更特別助长了斯大林主义的危机。这一路線就是直接地和卑屈地服从于和苏联官僚机构联合起来的或为官僚机构所“中立化”了的殖民地資产阶级的利益。在普遍的“非斯大林主义化”的气氛中，这一路線可能造成强有力地左派在这些党內的发展。但是群众革命运动的压力实际上也能使这些党的領導，或者其中的一部分，拟定一个轉向革命的方針，并在一个独立自主的左派誕生以前就压制住它在党內的发展。

不論資本主义国家里各共产党內部的斯大林主义危机在下一阶段采取什么形式，正在“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发展着的革命运动已經預示出它的最后結局：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思想流派的斯大林主义的消失，现在的一部分干部和共产党战士回到社会民主党（或者类似的中間派或右翼組織）里边去，和大多数具有信念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最健全的部分将在危机中出現的新的革命政党中重新聚合起来。

## V. 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一个阶段的苏联 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治革命

24. 苏联和所謂“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治革命的本身是不断革命的一个过程。这个政治革命的爆发是由于劳动群众对于官僚机构怀有积怨，它将按照本身的邏輯，从一个全国各阶层参加的民众革命向越来越快的社会分化发展，其結果只能是最无产阶级化的和最有觉悟的一派获得胜利。这一派由于主张和完成把一切权力

集中在民主选举出来的工人和貧农委員会手里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可是，不断革命的性质并不停止在工人委員会的取得政权上。相反地，取得政权将为一个特別丰富的革命时期开辟道路。在这一时期里，由于大胆精神和創造力量在革命的刺激之下达到了最高的表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将受到无情的批判和修正，以便到处产生与社会的物质結構相适应的直接民主、平等和團結的最高形式。这个社会物质結構，由于生产力(这个生产力最后将从官僚机构的保护下解放出来)的巨大发展和革命向着国际間扩张，将迅速地扩大，而这种扩大本身将成为不断革命的目的。不断革命的这一阶段将越来越有意識地企图达到下列的伟大目标：苏維埃民主在代表人类的三分之一和地球的四分之一以上的一切工人国家里的胜利。

25. 但是，在官僚主义蛻化的或变了形的工人国家里的政治革命，不仅是以本身动力为依据的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而且也是不断革命的世界动力的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主要組成部分。政治革命在几个现有的工人国家里边的胜利不能回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根本形式上去，这在事实上是不能想像的。这些国家不但远沒有什么需要維护的特殊利益使它們不得不繼續努力把国际工人运动置于保护性的控制之下，而且它們还会尽可能帮助和鼓励資本主义国家工人和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

而且，无论是在客观上或者在主观上，国际工人阶级运动还将从苏維埃民主在苏联的重建上得到一种只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与之相比的鼓舞。完全以官僚机构的罪恶为目标的資产阶级宣传和它的社会民主党僕从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影响一定会消灭。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里的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将很快地成为可能）一定会增加这些国家对于資本主义世界人民的吸引力。最

后的资本主义强国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不久就会在一个到处是它的敌人的世界上被孤立起来，而全世界的大多数工人不久一定会站到工人国家和殖民地革命这一边来。其中大部分国家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重新加强，无疑地会把在短时期内夺取政权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革命在全世界的具体发展，使中国和殖民地的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主要动力。这一革命高潮在到达苏联和为苏联官僚机构所统治着的国家里时，使反对这个官僚机构的政治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第二个强大的动力。在这些国家里，革命将发现自己面对着的是千百万有能力的和有高度教养的工人，他们今天能够以德国或法国工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后同样觉悟，来解决人类的社会主义改造所提出来的問題。政治革命在苏联胜利的具体前景是，无产阶级在世界上第二个最强大的工业国家里直接掌握政权。而这只不过是世界革命最后胜利的一个序曲。

# 七、第四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 大会文件

(1961年1月)

## 1. 宣言

### 全世界的劳动群众：

殖民地革命的广度和深度，工人国家朝气蓬勃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本身不断发生的矛盾，正在加深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并为建設社会主义社会开辟空前广阔的前途。

科学的发明，应用原子能方面的巨大进展，以及探索空间方面的惊人成就，証明人类拥有使自己摆脱匱乏和貧穷的难以估計的可能性。同样地，千百万男女动员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制度的斗争，以及群众建設新經濟的創造性精神的发揚，証明人类可以依靠这种巨大的主观可能性来利用一切創造性力量，剥夺掉帝国主义的破坏能力，建設一个迄今无人怀疑的能够繼續发展成长的和諧的社会。

人类的經濟和社会矛盾的表面化，其规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广闊，动员起来的力量沒有像现在这么大。从阿尔及利亚到南非，从古巴到阿根廷，从土耳其到印尼和日本，各个地方的群众都卷入这場斗争里，甚至迄今被认为是最落后的、最少受时局影响的人也不例外。在短短几年甚至几个月內，这些群众克服了分散状态，历史上的落后状态和社会与政治組織的落后形式，并由于他們闖入世界舞台而提出了人类爭取发展的最先进和最适时的任务。

帝国主义的强大的軍事和政治工具——另一方面則为苏联官

僚机构的强大的軍事和政治工具——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面前正在逐渐失去它的支配力和主动性。威胁着爆发世界冲突的危险点在于以古巴的农民或刚果的半部落制居民或者是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的最受压迫剥削的群众为基础的暴动。

工人国家动员起来的庞大人力和他們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巨大发展，在另一方面也碰到这样的事实，即帝国主义现在还保持着經濟和軍事力量，而且几年来社会也比较安定。正是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所动员起来的这些巨大的力量和帝国主义为保卫它的制度而集中起来的旧的力量之間所表现的矛盾冲突，它的规模和潜力，同时它所具有的創造力和破坏力，都是人类前所未见的。

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力量的結合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已压倒了老斯大林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或資产阶级和小資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者，他們必須不斷使自己适应为他們所不能控制的新形势或調整他們的策略。中苏的矛盾；“民族主义”领导者所受到的深刻的歪曲；以及他們中間所发生的质的变化(如古巴的情形)；共产党和一些社会民主党的危机的新发展；——所有这一切表明这些老的领导者已落在这个革命的新生力量的后面。

工人国家和殖民地革命之間日益发展的联盟以及他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正在推动着这历史的进程，它要求有新的領導。根据欧洲无产阶级(如比利时罢工所表现出来的)投入这場斗争，并在帝国主义的心脏打击帝国主义势力所能达到的程度，形势的动力因素将会使世界革命向前跃进并且取得更加深刻得多的发展。

革命已进入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整个說来是不可改变的，帝国主义或官僚主义领导机构用尽它的一切力量也不能加以改变，相反地，官僚主义领导机构在国内的地位已經动摇并且日

趋崩溃。

在帝国主义的虎口下取得胜利的古巴革命，推翻了资本主义，建立了一个新型的和具有特别根源的工人国家，它显示了革命的不可抗拒的力量，革命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动力，这种力量已克服了对于它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的一切限制，克服了斯大林主义的反抗，战胜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的领导的一切旧的倾向和观念。与旧的领导不同，正是今天这个革命向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其他大陆的人民指出了群众革命行动的道路和可能性。

阿尔及利亚群众的伟大示威运动打击了法国帝国主义的一切计划，它同时给予阿尔及利亚革命新的动力和新的范围，为新的思想发展与政治发展开辟了道路。

刚果的危机在经过几个月之后所表明的事实，虽然有着极不相同的情况和形式，然而可以同玻利维亚几年来的革命所表明的事实比较起来看：它们都缺乏一股具有足够的明确性和力量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来解决局势的潮流，同时，帝国主义也没有能力在这些国家重新建立起帝国主义的统治。

比利时的罢工，和英国工党左翼过去取得的进展与政治成就一样，表明了欧洲无产阶级尽管遭到挫折和局部的失败，仍然保持着革命的精力，同时也表明了帝国主义政权所享有的稳定性缺乏巩固的基础。

整个形势以及工人阶级国家本身所取得的成就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压力，正使工人阶级国家和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的领导机构陷于窘境。

- 官僚主义行政机构和一党独揽的方法与斯大林主义的方法越来越明显地同发展中的经济和社会发生冲突，这个社会拥有从事深入的创造性工作的无产阶级、农民群众、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

中国人和苏联官僚主义机构在观点上的分歧，表现了在殖民地革命发展和国内发展的新阶段的压力之下分化的因素。八一党会議企图在一个新的水平上稳定共产党的思想，在保持与资本主义和解的观点的同时，也保持在殖民地革命压力之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思想，这个企图只不过是一种妥协，是不能持久的。它也表明了斯大林主义在现阶段沒有能力使自己适应世界領導的新的要求。

苏共中央委員會的討論和法共及其他共产党內部的危机是一種迹象。赫魯曉夫通过中級领导干部对全党发生的直接呼吁，同时坦白承认官僚机器不是以适应經濟发展的新的需要，这个新的企图也間接地表现了群众关心并逐渐过問經濟管理問題。

工人阶级国家并没有分成哪些是比较有朝气的，哪些是比较保守的，但是越来越同官僚主义上层建筑发生抵触，这种官僚主义上层建筑在苏联更加强固，但是它们正以更有朝气和充满革命可能性的方式繼續在各地发展。

在革命发展中的这条新道路危害着旧的领导并加速它的危机，而继续为发展新的领导提供客观因素。

新的革命形势繼續勇往直前，一般說来，是按照其发动和采取的形式，伴随着一般与旧的方針和领导无关的青年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而来的，他們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之下，倾向于向前推进。

古巴的革命已逐渐克服了对它的领导的阶级限制和克服了旧的领导的反抗，并把它的任务发展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土耳其和南朝鲜的暴动；阿尔及利亚大城市群众的騷动；南非群众的行动；比利时群众的斗争，为爭取改变制度的成熟局势开辟了道路；拉丁美洲群众几年来脱离了他們的旧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所坚持的行动——所有这一切为建立新的领导打下了客观和主观

的基础。

第四国际坚持和发展了现阶段的革命綱領，即全世界人民群众爭取社会主义的革命动员的綱領，它必須越来越发揮作用以建立这种新的領導来領導这新阶段的革命。

这条革命的道路正在发展着难以計数的力量，除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預言和綱領之外，它客观地超乎任何預见和綱領。參加第四国际各党虽然小，但是它們能够在世界上許多地方領導或參加领导革命运动。要建立这种新的革命領導，要求革命的馬克思主  
义先鋒队采取比过去更大胆和积极的行动，因为旧的領導正在施加各种压力以維持他們的統治，他們并且力图引导、轉移和阻止新的发展和加入斗争的新阶层。

殖民地革命和工人阶级国家建立联盟的問題(正如古巴革命所表明的，它开辟了很大的和生气勃勃的可能性)，殖民地革命中的工农联盟問題，游击战争在发展和集中革命力量方面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都要求采用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以外的方法，为革命馬克思主  
义的創造精神和主动性打开道路。群众在几个月內就获得了成熟的經驗，——在其他时期，这也許需要几年或几十年的时间。根据革命发展的新道路，在今后几十年內必須加以解决的任务是：发展、指导和集中最庞大和最生气勃勃的力量来推动人类建設社会主义社会并建立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領導。

### 全世界的青年們！

在殖民地革命中，在工人阶级国家里，在帝国主义国家里，这种革命的发展，是同能够擺脫旧的領導的传统、能够以最大的勇气和最快的速度学习和行动的新阶层投入这場斗争相联系的。在青年人投入斗争的地方，他們就以他們的干預行动和开展消灭殖民主义、爭取社会主义和打破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控制的斗争，

为群众开辟一条新的途径。

### **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們！**

在这喚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大革命中，千百万妇女正在激烈斗争中爭取实现完全解放的权利。从南非到阿尔及利亚、从拉丁美洲到亚洲，她們正在粉碎着社会套在她們身上的鎖鏈，这个社会不仅是建立在人剥削人的基础上，而且基本上是建立在对妇女进行絕對压迫的基础上，把妇女置于完全下賤的地位。在中国，妇女参加革命是建設新社会的重要基础之一。在資本主义国家里，参加无产阶级斗争（如比利时大罢工）或参加反对殖民战争的斗争（如法国）的妇女人数正在不断增长。

在反对剥削社会的斗争中，妇女必須在工人运动和反帝运动的领导机构中和在为世界革命的发展所需要的建立新的革命领导机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者們！**

資本主义阻碍了发展的可能性和提高人类生活条件的可能性。赶走帝国主义，打倒資本主义！正如在古巴一样，必須改造革命，执行社会主义任务，剥夺資本家的财产，把一切經濟資源和人力都用来为有計劃的经济发展和更大的幸福服务。

### **古巴的劳动者們！**

拉丁美洲的群众，其他工人国家的群众，殖民地国家的群众，以及各国的托洛茨基主义先鋒队都尽他們的一切力量在保卫着你們的工人国家，你們的国家是在你們的革命的特殊条件下誕生的，它正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你們的革命被认为是其他国家应当遵循的道路。有信心地发展你們的斗争。发揚工人阶级的民主，通过工人和农民的权力机关由工人和农民直接执政，这个步驟加上其他已經采取的步驟，将給予古巴革命的胜利以力量来推行为

全体群众服务的綱領。

**北美洲的工人們！**

人类是否将为一場毁灭性的战争所吞噬，其他国家人民所采取的前进步驟是否将遭到北美帝国主义武装行动的阻拦，这在很大的程度上要依靠你們。支持其他国家人民的革命胜利，支持他們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的权利，保卫古巴的革命，反对任何反革命干涉的企图！为了你們自己的前途，阻止你們的政府准备战争机器，反对原子战争！

**苏联、人民中国和其他工人国家的劳动者們！**

你們的成功的榜样已为人类的新的地区打开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官僚主义警察政权限制了你們的发展，也限制了注视着你們的榜样的其他国家人民的发展，只有粉碎官僚阶层和警察机器的压迫，重新打开走向苏維埃民主的道路，才能使建設社会主义的斗争取得胜利！

**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們！**

你們的斗争对于消灭殖民主义、消除阿尔及利亚的残酷战争、消除非洲、亚洲和其他大陆广大地区的压迫，将有决定性的作用。学习日本和比利时群众的榜样：为打倒你們本国的资本主义政权而斗争、处在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的发展形势中，你們的普遍斗争能够基本上削弱帝国主义，而給予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以极大的鼓舞。

**世界革命万岁！**

**第四国际万岁！**

## 2. 世界形势和我們的任务

在殖民地革命的高潮和工人国家經濟与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压力之下，世界力量的对比繼續发生不利于世界帝国主义的迅速恶化。1960年标志着这个恶化过程的新阶段的开始，其重要意义只有1950年的情况可以与之相比，当时美国帝国主义在朝鮮和中国革命力量的手中遭到了第一次軍事上的失敗。

苏联在导弹方面所贏得的軍事优势；在美国老家的边界上的古巴革命的非凡进展以及它与工人国家日益紧密的联盟；南朝鮮和土耳其的暴动；美国帝国主义在日本的丢脸，殖民地革命在非洲的扩展；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日益增长的反資本主義傾向，它已在接受工人国家的援助，并且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1960年12月的示威中，阿尔及利亚城市群众已走上街头投入革命的斗争；古巴革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迅速扩大，它加强了群众的不断增长的战斗性和工人与貧苦农民的革命願望；——这一切就是对于帝国主义來說最近世界形势恶化的显著特点。在最近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帝国主义集团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在若干問題上第一次处于少数派的地位，只不过是象征地反映了这种总的趨勢。

自从“最高級會議”失敗以来，在我們面前已打开了一个扩大世界革命的新阶段。在东南亚，在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力量正在波浪壯闊地发展着。

应当預計到所有这些地区会有新的进展，这些进展将会进一步改变力量的对比，有利于革命力量而不利于帝国主义。后者从来还没有經受过日益增长的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之間事實上的

統一戰線的压力。

在下面的短決議中，对于这个趋势的規模和范围，以及对于帝国主义、苏联官僚机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和宗主国的人民的反应，都作了估計，并且从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得出关于經濟、政治和社会的近景的看法。在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殖民地革命、关于經濟前景、关于欧洲和关于自苏共二十大以来的斯大林主义的危机等文件中，对今日世界的根本趋势另外作了更深刻的分析，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 一、殖民地革命的新阶段

最近的时局在双重的意义上标志了殖民地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的地理范围扩大了，社会主义深刻化了。随着比利时殖民主义者在刚果的直接統治的結束，帝国主义在黑非洲的脊骨已經被打斷了，这个大陆第一次被逐漸地吸收到殖民地革命的过程中来了。古巴革命朝着几乎完全消灭資本主义私有制的方向迅速发展。这个革命是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第一次导致了一个工人国家在拉丁美洲的誕生，同时也是自从 1917 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不是斯大林主义勢力也不是多少受斯大林主义影响的勢力所領導的工人和农民建立起了一个工人国家。这个决定性的轉变，其长期效果将是巨大的。

古巴革命的胜利开辟了殖民地革命的领导权轉入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力量的手中的时期。它超过中国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日益增长的影响，超过几內亚的日益增长的反資本主义的演变，也超过阿尔及利亚反对資本主义的革命可能性。群众将会越来越明确地認識到摆在他們面前的两条道路：或者是让反帝运动的领导权仍然掌握在不能够同資本主义断絕关系的资产阶级或

小資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手中，其結果是不能实现殖民地革命的基本目标；或者是像古巴那样，同資本主义坚决一刀两断，而使历史性的迅速进展成为可能。

在非洲、阿拉伯世界和拉丁美洲可以感受到上述这些进步发展所产生的最强烈的影响。阿尔及利亚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間日益紧密的联盟（即使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陣綫內部的某部分力量的意图不过是作为一种要挾美帝国主义的手段），将加强阿尔及利亚群众中左的傾向，而使任何想用“布尔吉巴主义的”妥協来解决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办法几乎成为不可能，在一旦法帝国主义在阿尔及利亚或其大部分地区遭到政治上的失敗和实行軍事上的撤退的时候，它将会为把革命扩展到摩洛哥和突尼斯开辟很大的可能性。从 12 月 11 日开始在阿尔及利亚的城市爆发的激烈的群众示威，回教选民中的弃权派在戴高乐玩弄的公民投票的詭計中的胜利，以及在这以后这种不平常的战争气氛的繼續——这些都是革命力量强大和帝国主义将从阿尔及利亚退却的迹象。它进一步削弱了企图达成虚假的“妥協”的打算，并使北非洲的一切“溫和”派势力（实际上是亲資产阶级的势力）有所恐惧。阿尔及利亚群众的革命运动經常超出法帝国主义政治計劃之外。今天它威胁着从后方来削弱帝国主义联盟在地中海的整个軍事計劃。

世界帝国主义沒有能力重新控制刚果，以及它在当地的同盟者的日趋分裂和惊慌失措，而拥护卢蒙巴（他得到加納、埃及和其他非洲领导者的支持）的民族主义力量的控制和影响正逐渐扩及全国，这对于瓦解中非联盟和加速南非火药桶的爆炸是一个鼓舞力量。正如馬里的例子已經表明的，来自北方和南方的这些革命势力已使法国——非洲共同体的假“独立”的国家不可能得到稳定，相反的，它們却是促使非洲走向統一的客观的推动力量。

在拉丁美洲，特別是加勒比海地区直接感受到古巴革命的影响，其中尤其是在委內瑞拉已經鼓起了群众斗争的新高潮，并且促进了“官方”的“左”派和同古巴革命站在一起的新的中間派与左中派之間的分化。

在拉丁美洲各地，古巴革命的影响是同令人不能容忍的客观形势(通貨膨胀、为了消灭支付差額的赤字而实行的“精簡”、失业等等)的影响連結在一起的，它們掀起了罢工的浪潮、农民的暴动，促进了小資产阶级和資产阶级之間的对立以及普遍的政治动荡局面。在这种形势之下，群众寻求自由政治集中化的傾向将继续体现在若干拉丁美洲国家內群众工会組織的政治作用和萌芽时期的双重权力，或体现在大陆的其他地方建立游击基地或爆发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将成为更加普遍的斗争形式，这不仅是因为古巴的例子的影响，而且因为游击战争是拉丁美洲多数国家的革命所必須采取的农民战争的根本特征。从中美洲到哥伦比亚、秘魯和巴拉圭，各个地方早就普遍有了这种傾向或甚至采取了这种方式。游击战争将越来越表现为目前正在若干拉丁美洲国家燃烧着的內战的更普遍的特色。我們的任务之一就是在理論上和实践上为自己和为工农先鋒队做好进行游击战争的准备(包括研究、学习經驗、建立特別干部学校等等)。

同北非洲、中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形势比較起来，亚洲最近的演变对于反資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傾向是有些不利的。由于当地的斯大林主义政党执行灾难性的政策(这种政策有时接近于实际上的出卖)的結果，在伊拉克和印尼都失去了很好的革命时机，从而让資产阶级取得了和发展了走向軍事独裁的某些傾向。

在南朝鮮和土耳其，資本主义和亲帝国主义力量已暂时成功

地緩和了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滿，这种不滿已表现在推翻了被人痛恨的李承晚政权和曼德列斯政权。尤其重要的是，印度資产阶级的統治暂时还比較稳固，虽然下层的不滿和分裂的巨大力量正在逐步建立起来，然而最近在老撾发生的事件，表明东南亚这些亲帝国主义的資产阶级政权基本上仍然是不稳固的。对于在 1960 年內在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的統治被瓦解的过程，帝国主义几乎仍然是无能为力的，它现在可能首先在一些它认为其地理位置、經濟潜力和客观力量具有战略上决定意义的国家里有所反应。这种反应可能采取双重形式，现叙述如下：

(甲) 紿印度、巴西、伊朗、委內瑞拉也許还有阿根廷这样的国家以重大的經濟援助，然而由于革命范围的广泛，如果它想延緩(即使是稍为延緩)革命走向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就需要越来越多的投资，而这种援助的规模势必越来越赶不上这种需要。

(乙) 采取措施以防止古巴革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蔓延”和防止阿尔及利亚革命在阿拉伯世界的“蔓延”。

但是从帝国主义可能有所反应的观点来看，最薄弱的地方显然是北非洲，戴高乐沒有能够在那里制止阿尔及利亚战争，可能会在欧洲的大门口产生另一个新的古巴。因此，美帝国主义要求第五共和几乎要不惜一切代价使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不会一开头就成为工人国家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压倒一切。

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遭受到重大打击以及由于力量对比突然发生了有利于世界革命的新的轉变，才阻止了帝国主义对古巴进行軍事干涉。远比苏联的导弹威胁——虽然是重要的，这是事实，但它受到苏联官僚主义机构更全面的利益的限制——更大的威胁从而阻止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魔掌伸向古巴革命的是拉丁美洲群众的革命反响。

## 二、資本主义經濟新衰退的前夕

从經濟观点来看，1960 年也是資本主义战后历史的轉折点。尽管美国資本主义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馬尔薩斯主义”在鋼鐵大罢工中的作用，但是罢工的結果并沒有給生产能力带来任何新的高涨。相反的，美国的經濟在年初仍然停留在“平稳状态”上，而自夏季以来則开始走下坡路。鋼的生产仍然只接近于生产能力的 50%；耐用消費商品部門(汽車、电用具等等)多数的生产能力有很大部分沒有使用。在这之上的，是房屋建筑的猛烈下降和証券市場的直線下降。失业人数从来沒有低于全部劳动力的 5%，因此可以正确地說，美国的經濟是从 1957—58 年的衰退又轉入 1961 年的新衰退，中間沒有插进一次真正的繁荣。

在西欧資本主义国家和日本，发生了不同的情况。这些国家特別是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日本，几乎都成功地避开了 1957—58 年的一次严重衰退。与在美国发生的情况相反，它們在 1959 年和 1960 年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真正繁荣。今天它們所遭受的仍然是过分发展的現象(人力的严重缺乏、支付差額赤字的不断增加、为了避免全面通貨膨胀而日益加强信貸限制等等)，而不是衰退的开始。

但是，与 1957—58 年的情况完全不同，在美国經濟中出現的衰退已經开始影响到欧洲資本主义的經濟状况。对美国的輸出(特別是汽車輸出)已慘跌。結果欧洲的汽車工业已受到衰退的打击。美国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包括削价的竞争)越来越厉害。自从 1945 年以来美国帝国主义第一次取消了对欧洲資本主义的任何形式的經濟援助，甚至取消了給当地重整軍备的款項。由于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輸出或者陷于停滞状态或者增加的速度

大大低于生产发展的速度，因此发展的生产越来越多地需要在資本主义国家之間即內部市場之間互相交換。这种发展势必突破資本主义对群众购买力所强加的限制，并在西欧带来新的衰退，这不过是時間問題。

或者是采取重要的通貨膨胀的措施以刺激一个新的繁荣，从而增加国际对美元的不信任而使美国黃金儲备减少；或者是采取重要的通貨收縮的措施来保卫美元，从而扼杀了在孕育中的繁荣，处在进退两难之中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实际上是选择了第二个解决办法，但即使如此，它仍然未能防止美国支付差額赤字的增长。新当选的肯尼迪政府无疑地将会断然改变这个政策。它将会增加軍备和行政部門(公路、学校、卫生計劃等)的公共开支，虽然它将会削減或完全停止对資本主义欧洲和日本的經濟援助，但它将会大力增加对殖民地資产阶级的經濟援助。

这些措施也許可能阻止一次比 1957—58 年的衰退更厉害的衰退(它在整个 1961 年內对于資本主义是一个真正的威胁)，但是决不能在經濟复元以前抵銷一切导致經濟溫和地走下坡路的力量。

同时，这些財政和經濟措施加上竞争的加剧，也可能引起大多数西欧国家发生溫和的衰退，更重要的是，将会在 1961 年的衰退之后限制新的繁荣的出現。虽然还不能确切預言这些发展的力量在西欧和日本将如何消耗，但是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现在已明显地出现了对这些力量的限制，特别是在汽車、耐用消費商品和建筑部門方面。

殖民地革命任何一个新的全面胜利(例如北非洲的胜利)，将会促使一个重要的国家突破資本主义世界市場，而沉重地打击了目前保持着西欧和北美資本主义相对“繁荣”的不稳定的平衡，并

会立即增加帝国主义采取軍事反击的危险。

### 三、工人国家在經濟、技术和軍事方面不断取得 进步，但是官僚机构出现了新的矛盾

工人国家特別是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1960 年爭取得了經濟、技术和軍事的进展，这种情况同美国經濟的差不多是停滞不动，以及世界帝国主义在技术、政治和軍事方面所反映出来的混乱、失敗和局部瘫瘓，是鮮明的对照。苏联在諸如导弹技术、空間探索和自动化技术方面已取得优势甚至在不断加强这种优势。苏联經濟繼續不断的高速度发展，使它的七年計劃的目标在工业方面有一点实现的可能。同时，农业生产繼續有很大波动，特別是谷类生产仍然低于赫魯晓夫对于开发“处女地”的期望。

在中国，自从它由于过分的发展速度而导致“調整生产数字”的挫折，因而把速度放慢之后，即使它越来越把重点放在农业上面，人民生活水平依然低，尤其是人口增长的压力很大，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还是惊人的。

欧洲各工人国家經濟也在慢慢地加强互相合作和結合，通过更合理的国际分工来开辟发展經濟的新源泉。

这种傾向正在以實驗的方式表现出来，苏联官僚机构方面和許多国家的民族資产阶级則持很大的保留态度，但是由于客观需要的巨大压力，它的力量将会逐漸强大起来的。

在这种情況之下，苏联的赫魯曉夫官僚領導机构基本上坚持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宣布的双重路綫：在內政方面的赫魯曉夫式“改良主义”，在国际方面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这意味着：对群众实行經濟的让步和在苏联官僚机构内部扩大专政的基础：力图与帝国主义达成全面的妥协，以便“冻结”目前世界的“势力范

**團”，同时支持殖民地資產階級拿群众的革命願望去交換資本主義世界更多的利潤的努力。**

即使在官僚机构的这种让步政策之下，在苏联國內仍然酝酿着社会和政治的危机。对提高生产特別是提高农业生产的要求，客观地提出了群众要求有更多的权利参与管理和监督經濟的問題。苏联在世界中的作用；新一代已經成年了，在他們懂事的时候斯大林統治时期已經过去；科学技术研究的发展——这一切事实客观地要求工人国家必須有新的領導。直到目前为止，官僚机构是采取党内斗争和清洗的办法来适应这种形势的变化。但是苏联的繼續发展以及不平常的世界革命形势，已創造了条件使这个形势在苏联國內得到貫穿和反映。在劳动者們坚持地和直接地就关于他們参加管理工厂的整个問題提出国家和經濟民主化的关键性問題之前，还需要有一定的时间，还需要生活水平有新的提高。

但是苏联國內以及其他工人国家的社会与政治危机的問題，在政治方面得到完全和有意識的体现之前，将客观地在許多方面（經濟、艺术等等）的綱領或綱領性的解决办法中得到体现（即使是經驗主义的、变了形的和零碎的）。但是苏联的整个过去和现在正在創造条件，使这种危机很快地就会在相当高的水平上表现出来。我們的运动不仅在綱領上而且在組織上参加干預的可能性正在增长并且是现实的，即使它在最初阶段是采取間接的形式。苏联國內的斯大林主义危机的道路，正如世界革命的道路一样，在客观上是属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性质，它为托洛茨基主义打开了門戶，同时为了它的革命的結果，要求托洛茨基主义作为綱領和組織进行干預。

但是在国际方面，“和平共处”的政策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已导致失望有时甚至是灾难。尽管苏联官僚机构目前在导弹方面占

居优势，它仍然沒有能够通过“最高級談判”从帝国主义取得任何重要的让步。1960年春季巴黎會議的失敗，只不过是这个基本事實中的一个为时已晚的反映。同时，赫魯曉夫把共产党的战略“限制”在永远从属于殖民地資产阶级的企图，已断送了埃及和伊拉克的共产党，破坏了印度尼西亚的极好的革命形势，阻碍了若干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可能取得的进展，导致了馬格里布和古巴爆发了共产党在其中未能起任何重要作用的革命。

这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局势产生了以下几种情况的发展。首先，好些共产党全党(如摩洛哥共产党)或部分(如巴西共产党等)发生了反对这种自杀路綫的傾向；其次，在关于与世界帝国主义和与殖民地資产阶级的关系問題上，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已明显地成为“和平共处”路綫的“左傾反对派”；最后，苏联官僚机构本身被迫对自己的路綫作了某些調整。它的关于要在刚果和古巴实行軍事干涉的威吓并不眞确地反映了“和平共处”的政策，而八十一一个共产党的“莫斯科声明”則包含了对殖民地資产阶级的最激烈的批評。

以上这三种傾向在最近的将来将会繼續表现出来，即克里姆林宮将坚持其“和平共处”的路綫而把它調整得更为“左傾”一些，以免使自己在殖民地革命的先进力量中完全陷于孤立；这个路綫也可能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中繼續搗乱，因而使反对的傾向增强起来；最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在国际上表示共产党队伍对“和平共处”的不安，它将会在大多数共产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势力中扩大它的影响。

同时，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两个国家发生公开分裂是极不可能的，因为在帝国主义的威胁面前，他們的联盟对于两国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問題，而且因为中国在經濟上还要依靠苏联很

大的帮助。中蘇聯盟的保持，远远不會停止而是成為加深意識形態的討論和衝突的一個因素，在一方面是殖民地革命另一方面是蘇聯官僚機構對“和平共處”的反响的压力之下，必然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促进这种意識形态的討論和冲突。

在这种討論和官僚机构內部斗争中，現在的問題不是關於誰应当主张或反对戰爭，而是關於我們時代革命政策的基本問題：帝国主义的本质；世界阶级力量的对比；对待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态度；不断革命的問題；爭取殖民地革命胜利的条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国际建設社会主义的条件，等等。

官僚机构內赫魯曉夫的勢力和中国的勢力之間目前的討論（虽然它当然是有点变了样的），再一次提出、引起人們的注意并證明我們關於這些問題的基本思想的有效性。因为根据国际形势的邏輯和动力所达到的程度，官僚机构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当然，隨他們的便）。

于是，自从斯大林主义巩固以来，在空前未有的世界性革命形勢之下，第一次开辟了国际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危机的新的决定性阶段，它比南斯拉夫“分裂”时期更广泛和更深刻。

且不用說这个危机不可避免地会时起时伏，并且有可能在表面上掩盖下来，但可以认为，可以恰当地称为机会主义者或右派的官僚机构的勢力同“中間主义”倾向的勢力之間的分裂将是深刻的和持久的，还可以預见到，在后者的压力之下，前者在对待群众的行动上，不得不考慮到后者，甚至在对待帝国主义的行动上，也不得不部分地考慮到后者。

#### 四、帝国主义的反动和战争危险

帝国主义在 1960 年面临着世界力量对比于自己不利的新的

严重恶化，而表现近于麻痹状态，但这应当解释为由于例外的和特殊的环境而不是由于中国人民的革命胜利使世界形势发生了质变。如果认为 1960 年的时局已証明帝国主义已变成“紙老虎”，即认为它已失去必要的力量和資源来反对全世界反資本主义力量的前进，那将是輕率的和不負責任的。

自从中国革命胜利以来，我們曾經根据下列两个因素正确地分析了战争危险的存在：世界力量对比日益不利于帝国主义；以美国居首位的世界帝国主义仍保有巨大的經濟資源和軍事力量，使它們能够进行垂死的掙扎，对革命的每一个进展实行以牙还牙。只有当我们估計到帝国主义已不再拥有足够的資源或力量来保卫自己，亦即只有当我们估計到帝国主义将会消极地屈服于前进中的世界革命的时候，才能够改变这个結論。

今天沒有任何重要的經濟、政治、社会或軍事因素可以証明存在着这种乐观主义的假設，只要帝国主义在美国还保持着主要的力量，这种假設就不会存在。

必須認識到，帝国主义对于它在 1960 年受到的打击沒有相应的反应，相反地是由于一些例外的因素联合造成的。无疑地，說明这种暫时的麻痹状态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殖民地革命意外的成熟，殖民地革命的領導(至少在某些国家里)正在轉入与帝国主义决裂的力量的手中。在这总的形势之下，还存在着其他因素，例如苏联在导弹方面的成就；由于目前艾森豪威尔外交的破产所造成的政治上的混乱以及美国的大选运动；由于美国領導地位的暫时垮台，另一方面又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間力量对比的变化(參閱关于經濟前景的文件)，世界帝国主义联盟內部已陷于混乱和缺乏中心領導；最后則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因素，即帝国主义完全沒有預见到古巴和刚果形势的发展，它受到了殖民地革命的突然蔓延和

殖民地革命与工人国家結成聯盟的打击。

美国帝国主义在朝鮮战争中受到打击以后，华尔街的国际战略首先被在大力重整軍备之后“压倒共产主义”的思想占上风，其后又被“从实力地位出发的談判”的思想占上风。

但是这个战略在杜勒斯死去之前就已經失灵了。軍事力量的对比不是越来越有利于帝国主义，而是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共产主义沒有被压倒，倒是帝国主义自己被压倒了。殖民地革命的新浪潮和工人国家在軍事方面的領先地位所造成的世界形势，使美国資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人重新估价他們的战略。这个情况在 1960 年春季和夏季就已經明显了。在大选前夕，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大本营都在酝酿一个新的世界战略。

这整个过渡时期使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停止主动。在資产阶级中間，即使到了今天，反对这种重新估价的保守势力依然强大。在尼克松竞选运动中高唱“我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的主調之后，肯尼迪只获得微弱多数的胜利，証明了这种反对力量，另一方面，五角大楼和国务院之間的对立也証明了这一点。

然而 1961 年可能标志着帝国主义对世界反資本主义力量不断取得的进展将开始有激烈的反应。即使苏联在火箭和核武器方面保持領先地位，帝国主义仍然可以通过增加軍費和集中更大的力量来发展火箭和原子潛水艇，建立一支强大的攻击力量，使它有可能发动全面战争或在开头的时候发动局部战争，它并且将会在这方面与苏联进行竞赛，集中全力来防止苏联从目前的領先地位变为完全决定性的。

殖民地革命的輝煌发展和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至少在某些国家是这样），以及世界資本主义的日益困难和欧洲資本主义竞争的日益加剧，将迫使美国帝国主义寻求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

資產階級建立更密切的聯盟。後者為了其有限的經濟發展前途，將會把對帝國主義的敲詐同對帝國主義的親善二者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美國對西歐帝國主義的壓力將會越來越大，以支持各地的資產階級和半資產階級的力量，並使西歐帝國主義在援助殖民地資產階級和重整軍備方面更廣泛地參加經濟負擔。

當資產階級對殖民地群眾運動的控制已比過去任何时候更顯著地削弱，當工人國家對群眾的吸引力以及它們同殖民地革命事實上的聯盟使它們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中間的威望日益增長而帝國主義的威望日益下降的時候，這種聯盟（指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和半資產階級力量的聯盟——譯者）正在加紧進行中。

在最近的將來，工人國家能夠給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使用的代替資源——雖然增長很快，而且從平等的條件來說，也證明比帝國主義的“援助”更加有效得多——仍然不能夠完全清除這種“援助”對於殖民地資產階級的吸引力，尤其是後者同它需要保持政權和保持一般資產階級政權有密切的關係。

即使這種帝國主義的“援助”能夠幫助某些國家緩和經濟形勢的惡化（至少是暫時地），然而在殖民地革命的主要國家里，這種援助對於生活水平和群眾革命動員所能產生的影響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帝國主義自己也知道這一點，它甚至力圖幫助使一些半殖民地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結構“返老還童”。它支持巴基斯坦、蘇丹和南越的軍事政變，並且懂得如何利用土耳其的軍事暴動及南朝鮮的學生革命，以圖把政權移交給比舊的統治集團的腐敗程度少一些和更能贊成工業化的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集團。

但是，即使華盛頓克服了反對這種工業化的美國資產階級（正如在馬歇爾計劃時期它在西歐毫不猶豫地表現的那樣），它仍然不

能够摧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封建资本主义结构，而它同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联盟为了这个基本理由到头来还是不能制止殖民地的革命。

最后，帝国主义者第三种反应的形式将是加紧它们之间的军事联盟。由于英国不再成为世界强国，它在防御问题上将会越来越依赖于美国帝国主义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力量。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为一个“独立的”核强国（即德国和法国军队拥有核武器装备）的出现，将会导致帝国主义联盟成立美国帝国主义和西欧的“共同领导”，而德国资产阶级将在其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这三种反应的结合将会在最近的将来使世界形势产生一个新的极端危险的转折点，那个时候帝国主义将拥有与苏联最新的发展相匹敌的攻击力量，它将加紧它在西欧的联盟和它同一些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联盟。从现在起一直到那个危险时刻，战争的威胁始终笼罩在我们的头上，还不是因为五角大楼会发动一个自杀性的“反攻”，而在于：（甲）核基地分布在世界各地，大大增加了由于错误或惊慌而爆发战争的危险；（乙）对于革命的每一个重大进展（特别是在拉丁美洲）企图采取军事行动的压倒趋势——这种趋势将越来越占上风，并且将会转变为一场全面的反革命战争和一场国际间的内战。

## 五、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群众的反应

1958年5月以来西欧局势的发展证明了关于欧洲前途的文件中所作的分析的正确性，这个文件曾经预言，拿破仑式政权在法国的建立，在最近的将来将会是一个例外而不是一个规律，各地的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将会保卫自己，反对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

治上的攻势。

局势同样地証实了：（甲）这种攻势首先在竞争加剧的压力之下，将继续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在工业資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乙）劳动群众的反抗程度主要将依靠主观的因素，即依靠劳工运动的團結和相对的战斗性。

資产阶级的攻势特別表现在美国、日本、西德和若干欧洲小国日益增多的反对工会、收买工会或反对罢工的法律。它表现在：企图同意大利的极右势力（天主教党和新法西斯党）建立联合政府；准备在西德和日本通过反民主法案；第一次試圖在比利时建立超議会的政府；以及右派或极右势力在奥地利和日本的重新出现。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經实行了或准备实行对工人购买力的經濟进攻，即使在多数情况下（法国是例外），这些进攻被經濟繁荣所带来的实际工資的提高抵銷了。

工人阶级反对这种資本主义攻势的强烈反应以及在日本（学生示威、矿工罢工等）、意大利（塔姆布朗尼政府在工人群众强大示威之下倒台）、英国（海員的不时罢工和工党內部左派的压力）特别是比利时（改良主义政党和工会向左轉；1959年初和1960年底的罢工）已逐渐倾向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工人阶级政党（特别是左派政党）在瑞典、芬兰、丹麦大选中的胜利以及在意大利大选中的部分胜利，应当归于同一范围。在荷兰，在一系列罢工中也体现了工人阶级战斗性的微小加强（特别是由于繁荣的結果）。

在加拿大，失业的压力已把工会推向建立工党的道路。在西德（它同法国是今日西方劳工运动中最弱的部分），由于改良主义领导机构的叛徒們的譏諷式的出卖，反抗中心仍然是在青年和工会中，特别是在五金工人联合会中。最后，在法国，戴高乐政权未能結束阿尔及利亚战争，已在經濟領域中和在反对阿尔及利亚战

爭(特別是在青年中間)的斗争中掀起了新的斗争高潮。

各个地方反对核武器和爭取普遍裁軍的斗争已成为促使反对資产阶级攻势的斗争浪潮政治化的强大推动力量。在有些情况下(例如日本和英国)，它已赋予或正赋予这种斗争以反攻的形式。

1960—61 年爆发的比利时大罢工(它将由工人运动内部的广大先鋒队逐渐达到的成熟程度来特別加以說明) 是对初步进攻劳动群众购买力的一个答复。它的异乎寻常的范围 和時間的持久性，以及同过去最大胆的經驗有連系的組織形式和斗争形式，彻底地动摇了资产阶级政权事实上并已轉变为爭取实现过渡性要求的斗争，这些要求只有在推翻了反动政府而代之以工人政府之后才能实现。这表明在整个欧洲工人阶级中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战斗后备力量，它迫切需要革命的馬克思力量在群众运动中取得陣地和影响，同改良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爭取領導权，以便挽救这新的浪潮，免致再招受一次新的挫折如果不是新的失敗的話。

由于殖民地革命的繼續发展，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正在被削弱并在殖民地群众面前遭到失敗或退却，同时殖民地群众的斗争也树立了榜样，推动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群众去克服背叛的领导者的反抗并越出他們的改良主义方法；由于帝国主义之間竞争的加剧及其对于工人生活水平所产生的有害后果往往越来越明显；由于欧洲的許多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失业的范围正在扩大；由于雇主們越来越不願意对工人作出新的让步；由于一些国家是用損害工人生活水平的办法来实行稳定經濟的計劃(以法国为例)——由于以上这些事情的发生以及它們相互作用，工人阶级斗争的次数可能会增加，范围可能会扩大，它們将有助于加强左傾力量特别是加强那些以工会为基础的左傾力量。

在英国，盖茨克尔一派所表现的对于斯加波拉大会 (即 1960

年英國工黨年會——譯者)決議的公開蔑視將會發生同樣的作用。在西德，1961年大選的失望將是左派在社會民主黨內和工會內重新施加壓力的起點。在法國，隨着帝國主義在阿爾及利亞的必然失敗而來的將是戴高樂加強其政權的拿破崙主義色彩的企圖。

但是，從現在到失敗的這段期間，如果群眾的鬥爭性加強了，在阿爾及利亞革命勝利之後，隨着帝國主義的削弱，必然會產生一次新的社會危機。加拿大勞工黨的進展，以及殖民地革命對住在美国的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的影響和古巴革命的吸引力，將使這個國家的左派力量克服最近幾年來的極大弱點。

但是如果認為這兩種接近於平衡的力量——逐漸走向“強有力的國家”的壓力和工人的防禦性的鬥爭——可以維持一個長時期，那將是錯誤的。充分就業的終止(它在下一次衰退時幾乎在各個地方都有可能發生的危險)；資產階級和保守的小資產階級勢力在世界力量對比惡化的情況下日益惶惶不安；工人階級一次又一次的鬥爭如果不能導致決定性的政治變化或產生实实在在的重要物質效果，其士氣有瓦解的危險；——所有這一切對目前的過渡階段按下了時間的界限，至少對於西歐和日本是如此。

工人運動必須通過爭取決定性的過渡目的的鬥爭，表現它轉入攻勢和組織奪取政權的鬥爭的能力。

上述這些鬥爭的條件的成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傾向勢力的發展道路，它至少必須在群眾運動中的關鍵部門扎下根，發揮它的領導和組織能力。比利時罷工證明工人階級有採取攻勢行動的巨大可能性，但是它同時也證明，如果工人階級不能成功地衝破改良主義領導(即使是最左的領導)所強加於他們的限制，不能超過對資產階級政府施加壓力而不把問題公開提出來的階段，它就不能夠盡其全力突破障礙和阻止資產階級攻勢

的基本措施。

相反地，如果工人运动在这个斗争时期中不能提高它的眼力，右派势力终于会在經濟和政治发展形势的压力之下突破障碍——这将会打破困难的平衡局面，而有在其他国家里重新出现法国类型(政权)的严重危险。

革命的馬克思主义力量(通过大胆的干涉行动，并利用目前大大有利于工人阶级开展广泛斗争的主客观形势)的任务是使欧洲无产阶级克服改良主义领导甚至是左倾的改良主义领导的阻挠行动，并采取能够使提出政权問題的条件成熟的方法和提出过渡性要求来組織斗争。

在这新的世界形势中，我們的运动大有可为。我們的整个过去就是为了这个局面，为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历史道路而准备的，我們在意識形态上比工人运动的其他一切潮流无比的先进。

我們在群众运动内部，以我們的大胆的和有方法的辛勤努力，已經在各个地方取得了重要的陣地和丰富的經驗。在这新的有利的世界形势之下，我們在扩大我們的行动方法的同时，必須坚持这条道路。

殖民地工作仍然是主要的工作。

## 六、我們的任务

(甲)殖民地革命在下一个阶段将继续成为第四国际的主要活动中心，也将是我們的运动可能取得最迅速的成就和发展的地方，这是因为现有的条件以及因为第四国际在一系列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已經取得了发展。在殖民地革命中，巨大的力量正在发展和扩大，它們已摆脱了不管是斯大林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传统领导。在殖民地革命的新阶

段，爭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在一系列国家里将是一个当前的任务。在转入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中，正如古巴所表明的，第四国际的作用是巨大的。它是唯一能够为作为革命新领导的基础的这些力量更融洽地发展开辟道路的组织。

在一切国家中，我们的组织必须作为推动这个新的领导出现和组织的中心，通过现有群众组织或采取这些国家的群众所要采取的形式（如游击战等等）来参加、领导和准备组织和领导群众的动员工作。

我们的组织应当提出使革命的发展无产阶级化的纲领，提出过渡性的口号和任务，但是同时应当作为取得这个发展的组织者（即使开始的时候只在一些有限的部门）和领导者（即使现在事实上还不是）。

在下一时期中，在殖民地革命正在开展的一些国家里，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存在着第四国际领导革命或参与领导革命的真正可能性。从现在开始，至少必须在群众运动或群众组织的一些主要部门中争得领导权，从这里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行动使全国的群众运动感受到我们的纲领和组织的力量，同时在它的面前，在行动中来考验我们的纲领。

正是通过殖民地革命使第四国际的发展有着最迫切的机会，以便在建立世界性的新的革命领导的条件已经开始成熟的过程中，在斯大林主义危机的过程中，在工人国家取得发展的过程中，使第四国际不仅从思想和纲领的观点上，而且在组织上对于整个世界革命能够发挥真正的力量。第四国际的努力和行动特别应该集中在这广大的前途上面。

在实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还应当对那些不依赖于传统的政党而出现在群众革命暴动的最前头的新的革命力量（如阿尔及

利亚、古巴、日本、委內瑞拉、南非洲和黑非洲等等)表现最宽宏的友爱精神。对于他們一般的經驗主义的革命方法我們毫不掩盖我們的保留态度和提出政治上的批評，我們在表示了我們的批評权利之后，始終应当参加和大力支持这些暴动。这些运动的中下級干部在考慮一切战略問題或策略問題时都很虛心坦率，沒有斯大林主义或中間主义的偏见。这就為我們在綱領上和行动上的滲入創造了无限的机会。

关于在殖民地革命的不同地区的專門任务詳見关于殖民地革命的提綱(即第四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另一个論“殖民地革命”的文件——譯注)。

第四国际还必須繼續动员它的力量并号召世界工人运动起来保卫殖民地革命——在今日特別是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的革命；明天新的烈火将会燃烧起来。第四国际必須繼續加紧協調已經开展了的对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世界性的重要援助。它必須极端重視采取各种形式来援助古巴的革命，繼續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組織或联合成立保卫委員会的工作，号召或組織劳动队、民兵队、劳工代表团，动员工人和学生保卫革命，等等；动员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在一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爭取領導权，利用目前的有利条件以便給予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以致命的打击。

(乙)只要帝国主义拥有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世界性核战争的危险就依然存在并且是现实的，这个战争不仅威胁着人类文明而且威胁着人类本身的生存。用宣传“裁軍談判”、請願等等或用“經濟競賽”(即一般地仍然停留在“和平共处”的范围内)的方法来反对核战争的危险，是一种反动的空想。**反对全球性核战争危险的唯一有效的斗争，就是在具备可能条件的地方爭取推翻帝国主**

义和資本主义的斗争，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开展爭取帝国主义裁軍(单方面裁軍，特別是单方面解除核武装)的斗争。不論在什么地方，我們都应当站在这个斗争的最前綫，在國內或国际范围内成为这个斗争的組織者和協調者，并把这个斗争同工人阶级爭取社会主义和推翻資本主义的一般运动联結起来。

(丙)在美国，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迫切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保卫今天越来越受到威胁的工会的陣地；保卫古巴革命和殖民地革命；反对种族隔离；宣传加拿大的榜样同时立即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这些是发展一个以工会为基础的工党的主要武器。

(丁)在工人国家里，特別是东欧的工人国家和苏联，我們重新建立起来的第一个核心組織必須制訂一个提出过渡性要求的綱領，在一方面是“改良主义”的幻想另一方面是思想的日益解放和不一致的目前气候中，要求允許成立工人阶级的新的先鋒队。在中苏矛盾中，我們給予中国共产党有批判的支持，并努力提倡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圍繞着爭执中的問題开展国际性的討論。

(戊)在西欧，一般的任务仍然是关于欧洲前途的文件中所提出的任务，主要是通过中間主义的媒介，在群众組織和劳工运动内部建立强大的左派，它必須能够为先鋒队或群众中的各种不同的左派积极分子起集合各种不同論点和團結中心的作用，并为这些积极分子指出主要的政治前途，并提出一个以各国具体的过渡性要求为基础的当前行动綱領。特別应当重視英國的局势，那里今天正在发展着西欧最强大的左的傾向，使革命的馬克思主义可以在极端有利的条件下决然地参加进去，此外，还必須尽很大的努力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联系和組織，那里正在集合力量准备掀起一个劳工运动的新高潮。

1960—61 年比利时罢工的实例已把下面的工作提到議程上來：更坚决地开展支持建立欧洲工人統一战綫的活動和把所有工会力量集結在一个联合会里，以便采取共同行动（特別是普遍实现四十小时工作周），并且在某一个国家发生先进的斗争性，采取积极一致的行动以便組織真正国际性的同情罢工。

总之，我們在所有国家里是一支最明确地、最积极地和最自觉地体现我們时代巨大革命可能性的力量。在这个阶段，当許多地区的革命运动和世界革命建立新的革命领导的条件已更具体地成熟的时候，当各个地方的力量已經起来并朝着这个摆脱工人阶级一切传统組織的控制的新領導前进的时候，第四国际应通过它的綱領和通过参加世界革命的过程，成为最自觉地促进这个新领导的出現和組織起来的中心。

我們正在进入世界革命发展的新阶段。第四国际在这新阶段中应当起自觉的、生气勃勃的、有組織的、积极的革命馬克思力量的作用，它从已經取得或正在取得的一系列主要的陣地出发，以其对革命发展过程的理解和掌握，充当这个过程的指导，促使这个新领导的成熟和出現。为此，第四国际特別要在那些在现阶段是最重要的和容易接近的地区，在那些今日最直接地反映了我們时代的“托洛茨基主义”特性的地区扎下根（今后将更牢固地扎下根），这些地区是：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和一般的殖民地革命，以及工人国家。

同时，第四国际将通过它在大的群众組織中的地位，成为能够促进和彻底利用目前已在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中重新开展起来的极为广泛的革命可能性的力量，以促使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在下一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汇合起来，并且把資本主义国家的这些可能性和这种活动同殖民地国家和工人国家的群众已經开展的可能性

和活動結合起來。

為了實現這個任務，第四國際正在建設和將繼續建設適應這個時期的幹部，建設適應這個過程的組織，總而言之，就是建設適合擔任領導群眾運動或參加領導群眾運動的自己的布爾什維克幹部和組織，它們仍然是爭取社會主義的世界性勝利的不可缺少的武器。

### 3. 世界經濟的趨勢和前景

#### 一、導言

最近十年以來，世界經濟形勢一直為下列三種因素所支配：

(1) 工人國家——首先是蘇聯以及後來日勝一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蘇聯的工業不僅已躍居世界第二位，而且，它將在未來的某一時刻超過美國工業力量的可能性已經第一次具體化，並且受到了美國資產階級本身的認真考慮。從現在起，資本主義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已在無法挽回地日益縮減。

(2) 虽然不如工人国家发展得那样快，西欧帝国主义各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持久性仍然超出了一般的預料——尤其是如果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后的时期相比較的話。特別是参加欧洲共同市場的各国以及——在較小程度上——奥地利和挪威，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显著。和馬克思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作的一切預言相反，从 1938 年以来也就是說有二十多年之久，美国和西欧的資本主义經濟并没有发生过一次非常严重的危机。1949、1953 和 1957 年的三次战后衰退都沒有妨碍相当迅速的复元和十

二至十八个月以后的新的繁荣。

(3)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經久存在的危机——而在資本主義世界，这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国家相对繁荣的另一面。它是由下列两者之間的矛盾引起的：一方面是通过投資和貿易（如果不是通过殖民主义的直接干涉的話）进行的帝国主义剥削，另一方面是爭取政治独立、驅逐帝国主义、推翻旧寡头政权、实行土改和工业化的深刻而广泛的群众运动。帝国主义制度的这种矛盾表现为：甲，随着世界上的大片地区获得政治独立，殖民帝国和列强瓜分世界的局面逐渐消失；乙，最近十年中殖民地革命所采取的沒收帝国主义企业的經濟措施：英伊石油公司、玻利維亞錫矿、苏伊士运河以及在埃及的帝国主义企业的被沒收；印度尼西亚对荷兰企业的沒收；古巴的經濟国有化；玻利維亞和古巴的土改等等——同时，除去以上列举的各种措施以外，还有帝国主义統治的危机和投資的不安全；丙，作为殖民地革命风起云涌的結果，世界各地封建—資本主义上层建筑——帝国主义統治賴以为基础的政权的崩溃。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鮮战争繁榮时期”的有利条件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业化已經有所进展，但是，它們的经济发展不仅和西欧資本主义国家（更不用說工人国家了）的发展不成比例，而且很难跟上其人口增长的节奏；它甚至都不能抵銷交易条件的不利发展。其結果是，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程度和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在今天比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前都更为显著。

某些特殊情况——例如日本，它正在經歷一种特殊迅速的工业扩展——并沒有被我們談到，但以上的簡短分析仍然总结了世界經濟发展的主要輪廓和基本趋势。本文件将詳細說明这些趋势将在今后十年中維持和改变到何种程度，由此将造成那些主要的

經濟、政治和社会后果。

不過，我們必需提醒一句。為了研究一般的以及長期的經濟趨勢，我們不得不把社會的和政治的變化、革命暴力的爆發等等從經濟領域中排開。第四國際比以前更深信這些爆發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它深信未來的十年和剛剛過去的十年或二十年一樣，不會是維持現狀的年代。在這種意義上說來，任何以“兩大集團之間進行經濟競賽”思想為中心的共產黨的政策，都是既不現實又瓦解人心的：國際工人運動的戰略不應該是保證這種和平競賽，而應該是爭取推翻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而且，本決議的結論也提供了證明這一論點的主觀理由。

儘管如此，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在研究資本主義和由於官僚主義而蛻化或成為畸形的工人國家的發展趨向時，必須假設這些政權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將繼續存在。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够了解作為一切政治發展之基礎的各種客觀力量。沒有這種假設和不進行這種研究，就不可能對現實有全面的了解，也就不可能制訂出一套有效的革命策略——特別是當我們要使如此表明的某些客觀力量失去作用，或者是利用某些力量做基礎的話。

第五次世界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國際經濟和政治前景的提綱已經指出，大會希望。

“根據兩種類型經濟的當前形勢和動態所能得出的推論以及在這一時期內將不會發生任何重大衝突的純理論假設，判明資本主義經濟和工人國家經濟在未來若干年中的一般趨勢……”

提綱還特別指明，“如果我們打算判斷一般的趨勢和前景，只能採用這種外推法，也就是以當前的形勢和動態為出發點，而不考慮會發生重大動亂的可能性。”

通过利用同一种方法并且通过大体証明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各项結論，我們強調这样一种需要，即必須科学地了解从长远說来将最后决定世界发展的各种客观力量——沒有这种了解，关于革命行动前景的任何判断都有染上主观主义色彩的危险。

与此同时，我們也完全了解——关于这一問題，正如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綱領所闡明的那样——实际发展将不是这些长期經濟趋势的簡單反映，而将是这些趋势和人們有意識的干涉（即包括反資本主义力量的革命行动，也包括有产阶级及其它害怕革命的社会力量的保守行动）相互作用的結果——这一种相互作用能够深刻地变更，有时候甚至能完全扭轉以这种外推法表明的客观趨勢。在这些超經濟因素中，群众的革命行动正在起并且在今后将日益起一种決定性作用。

### （一）工人国家的經濟发展

## 二、工人国家的經濟正在比資本主义国家 更为迅速地发展

在最近十年中，工人国家的发展速度一直非常迅速，即使說這一国与那一国此一时期和彼一时期以及經濟部門和經濟部門之間并不一样。它的发展速度比資本主义經濟快一倍以上。和发展最快的資本主义国家（西德、法国、意大利、日本）相比，工人国家的得意程度要稍有减少，但它仍然显示了发展节奏——特別是就长远說来——的鮮明差別。

从 1950 到 1959 年，工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

苏联	11.8%
波兰	13.3%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0.8%
捷克斯洛伐克	10.7%
中华人民共和国	24.8%

对：

日本	14.0%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0.0%
意大利	8.5%
法国	5.8%

以及：

美国	2.8%
英国	2.5%

(資料来源：联合国欧洲經濟委員會所作《1956年歐洲經濟形勢研究》以及1960年国际清算銀行的《第三十屆年度報告》)

从1955到1959年，工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如下所示：

南斯拉夫	13.5%
苏联	10.8%
捷克斯洛伐克	10.4%
波兰	10.0%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8.2%

对：

日本	11.8%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8.2%
意大利	8.0%
法国	6.7%

以及：

美国	2.3%
英国	2.1%

### 三、产生这种优越性的原因

这样，計劃經濟胜于資本主义經濟的优越性便惊人地呈现出

来。产生这种优越性的原因值得我們談一談：

(1) 和資本主义經濟相反，工人國家的經濟經歷着一种不会为危机、衰退、工业产量的突然下降所打斷的发展。它經常保持着劳动者的充分就业和生产資料的充分利用（虽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最适当的就业和利用）。

(2) 由于决定最重要投資問題的权力集中，因此可以避免无益的重复劳动、**設备能力过高**以及浪費和非生产性开支——即使在垄断資本主义时代，資本主义的竞争和“自由企业”也往往要造成这些浪費，虽然官僚主义的管理部分消除了这些有利条件。

(3) 生产資料的国家所有制消除了資本主义国家中尙待收回的固定資本所有者的私人利益給技术进步造成的有力障碍。

(4) 生产資料的国家所有制使生产可以更为迅速地標準化，也就是把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应用到工作母机这类产品上去，而在資本主义制度下，这些产品則处于专利权持有者的小心監視等等影响之下。

(5) 由于是計劃經濟和生产資料为国家所有，因此在分配国民收入时有以减少某些从經濟发展观点說来是无益的浪費（过高的分配費用、过多的奢侈品消費等等）。不过，官僚主义化的政权仍然使这些非生产性的和无用的开支維持着一种过高的水平。

此外，苏联和其他大部分工人国家已經完成的真正的文化革命，在經濟发展方面也發揮了很大作用。苏联今天拥有的工程师、发明家、工艺学家和技师的队伍，在人数上已大大超过美国。因此，它便得以維持一种胜过一切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新的节奏。

一切有才能的人一般都能受到高等教育这一点，消除了資本主义制度带来的才能的浪費。由于在教学工作上有更多的經費并且系統地喚起和鼓励求知欲，因此便形成了一支人数更多的大学

教師的队伍。这样，无论是在质量或数量上，技术革新在苏联得到的刺激都比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不用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了——远为有力。

在今后若干年中，沒有理由指望这些方面的发展速度——或它們对最重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領先——会发生根本变化。誠然，以 1950—55 年和 1955—60 年相比，工业发展速度已經显著降低<sup>①</sup>，而且連这种較低的速度苏联都不能維持——这就是不得不放弃第六个五年計劃的原因。

一方面，群众压力已經迫使官僚阶级更为經常地努力增加人民的消費量，虽然并沒有实行可以同时刺激生产发展的更为民主的管理制度——如果实行了更民主的管理，就可以維持甚至加快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官僚主义管理以及特別是經濟的过分中央集权，則起有降低这些发展速度的作用。后一类障碍已經部分为赫魯晓夫的改革所克服，他的改革已經使苏联有可能再次获得第六个五年計劃预定的发展速度(只有某些部門例外)。

#### 四、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四强国

在这些条件下，将使今后十年中工人国家的經濟发生变化的

① 在所述整个时期工业增长百分比如下所示：

	1950—55	1955—60 (1955年計劃)
捷克斯洛伐克	70%	50%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90%	55%
匈牙利	102%	48%
波兰	118%	53%
苏联	85%	65%

(資料来源：联合国欧洲經濟委員会《1956 年欧洲經濟形势研究》)

最重要的新因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作为一个一等工业国而出现。即使我們对中国的統計数字保留某种怀疑(鉴于对有关“大跃进”成果的数字的修改)，我們仍然可以接受这一事实，即中国国民收入的现行增长速度要比苏联高二至三倍。造成这种极高速度的部分原因是中国开始时的基础要低得多，部分原因是各个部門、特别是重工业部門中新企业的兴建，使得这些部門的生产有可能立刻获得很高百分比的增长。

然而，此外也还有两个輔助原因：其一是苏联以及其他工人國家的援助，虽然这种援助显然并不充足，但它仍旧构成了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缺乏的相当帮助；其二是中国有可能避免一系列失敗的經驗，特別是有关企业管理的极端官僚主义化和农业生产低落这些曾經妨碍过苏联工业发展的問題。中国农业得以避免长期停滞不前——而在苏联，由于强迫集体化的关系，这种现象在迅速工业化的阶段一直存在——的事实，消除了不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更迅速地发展工业的一个重要障碍。

即使中国的工业发展速度今后会有所降低——一旦重工业的最初基础建成以后，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它很可能仍旧高于苏联，并且比最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高得多。和印度及其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相比，中国和它們在工业化道路上的差距将特別显著。不管某些官僚主义的方法已經使并将继续使中国劳动群众受到多少本可避免的牺牲，中国迅速工业化的例子就像近几年中一样，将对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特別具有吸引力。

可以預料，中国的工业生产在今后十年中将大大超过日本和英國。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因此而成为世界上的第四个工业强国。不过，它仍将低于欧洲經濟集团(共同市場)、苏联和美国的工业产

量。在这种状况下，預言工人国家的总产量到 1965 年将超过世界工业总产量的一半，似乎很难說是现实的——如果在新兴的重要工业国家中废除了資本主义，那当然是例外。

此外，我們还不應該忘記，尽管中国在走向工业化方面获得了这样多的成就，如果按人口計算产量，这个居民超过六亿的国家仍然非常貧困。中国要想达到日本现有的工业化水平，它的鋼鐵、电力、机器和紡織品产量就需要超过日本六倍（也就是要达到苏联計劃在 1970—72 年达到的水平）。看来，要达到这一目的至少还需要再过二三十年。<sup>①</sup>

## 五、工人国家經濟中的特殊問題

工人国家的經濟在发展速度上快于資本主义国家，是其最基本、最主要的特征。然而，这并不是其唯一的特征。工人国家經濟发展的另一特征是不同部門中发展节奏的不均衡这一点再加上这些国家的官僚主义蛻化或变形造成的結構上的缺陷，引起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問題，造成了經濟发展期間的种种困难和紧张，甚至引起了一系列障碍的出現。

不同經濟部門的不均衡发展首先是工农业之間的不均衡发展。农业在今天比以往更成为苏联經濟的致命弱点。不論是赫魯晓夫通过开垦“生荒地”来“迴避”农民的策略，或者是对农民們作出的严重让步（向集体农庄出售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都还没有能解决这一問題。由于西伯利亚中部的农业和气象条件特殊，那里的生荒地只能每两年得到一次丰收——这便使苏联的谷物产

---

① 中国目前的鋼产量是一千四百万吨（公吨或长吨）；要在按人口平均計算的产量上达到日本的现有水平，中国将需要生产一亿零二百万吨鋼（一千七百万吨的六倍）。

量年年有巨大波动：

(按百万吨計算)

1937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96	82.5	88.5	108	127.8	104.8	139.4	110①

在苏联，彻底解决农业落后于工业問題的两大障碍是：集体农庄庄員对逐步发展生产的兴趣不够以及对农业的投資不足（特別是肥料的使用有限）。这就使苏联农业劳动的平均生产率远低于美国——更不用提实行集約农业的西欧和中欧国家了。

赫魯曉夫的改革，特別是修改集体农庄向国家供应的产品的价格以及把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出售給集体农庄，无疑已經在一定程度提高了农业生产。但它們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新問題，即集体农庄因此积累了巨額資金。集体农庄的收入已經从 1953 年的五百亿卢布增加到 1956 年的九百五十亿卢布和 1959 年的一千五百亿卢布，也就是說在六年中增长了三倍。

由于对农村的消費資料供应肯定沒有按相同的比例增长，集体农庄事实上已經积下一筆无物可购的巨大购买力。赫魯曉夫通过出售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吸收了它的一部分。某些工业生产資料也在日益容易地出售給集体农庄，因此，农庄便建立起輕工业工厂、发展起建筑材料工业，有时候甚至开始向城市居民出售产品。这样，苏联的經濟結構中就多了一种新因素：国营工厂丧失了它們对工业生产的事實上的垄断。不过，这显然是一个并沒有影响重工业的純边际問題，在目前生产中只占很小一部分。

不同工业部門以及工业与交通运输体系之間发展速度的不均衡，在今天也非常显著。一般說來，在 1955 年以后制訂的新計劃

---

① 如果考慮到人口的增长，这一产量数字按人口計算竟比 1937 年还要低！

中，輕工业的增长速度已經非常接近于重工业，虽然還沒有完全达到它們的发展速度。但是在执行計劃时，重工业部門仍然优先获得重視，这样，和預定計劃相比，便推迟了紡織工业和耐用消費品工业的发展，这在苏联和大多数“人民民主国家”都是如此。

基本工业（电力和金属矿开采）和制造部門之間发展的不均等，在东欧很多国家——特別在 1953—56 年期間——造成了种种危险的障碍。这些障碍已經通过在东德强迫发展褐煤以及向这一地区大量供应苏联的石油产品（正在鋪設的輸油管网将鼓励大部分东欧国家以石油代替原煤的趋向）而被消除。

## 六、工人國家的經濟統一和消費者的压力

全体工人国家（或者甚至是欧洲工人国家）經濟統一的問題，一直還沒有解决。經濟互助委員会并不是一个統一經濟的工具：它的任务只是处理某些部門（汽車、机器和工作母机）以及对外貿易中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問題。它甚至都不負責統一調配全体工人国家的投资（可以參看哥穆爾卡最近在这方面表示的不滿）和全面的安排計劃。这种合作不足是由各国官僚阶级（包括苏联官僚阶级在內）各自的特殊利益造成的。

客观力量（例如在动力資源方面进行競爭的风险）和主观力量（消費者的压力）的压力在未来的年代中将达到如此程度，以致苏联的官僚阶级將被迫走向进一步加强其全部“勢力范围”內經濟統一的道路——而这将造成新的內部冲突，动摇在經濟方面“團結得堅如磐石”的神話。

这种已經表现在經濟互助委員会上的对工人国家經濟加强国际安排的趋向将日益增长，在布加勒斯特就這一問題达成的協議以及八十一国共产党莫斯科會議的決議都証明了这一点。这种发

展将在新的基础上再次引起群众参加經濟管理的問題，并且随之而带来它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不仅如此，消費者的这种压力還将在苏联本国和大多数其他工人国家中逐步加强。五十年代初期已經是这种情况。但是既然赫魯曉夫改革的第一陣浪潮已經發揮作用、人民的衣食得到了改善，这种压力又将大大增长。它将表现在以下三方面：质量（特別是衣服的质量，但也包括对食品质量的要求）；**耐用消費品和住宅問題。**

“罢买”(BUYERS' STRIKES)現象正在日益經常地发生(苏联報紙最近就承认在塑料制品方面有过这种問題)，而消費者的压力在今天对官僚专政說来是最有力的威胁，正如 1959 年哈薩克斯坦的騷动所証明的那样——在 1959 年，那里的几千个青年由于缺乏最低限度的舒适和消費品而发生騷动。

赫魯曉夫答应“赶上并超过”美国平均生活水平的宣传，将日益給他自己招来压力，刺激起人們对耐用消費品供应的大规模要求。如果这种压力——特別是想得到私人汽車——在今后十年中变得过于强烈，就会給苏联鋼鐵工业带来嶄新的問題，因为苏联和美国以及西欧正相反，其鋼鐵工业中用来生产小汽車的部分是微不足道的。

另一方面，想更多地参与企业管理的生产者的压力增长得則比較慢。但是，生活水平的改善，特別是工作時間的縮短(普遍实行七小时工作日制)以及文化与技术平均水平的提高，在今后将使这种压力加强。

## 七、几个特殊例子

欧洲的某些工人国家另有其特殊的經濟問題：

**南斯拉夫：**无论是就工业生产或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而言，該国在所有欧洲工人国家中都居于首位。这可以以其經濟政策的独有特点来解释：由于一步步彻底实行企业自治而使官僚主义有所削弱；实行了一种既避免强迫集体化又避免使私有农民統治市場的农业政策；更为和諧地統一于世界市場之中，因而可以从世界分工中得到更多的好处。

供应給南斯拉夫劳动者的耐用消費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在以快于大多数其他工人国家的速度不断提高，不过，南斯拉夫的經濟将碰到两种危险：其一是市場經濟在工业部門中的过分扩张，这将引起社会不平等日益发展的危险（參照最近把房租調整到与“实际成本价格”相一致的做法，其結果是使最好的住宅产生了有利于特权阶层而牺牲工人的再分配）；其一是过分統一于世界經濟之中，这会使它日益依賴（在信貸和外汇方面）国际資本主义經濟，并且使它长期脱离（这是苏联官僚阶级的过失）工人国家日益加强的国际安排。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尽管这个国家的居民可能已經享有在一切欧洲工人国家中算是最高的生活水平，它和西德之間的差距仍然很显著，即使說这种差距正在一点一点地縮短。照西德經濟目前相当高的发展速度看来，这种差距在短期以內多半不会完全消失，除非西德会受到一次严重經濟危机的打击。

这种差距目前不但在政治方面而且甚至在社会方面都起着关键性作用：它使东德在“人民民主国家”的組織整体中成了一个真正的缺口。它是使得技术分子（工人和知識分子）不断大量外迁——这种大迁徙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經濟資源的真正外流——的原因之一。

烏布利希为“解决柏林問題”施加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

由于他决心要堵住这种外流。此外，德国統一社会党領導上狹隘的教条主义和粗暴的官僚主义，特別是通过强迫全部农业集体化（即使这是一种名义上还維持相当一部分农民私有財产的“集体化”），也进一步加重了这种形势。

**捷克斯洛伐克：**捷克的經濟在所有“人民民主国家”中具有最多样化和最平衡的結構。經過 1953—55 年前后的衰退，现在已經重新高涨。但是，由于这个国家中对某些产品的需求看来已經充分飽和，因此，目前正在发生——这在一个工人国家中說来还是第一次——**調節耐用消費品供求的問題**。要想以一种和諧的和进步的方式解决这些問題，就需要让生产者和消費者在企业和地方集体（城或区）内部都能积极得多地参加制訂計劃。

## （二）工业化資本主义国家的經濟发展

和馬克思主義以及非馬克思主義经济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作的預料相反，战后并沒有发生一次 1929 或 1937 年类型的生产过剩的严重资本主义危机，而是出现了一段恢复阶段，接着便进入了一段經濟繁荣时期，中間只发生过几次時間相当短并且沒有两次大战間的危机那样严重的衰退。目前，西欧和日本正在繼續着这种經濟繁荣，虽然它在美国已經让位于一种近几年来的經濟只是維持原状的局面。

### 八、存在这种繁荣和沒有发生严重危机的原因

工业化国家中資本主义經濟之所以呈现这种新的繁荣，并不能归之于单独一个主要因素。这种繁荣毋宁說是資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国家）政策中或資本主义企业結構中各种环境的湊合和

一系列改变的結果。造成这种相对稳定和刺激这种空前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几項：

(1) **国家的作用日益增长**,因而限制了經濟危机的累积过程,能够在危机的最初阶段就設法加以阻止(美国的統計資料表明,在1957年,衰退刚一开始的来势几乎和1929年大危机的最初阶段同样凶猛;1957年不同于1929年的事实是,危机在这种最初阶段就已经被防止,而在1929年則听任其在三年中日益加重)。<sup>①</sup>

我們必須区别开資产阶级国家以經久方式在資本主义經濟中所起的日益增长的作用,以及它临时出面干与**以緩和危机振蕩的可能性。**

在大多数工业化的資本主义国家中,公共支出目前吸收了国民收入的15—35%。所以,国家成了投資(特别是在軍事部門以及在輔助程度上的交通運輸和动力部門)和工人及白領阶层消費者(公务人員队伍和国有化或市有化企业中的工人等)收入的主要提供者之一。国家还同时实行了各种重要的轉賬支付,从而减少了劳动者由于无产阶级基本上无保障的地位招致的购买力的損失(养老金、失业救济金、疾病或工伤事故保险等等)。誠然,这些支付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工人本身的筹集。但是,大多数工业化資本主义国家也以津貼方式提供了相当帮助。

作为整体来看,这些实际上不会受暫时危机影响的公共支出,有助于使消费者的投資和收入保証有較稳定的数量,从而起一种**經久性的反周期作用。**

此外,資产阶级国家还拥有一整套在危机刚发生时便使之緩

---

<sup>①</sup> 和1929年危机头九个月中工业产量下降了15.9%相比,美国在1957—58年衰退的头九个月中,工业产量跌落了13.1%。和經濟大危机相同时期减少26.5%的数字相比,在1957—58年衰退期間,耐用品的訂貨減少了20.1%。

和的手段：普遍增加轉让开支（实行赤字財政）；減少信貸成本；給予私人投資和出口以津貼和紅利等等。

总起来說，資產階級國家在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生活中这种日益增长的作用意味着，在資本主义今日正在世界範圍內經歷的政治与社会危机当中，**非經濟性因素在經濟中正在起着并將繼續起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意味着資產階級（作为集体來說）正在牺牲其通貨的稳定和长远利潤的未来（以及某些部門的当前利益），以利于这个制度的当前自卫而不顾及其长远后果。

在未来的年代中，由于全世界各种力量的对比关系一步步走向不利于資本主义的变化，这种因素非但不会削弱，而且将發揮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将尤其如此。

在这里补充一点是有益的，即这一分析不仅不証实认为資本主义现在因此就得以“避免危机”的修正主义論点，相反地却証明了一条馬克思主義理論：景气与不景气、繁荣与危机的交替是**資本主义經濟与生俱来的一种痼疾**，資產階級国家唯一能够做到的，只是暂时限制住这种疾病的发展（以加重其将来的病情为代价），而不能消除疾病本身。此外还需要指出，这种可能性本身也不是无限制的，它既不能阻止衰退的爆发，也不能——不管国家怎样日益加强干預——使现在的衰退不变得逐渐严重。

（2）**技术革新的大爆发**（基本上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准备下的），結果在私营工业中造成了一种比两次大战期間高得多的固定投資率，从而帮助縮短了資本主义周期（现在，衰退每隔四至五年便爆发一次，而不像以往要隔七至十年），并将继续得到軍备生产（核子和电子技术）所部分刺激。这种技术革新——它在自动化的发展上表现最为突出——同时也是資本家得以在战后最初几年中对工人加强自己的工会和增加工資作出的基本答复：相对剩余价

值的增加和由于生产力的急剧增长以及通过技术失业造成的工业后备軍的扩大。

在美国，技术进步的这一社会特征已經极明显地表现出来：甚至在景气时期，失业人数也始終保持在三百万以上。在英国和共同市場，这种现象出现得稍晚（特别是在共同市場，由于其发展速度甚至比生产力的这种巨大增长还要快，这种现象来得尤迟）。但是，今天正在美国发生的事看来也預示了欧洲資本主义国家的将来发展。

(3) 劳动群众对消費品的需求已經发生一种結構变化。重心正在日益从食物和衣服轉移到房屋和耐用消費品上。这种变化部分是充分就业最初阶段的延长和实际工資相对增长的結果。这也也要归因于对消費信貸和广告压力的日益不加限制的利用（这也是一个以第二类消費代替第一类消費的問題，譬如若干情况下食品消費质量的某种降低）。

这样一来，对耐用消費品的购买力便以一种快于紡織工业品购买力的速度不断增长，而对农产品的购买力則正在相对地（如果不說是絕對地）下降。此外，部分也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像谷物、馬鈴薯和猪肉这类大宗食品的絕對消費量已經开始減少。

劳动者需求的轉移本来是一定时期的相对繁荣和高就业水平的結果，以后則轉而給耐用消費品工业带来兴隆局面，从而成为对这种繁荣的主要支持。这可以从共同市場經濟的不同部門中相差很大的发展指数上明显地看出来：

（以 1953 年为 100 的指數）

在 1959 年

小汽車生产	340
全部工业生产	158

紡織生产	122
农业生产	104

“新”部門(耐用消費品、石油产品、塑料产品、电子仪器、自动化机器等等)的发展速度极高这一点,明确地解释了工业化資本主义經濟——特别是在西歐和日本——平均增长速度何以相当高的原因。

购买力的轉移还表现在先进資本主义国家中多少是經常性的农业生产过剩的危机上。面临着由滯銷——特別是对谷物、馬鈴薯和猪肉說来——造成的农产品价格普遍下降的趋势,为了維持一种哪怕は日益減少的收入,农民們已經通过使农业工作高度机械化、增加肥料投資以及日益改善农业技术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生产力的这种提高在正常情况下本会排挤掉最軟弱的农場,并且导致放弃比較低劣的土地。但是,一切資本家政府主要为了选票和社会目的(农民在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中一般都是最保守的社会阶层)而执行的人为价格补贴政策,仍然人为地維持着这些土地的耕种,限制了农村人口的外流,从而把生产力的增长化成了需求低落和多少是經久性的生产过剩局面。只有比較“高貴”的产品(优质肉类、柑橘等)还没有发生这种趋势。

(4) 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业化而言,不管它們的工业发展性质如何有限,通过这一过程——即使具有其种种限制——仍然发生了資本市場日益扩大的现象,这样,資本商品便部分代替了受这种工业化威胁的消費品的出口。

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产品价格上涨的同时,却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輸出的原料价格不断加以压抑。<sup>①</sup>

---

① 西歐 1958 年輸向落后国家的出口总值与 1953 年相比已經增长了 50%。而同一时期原料输出只增长 3.12%。美国在这一时期的輸出增长了 41%,而輸入的原

这种帝国主义国家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无偿取得的劳动，是有助于帝国主义国家繁荣的另一种因素，这样，它們就把一部分矛盾轉嫁給了落后国家。

## 九、資本主义經濟在今后十年中的前景

以上这四种因素經過短期和不长不短一段时期以后的情况会怎么样呢？关于工业化資本主义国家經濟发展的前途，我們能够作出哪些結論？

(非經濟性因素中的)国家干涉在資本主义經濟中将继续空前加强，它将具有一种日益显著的趋势。和工人国家展开“經濟競賽”的迫切需要，将使得几个資本主义大强国不得不通过国家保証来扩大本国关键部門的生产能力，即使这种扩大并不能“得利”(考慮到目前設备能力已經非常过剩的情况)。特别是在美国的鋼鐵和石油工业中，已經出現这种局面。大壟斷組織制訂“投資計劃”时比以往更少考慮短期内具体景气問題的趋势，也便利了这种干涉。

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殖民地革命和帝国主义力量对比的进展就以此为轉移)，将决定日益加强的国家干涉成为“节约”类型或(牺牲劳动者来提供投資資金)通貨膨胀性质的“溫和”类型(由工資和利潤共分发展果实)的程度——前者如德勃雷一比內政府統治下的法国，后者如从战后直到 1953—54 年左右的美国和英国。

技术革新的浪潮将继续推进，虽然它在美国的发展已經緩慢下来(鋼鐵工业等某些部門例外)。在欧洲，相对于美国而言的技

---

料总值比 1953 年还要低 2%，这种现象事实上早已出現。譬如說，在 1930—33 年的世界經濟蕭条以后，比起从本世紀初到蕭条时为止这段时期的平均價格來，阿根廷的价格下降了 19%。按照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的計算，这意味着每年平均損失利潤二亿三千八百万美元。

术落后状态在今后十年的头五年中，仍然容許生产力大量增长和进行巨額投資。不过，資本主义的历史表明这些“技术爆炸”不可能无限期地延长，因为在两次“爆炸”之間必須有一个間隔，以便容許新的固定設備全部得到充分的发展和摊还。到今后十年中的后五年，这种浪潮就将逐漸平息。随同六十年代第二次衰退的开始，它无疑将产生显著影响。

群众消費的結構变化在美国已經不再起刺激作用。与此相反，耐用消費品部門获得的重要地位目前正日益成为一种不稳定的因素，因为对这类产品的需求比对非耐用消費品的需求波动得远为强烈。正是在这一部門，生产設备能力过剩的情况最为突出，甚至一个周期比一个周期更严重。

在欧洲，达到这种飽和状态无疑还要經過一段時間。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西欧(包括英国、瑞典和奥地利)的小汽車生产能力目前已經达到年产五百万辆，而这一能力在得到充分发展以后，到 1963 年将提高到年产七至八百万辆——比起 1955 年最高年产量才达到七百万辆的美国来，西欧的人口多得极其有限，而美国消費者的平均收入却要比他們高出 250%！——考慮到这种情况，我們可以預言，在今后十年中，欧洲在耐用消費品方面也将达到美国目前的飽和状态。因此，这一因素在西欧也将逐漸失去其刺激工业相对地迅速发展的作用。

第四种因素(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投資以及和这些地区的貿易)和对于整个帝国主义体系說来是最深刻和最持久的变化密不可分。在今后的一段不长时期，相应于帝国主义“援助”日益增多的程度，它作为帝国主义經濟刺激剂的作用，将由于輸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机器、工业装备等的增多而加强。但是，殖民地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的逐漸轉化也将相反地給予帝国主义以

沉重打击。

鉴于所有这些原因，所以今后最有可能出现的变化，从短期来看，将是西欧和日本的发展速度比美国快得多，从未来不太长的時間和长远来看，**将是資本主义經濟发展速度的普遍下降，并且將經常为日趋严重的衰退所打斷，而这些衰退将一方面遺留下技术性失业，另一方面遺留下生产能力的过剩。**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这种下降所表现的节奏和范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竞争加强和对工资施加压力的现象，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西欧和北美工人阶级斗争的客观条件，即使它们并不是工人运动在这些地区复活的必须条件。

## 十、資本主义內部力量对比的变化

资本主义内部各种力量的对比在近年来发生的重大变化，必须放在以上所谈各种前景的范围以内来考察。

由于西欧和美国经济发展节奏的差距日益增大，由于欧洲经济集团的建立，**美帝国主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結束时在資本主义陣營內取得的和整个战后初期(先是复兴时期，然后是所謂的“朝鮮战争繁荣时期”)一直保持的絕對統治地位又开始发生問題。**美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统治地位的这种相对衰落，是许多征象引起的結果。以下是几个例子：

### 鋼产量(百万公吨或长吨)

	1929	1946	1953	1959
美 国	57,3	61	101.3	84.7
共同市場	35.6	11.8	39.7	62.3
英 国	9.8	12.9	17.9	20.5

### 汽車产量(百万辆)

	1937	1950	1953	1955	1959
--	------	------	------	------	------

美 国	3.90	6.70	6.10	7.95	5.60
共同市場	0.51	0.58	0.90	1.50	3.10
英 国	0.38	0.52	0.60	0.90	1.20

### 出口值(十亿美元)

	1913	1928	1938	1950	1955	1957	1959
美 国	2.4	5.0	3.1	10.1	15.3	20.9	17.4
共同市場	5.1	7.3	4.8	9.5	18.2	22.4	25.2
英 国	2.7	3.5	2.3	6.0	8.0	9.3	9.8

由于共同市場目前的工业生产发展速度比美国和英国至少要高一倍，考慮到共同市場的开始基数已經相当高，欧洲經濟集團和美国之間的生产差距将迅速縮小。在未来十年中，欧洲經濟集團在大部分耐用消費品方面有可能赶上乃至超过美国的生产能力，不过，这种进展将由于欧洲劳动者购买力的相对下降而受到部分妨碍。

同时，从上列数字中可以看出，和世界工业生产的“三巨头”(美国、苏联和共同市場)相比，英国正处于下降为第四位强国的危险中，虽然其出口值按人口平均計算仍稍高于共同市場。在今后十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乃至于日本都有可能超过英国的工业产量。因此，某些資本家集團正在为迫使保守党政府让英国参加共同市場而施加压力便不难理解了。同时，我們因此也就会明白，贊成——特別是出于政治动机——建立共同市場的美帝国主义何以反对英国加入。这样一种溶合形成的工业力量将对世界市場施加巨大压力(它将购买 50% 以上的全世界出口商品)，并且可能很快就追上——如果不是超过——美国本身的工业能力。

美帝国主义对資本主义內部这种力量对比变化的一个重要反应，就是日益向欧洲，首先是向英国和西德，輸出資本。这种趋势想同时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利用低于美国的欧洲工資，以便特別是

利用比較先进的技术击败其欧洲竞争者；一是在美国建立起一支工业后备军，借以对美国工资日益施加压力<sup>①</sup>。这种趋势将保持若干年；这样，它也有助于使西欧经济具有一种高于美国的投资率和发展节奏。

誠然，欧洲非常严重的政治或經濟危机（一場新的柏林危机、一陣仍有可能发生的群众运动的高涨，伊比利亚半島上的革命及其国际反响、戴高乐政权的倒台等等）可能会改变这种形势，延緩西欧的資本积累，甚至会使資本向海外国家大量外流。世界革命的新跃进——例如印度、阿根廷、日本的历史规模的胜利——也会动摇西欧资产阶级目前对自己的命运所表现的越来越大的信心。不过，一旦各种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这类从资本主义角度看来是灾难性的变化，战争的危险就会加大，而一陣扩大軍备生产的新浪潮也許会部分緩和資本家和私人企业的这种丧失信心。

## 十一、欧洲共同市場的发展可能性和局限性

代表大会以前的文件《欧洲劳工运动的形势和前景以及我們的任务》，已經大致說明欧洲共同市場的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原因。它既符合于已和欧洲小民族国家的限制长期发生冲突的一般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又符合于資本主义大垄断組織的发展邏輯——它們早就把自己的力量扩张到国境綫以外，一直在設法使这种新扩张“正常化”和合法化。

但是，相应于这种双重起源，也存在着双重动态。一方面，交換的自由和更广泛市場的建立促进了一般工业更加迅速的——虽然也是更有差別的——发展。另一方面，資本主义垄断組織的联

---

① 像萊明頓·兰德、福特和通用汽車等美国公司，已經决定在欧洲全部生产它們的某些产品，然后从那里向美国再进口。

合和相互滲透則壟斷了这种发展带来的利潤，加剧了落后企业部門和集團間的竞争，并且在較后阶段甚至使壟斷集團內部也将发生爭夺欧洲“六国”领导权的范围深广的斗争——这将在普遍发展过程中造成突然的中断。

从共同市場提供的发展可能性上得益最大的是西德經濟。不过，法国的戴高乐政权所体现的法国雇主中进取的和有魄力的一翼，也正在設法保証自己在共同市場內部能得到大力发展。这样，在許多方面就建立了一种法德两国的共同領導，这在实践中便表现为統治着今日共同市場的巴黎一波恩政治軸心。在意大利，范范尼—馬蒂的傾向也代表資產阶级中最活跃的一翼，这一部分資產阶级正力图最大限度地利用共同市場的可能性为自己謀利。

只要整个欧洲經濟的高速度发展所引起的还只是瓜分利潤的問題，这种形势就将基本保持。但是，在若干“落后”的工业部門——煤炭、紡織以及明日的各种冶金和重化学产品部門——生产能力过剩的现象已經在整个共同市場內出现。从这一时刻起，将首先承担損失的是成本价格最高的那些部門和国家：法国的造船业；罗亚尔区炼鋼业；意大利的鐵矿开采业等。一到为现代化提供的投資不再增长，一到市場逐漸为耐用消費品所飽和，“竞争和合理化”趋势就将凌駕于“扩展和諒解”的傾向之上。各个壟斷集團內部将要进行的斗争以及这些斗争对劳动者生活水平的影响，将便利了西欧工人阶级的斗争——这首先是防御性的，如果获得成功，则进而轉入进攻，最后必然会出现围绕着欧洲問題文件中說明的过渡时期要求进行的工人运动的普遍复苏。

整个这一前景都是以下列假定为前提的，即至少是在过渡时期会維持这样一种經濟結構，其特征仍然是共同市場六国都各自維持着主要是“民族性”的私有財产。到这一过渡时期結束时，資

本的相互滲透便該位于單純的聯合之上。但是，在日益严重的衰退、全世界的革命以及上述欧洲工人运动的斗争給予資本主义以新的打击下，这些前景将經常因此产生問題。

## 十二、几种特殊情况

**美国：**在世界規模上变得日益不利于美国的政治、經濟和社会发展，使美国資产阶级面临着一系列在 1960 年总统竞选中已經清楚表明的选择。

为了对付世界市場上其他資本主义国家日益加强的竞争，美国資产阶级本應該日益对工資施加压力，拒絕任何新的社会改革，集中力量来提高生产力，并且利用愈来愈扩大的失业群众把这种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利潤完全归于雇主和用以加强美元的稳定性。为了保卫它的长远利益，它也本当使新的投資尽可能合理化，反对新增加任何公共开支，而在增加軍費时——从它的观点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則按相同的比例削減民用开支。

鋼鐵业巨头的态度表明，这一派資产阶级正准备实行这种政策。但是，共和党政府的反应已經清楚地表明，美国資产阶级的大多数負責領袖，不論是民主党或共和党，都了解这样一种借口从长远利益出发巩固資产阶级政权的政策反倒会在不太长的时间內摧毁这一政权。

事实上非常显而易见的是，正当苏联在它的历史上第一次准备实行新的和大胆的社会改革(7 小时工作制，然后是 35 小时工作周)时，对工会权利进行恶毒进攻并同时冻结或降低工資，肯定会使工人立刻发生猛烈反应(如鋼鐵工人大罢工所显示的那样)，惊醒那种使得劳工运动瘫痪多年的政治昏睡和冷漠，从而为美国預备下一場严重的社会危机。

此外，以維持“預算平衡”并同时保持很高水平軍費开支为中心的政策，不仅要限制美国国内的社会开支，而且会减少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它会使美国經濟的发展速度危险地緩慢下来，并且有使得美帝国主义在短期内把它对殖民地資产阶级仍然具有的一点影响丧失干淨的危险。

艾森豪威尔政府部分地遵循了这样一种政策；这就是它威信扫地的原因。在 1957 年的衰退以后，随之而来的只是一种繁荣的假象，而到 1960 年，忧心忡忡的经济学家就已經怀疑美国面临的究竟是一种經濟的水平发展还是一次新的衰退。通过洛克菲勒之口——正如通过肯尼迪之口一样，美国大壟斷資本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群正在号召——并且从 1961 年起将实际执行——彻底改变政策。他們將抛弃“稳定美元”的保守政策——一种不是反危机而是反周期的、使得經濟停滞不前的政策，而再次代之以一种增加公共开支(这被当做是加速經濟发展的主要刺激剂)的政策。他們將既增加軍事性的公共开支，又增加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援助，以便大规模地作下一次扭轉局势的最后努力，改变目前正在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一段不再是很长的时间內陷于灭亡的世界局势的发展。一个拥有五千亿美元国民收入并且还能动用巨額儲备的国家，可以冒这样一种危险而不用担心立即垮台。在这样做时，美国資产阶级将有意識地牺牲长远的稳定性以应付短期和不太长时期的需要。但是，在当前的世界局势中，它实际上也別无其他选择。

同时，竞争的迫切需要仍然使美国雇主不得不日益頑固地反对增加实际工資(国家在社会开支方面的增加，能够在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中緩和这一政策造成的震蕩)。对工会运动的敌視以及打算慢慢破坏其力量的企图将会加强。这样一来，客观条件就会

变得日益有利于工会中的工人先鋒队在一定程度上過問政治。这些条件将会为殖民地革命对美国劳动群众中某些部分(非洲革命对黑人、古巴革命对波多黎各人和知識分子等等)发生的影响所加强。在加拿大，目前正企图以工会为基础組織工党，这如果成功的話，也将有助于为美国劳动者提供榜样。

**日本：**日本經濟的特征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大工业部門和一个家庭工业及手工业部門的結合——前者为國內外市場生产資本商品和耐用消費品，后者以古老原始的方法从事操作，只是由于对极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才得以存在。就日本的資本主义——麥克阿瑟的土改尽管有种种局限和不足，仍然无疑为它創造了一个更較大的國內市場——說來，这两个部門的同时并存既解釋了它的力量何在，又說明了它的弱点。

在高度国际景气时期，这个国家的資本主义拥有几乎是无限制的人力后备(除去从事手工业的人力以外，它还可以动员那些在农业中实际就业不足的群众)。这支潛在后备軍对工資的压力，使工資即使在繁荣时期也保持很低水平。其結果是，它的积累速度便能超过在西欧或美国平常见到的任何水平。

但在另一方面，日本工业迅速发展的能力和日本人民几乎停滞的购买力之間的矛盾，使得日本資本主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更加依赖出口。现在，它已經失去其一部分傳統市場，而它打算扩大自己在世界市場中所处地位的企图則遭到了其新老競爭者(前者如印度、香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是在紡織品方面；后者如英國、西德)的猛烈反对。这样一来，日本經濟便比欧洲共同市場或英國更不稳定，更容易发生严重的衰退，而不得不实行大规模的結構再改变(发展强大的資本商品輸出工业；紡織工业的相对衰落；煤炭工业开始衰退等等)。

这种不稳定性并不会自动地对工人运动起有利作用。在工会分裂、大工厂工人日益担心失业和原始工业中的工人缺乏觉悟的情况下，它甚至会暂时造成工人运动的相对衰落。但是，大部分被剥削群众的必然觉醒加上更大的經濟不稳定，最終将会在日本形成一种在一切資本主义国家中最有爆炸性的局面。

### （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发展危机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經濟的一切局部的、暫时性的現象都为一种普遍現象所遮盖，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的开始被消灭，旧的經濟和社会結構的开始改变，土改和工业化运动。

正如在帝国主义国家一样，政府竭力通过直接和經常的干涉来支持經濟景气一样，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正是群众在支持着結構变革过程，正是他們强迫政府实行国有化或者只是防止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統治穩定化。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来，这一过程已經产生了中国、北朝鮮、北越和古巴等工人国家，并且始終不断地在扩大加深。正是这一过程使得帝国主义本国不論有什么暫时性的有利景氣，最后总会爆发帝国主义危机，正是这一过程肯定地促进了整个資本主义制度的危机。

当工人国家和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經濟一直在并且仍然在經歷着不同程度的迅速发展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看到它們在生产力和消費水平上落后于先进国家的距离更为增大。因此，它們正在經歷着一場作为殖民地革命基础的真正的經濟和政治危机——这是过去十年中主要的并且在今后十年中也将无疑是主要的

事實。·

不錯，當我們談到經濟危機時，我們必須具體說明這是一種“特殊的”危機，是一種發展不足的危機而並非標準的生產過剩危機，雖然某些徵象（某些產品的暴跌、大規模失業、勞動者的實際工資下降等）對這兩種類型的危機說來都是共同的。然而，儘管有這種“特殊的”危機，工業生產的增長，也就是說工業化的过程依舊在進行，只不過是其節奏抵不上先進國家，完全不足以改變國家結構，特別是無力改善群眾生活水平而已。

舉例說，拉丁美洲的工業生產指數就從 1950 年的九十一增加到 1953 年的一百和 1958 年的一百三十六。可是，這種增加仍然比歐洲六國（更不用提日本、蘇聯和中國了）低得多。而且，世界上的大部分不發達地區在生產的增長上都還不及拉丁美洲；印度半島和東南亞的情況特別是這樣。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經濟所表現的發展日益不足，既有其時機性的又有其結構性的原因。前者關係到在這些國家的出口中占主要地位的輸出原料的價格（有時候甚至還連同其數量）的下降趨勢。後者關係到這些國家中嚴重妨礙迅速工業化的封建一資本主義結構的主要後果。

### 十三、帝國主義體系和殖民地革命

投資於落後國家的帝國主義資本獲得的利潤（它們在宗主國起有重要作用），使得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不可能進行原始積累。和帝國主義宣傳家今天所鼓吹的剛剛相反，正是世界上的落後區域部分資助了先進地帶。

使落後國家的經濟可以從資本主義世界市場資源部分得益的一向是原料輸出。然而，交易條件的不利發展甚至使這種可能性

也受到了限制<sup>①</sup>。 帝国主义国家本身在原料生产方面的发展(石油和合成汽油; 合成橡胶; 人造絲、尼龙和其它合成纖維等)以及像非洲这种新原料产区的开发(特別是咖啡、棉花、可可、銅、錫、鋁等), 更加深了这种局势。

此外, 帝国主义——特别是在朝鮮战争以后, 还有意識和有組織地設法压低原料价格。作为施加压力的手段, 美国主要利用它自己的國內資源, 特別是农业劳动生产力空前发展所造成的剩余农产品, 以及它本国的矿藏和石油产品等。至于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宗主國內不生产的原料, 它們則組織大消費者市場把自己的条件和价格强加給原料生产国。国际錫理事会<sup>②</sup>, 国际糖业协定, 以及有关咖啡、棉花等协定就是这种情况。

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权采取的某些反措施, 是限制外国資本所得利潤的送回本国, 建立不同的外汇制度、执行有利于本国工业的保护貿易主义措施, 特別是提高进口工业制品的价格。但是, 帝国主义通过积极干涉硬把为抵制其扩张正在关闭的大門打开。它利用殖民地国家收支差額中逼人的赤字、危机和困难, 迫使它們給予外国資本以不受一切經濟和財政控制的“自由”。特别是在拉丁美洲, 伊德計劃(玻利維亞)、克兰一薩奇計劃(智利)、勃列比奇計劃(阿根廷)以及国际貨币基金組織的直接干涉, 通过强迫这些国家放弃对外汇的控制, 表明帝国主义认为保持这些国家的經濟繼續向它的剥削开放是如何必要, 表明它是如何需要这种剥削来保卫美元。

---

① 根据关税及貿易总协定发表的情报, 从 1953 到 1958 年, 整个非工业化地区可以用它們的出口抵偿的工业制品的比例, 已經从 90% 下降到 64%。

② 以錫为例, 美国采取的办法是通过外汇活动以低价积下巨大数量的存貨, 然后, 在当价格趋于上涨时, 使用这些存貨对市場施加压力。

当帝国主义企图利用所謂“援助”計劃來緩和如此加剧的矛盾时，它实际上并不能解决引起的任何問題。帝国主义的援助只等于它本身正在从落后国家榨取到的剩余价值的一小部分。要保証它們的工业化和全面經濟发展，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将不仅需要把本国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都化为資本以及为它們的原料取得公平价格，而且要接受这样一笔淨投資形式的援助，其数量至少要比目前所有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工人国家每年提供的“援助”总和大十倍。

“第三世界”的某些地区已經接受投資，并且經歷了一种并非不重要的工业发展：例如南非联邦、南北罗得西亚、前比属刚果、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智利以及印度和亚洲其它地区。委內瑞拉和近东产石油国家已經得到巨額矿区租借費，然而这并没有能緩和社会矛盾，反而加剧了阶级的两极分化和国内局势的爆炸性。

**土地改革**或为爭取土改进行的斗争，提出了让半数以上的人数过文明生活的問題。它正在动摇本国地主或占有最好土地的白种殖民者（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怯尼亞、南罗得西亚和南非）的权力，和資本主义种植园制度发生直接冲突，并且推倒了多年以来一直把公社或部落（在热带非洲、秘魯、玻利維亚和印度）和外界隔絕的墙壁。

在这类国家中一般包括大多数农民并且占有大部分（虽然不是最肥沃的）土地的这些人口的觉醒，要求有巨額投資使他們摆脫落后状况。玻利維亚土地改革的长期停滞就証明了这一点。土改本身及其所引起的经济发展問題，不能在資本主义制度的范围以内得到解决。它要求沒收和驅逐以前的主人，要求有以获得其所耕土地的千百万小农为基础的大規模投資計劃。因此，土地改革的发展便加剧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危机，从而为正在努力消灭全世

界資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提供了客观的——甚至也是主观的(这种程度已經越来越大)——支持。

由殖民地革命推动的另一个巨大經濟进程就是工业化和普遍发展經濟。和土改一样，它植根于群众要求改变本身生活状况的深刻願望之中。而且，也和土改一样，它很快就和資本主义本身发生冲突；和以下种种問題发生矛盾：帝国主义强加給这些国家的片面的劳动分工、國內市場的狹小、拉丁美洲、阿拉伯世界和热带非洲的內部分裂，資本的缺乏，以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生产的剩余价值有很大一部分被送回帝国主义国家等等。資本主义不可能通过土改使广泛阶层的人口摆脱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状态，从而把他們包括进國內市場。

只有由国家积累資金——特別是通过沒收外国企业和本国地主的办法——才能部分解决这一問題。这样，社会生产剩余才能集中在一个工农政府手里，这个政府将利用它同时发展經濟和改善群众生活水平，其办法則是大规模地动员起潛藏于巨大数量失业或就业不足的劳动者中間的生产能力。这就是殖民地革命可作的另一抉择，它已經通过中国革命迈上这条道路，今天正在接近古巴，并且已經开始为它本身在非洲的某些地区开辟途径。

#### 十四、封建—資本主义結構，迅速 工业化的一个阻碍

除去开始于 1952—53 年的、不利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交易条件的逆轉以外，这些国家的封建—資本主义社会結構一直是迅速工业化的主要障碍。一般讲来，特别是在黑非洲和东南亚，占人口絕大多数的农民的极端貧困——他們不是仍然过着原始生活，就是被地主、高利貸者和商人的联合吸干血液——造成了

國內市場的不够廣闊，因此不足以刺激私人大工业的发展。这些地区——拉丁美洲、黑非洲和各阿拉伯国家——的分裂状态又进一步限制了國內市場。其結果是，并不总是有限的可用于积累的資金，便被專門用来从事土地投机、商业、放高利貸或送往国外。

那些生产大量石油的国家(委內瑞拉、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近十年来已經积累了几十亿美元的矿区租借費，但却并沒有因此經歷真正的工业化过程，其秘密就在于此。这一笔可观的資本大部分都被用于基础工程或壮观瞻的建筑(在加拉加斯、德黑兰等地)，大量进口奢侈品以及兴办只是輔助石油生产的工业(炼油厂、港口、化工厂)。在那些于同一时期主要由于战略原因而接受数十亿美元的国家，如南越、南朝鮮、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则以甚至更为巨大的规模重复着这种浪費。

即使在本地民族資产阶级相对說来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印度、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它采取主动的方面也只限于消費品部門。直接和帝国主义发生冲突和競爭的建設本国重工业的努力，一般都必須由国家来承担。随着重心由計劃或准备轉到实际执行，它所遇到的社会和經濟阻力也越来越大，并且常常会由于部分統治阶级的节外生枝而重新成为問題(曼德列斯統治下的土耳其、弗朗迪西統治下的阿根廷等)。

在墨西哥、埃及、印度尼西亚或玻利維亚这些国家，重要的帝国主义产业已被沒收，但却还保持着資本主义的經濟經營，在这种情况下，这类国有化产业正在趋向于变成私人財产的营业領域和職員及官僚私人发財致富的泉源——这便使国有化产业亏本倒欠、丧失信用和不适于作为发展經濟的积累来源。

埃及、墨西哥、委內瑞拉的貝坦科尔特或印度的尼赫魯这些政权完成的土地改革，只是一种資本主义的土地贖买，目的仅在于緩

和农村中的矛盾，而并不打算解决使耕者有其田的根本問題或者提供发展农业生产的投資。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資产阶级本身正在为内部矛盾所动摇。弗朗迪西指望依靠帝国主义发展重工业的企图，也許已經在牺牲輕工业——它是在庇隆政府任內发展起来的——短期前途的情况下如願以偿，这就是說它正倾向于通过加强对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剥削，即限制輕工业的国内市场来积累資本。

既领导着一場反对这些解散工业計劃的經久斗争，同时又实际保卫着已經取得的工业化水平使之不受資产阶级本身破坏的，正是工人阶级。

通过地区协定克服分裂敌对的打算只是一些效果不大的措施——例如过去有关中美和大哥伦比亚的協議或者目前的拉丁美洲“自由貿易区”，它們只有助于維持和国际貨币基金組織簽訂協議以前存在的地区貿易的某些特权而已。一般讲来，即使在半殖民地国家之間差別也是很大的，因此，地区协定将意味着比較发达的国家享有特权，而比較落后的国家打算工业化企图則会受到它的妨碍。

## 十五、殖民地革命的經濟影响

殖民地革命影响了整个資本主义体系，并且在今后将继续破坏它的基础。无论是在殖民地国家或宗主国本身，都直接感受到了它的影响。

在不发达国家，殖民地革命刺激起群众要求福利的願望，从而妨碍或阻止了資本主义的財政和經濟“稳定化”，損伤了利潤率，使得任何长远的私人投資都越来越带有投机性和冒险性。殖民地革命通过有力地施加有利于这一地区工业化的压力，倾向于縮小现

在还对资本主义宗主国开放的市場(这些宗主国已經由于資本主义在大片地区的消灭而丧失了很多銷售地)。此外，它还給宗主国工业生产者带来新的競爭对手，并且就它自发地和工人国家結成同盟的程度而言，它也威胁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場，使它們的出口品为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等所排挤。

在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殖民地革命減少了以向海外国家輸出作为对付資本主义生产固有的生产过剩趨勢的安全活門的可能性。通过减少或消灭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輸出的資本投資的收入，它动摇了收支差額的平衡，縮小了資产阶级在反对无产阶级斗争中的活动余地，并且倾向于迫使它采取一种可能有造成社会危机之慮的节约政策。

不过，殖民地革命的这些經濟影响只是在长远中才会被感受到，而且其大小完全和它使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脱离整个世界資本主义体系的程度相应。目前，在整个第一阶段，帝国主义企图通过把不发达国家的政权移交給民族資产阶级；来保存它在那里的必要地位。只有在同时发生把投資于該国的外國資本收归国有和对外貿易轉变基本方向的时候，政权的这种轉移才会是对帝国主义的严重打击，尽管以往十年中有过某些国有化的壯举(如伊朗的石油工业和苏伊士运河)，一般讲来，卷入殖民地革命的大多数国家并沒有全盤脱离世界資本主义經濟。这就是迄今限制着殖民地革命对資本主义宗主国經濟立即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

在这方面，古巴的革命經驗在殖民地革命中开辟了一个新阶段。这次革命甚至在为无产阶级所領導以前，就已經第一次把投資于該国的主要外國資本收归国有，并且使古巴的对外貿易根本轉向工人国家。如果說这些发展对美国或欧洲資本主义經濟的眼前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它們却具有一种展示出未来一般傾向的历

史意义。相應于未來十年中若干國家的殖民地革命超越資產階級民主領導阶段的程度，它对資本主义宗主國的經濟影响将日益加大。如果“第三世界”(印度、巴西、中东)集團全部脱离資本主义世界市場，这些影响就将变成灾难性的。

今天的殖民地革命以一种尖銳的形式表现了資本主义体系的世界危机。不过，这种危机轉化为世界資本主义經濟危机的程度，完全要看它对最重要工业資本主义国家——美国、共同市場、英國、日本——的經濟起有多大破坏作用。我們根据經驗可以指出，在短期以內，这种破坏作用的大小大体上要完全取决于殖民地革命超出民主資產階級領導的程度。

## 十六、迄今限制着殖民地革命之經濟影响的因素

过去十年中主要的矛盾現象恰恰就在于下一事實，即：尽管存在着一个把不发达地区和工业化地区联系起来的資本主义世界市場、尽管殖民地革命有巨大进展，尽管各种力量的对比发生了不利于資本的全球性变化(这愈来愈損害投資的长远安全)，尽管有这些情况，先进資本主义国家却仍然能享有相当迅速的工业发展。归根結底，其唯一的解釋只能是，有一系列暫时限制着殖民地革命对宗主國資本主义經濟产生影响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因素大部分已經由第五届世界代表大会关于經濟和政治前景問題的提綱所指出，它們是：

(1) 帝国主义在已經开始殖民地革命的国家中仍然維持着重要地位。这既适用于資本投資，也适用于工业产品的市場。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伊拉克，在那里，尽管已經开始革命，大量紅利仍然在不断流向伦敦商业中心区。英國每年仍然从它的对外投資中获得总数大約为三亿五千万英鎊(九亿八千万美元)的收入。以市場

而言，在 1959 年，英國出口商品中仍有 53%、法國有 44%、意大利有 27%、西德有 25% 是輸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以及英帝國自治領的。

(2) 在不发达地區內部喪失的市場由新市場所代替。例如英、法、荷等國在它們的前殖民地失去的市場，已經由於向其他“有聯繫”領地（對英國來說，特別是澳大利亞、南非、加拿大和中非聯邦；對法國來說，特別是黑非洲和阿尔及利亚；對荷蘭來說是荷屬西印度群島）或者其伙伴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輸出的繁榮而得到部分補償。

(3) 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的貿易為工業化國家之間的貿易所代替。一般說來，自 1953 年以來，工業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一直在以一種快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和不发达国家間的貿易發展的速度向上增長。在這方面經常存在着兩種突出現象：

其一是美國已經成為大多數殖民強國的一個重要市場，它們在那裡部分找到了在別處喪失的銷售地：

#### 賣給美國的商品在出口總額中的百分比

國 家	1928	1938	1950	1959
英 国	6%	4%	5%	11%
法 国	6%	6%	4%	8%
意 大 利	11%	8%	6%	12%
荷 兰	4%	3%	5%	6%
比 利 时	8%	7%	9%	14%

至于日本，它目前的出口商品中有 30% 是輸向美國。

其二是共同市場內部貿易發展的目前速度要比共同市場和世界其余地區間貿易的发展快得多。

(4) 原來需要進口的產品為國內的產品（及市場）所代替。这

既适用于合成工业或国内新兴的原料工业(意大利、法国、德国、荷兰的石油;意大利和法国的沼气;美国、加拿大和法国的鉻等),也适用于以本国制合成紡織品和耐用消費品逐步代替向国外购买食物或紡織品。

#### (四) 今后十年世界經濟的前景

根据这里和关于殖民地革命的決議中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基本經濟趋势所作的分析,显然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目前将继续向着与世界其余地区相反的方向发展,而且无疑在整个一段时期內将继续如此。一方面在世界上的工业化地区,产量和按人口計算的收入已經达到很高水平,或者正在非常迅速地发展(工人国家)或迅速发展(西欧和日本),另一方面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按人口計算的收入和产量却繼續陷于停滞或者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开始提高得非常緩慢。

工业化的資本主义国家和工人国家在这种形势下,正設法根据自己拥有的資源以及它們所体现的阶级力量来对付这种情况。但是,資本主义經濟的前景仍将越来越多地为日益加深的帝国主义危机所支配,特别是在殖民地革命达到受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領導阶段的意义上說来是如此。

#### 十七、在援助不发达国家方面的競爭

从純經濟观点看来,資本主义国家今天拥有的資力超过工人国家,因为它能够发动一个规模更大的援助殖民地資产阶级的运动。它們不仅要富有得多,能够使它們在机器和人力方面的儲备力量在这方面产生效果,并从事更丰富的資本商品的当前生产,而

且它們不像苏联，沒有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强大的盟国經常对它施加压力，这个盟国为了自己的发展，需要耗用掉苏联的大部分现有資源。

工人国家的优越性在于：它們的援助虽然数量較少而且是出于政治原因給予的，一般說来却和可能改变这些国家落后結構的运动和企业有直接联系。这种援助之所以会重要和有成效得多，而在今后一些年内将越来越是这样，其原因正在于此。正如埃及和其他国家的事例已經證明的那样，古巴的事例說明，这种援助是使它可以避免帝国主义国家的报复和經濟封鎖企图的一种支持力量。

誠然，美国的共和党政府由于对美国收支差額的不利发展感到不安，有一个时候在給予不发达国家以贈款和信貸上甚至有所遏制，借口要用这种訛詐手段来迫使它在西欧的盟国——首先是西德——作更大的牺牲。但是这种政策——最后以政治上的消极和无所行动告終，并且使得美国資产阶级只能在以下两者之間进行选择：在殖民地革命更为扩大的情况下，进行有計劃的軍事干涉，或者干脆投降——正在美国本国和西欧世界资本主义的領導集團中間引起越来越大的煩惱。

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政策就会改变，而且我們会看到美国給予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比以往多得多。这种援助非常可能是有选择的，要看华盛顿认为以下哪个地区最危急和最有战略性而定：拉丁美洲(首先是巴西、墨西哥、委內瑞拉、也許还有阿根廷)、印度、土耳其、伊朗，也許还有印度尼西亚。

但是，帝国主义执行这个計劃的具体可能性碰到了严重障碍，特別是就美帝国主义的情况說来是这样，因为在扩軍备战的巨大負担下，它在財政上已經日益衰弱。

此外，它还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本身遭到各种社会障碍，在半殖民地国家中，这些障碍将严重地限制这些“援助”计划的效果。

(1) 私人資本很不願意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可以与宗主国的工业竞争的加工工业。因此为此目的給予的援助将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援助(受各該國資源的限制)，因为美国政府可以为了資产阶级的集体利益而超出这个阶级中某些部分的狭隘經濟利益的范围，就如它于 1945 年以后在西欧所做的那样。

(2) 这样一个計劃的規模本身不足以在短时期內改变群众的貧困与不满，也不足以制止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革命形勢的高涨。只有在某些有限的情况下，并且要經過一段时期以后，它才可能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此外，提高生活水平并不能自动地对群众起涣散革命斗志的作用。

(3) 在大多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沒有一个足夠广泛的資产阶级社会阶层能夠把这种援助全部用于生产方面来促成真正的經濟高涨。在这方面，不仅像蒋介石、李承晚和伊本·賽义德这些过去的政权，甚至比較近的国家，如伊朗、土耳其、南越和老撾問題，都是很大的。

无论如何，“援助”計劃絕不会稳定这些国家的經濟形势，这是由于革命过程和这样一个事实：不論接受这种援助的資产阶级阶层的本性如何，最后它总是与群众运动相对立的。

事实上，帝国主义想和暂时领导群众运动的民族資产阶级达成協議的企图就要依靠牺牲进步事业来实现：他們尽管避免沒收企业；他們用不充分的措施来代替土地改革，他們贊成通过过分割削工人来积累資本，这就使得一切矛盾原封不动，依然得不到解决，而且起了把革命运动与民族資产阶级的領導分开的作用。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最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在今后一些年内，给予不发达国家的支援，也就是說資产阶级的援助以及苏联的援助将继续增加，美帝国主义将格外努力通过对殖民地資产阶级的某些部分作重要让步以使他們依附自己。但是从这些国家目前的社会和政治情况来看，不論是在短期内还是不长不短的时期内，这种援助都不能制止殖民地的革命。

### 十八、工人国家与資本主义国家之間的經濟競爭

至于苏联与美国之間，以及所有工人国家与資本主义国家之間的直接竞争，假定目前的趋势大致继续下去，可以断定說：到 1970—72 年，苏联的产量极不可能超过目前美国按人口計算的产量，至于像赫魯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所說的那样，工人国家的产量在 1965 年就将超过資本主义国家的产量，那就更不可能了。只有在美国和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的經濟完全陷于停滞的这样一个非常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下，这两个預測才能成为事实。比如，苏联人士自己就承认，在 1959 年，工人国家的电力总产量只占世界总产量的 20%，鋼鐵产量只占世界总产量的 31%。这些数字表明，要实现赫魯曉夫的不是非常郑重其事的預測，在六年內需要取得多大成就。

不錯，並不是絲毫沒有这样的可能性：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苏联的产量可能赶上美国按人口計算的产量，特別是如果在有关年份（不論是 1965、1970、1971 还是 1972 年）发生严重萧条的話。但是如果要从中归纳出两国經濟力量的对比或人民的生活水平到时候就会相等的結論，那就是自欺欺人。

至于經濟力量的对比，必須考慮的是生产能力而不是目前的产量。至于生活水平，在目前的产量之上必須加上的是在十年或

几十年內积累的耐用消費品的总数。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今后一二十年有希望成为資本主义国家在經濟上对工人国家保持一定领先地位的最后一个历史时期。但是这种领先地位会逐渐下降。因为随着衰退越来越广泛，生产能力与目前生产之間的差距在越来越多的工业部門日益加大以及殖民地革命使越来越多的国家退出資本主义的世界市場，这种优越地位可能时常因为工人国家在当前产量上已經赶上資本主义国家水平而短时期中断。

必須进一步考慮到，工人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以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經濟动态是得到以下超經濟因素支持的：为建設第一类国家而奉行的国家政策和对群众的动员，在第二类国家中国家进行的干涉以及在第三类国家中革命进行的干預。

衡量国有化計劃經濟(不同于資本主义經濟)成就的标准不仅是它的发展速率以及即使是在官僚主义領導下目前在提高群众的消費水平方面取得的成績，而且还有这样一个事实：經驗說明，的确唯有这个制度才能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即全人类的四分之三——摆脫落后状态、建立现代化的經濟，并且按照群众的需要来利用它們的資源。以中国为一方，以印度与所有其他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为另一方的对照証实了这一点。这个事实成了对于群众革命运动的具体鼓舞力量。

下一个阶段工人国家与資本主义进行競爭时将不仅通过苏联和中国的五年計劃以及帝国主义能够利用来避免最坏的危机和維持有利景气的手段，还要通过这个或那个政权所表现的解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发展需要的能力。

必須补充一句：美国資产阶级是意識到在这場競爭中所下的决定性賭注的。它将动用所拥有的一切資源来加快美国工业的发展速率；使它的工业在技术和工艺上对苏联工业保持一定的优越

地位，并在它失去其最后一张王牌以前，迫使对方摊牌。

## 十九、政治結論

殖民地革命的新高涨、帝国主义制度的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对工人国家保有的經濟領先地位的下降意味着世界資本主義力量与反資本主義力量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有利于反資本主義力量而不利于資本主义力量。力量对比的这种改变将相继从社会方面发展到政治一軍事方面，最后再发展到經濟方面。我們的运动在 1950 年就首先強調了这一根本变化，它沒有理由只是因为苏联官僚机构的領袖和全世界斯大林主义政党的首腦也正在——已經晚了若干年——作这种估計就把它放弃。

工人国家与殖民地革命之間的联盟可能在今后几年使力量对比的这种变化飞速发展。通过动员过去历史上聞所未聞的人力資源，通过第一次在非資本主义基础上以世界規模利用經濟資源，这个联盟具有无限发展前途。这种联合发展——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对帝国主义制度和官僚主义控制都是不利的，虽然可能出现过渡性的新官僚統治形式。

这种强大的革命发展不仅危害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的統治，并且由于它提出了在工人和被剥削群众进行监督和領導的基础上，对經濟发展問題作出協調而科学的解决，这就使革命先鋒队的影响在今后有可能日益增长。为了在下一个阶段指导这些革命运动，非常需要一个解决这一发展阶段中經濟改革和管理問題的过渡性綱領。

但是，我們的估計和赫魯曉夫以及各国共产党机械論估計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辯証的，也就是說包括今日现实中的所有矛盾

因素。我們懂得，儘管力量对比发生了这种有利于世界上反資本主義力量的变化，美帝国主义仍然在經濟上处于实际領先的地位，仍然拥有巨大的潛力，我們还懂得，資本主义在西歐已經經歷并且正在經歷着一种表现为資产阶级的自信心有所增强（有时候甚至超过了美国資产阶级中某些部分的自信心）的新高涨。

在这种情况下，要期望世界形势通过美国对苏联的經濟領先地位的下降（甚至是丧失）而发生根本变化，那是絕對虛妄和危险的。

降低这种領先地位不会使美帝国主义丧失任何这样的武器，这种武器现在和将来都使它能够在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过程中的任何决定性时刻，发动一場自杀性的防禦战争。

此外，如果資本主义欧洲的經濟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苏联的經濟进展同样不可能自动改变那里的社会力量对比而有利于无产阶级，更不用提有利于共产党了。

由此看来，期望单单从工人国家的經濟进展上就产生奇迹，所謂“和平共处”战略是以两个完全不切合实际的假說为基础的。这种战略主要表现的不是苏联社会广大阶层“不惜以任何代价实现和平”的决心（經過几十年来不断的受苦和牺牲，这种决心无疑是存在的），而是苏联官僚阶级在世界革命获得新进展的情况下所感到的恐惧。这种战略是极为保守和涣散人心的，因为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使国际工人运动（包括殖民地国家的群众在内）的作用降低到只是对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資产阶级施加压力，以便迫使他們接受“共处”。

不錯，絕對不可能也要求苏联政府使用“核战略”，要求它利用目前在核弹头导弹方面的优势来消灭这个或那个国家，或者甚至是全世界的資本主义。奉行这种政策的結果不会是共产主义在全

世界取得胜利，而会是文明或者甚至是全人类的消灭。

問題在于懂得这样一点：只要帝国主义繼續拥有它今天仍然拥有的力量，核战争的危险将继续存在，而且在今后二十年內，工人国家中的任何发展都无法剥夺帝国主义的这种力量。因此，問題在于最大限度地利用目前在某些国家存在的有利条件，以便那些国家的劳动人民从内部打击世界资本主义，以保証工人运动在它暫时停止的国家中恢复。这是决定性地解除帝国主义的武装并防止核战争浩劫的唯一方法。

有人說，工人政党奉行的这种政策会“刺激”帝国主义，他們忘了解释，为什么他們不同时贊成制止同样“刺激”帝国主义的、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

**只有在最强大的資本主义国家中革命获得胜利，才能肯定使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对这場战争的恐惧远不会使群众人心涣散，倒可能成为使資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态度趋向激进的主要力量(如日本和英國已出現的情况那样)。把这种恐惧化为一种强大的反資本主義武器——这就是迄今为止为共产党所可耻背叛的工人政党的責任。因为对于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說来，推翻資本主义不一定預先要求存在生产过剩的严重危机；可能由于政治和社会危机而将推翻資本主义問題列入議程，有了这种危机，就可以对群众进行革命动员，尽管在經濟上并沒有发生灾难性情况。

千方百計推動殖民地革命，使它对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取得新胜利，将日益損害資本主义經濟的相对稳定性，从而也有助于恢复資本主义国家中的运动。

第四国际正是用这种战略——革命的、现实的和負責的战略——来对抗“和平共处”的神話，这种神話在劳动者的队伍中播下

了精神沮丧和消极的种子，并且使资本主义保有迟早会把他們拖进一場残酷核战争的力量。

## 4. 殖民地革命

### ——它們的比較、問題和前景

#### (一) 总論

##### 一、殖民地革命持續高涨的原因

过去十年来，殖民地革命的不断高涨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內革命工人运动的长期停滞是一个显明的对照。

战后时期殖民地革命的高涨是由一系列因素产生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則缺乏这些因素或者其剧烈程度已不如过去。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是和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財經状况的恶化同时发生的。

这些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由于大量輸入美国資本以及由于战争結果引起了世界各国在恢复建設和发展工业方面的广大需要而得到了好处，使資本主义在更高的生产水平上得到了新的周期性的发展。与此相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战争期間和战后初期所积聚的資本都很快地消耗淨尽，并且由于先进国家所取得的絕對或相对的进展而越来越被抛落在后面了。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經濟发展的标志是工业化，虽然其工业化的过程是急促的和不平衡的，但一般还没有中断过，这种情况对于先进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是有利的。

同时，資本主义国家也从技术和科学的成就得到了好处，增加

了某些农产品和原料的自給而使这些产品原料的輸入價格下降，对附属国保持了有利的貿易差額，更好地防止通貨膨胀。相反的，附属国的貿易差額愈来愈恶化，并且正在同瘋狂上涨的通貨膨胀进行掙扎。

由于附属国的人口增长率比生产发展得更快，因而附属国无论在絕對生产量和按人口計算的生产量方面都落后于先进国家。

根据这种发展情况，附属国有着不同的經濟結構和社会結構，并且在历史上也是发展比較晚的。一个国家要赶上先进資本主义国家现有的发展水平，必須有一个发达的經濟基础作为起点，并且必須拥有技术熟练的人力和按人口計算比例很高的投資。

现在附属国在这个竞赛中受到結構上的障碍。他們的經濟基础薄弱，国民收入比較低，并且由于他們目前收入有限以及由于他們所創造的剩余价值大部分回到帝国主义国家的腰包里去，因而未能积聚足够的資本，而属于本国寡头政治的大部分資本則被用于进行高利貸、获取商业利潤和租金方面。

在这些国家里，要从国民收入中积累 15% 到 20% 的資金以供实行大规模工业化的需要，在目前的具体情况下，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就其中的多數国家來說，如果沒有其他資源的支援，即使这个比数也是不够的。

在那些其結構已經是資本主义的国家里，这些資金来源通常是以公共投資或私人再投資的形式出现的外國資本。即使他們找到这些資金来源——尽管它对于不能获得平均利潤的投資有保留权——，其数目要大大超过目前給予“落后”国家的每年开支的总数(包括苏联給予这些国家的数目在內)：从四十亿美元到二百亿

美元以上，如果不是更多的話<sup>①</sup>。

資本主义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在这种情况下——然而决不低估帝国主义更广泛地“援助”所謂“落后”国家(印度、拉丁美洲、非洲、阿拉伯国家)的新企图——，必須預见到在今后的年月里，这些国家同先进国家之間絕對的和相对的(就其含义而言)悬隔将会扩大。

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經濟和工业的发展(虽然不会不是稳步发展的)将在具有高度爆炸性的和与先进国家大不相同的条件(它不仅有衰退、失业和通貨膨胀，而且有真正的萧条)下来完成。

由于附属国同已开始了新的周期性发展的先进国家比較起来，在历史上发展得比較晚，以及由于附属国的发展遭到他們自身的經濟和社会結構、封建資本主义者及滲透了資本主义的部落地区的障碍，这种不同的經濟状况，說明了附属国群众革命活动力量强大和不断更新、而先进資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工人运动却在衰退的根本原因。

目前正在鼓励着殖民地革命运动高涨的另一个原因，明显地是由于帝国主义的衰退和工人国家(指社会主义阵营——譯者)力量的日益强大，以及由于战后时期殖民地革命的領導阶层一方面同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同工人国家的官僚机构所建立起来的新的关系。这些拿破仑式的領導阶层主要是由那些追求本国經濟发展的分子組成的，他們由于工人国家的存在、工人国家的势力和財富以及由于他們对帝国主义的敌对态度(显然是为了加强他們的拿破仑主义的作用和进一步努力摆脱帝国主义的直接控制)而得到好

---

① 据联合国专家們的估計，在三十五年内，要把现在每人每年有一百美元的人口(即大約十六亿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一倍，每年需要的款項将达到二百亿美元。但是其他的估計則把这个数目提高到五百亿至六百亿美元或甚至更多。

处。

殖民地革命在实现了它的基本目标——从帝国主义統治下取得形式上的独立——之后并沒有結束。它繼續力求完全清除帝国主义的余殃和一切經濟及社会的桎梏，爭取經濟的迅速发展和实行工业化。这些附属国的人民群众越来越感到难以抑制的迫切要求就是要很快地达到先进工业国家的水平和弥补他們在历史上的落后状态。

正是因为这个原故，所以一般來說資產阶级和小資產阶级能够起領導作用的殖民地革命的反帝阶段，现在正让位給提出了附属国的迫切的經濟和社会要求的更高阶段。特別是拉丁美洲許多形式上独立的国家、中东和北非的国家以及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錫兰等国家的情形更是如此。在古巴，不断革命的必然发展过程已使这个国家的革命突破了資本主义的界限。

在这种情况下，殖民地革命在世界革命中已占居先鋒的地位，并且是它的主要力量，包括重新觉醒起来的先进国家內的革命斗争在內。由于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內革命的迟緩（这是由于上层领导的背叛和資本主义新的經濟发展相互影响的結果），殖民地革命同工人国家日益壮大的力量联合在一起，在客观上已成为世界革命的动力。

在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特別是欧洲的資本主义国家內，由于这种联合力量的外部压力（至少部分地是由于这种压力），在一个对目前这些国家的資本主义更为不利的新的經濟危机中，重新喚起革命是极有可能的。

## 二、殖民地革命和帝国主义

这种不可抗拒的群众运动的力量正在不断地把殖民地革命推

向更先进的地位，帝国主义已被迫不得不采取更间接和更灵活的依赖(DEPENDENT)形式。英、法和比利时帝国主义最近的所有例子都清楚地表明了这种趋势：许多昨日还是殖民地的领地今天已提升为自治区的地位，或是同宗主国的联系有更大的伸缩性的自治领地位；许多国家在形式上已完全独立。

帝国主义——至少是其中更开明的势力——目前正在力求通过把政权移交給当地的上层领导集团，以维护对自己有切身利益的經濟地位，它正在企图用付出这种政治和經濟权力来发展和收买当地的上层领导集团。帝国主义的这部分势力已认识到，不論是采取欧洲人直接統治的形式，或是采取不是广泛独立的、更为灵活的当地政府的形式，要想长期統治下去是不可能的。

在存在着当地上层领导——知識分子和其他阶层的人士，实际上是或可能是資产阶级或小資产阶级分子——的地方，帝国主义力图依靠他們，立即地或分阶段地把政权交給他們，并通过和他們一起对他們本国共同进行經濟剥削的办法来收买他們。但是帝国主义在这項事业中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当地的领导阶层沒有足够发展的力量来担负这个角色，在他們面前的是声势猛烈的群众运动，群众所要求的生活条件是資本主义沒有能力保証的。

各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特定地位取决于它的力量和它所面临的具体形势。

及时地从亚洲解脱出来的英帝国主义，在成功地維护它在印度、巴基斯坦、錫兰、甚至馬来亚等国家的主要利益的同时，考虑到中非洲和南非洲的特殊形势，当地的大量欧洲移民，以及数量巨大的投資岌岌可危，现在也企图在非洲采取同样的办法。但是甚至在这些地方，帝国主义现在已冷靜地看得见，終有一天爆炸性的种族歧视政策和少数欧洲人的独裁专权要被迫让位給当地大多数人

民的政权，尽管人們必須預见到这些少數人會進行激烈和長期的反抗。

法帝国主义目前已被迫要跃越几个阶段，从帝国到父子关系的“共同体”，从而进到“革新的”共同体，即諸如现在已取得“国际主权”的、在形式上多多少少是独立国家的联合体。法帝国主义现在只是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着絕望的反抗，那里居住着数量甚多的欧洲人，而且拥有撒哈拉的不可估量的財富。

比利时帝国主义在一度傾向于进行短暫的然而无能为力的反抗之后，已被迫允許刚果独立。

葡萄牙帝国主义——它知道它的殖民地如果取得独立，就会暴露(葡萄牙)独裁政权的軟弱无能和断絕它的大部分經濟和財政来源，而为独裁政权敲下丧钟——仍然在进行反抗，保卫它的奴隶式的統治。但是这样就更有理由說明，在目前国际斗争和非洲斗争中，它的不可避免的崩潰将会更加猛烈。

至于美帝国主义，它的殖民政策更是多种多样。除了在波多黎各之外，它都避开直接的統治，但在它拥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和战略利益的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如中美洲、南越、南朝鮮、泰国等地)，它毫不犹豫地支持当地的残暴政权。相反地，在非洲，由于它必須同吃到直接統治苦头的老的帝国主义对手进行斗争，因此它就給自己戴上“解放者”、“自由主义者”的假面具，企图通过物质“援助”的手段來討好正在形成中的当地資产阶级。

对于帝国主义來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經濟上和部分战略上的重要性仍未消失(就取得原料供应和輸出工业品甚至輸出資本而言，不过最后一个因素的重要性同其他二者比較起来已經減少了)。而且，对于发动突然袭击有利的原子战争的战略，提出了生存的問題，从而导致(战争)基地分散在世界各地。

在这决定性的竞赛中，由于形势的压力，帝国主义必须同工人国家对抗，因而保持它在附属国的势力比过去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个竞争——假定它将“和平地”持续一个时期——包含着一场比过去激烈得多的夺取经济权力的竞赛，其中最重要的后备力量仍然是附属国的资源和工业化。

在今后十年内，帝国主义参加这场竞赛有以下几个不利的方面：群众对它的历史记忆犹新；由于它的结构，它没有能力给予有效的援助；内部分裂，已经重建或超过过去的势力的强国之间在最有利于积累财富的地方正在进行激烈的竞争；附属国的工业化。

帝国主义在这方面的唯一机会就是依靠正在形成中的殖民地资产阶级所可能提供的帮助。殖民地革命的下一个阶段将取决于这个阶层的形成（帝国主义正千方百计地给予帮助）和群众革命运动（他们要求根本解决他们的问题，因而要求有一个急进的领导）之间在时间方面的竞赛。

但是即使这个过渡是通过一个当地的新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这个过渡时期在历史上也将不会是很长的，最后仍然会使帝国主义在经济上遭到破产，因为当地资产阶级所取得的任何重大发展，到头来必将减少仍然为帝国主义所垄断的那部分剩余价值。

### 三、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

在目前历史阶段，同资本主义并行的是工人国家体系，殖民地革命和这个体系建立联盟应当是非常自然的并且几乎是自动的。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利益一致是显而易见的。工人国家对这个斗争应当给予积极的和无条件的支援。

而且，在经济交流方面，工人国家可能占有优势，逐渐地代替

帝国主义所提供的“援助”，并将（附属国）目前与帝国主义联系的线路纳入它自己的轨道。工人国家可以提供低廉的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不强加任何政治条件，来帮助这些附属国取得真正的经济发展。

他們可以在經濟上互通有无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貿易关系（虽然这种情况不可能是普遍的）：由附属国输出农产品和原料，而从工人国家输入工业设备物资。从历史观点来看，这个关系的发展将十分清楚地表明工人国家在这方面所拥有的巨大潜在能力和帝国主义在一場长期的“和平竞赛”中最后将要碰到的致命危险。只是由于工人国家的政权性质遭到官僚机构的败坏和歪曲，才使上述可能条件的利用受到了限制，并且妨碍和损害了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之間事實上的联盟。

自然，对于苏联或其他工人国家給予附属国资产阶级政权的经济援助不能提出反对，因为这种援助可以使这些附属国暂时抵住帝国主义或者更自由地发展自己。但是要反对的是把这种援助来交换殖民地资产阶级的“中立”政策，而附属国内的共产党则被迫把他们的独立性的阶级政策服从于工人国家外交的需要，这实际上是冒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风险，而这些资产阶级政权必然要回头来对付他们本国的工人运动，而在一个更遥远的阶段，他们必然要回头来反对工人国家。从这种观点出发，最近由尼赫鲁、苏加諾、納賽尔、卡塞姆和其他从工人国家的援助得到好处的受益者所提供的例子雄辯地說明了這個問題。

然而，工人国家的援助在客观上仍然可以帮助群众的日益成熟和最后成为资本主义的客观威胁。这特別說明了某些国家如巴西和玻利維亚的资产阶级的态度。古巴的情形体现了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之间的客观联盟的力量，在这里，苏联的官僚机构不得

不抛开和平共处政策而答应用火箭来捍卫(古巴的)革命。在这新的阶段中,尽管苏联官僚机构和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力图阻止,殖民地革命事实上正在同工人国家的力量联合起来。

必須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在群众中鼓励这种联盟。第四国际将促进劳工中央组织、工会、农民组织和其他群众团体同工人国家的各种组织之间的联盟,作为建立这种联盟的一个具体步骤。

#### 四、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

依靠商业利润、地租和高利贷的收入或充当帝国主义走卒的当地买办寡头,是目前在附属国里正在没落中的阶层,它的没落有利于反映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和工业发展过程的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这些阶层在现阶段正直接地或通过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政治煽动家掌握着殖民地革命的领导权。被称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阶层,根据各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在不同的附属国里面,他们的重要性各有很大的不同。

例如在印度、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它已經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阶级,有足够的力量并且自觉地去直接掌握政权,即使这个政权随时有丧失给同垄断寡头和帝国主义有更密切联系的其他势力的危险。

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里,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性要比买办寡头差一些。

在某些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常常是通过拿破仑式的政权(如苏加諾、納賽尔、卡塞姆、恩克魯瑪等人)来行使它的权力,这些政权从历史观点來說是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在其他情况下(非洲往往有这种情况),除了部落酋长和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官吏以外,力量非常薄弱的当地上层集团可能产生

出同帝国主义密切勾結来对本国进行經濟剥削的新的买办资产阶级。

在各个地方，民族资产阶级取得发展的主要工具已証明是拿破仑式的政权。正是这个政权使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同时对付垄断寡头、帝国主义和群众，并且可能找到为打下基础和供給大企业资金所必需的数量可观的資本。民族资产阶级还通过行使政治权力和国家的經濟职能，用扩充政府官員、滲入企业、貪污腐化等方法来部分地建立自己的干部队伍。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式的政权成为在附属国里发展资本主义的培养所。

最适合于这种拿破仑式政权的意識形态就是实行事实上的一党专政，它又簡縮为掌握权力的領導集团的专政。如果这个党通过它的綱領和意識形态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党，那么，这种以群众組織的民主委員会或公社为基础的专政毫无疑问地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是目前有某一些人用所謂无阶级的殖民地社会作为借口来为其在非洲实行拿破仑式的一党专政，发展资本主义經濟和不受群众組織的民主监督的行为辯解，都是必須加以反对的。

不錯，对于一个刚刚摆脱部族制度的社会的确不能搬用社会主义民主的多党制度(现在正是这样)，但决不可能因此而认为不需要建立这样一个单一的政党，它具有阶级特性，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識和綱領，并且是以群众民主地組織起来的农民公社和城市委員会(它們管理政府并掌握权力)作为基础的。

无论如何，第四国际决不能放弃这个观念，即應該有几个工人的党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保証。

决不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真正傾向抱有任何幻想。虽然民族资产阶级在其形成的过程中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帝国主义和

壟斷寡頭，不得不同无产阶级及其工会組織結成同盟，不得不主张甚至在一定时期內实行国有化和“混合經濟”，但是一旦它的力量壮大之后，它必然要和先进国家的正統資产阶级一样，回过头来反对工人运动，并且通过“废除”它的“混合”經濟(为了吸引外国資本和刺激本国私人資本主义的积极性)和在外交上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來进一步靠攏帝国主义。尼赫魯的印度就是一面鏡子，它是第一批获得独立的国家之一，并且形成了本国的有势力的民族資产阶级，现在在印度已經清楚地反映了民族資产阶级的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它在短期间內已經走向倒退和反革命。(其他例子是：突尼斯、埃及、加納、阿根廷、巴西。)对于殖民地的革命群众來說，潛伏着的最大危险就是受到与本国資产阶级建立民族團結的神話的哄騙，并为此而牺牲自己的組織和独立性的阶级政策。

## 五、資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

殖民地的群众要求政治独立和經濟迅速发展的普遍願望是深切的和不可抗拒的。

民族資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安定民心，正努力想完成这个使命。但是它不可能通过資本主义的道路来达到經濟迅速发展的目标。

无论哪一个地方的民族資产阶级都証明它自己不能坚决地把帝国主义在附属国勒索的剩余价值的主要部分收归国有(經過几个阶段之后势在必行)，也不能坚决地把本国封建主义者的地租收归国有，不能調动本国庞大的沒有被使用的人力。沒有一个地方的民族資产阶级能够或者願意不付赔偿地沒收帝国主义在农业一矿业和商业部門的企业，不付赔偿地沒收封建主义者的土地而分給农民；沒有一个地方的民族資产阶级能够或者願意实行国有化

和計劃經濟并動員本国的群众来为这个目的服务。

目前土地問題是普遍的根本性的問題。无论什么地方，土地大部分是掌握在本国地主、大殖民者或外国帝国主义公司的手中，只有一部分(其重要性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是本国农民私人耕种的土地或是集体耕种的部落保留地(例如黑人非洲)。

即使这些既不是农奴、不是佃农也不是农业工人的自由农民，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水平比較來說，大多数是貧穷的，他們要作为农民繼續生存下去还必須拚死拚活地干。这里就产生了实行根本土地改革的极大重要性，这种土地改革必須和真正无产阶级国家的有效的物資和技术援助同时并行。

土地改革的首要工作就是按照土地耕种者的自由意志来分配土地。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采取把封建主义者和大殖民者的土地分給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方式，同时由国家援助农民合作社；或是采取集体管理土地的方式，一开头就由公社(其规模相当于一个村或大于一个村)和大庄园的农业工人和佃农集体管理；或者采取如在最通常的情况下实行的混合制。

民族资产阶级仅仅指望外国資本的主要援助来发展經濟，然而按照外国資本的数量及其条件，要期望附屬国甚至用稍微快一点的工业化速度来赶上先进国家不过是一种妄想。在这方面，中国和印度的例子的比較是有决定性的意义(不必坚持苏联的例子)。南斯拉夫則是另一种例子。中国的經驗是非常宝贵的，它指出了一个从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基础上起家的殖民地国家爭取經濟的迅速和平衡发展的特殊道路。

把农民群众組織起来成立公社，在有些情况下特别是在农民的地方自治传统还比較强烈的地方，包含有許多可以有利地加以

运用的因素。公社的政治和經濟組織利用当地所有的生产資料和生产力，把所有能够劳动的人都雇来进行生产，从而使国家开始了迅速和平衡的经济发展。

一般說来，对于公社的建立只能从公社可能产生官僚主义管理机构这个角度来加以批评，因为这种官僚主义管理机构有不够关心群众的生活状况和群众自愿参加这种新型的經濟和社会組織的必要性的倾向。但是在官僚主义受到限制的地方（主要是由于有管理公社的群众民主組織的监督），公社在历史上将成“落后”国家爭取迅速和平衡地提高生产发展的一种組織形式，它可以充分和精明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力物力，并成为一个更富有地方自治的社会生活的学校。

南斯拉夫的經驗也是有价值的，它是一个农村小私有制占优势的“落后”国家取得迅速发展的榜样，虽然它的經濟性质是工人阶级的經濟，它仍然对世界市場大开方便之門，同时生产者在监督和甚至管理經濟方面有更密切的民主联系（工人委員会）。

“落后”国家远远不会因为外国資本的帮助而陷于或者停滞不前或者走向資本主义发展的进退两难的境地，它們有实际可能性可以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采取“中国的道路”或“南斯拉夫的道路”，或是把这两种道路結合起来而去掉二者的消极因素。

但是，要取得这种可能的发展，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建立起社会主义类型的新的經濟和社会結構。这意味着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爭取真正的解放和爭取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的斗争是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不可分割的。只有那些懂得如何把反帝斗争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結合起来的附属国才能够真正地从帝国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并为本国的迅速发展和工业化开辟广闊的道路。

## 六、殖民地革命的不斷性

投入反对帝国主义直接或間接統治的反帝斗争的群众，必然地要朝着超越形式上独立的范围的目标前进。

在目前殖民地革命的国际和国内关系中，它有发展成为一种不断性革命的难以扭轉的趋势，它越来越把广大农民和工人群众所要求的經濟和社会目标提到最前面来，这些目标是：土地改革，国有化和計劃經濟，解放妇女。

在这个过程中，同民族資产阶级的冲突在一定的斗争阶段中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虽然附属国的資产阶级着手建立一种包括所有社会阶级（封建主义者和买办資产阶级除外）的事实上的统一战綫来反对帝国主义的直接或間接統治，按照阶级路綫来划分这个统一战綫的斗争仍将不可避免地深刻化。民族資产阶级很快将会发现他們自己同工农群众运动的急进主义扭在一起，工农群众要求实行土地改革、国有化和計劃經濟及解放妇女，而这一切目标同民族資产阶级的制度是不相容的。这就迫使資产阶级回头来反对群众运动，并且公开地或不公开地实行专政制度。

在还没有一个真正的革命群众政党的时候，民族資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斗争时期中所取得的威望使他們贏得群众的信任，并暂时使革命在半途中停頓下来（例如尼赫魯、苏加諾、布尔尼巴、納賽尔、卡賽姆、恩克魯瑪等）。跟着就会产生这样的要求：决不能把独立性的群众革命运动置于民族資产阶级的政治領導之下，决不能“美化”民族資产阶级，决不能停止对民族資产阶级的批評和揭露，同时对于民族資产阶级可能采納的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具体措施，則視民族資产阶级在工人和貧苦农民中繼續取得信任的程度，給予批判性的支持。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并不排除在

特殊环境之下，就某些足以推动革命前进的明确目标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建立统一战线。但是反帝统一战线一般在非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中居于支配的地位。

民族资产阶级或归根究底具有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小资产阶级目前在殖民地革命中所占有的显著地位，部分是由于斯大林主义政策的结果，因为这个政策把群众的独立性的革命运动置于宗主国的资产阶级或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之下。假如不根本反对这个政策，假如不停止把群众革命运动仅仅看做是资产阶级玩意儿和资产阶级与斯大林主义者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的一分力量，就有可能使殖民地革命走向更高水平的过程大大迟缓下来。

在这些附属国活动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分子往往不可能从外部和以完全独立的方式来反对目前由资产阶级领导或受资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民族运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有可能冒同国外的群众割裂开来和在实际上陷于无能为力的状态的危险。他们在接受在各地开办能阐明问题和指出明确前景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物的任务的同时，不得不在具有群众性和革命性的当前民族运动内部继续进行他们的主要活动，并在运动内部鼓吹执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方针的势力。这个方针在有些地方是采取组织阶级政党、以工会为基础的群众性工党的过渡形式。

但是，任何专门为了无产阶级而在事实上忽视农民阶级的方针将会成为取得革命斗争胜利致命伤。除了必须实行适当的土地改革纲领，考虑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外，还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工人斗争同农民斗争联结起来，并通过日常工作使革命组织在农村中扎下根。

许多附属国具有适合于组织和维持游击战争的条件，游击队可以由农民供给人力并且得到农民的帮助和保护。把农民的武装

斗争同城市工人的动员工作适当地结合起来，将能够大大加强革命斗争的力量和效果，加速附属国的帝国主义政权或买办政权的垮台。

在許多情况下，革命的领导的成熟和效力应当表现在它的首创精神、能力和敢于抓住时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以便支持和促进民族革命运动，使敌人得不到喘息的机会来重新巩固它的阵地。

根据中国以及阿尔及利亚、古巴等地的經驗来重新估价农民战争的革命可能性，是处于相似条件下的每一个领导者的责任，也是必须加以融会貫通的殖民地革命的最珍貴和最重要的經驗教訓之一。在許多附属国里，一个现代的革命政党必須証明自己是农民武装斗争的真正組織者，能够把本国的革命发展过程正确地提到更高的水平，包括夺取政权在内。

## （二）殖民地革命的各种不同的 爆发中心及其特点

### 七、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在远东的附属国中，直接的政权目前是掌握在民族資产阶级（如印度）、或代表民族資产阶级的拿破仑式政府（如印尼和緬甸）或与帝国主义密切勾結的买办集团（如南越、柬埔寨、泰国、錫兰、馬来亚和南朝鮮）的手中。现在我們必須和他們打交道的以上这些形式上独立的国家，資产阶级沒有能力来完成包括資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内的革命，已經是明明白白的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其中最发达的国家印度。

印度不是沿着越来越“社会主义化”、国有化和計劃經濟的道路前进，不是沿着根本的土地改革和真正国家統一的道路前进，

从而为經濟的迅速发展奠定基础，而是实际上背道而馳。它特別是在私营方面发展它的“混合”經濟，再次为外国資本大开方便之門。同时，不論是“乡村建設計劃”、“全国乡村推广計劃”或維諾巴·巴維的非官方的“捐田运动”，都未能解决分配土地給农民和把他們有效地組織在合作社里的实际問題。

由于印度的古老的結構还未能根本推翻，資产阶级政府的經濟目标依然受到限制和从属于外国資本主义的援助。这就导致本国工农业經濟的发展速度依然很低，甚至落后于人口的增长速度。

国家經濟发展的薄弱以及它的仅仅受到輕微触动的封建資本主义結構进一步阻碍了对于地方之間的对立和风俗、語言、宗教等各种障碍的消除，它們妨碍了国家的真正統一和經濟文化的迅速发展。

和印度尼西亚、非洲的許多地区甚至拉丁美洲一样，印度也缺乏一次根本的革命，因而使資本主义以前的生活方式和野蛮主义的恶果沒有得到清除，加上帝国主义的統治，情况就更加恶化了，从而阻碍了国家越过地方主义、教派主义、部族制度或帝国主义所树立起来的老朽的或人为的障碍而走向統一的过程，阻碍了經濟和文化建設高潮的到来。

随之而来的，在今后的年代里，局势的发展必将是爆炸性的，它将会促使資产阶级政权在保持了一个时期的議会制度和表面上的民主之后，轉为更公开的专政。由于生产的增长和人口的增长之間存在着严重的鴻沟以及由于中国不断取得成就所产生的革命影响，在这双重压力之下，印度的資产阶级从现在开始已看到有朝一日国大党和尼赫魯本人在反对英帝国主义斗争时期中所树立起来的威望就要丧失殆尽了。

国大党内部已开始发生分裂，它的更为好战的封建資本主义

和亲帝国主义右派势力的崭露头角，这都是它可能发展成为类似巴基斯坦那样的公开独裁的征象。将来印度的例子也可以証明，不論哪个地方的民族資产阶级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是决定要破产的。

在民族資产阶级及其領袖能够拥有难得的威信(由于共产党在大战期間的失算)的另一个国家印度尼西亚，資产阶级的議会把戏已經結束而建立起了以軍队为基础的公开的拿破仑式政权。这是由于印尼共产党的背叛政策而使軟弱的印尼民族資产阶级的“英雄”苏加諾得以渡过自 1945 年以来接連发生的一切严重危机，并且在现在，在它对群众和工人政党采取更坚决的反对行动之前，得以巩固它的拿破仑式的政权。

的确，即使到现在，印尼的資产阶级政权还是脆弱的，它正面临着本国許多尙待解决的問題(如土地改革、国家的真正統一、清除帝国主义所遺留下来的全部經濟恶果、工业化等)和群众的不滿，群众的生活水平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的緩慢、通貨膨胀和失业已降低了。

根本改变工人阶级领导对待民族資产阶级的政策，必将大大有助于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一个比較短的时期內掀起新的革命斗争浪潮。这种情况似乎不大可能发生，因此，諸如印度的革命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的共产主义青年党这样的組織就更应担负起制定一个具体的过渡綱領的任务，这个綱領将完全揭露資产阶级政权，并把一切革命力量导向爭取建立工农政府的斗争。

保卫中国的革命和普遍推广它的一切确实有效的成就(包括关于公社的概念)，不仅是在上述这些国家中活动的革命馬克思主主义者的责任，而且是他們手中的非常有力的武器。再者，为了对資产阶级进行有效的斗争，为了促使传统的工人阶级政党内部不可

避免的思想分歧(这一句原文如此,意思不明——譯者),在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党和共产党及其他工人組織之間实行列宁主义的統一战綫政策是必要的。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革命是在今后年代里将要碰到的两个伟大的事件,必須从现在起就以极其认真的态度来做好准备。

尽管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经济发展方面,在資产阶级的力量比較方面,以及在农村的結構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的地方,但双方都具有如下的相同的决定性因素:在印度和印尼,群众都已經有了民族資产阶级直接統治的巨大經驗,民族資产阶级面临着人口的日益增长,却沒有能力来解决土地問題、(国家的)真正統一的問題和工业化問題,而且正在向着独裁方面轉化。这个政策已把他們引进了死胡同,它越来越同中国的革命成就和国际局势背道而馳,結果只会导致(革命的)爆发。

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爆发革命危机,就有可能触动远东一系列其他国家爆发新的革命,这些国家目前正处在受美国帝国主义积极支持的买办集团的統治之下。

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还必須注意到,在南越,有利于革命斗争的形势已日益明朗化。南越的許多地区在现阶段存在着革命的根据地,它們还在繼續扩展,并且多少是各自为政的。它們的領導者是在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斗争有了經驗的中級干部。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任务是参加到这个武装斗争中去。根据这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武装斗争可以为夺取政权和重新統一全国开辟道路。

錫兰由于存在着一个拥有巩固的群众基础的平等社会党,因此錫兰的革命可能成为一个例外。为了充分发挥它的作用,錫兰平等社会党必須加强它的布尔什維克結構,并通过在农民群众中开展工作、党的劳工力量的支持以及根据經濟和政治的过渡性要

求的具体綱領，加強同農民群眾的聯繫。

至于南太平洋島嶼雖然人口很少，資本主義不發達，但是其他地方的殖民地革命對它仍然發生影響。

這個地區的主要經濟特點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或多或少地受到商業資本主義的破壞，商業資本主義剝削了它的一部分熱帶產物，主要是椰子干，在政治上，殖民主義通過部落酋長對它進行管治。

但是在這種普遍經濟落後的狀況下，還有若干重要的例外。

第一，在英國殖民地斐濟群島，有高度發達的糖業，經營者是農場主，但受到澳大利亞糖業壟斷資本“殖民地煉糖廠”的實際控制。島上居民大部分是印第安血統，他們特別感受到世界殖民地革命的影響。在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領導下，組織良好的工會在去年同殖民地政府進行了一場激烈的鬥爭。除非小資產階級的領導同殖民地政府之間達成協議，亦即除非他們取得了某種程度的獨立，否則在 1961 年將會有新的爆發。

第二，在法國殖民地新喀里多尼亞群島，擁有一支在鎳礦和加工工廠工作的實力可觀的無產階級隊伍，還有一批生活水準和當地居民一樣的受壓迫的法國農民。人們還曾經提出過國有化的要求。當地居民具有反法鬥爭的傳統，在最近以前還發生過這種鬥爭。

第三，在一些島嶼（如塔希提、薩摩阿）正在進行着反對殖民統治的鬥爭。西薩摩阿將在 1961 年正式獨立，雖然它實際上仍控制在酋長的手里，但總算是開了一個例子。

第四，在澳大利亞的新几內亞也有政治覺醒的征象。印度尼西亞爭取西几內亞（即西伊里安——譯者）的鬥爭為澳大利亞管治的遠東半部提出了問題。把整個新几內亞并入印度尼西亞的問題

必須加以认真考慮。

南太平洋革命高潮的中心最大的可能是在斐济群島。这个高潮将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

第四国际必須提出南太平洋社会主义联邦的問題，这是在地理上处于孤立地位的各个岛屿的唯一解决办法。帝国主义将会企图阻止这种政治上的合并，特别是力图孤立那些可能产生革命高潮的地区。建立南太平洋社会主义联邦的口号对于在这个地区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 八、阿拉伯革命

### 中 东

在亚洲的另一端，在中东国家中，现在突出了伊拉克革命的中心点。它构成了阿拉伯革命的一个特殊部分。

在經過一整段时期的向前迈进，采取了沒收若干帝国主义的陣地、土地改革、解放妇女和建立工会及群众性軍事組織等重大措施之后，(伊拉克)现在已有一段时期踏步不前或甚至向后退了。

和其他类似的例子一样，伊拉克革命使一伙小資产阶级出身，渴望更迅速地发展經濟，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束縛的“民族的”軍官掌握了政权。这些人正夹在中东阿拉伯国家特有的敌对社会力量的中間，即：一方面是封建主义者和商业及高利貸买办資产阶级、民族資产阶级的有限阶层及城市小資产阶级(手工业者、职员、公务员和知識分子)，一方面是革命无产阶级与农民，他們具有显著的拿破仑主义的性质。因此，他們注定或者最后再次屈服于封建資产阶级的势力，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成为民族工业資产阶级和被他們拉过去的城市小資产阶级的利益和政策的工具。

在这方面，卡塞姆的轉变是具有特色的，他的轉变比納賽尔更快。有一整段时期，卡塞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仅容忍城市和乡村的革命运动以及自称代表这个革命运动的組織，而且他本人也部分地依靠这个力量来对付那些企图推翻他的买办封建資产阶级和亲納賽尔集团。

卡塞姆已逐渐变成伊拉克統治集团的政策的工具。伊拉克統治集团想攫取本国的巨大財富，他們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特別是叙利亚的統治集团共謀与支持納賽尔的埃及資产阶级争夺中东的霸权。

卡塞姆和納賽尔的对立，以及納賽尔之反对布尔吉巴，粉碎了关于超阶级的阿拉伯統一的神話，并且証明历来寻求阿拉伯民族真正統一的决不是阿拉伯資产阶级，而是从事反帝斗争并在一定阶段內同样反对本国統治阶级(包括民族資产阶级在內)的阿拉伯革命群众。

伊拉克共产党的背叛政策大大帮助了卡塞姆政权的相对巩固。伊共把卡塞姆“理想化”，大大帮助卡塞姆个人威望的建立，而把革命运动的独立政策和組織置于卡塞姆領導之下，并且沒有能够利用这个运动来把革命推进到更高的水平。如同納賽尔和埃及共产党的情形(埃共有一整段时期也頌揚納賽尔和他的政府)以及摩洛哥共产党对回教国王及其政府的态度一样，伊拉克共产党现在正受到它所崇拜的偶像的侮辱和压迫。

正是因为这个道理，所以有批判地支持他們反对帝国主义或本国封建資产阶级的进攻虽然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十分重要的是必須打破群众对他们的幻想，并促进一个目的在于建立工农政府的独立的阶级政策。

以一个保証资本主义經濟发展的純粹的資产阶级民主綱領，

来代替把群众的基本經濟要求与政治要求同过渡性要求联結起来的过渡性綱領和工农政府的前途，結果只会导致革命运动的必然失敗和資产阶级独裁統治或甚至是买办封建資产阶级独裁統治的建立。因为只有无产阶级領導的群众革命运动，建立起工农政府，才能解决附属国的資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土地改革、消除帝国主义的迫害，实现国家的真正統一)，才能在国有化計劃經濟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化，調动全国的沒有使用的人力来从事生产。

继伊朗的摩薩德和埃及的納賽尔的經驗教訓之后，伊拉克革命的經驗教訓成为到目前为止殖民地革命在中东的最突出的事情。

这个經驗同时証明，群众的革命运动如果沒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領導，革命就不可能解决資产阶级民主的任务和认真实行工业化。相反的，掌握政权的拿破仑主义的領導者們，致命地屈从于本国的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轉过来反对群众，以便把他們的运动保留在本国資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内，这种資本主义发展是以外国資本的不可缺少的援助和对本国群众的非分割削为基础的。

但是，卡塞姆的政权还是軟弱的，伊拉克群众的革命潛力虽然遭到打击，但還沒有完全消失。只要群众运动明确了它对卡塞姆的資产阶级拿破仑式政权的立場，断絕了从属于卡塞姆领导之下的永久性联盟，在伊拉克开辟出建立工农政府的前景，局势还是可以扭轉过来的。

更一般地說，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必須为爭取成立阿拉伯东方社会主义联合共和国和馬格里布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斗争，这是走向成立阿拉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第一个步驟。

## 阿尔及利亚革命

几乎是在阿拉伯世界的另一端的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帝国主义主要的侵略军队的革命斗争已經持續进行了六年多了。

因此，阿拉伯世界正处在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这两个积极革命的溫床的中間。除了他們內部的困难之外，还必須考慮到帝国主义的敌視，苏联官僚机构的相对的关心，以及突尼斯、摩洛哥和埃及資产阶级的态度。阿拉伯革命中的資产阶级勢力已大大加强，按照它本身的力量，它会把革命保持在类似拉丁美洲半殖民地国家的水平上。

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在目前是一支不受馬格里布的資产阶级或任何帝国主义駕馭的平民力量。尽管存在着已經严重分裂的封建阶级和相当重要的城乡小資产阶级，革命发展过程的深入，正在促使作为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基础的农民和无产阶级，比起上层的少数資产阶级分子和把持着民族解放陣綫的机器的小資产阶级分子，始終起着主要的影响。

但是民族解放陣綫的結構已产生了严重的危机，它的在国外成立的政治机构同革命的战斗部队之間的联系和受他們的控制都是不够的。这个因素，加上民族解放陣綫的社会和政治主张仍不具体，来自法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也不够，因而使革命經常受到外国資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力量的压力，使民族解放陣綫官僚化。

只有无产阶级的有效援助才能阻止这种演变，首先是法国无产阶级的援助，以及在民族解放陣綫内部制訂明确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方針，同革命的战斗基地、国内的战斗部队和居民及移居法国的无产阶级联系起来。

已經六年了，它在一場实力悬殊的反对强大的帝国主义的战

斗中牺牲了一大部分有生力量，沒有得到世界无产阶级的实力援助。同时，它已能够在战斗中达到无可怀疑的成熟程度；培养干部，扩展国际宣传网，接触舆论特别是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舆论，并迫使法国帝国主义在物质上和军事上的努力严重地妨害了它多方面的利益和计划。

目前，为了应付可能同法国帝国主义进行一場新的长期斗争，除了工人阶级国家、国际无产阶级和阿拉伯及非洲人民的援助（物质的、外交的和道义上的援助）之外，它还需要把领导它的组织提高到更高的政治水平和组织水平。否则，巨大的损失，消耗和战斗的疲劳可能使它遭到失败——不是争取这种或那种形式独立的斗争的失败，而是争取能为国家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开辟道路的那种真正独立的斗争的失败。无论如何，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平民基础已經取得了充分的經驗，因而可以使革命的发展不会导致单纯的布尔吉巴式的結局。

在民族解放阵綫內部存在着思想的分歧，如果不是終旧不可避免的話，它可能分为两种倾向，一种是資产阶级的、布尔吉巴主义的倾向，它企图使国家的领导限制在同帝国主义妥协的基础上；另一种倾向即是比較无产阶级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在摩洛哥的独立党发生的事（指独立党的分裂——譯者）可能在民族解放阵綫重演，不同的是：布尔吉巴主义的右的倾向在开始的时候可能力量較弱，而左的倾向可能比摩洛哥（独立党）的左派更急进，并可能轉变为一个以工会为基础的群众性政党。

1960年12月的群众运动标志着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的特点是：(1)城市的群众已被积极动员起来；(2)示威的自发性质已远远走在民族解放阵綫的干部和指示的前面；(3)在战争期间形成起来的还缺乏政治經驗的新的一代投入了运动，从这年青的

一代当中新的干部繁盛地成长起来；(4)妇女大批地参加了运动，她们在斗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5)一些新生的委员会所起的作用，它们保证了对运动的事实上的领导。

由于上述这一切因素，民族解放阵线的左派在这新阶段中力量加强了，在关于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可能同戴高乐达成协议的臆测中，他们已握有愈来愈大的优势（在目前客观条件下，这种协议决不可能包含有民族解放阵线投降的意思）。

阿尔及利亚革命不仅对于整个阿拉伯革命而且特别是对于整个非洲革命具有强大的推动力。在缺乏来自法国和欧洲无产阶级的有效援助的情况下，非洲革命的进展仍然较其他任何因素能够对阿尔及利亚革命以后的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而且，阿尔及利亚革命是马格里布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马格里布革命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阿尔及利亚斗争的发展。在马格里布的一般范围内，摩洛哥的革命将起很重要的作用。摩洛哥拥有在数量上最重要、最集中、最有组织和最有战斗性的工人阶级，事实上，封建资产阶级是在经过同工人阶级进行一场激烈斗争之后才取得政权的（与此相反，突尼斯的资产阶级却是在平民力量的支持下取得政权）。若干因素表明，互相对立的阶级力量正在准备着一场决定性的摊牌，它甚至很可能在最近发生。

不論阿尔及利亚革命和民族解放阵线的前途如何，在革命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国际援助和没有在这个组织内部开展工作以前，决不可能满足于站在外面对这个组织进行批评。自 1960 年 12 月以后，特别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努力同在这个运动中涌现的中级干部取得联系，这些中级干部是代表第一批无产阶级领导核心的萌芽。

## 九、黑非洲

在最近展开的殖民地革命中，最蔚为壮观的是黑非洲的形势。

許多在殖民地直接控制下的国家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跳过几个阶段地取得自治或甚至正式独立。英、法和比利时帝国主义在群众要求从殖民地的直接束缚之下解放出来的运动面前，已不得不到处退却，或者采取把政权交给当地上层集团的办法来企图分裂这个运动。只有中非洲、南非洲和葡萄牙控制下的一些地区还落在形势变化的后面。

驅使帝国主义采取这种更大的伸縮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由于大战的結果，非洲群众的觉醒以及从此以来（以苏联为首的工人阶级国家力量的增强，中国革命的胜利，阿拉伯国家特別是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又加上资本主义經濟在非洲的发展，城市化，部落制度的解体，早先自給自足社会的經濟和社会生活被带来了不稳定性，集中的和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和知識分子阶层的誕生，甚至在有些地方也产生了想自己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分子。而且，整个非洲（特別是黑非洲拥有非常巨大的和几乎尚未开展的矿产、人力和农业，自从大战結束以来，它已成为帝国主义的主要的殖民保留地了。它的战略地位也更加引起帝国主义的兴趣。最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間对非洲大陆的爭夺，以及东方和西方的对立，增加了当地上层分子的自信心，使他們认为有可能利用这个形势来直接取得政权。

英国帝国主义以及法国、比利时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动向现在已經十分清楚，就是要把人数有限的当地上层分子赶快組織起来，把政权移交给他们，联合他們，贿赂他們，以便共同对非洲进行經濟剥削。在沒有一个有历史淵源的阶级結構、沒有资产阶级，甚至

沒有具有有機結構的小資產階級的情況下，現有的人數有限的上層分子（少數知識分子、公務員、工會幹部、小商人和商人）如果不是已經成為新的買辦階層，實際上也是潛在的新買辦階層，帝國主義正是要依靠他們，希望看到他們發展和鞏固。

但是另一方面，這些人數有限的上層分子在社會、經濟和政治方面仍然是十分軟弱的，面對着強大的群眾運動，同時他們也覺得有可能在帝國主義者之間的競爭和東西方之間的對立上面進行賭博，這樣就以下的更為具體的意義上來說，不僅把他們推到特殊的政治地位，而且把他們推到特殊的社会地位：

在這急劇變化的非洲社會中還沒有形成起來和扎下根的這些上層分子，在現階段還不是新資產階級的萌芽，而是轉移於目前非洲社會的平民群眾和帝國主義之間的國家官僚階級的萌芽。只有在像加納或象牙海岸這樣的地方，才能找到民族資產階級政權的萌芽，這些地方由於資本主義之侵入農業，已產生了商業性的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其中也點綴着少數真正的資產階級分子）。

為今日非洲社會所特有的（這些上層分子的）這種特殊社會地位，可以轉變為具有完完全全的資產階級性質，也可以轉變為半無產階級性質，一切以群眾運動的力量以及它們同帝國主義和工人階級國家的關係為轉移。在目前，塞吉·杜爾的几內亞是這種現象的最突出的例子。約莫·肯雅塔的怯尼亞以及喀麥隆、葡萄牙控制下的殖民地和其他地方都可能在明天成為類似的例子。在所有這些例子中，未來演變的根本因素在於國家和管理這個國家的階層。

如果經濟目標是對少數主要的礦產、農業和商業企業實行國有化，在部落村庄的基礎上實行農業集體化或擴大公社，和把國家

結構建立在农村和城市公社的基础上，那将是向着以国营經濟和計劃經濟为主要基础的工人阶级国家发展的开始。

把外国企业收归国有可以分阶段进行，但是必須規定它們只能把一定限量的利潤运回本国，其余全部必須在当地再投資；并且須接受国家和本企业工人組成的委員會的監督。

由于黑非洲残存着部落公社的习俗，大大便利了实现农业集体化。国家为了防备不好的气候条件和提高产量而对农业提供的主要援助（科学的、技术的和物质的援助），也将一开始就大大促进农业集体化的趋势。在这些国家里，迅速发展經濟的最重要泉源在于充分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劳动力来从事生产，直到现在，还有很大一部分劳动力沒有被使用。

但是要把一切人力都动员起来，沒有真正的革命气候，沒有实行国营經濟和計劃經濟的真正的工农政府，是不可能的。当然，它的目的决不是要建設一个自給自足的“社会主义”經濟，那样的經濟只会使群众保持很低的生活水平，并使政权蜕化为官僚专政。它的目的是为了使資本主义世界市場和社会主义世界市場的一切可能方面都很广泛地得到好处，同时也有利于非洲内部之間的市場和貿易的发展。

黑非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避免地有其不同的特点，这是因为我們在这里与之打交道的国家，其經濟和社会水平都低于世界其他部分（拉丁美洲或亚洲）的封建資本主义結構的附属国。在黑非洲，我們与之打交道的国家一般都具有更特殊的結構，大部分仍然是由于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的入侵而陷于四分五裂的部落社会，它們的自給自足的經濟也受到了破坏，本地的商业化的小规模农业生产与資本主义的大规模农业生产同时并存，这就造成了由于传统的民族經濟的瓦解而被解放出来的劳动力，都集中在城市、

矿业中心和帝国主义的种植园。

因为这种經濟发展的程度并沒有排除掉本国的統治阶级（因为直到最近以前，人数有限的少数欧洲人在亲自管理和指导經濟的同时，把地方民政机构交给传统的酋长及其僚属去管理）。今天的黑非洲社会具有一种自然經濟、單純的市場經濟和帝国主义經濟并同发展的特殊形式，而完全缺乏或大部分缺乏封建經濟或本国的資本主义經濟这一环节。（只有尼日利亚北部的某些地区封建主义的农业占优势。——原注）

正因为这样，才造成了正在取得政权和管理国家的人数有限的民族阶层，在这前所未聞的同样特殊的国际和民族关系中的特殊地位。这个阶层拥有自己的力量，它沒有经历过作为統治阶级的代理人所受的明显的影响或控制。这个阶层是通过管理国家来发展和取得社会重要地位，而不是由于生产的内在需要和它在生产中的地位。在第二次大战以前的历史条件下，这一阶层只会发展成为帝国主义效劳的买办資产阶级。

但是在目前的特殊条件下，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强大的群众运动和工人阶级国家日益壮大的力量的影响，并且知道它可以从东西方的对立得到好处，这个阶层正在本国起着拿破仑主义者的作用，其本国的經濟和社会結構还不是明确地必然朝着正統的資本主义方向发展。

目前非洲各国的疆界是人为的和不合理的，是适应划分势力范围的方針，它是帝国主义在上世紀末(1885 年的柏林大会)所执行的分裂政策。必須把现在的这些国家重新联結成为更广大的組織，它的力向应当是成立“非洲联邦”，把北非的阿拉伯国家以南的所有黑人国家联合起来。

如果从人种起源、語言和宗教的观点来看，这些国家的人民严

格地說來并不是同一种族。但是由于几世紀來受到白人及在白人指揮下的本国雇佣者的奴隶剥削，促成他們在一个共同的部落、經濟和社会組織的基础上有了共同的风俗、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命运，现在由于爭取从帝国主义的束縛下获得解放的斗争，他們已开始具有共同的非洲民族意識。激起非洲上层分子并且越来越把先进部分投入决定性的反帝斗争的泛非洲主义，反映了他們急忙于寻求由这种共同的血統、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斗争所促成的非洲民族的团结。

姑且认为泛非洲主义也能够成为现在正在形成中的非洲资产阶级的思想，来掩盖分歧和阶级斗争，并在一整段时期內利用群众的革命潜力和劳动力来为其本阶级的利益服务。（掌握在納賽尔和阿拉伯新兴资产阶级代言人手中的泛阿拉伯主义正遭遇到这样的命运。）必須把恩克魯瑪嘴中的泛非洲主义同作为整个非洲黑人民族团结理想的泛非洲主义区别开来，非洲黑人是推动非洲群众进行反帝斗争的强大革命力量。

关于把非洲国家重新联合起来的具体步骤，究竟是采取合併还是联盟的形式，现在这个时候要預见到或提出来为时尚早。但是可以说，这种统一的趋势应当是受到普遍贊成、鼓励和写入非洲革命政党的綱領中的。如果塞古·杜尔的几内亚往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努力所发射的光注定要在全黑非洲扩大的話，在今后几年內，在黑非洲須要注意的革命溫床有南非洲、安哥拉和莫三鼻給、中非洲、怯尼亞、刚果和尼日利亚。

已經在南非洲开始发生的革命在今后几年內极有可能发展成为在大陆另一端的第二个阿尔及利亚战争。这个斗争是游击战和城市与矿区的无产阶级革命动员相結合的斗争，它将会得到由（非洲）内地构成的全黑非洲的积极支持。农民后备軍和本国有利的

地理条件都是对游击战争非常有利的。而且，南非洲的工业、农业和矿业无产阶级的本国经济是非常重要的。以一个全国性的真正的革命组织为基础的南非群众的革命暴动有可能比较迅速地结束少数欧洲人的激烈反抗。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把这种不可避免的反抗考虑在内，决不能轻视它而必须根据这种考虑作好准备。

南非洲的革命不可避免地将会是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革命，它将推翻在全非洲在经济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政权（具有奴隶思想、种族主义和特殊地位的政权）。在它进行斗争的时期以及由于它的胜利结局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后果，南非洲的革命将把全黑非洲的革命发展形势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目前在南非洲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非欧洲人的群众革命组织。这个组织在提出群众的全国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的同时，它的目标将指向武装暴动和无产阶级革命。

如果没有朝着上述方向的决定性行动，没有群众参加各项动员工作，没有灵活性的策略以便即使群众采取错误步骤时也不致同群众割裂，那末，就会有很大的风险，使群众的革命潜力在一整段时期内浪费在没有前途的爆发上面，群众的实际领导权可能转移到没有能力坚持全国性的长期斗争和不断地把斗争提到更高的水平。

如同在阿拉伯国家的情形一样——有的地方甚至也和在黑非洲国家的情形一样——，各个地方需要建立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组织将需要在一整段时期内把大部分工作放在现有的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和工会里面。它的总的目标将是在各地建立起以工会为基础的群众性的阶级政党。

这些政党将需要制订一个过渡性的纲领，这个纲领须适应本

国的具体情况同时也要考虑到将来把它们重新联合起来和成立非洲联邦(或黑非洲社会主义联邦合众国)，建立工会組織和全非洲性的独立自主的工会联盟，是各地必須热烈执行的任务，因为各地工会代表着主要的組織力量，各地政府(还有现在正在形成中的資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会力图使这些工会为他們服务。

## 十、拉丁美洲革命的新阶段

### 拉丁美洲不稳定的原因

拉丁美洲的革命是现阶段殖民地革命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它已越过了正式独立的阶段并且取得了关于买办寡头政治甚至关于民族資产阶级的不少經驗。

拉丁美洲的資本主义发展在所有附属国家地区中是最先进的，在某些情况下，例如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甚至已达到接近于資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虽然同今天的先进資本主义国家比較起来，它们是明显地落后的，但它们基本上接近于战前一般資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以及买办地主阶级和商业寡头对它们的控制还是很紧的，它们在这些国家里形成一种在经济发展中充满矛盾、时断时續和不平衡的联合体。

拉丁美洲在大战期間大大加快了它的工业化过程，自从大战結束以来，工业化过程仍然在繼續着，尽管它是痙攣性的。在所有附属国地区中，拉丁美洲拥有欧洲和北美洲最大的投資。

但是帝国主义也正是从这里榨取了最大部分的剩余价值，它远远超过帝国主义的“援助”而且沒有就地再投資生产。帝国主义对拉丁美洲庞大的农业、动力和矿业資源的剥削，加上寄生的地主和商业垄断寡头的剥削，阻碍了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并造成了这

种经济发展所表现的时断时續、危机和不平衡。

由于矿业、煤油业、农业和其他帝国主义企业所榨取的最大部分剩余价值都被运回本国；由于垄断寡头对投资的投机性变化；由于人民目前收入低，国内积累的比率非常小，因而使就地再投资生产的资本构成受到阻碍。然而目前两个因素比較起来，最后的因素在资本构成中的重要性是有限的。

在拉丁美洲输出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在大战期间和战后由于在世界市场上奇貨可居而获利的情况下，本地货币资本的构成在增长，并且数量很大。这个因素連同其他因素有助于加速工业化的过程。但是自从这些输出品的价格甚至出口数量下跌以后，这种本地资本构成的来源也就減少了。

而且，拉丁美洲的老朽的封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結構，阻碍了国内市场的平衡发展，大多数农民只有很少的土地或者沒有土地，他們从国家方面也得不到适当的援助，工人的工資一般很低，同时也缺乏发达的下部結構（交通、动力、各种公用事业的建設等等）。因而使国内市场受到限制和互相脫节。

而且，由于它的經濟往往依赖于单一农产品和矿产品或者范围极为有限的产品的输出，在发生真正的經濟危机时，这些国家就感受到在世界市场上的衰退，并在慢性通貨膨胀中进行痛苦的掙扎。这无助于扩大国内市场，也无助于本地资本的投资构成。

人为的疆界（这是帝国主义殖民地化和帝国主义的統治及买办寡头区域性利益的遗产）也使市場不能在它的自然界限內得到充分的发展：即整个拉丁美洲，或者以南美洲为一方面，中美洲、墨西哥和加勒比海諸島为另一方面。

反对拉丁美洲革命的自由发展最坚决的是北美帝国主义。拉丁美洲的农业、动力和矿业資源，从墨西哥經過富饒的委內瑞拉和

巴西直到巴塔哥尼亞(阿根廷南部高地——譯注)，已成为正在消耗着本国資源的經濟高度发达的美国的絕對不可缺少的后备力量。而且拉丁美洲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工业品和資本的最重要的出口，它的战略利益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也是十分重要的。

北美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逐步地取代了欧洲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势力之后，已成为主要的反动力量，它同买办垄断寡头結成同盟，阻碍了拉丁美洲自由和平衡地发展經濟和实行工业化，保持了过时的社会結構，并把这个地区割裂成为許多互相对立的小国。

北美帝国主义战后对拉丁美洲的控制不断地遭到拉丁美洲新兴力量的猛烈反抗，有时且是胜利的反抗，它的控制同样地由于帝国主义之間的重新竞争以及工人阶级国家开始的竞争而受到破坏。

不管怎么样，随着这个地区战后經濟发展和工业化的繼續和加速，这些国家的社会面貌已大大改变，它們大大不同于世界上其他附属国地区，而且比較发达得多。

除了占总人口的絕大多数的农民(分益佃农、农业工人和个体貧农)和人数相当多的城市小資产阶级(知識分子、机关工作人員、职员、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之外，已經形成了集中的和生气勃勃的工业无产阶级，特别是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以及在智利、玻利維亚、秘魯和委內瑞拉的矿业或油业中心。

而且除了正統的买办地主和商业阶级之外，还形成了新的工业民族資产阶级，他們希望爭取一个比較自由的、受帝国主义和垄断寡头的阻力較小的經濟发展。在許多拉丁美洲国家中，正是这些阶级直接地或通过拿破仑式政权力图壘斷和把持政权，并利用农民、工人和激进的城市小資产阶级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来为

他們自身的利益开辟道路。

但是帝国主义和垄断寡头的反抗力量仍然很强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本身也害怕过分相信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支持，而不能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垄断寡头。这个政治因素和经济困难的相互作用，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以及革命群众运动的力量，是现阶段拉丁美洲国家长期不稳定和几乎是不断发生革命危机的基础。

依靠军队和警察的买办垄断寡头的独裁政权在多数情况下已证明今后是不可能的或无能为力的，而处在帝国主义与垄断寡头的反抗和群众运动的急进主义之间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权又证明是非常不稳固的，因而政治危机就成为拉丁美洲特有的病症，在政治方面就反映了目前拉丁美洲革命的变化，在帝国主义发生总危机、工人阶级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威力在增长、殖民地革命正在各国兴起的当前国际局势中，充满了矛盾、时断时续和不平衡。

拉丁美洲国家的不稳定和革命危机的延长，也表现了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迟缓（或不如说是不够成熟），未能使这个危机在最近的将来达到胜利的结局。但是客观条件对于这种迅速的成熟和建立革命无产阶级的集体领导是极为有利的。

目前拉丁美洲一般的客观革命形势明确地反映了群众革命运动的威力和领导阶级之间的极端分裂和尖锐的对立。

阿根廷无产阶级自庇隆垮台以来所进行的不停的斗争，玻利维亚自 1952 年革命以来所保持的基本革命果实，智利工人阶级政党势力的增长，哥伦比亚、秘鲁和委内瑞拉独裁政权的垮台，古巴的革命，以及现在已经在巴拉圭开始的反对独裁的斗争，这许多许多的事实雄辩地象征着群众革命运动力量的不断增长。

另一方面，阿根廷、巴西、智利、玻利维亚和其他国家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及军队（它是这些国家的反动独裁政权的传统工

具)之未能有效地干預和阻止这不断发生的危机，也是标志着拉丁美洲的深刻不稳定和客观的革命形势的重要征象。

### 拉丁美洲革命的过渡性綱領和主要的問題

下一阶段的拉丁美洲革命可能达到的水平将取决于建立能够代替目前领导群众革命运动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无产阶级的集体领导，只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倾向性的组织在群众运动中大胆和巧妙地开展活动并考虑到各国的具体情况，这个任务在目前是可能实现的。

在各个地方把在无产阶级群众组织或具有革命性质的平民群众组织中的独立活动和招收成员的工作结合起来，它的任务将是制訂和提出一个走向工农政府和社会主义的过渡性綱領，这个綱領将特別包括以下几点：根本的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給耕种它的农民；国家給予农民合作組織以有效的援助；在經濟基本上国有化的基础上实行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計劃，它应考慮到世界市場特別是統一的拉丁美洲市場的資源以及来自工人阶级国家的援助和同工人阶级国家的貿易。

在拉丁美洲一般地必須不懈地宣传建立**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联邦**的口号。

各个地方所需要的不是爭取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的抽象口号，而是具体解答各个国家的重大問題，这些問題必須由以政治組織和工会組織及民兵組織和各种委員会为基础的工农政府加以解决。

土地改革必須导向把垄断寡头的土地分配給耕种的农民，只有在公社习惯根深蒂固而便于实行集体主义經營的特殊情况下才能立即实行，集体主义經營，如同种植园的情形一样，国家把它轉

变为由种植园工人合作社經營的集体主义模范种植园。伴随土地改革而来的应当是来自工人阶级国家的、有利于农民合作經營的技术和經濟援助計劃。

虽然銀行、运输、某些主要企业和对外貿易的国有化，在开始的时候是不可缺少的权利，但是其余的国有化将根据生产繼續的标准和生产的标准，在国家对企业(包括外国企业)可能管制的范围内采取措施。

正如在其他比拉丁美洲国家更不发达的附属国家一样，促进拉丁美洲按計劃迅速发展經濟和实现工业化的主要源泉之一是，把世界人口生长率最高的地区之一、而目前有很大一部分沒有使用的人力动员起来参加生产。但是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根本革命，在工农政府的統治之下，才能为这项动员工作創造必要的精神状态和具体的架子。

具体的过渡性政治綱領的制訂必須与寻求走向群众性革命政党的过渡性組織道路同时进行。目前在拉丁美洲各地，这方面的目标必須是成立具有群众影响的阶级性的政治組織，它不同于壟斷革命领导权的民族資产阶级和急进的小資产阶级的最先进的組織。

拉丁美洲革命比其他地方的革命有一个更显著的特点就是工会运动在若干拉丁美洲国家(特別是阿根廷、玻利維亚和智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包括政治作用)。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民族資产阶级力求使工会成为反对它的敌人和发展自己的力量。为了阻止这种趋势并充分利用工会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重要作用，必須有系統地宣传**建立以工会为基础的群众性工党和以工会为基础的工人政府的思想**(在存在着提出这个口号的客观条件的地方)。而且，为了加强工会运动本身的力量，必須号召为爭取各国工会的統

一(每个企业一个工会和单一的工会联合会)以及为爭取建立拉丁美洲劳动者的单一的革命联合中心而斗争。鼓动建立反帝統一战綫始終是同鼓动建立无产阶级統一战綫联結在一起的，这种鼓动适应目前这个时期的需要。

拉丁美洲的无地农民的巨大革命潜力已在玻利維亚、巴西、哥伦比亚、中美洲特别是在古巴表现出来。工农联盟是这个国家的革命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依靠对农民系統地宣传根本土地改革的綱領和在农民中間进行系統的工作，就能使革命組織在农村中扎下根并培养农民干部，使农民的革命动员成为可能。但最重要的是必須在革命激烈动荡的时期中，抓住有利的革命时机，組織农民大胆地发动爭取土地的武装斗争，把这个斗争同工人的动员联結起来。然后农民游击战争将可以証明是工人斗争的强大鼓舞力量，并在一旦工人运动可能遭到部分失敗或处于低潮时，使阶级敌人不能加以利用。

在拉丁美洲，革命的馬克思主义傾向拥有比其他地方可以迅速发展的有利陣地。除了有利的客观条件之外，现有的社会党和共产党在群众中还没有扎下根。唯一的例外是智利，那里的社会党(它的阶级构成和影响都和拉丁美洲其他社会党完全不同)和共产党(它拥有广大的群众)在群众的压力之下建立了統一战綫(人民行动陣綫)。社会党左翼的行动还有助于部分地糾正共产党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的路綫，在这里面托洛茨基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他地方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实行听命于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和懦怯的政策，这种政策不符合于拉丁美洲群众的革命願望，也不符合于根本解决問題的迫切需要。

在强大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压力之下，由于統治阶级內部的分裂和危机，帝国主义在国际的削弱，以及工人阶级国家的力量和威

望的不断增长，目前在若干社会党（智利、乌拉圭、阿根廷）中，重要的左倾中间势力正在发展。

相反的，共产党唯一的中心目标就是为了苏联外交的暂时利益而对美国帝国主义施加压力，把赌注专门放在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完全相对的对立上面——他们从而放弃了独立的阶级政策而实行极端机会主义的政策，把自己置于无能为力的配角地位，没有任何威信，而且常常遭到各种以“左”的美名作掩护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出卖”。

### 特殊的形势

在拉丁美洲目前客观形势一般是革命的，其中**阿根廷、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和古巴**具有更加特殊的形势。

**阿根廷**，工人阶级自发的斗争性，只有日本的群众可以同它相比。在这种条件下，政权经常不稳定，可是群众也未能够把国家的不断发生的危机导向革命的结局。只有建立以工会为基础的阶级政党，它们将懂得如何抓住有利的时机把群众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委员会和民兵组织，动员农民和农村无产阶级，把整个斗争的目标指向成立工农政府，只有这样才能把国家从死胡同里挽救出来。

在这由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动员而产生的形势中，在各个不同的关头已经出现或至少可能出现**双重政权**的因素，这些因素还可能再度出现。必须努力使这些因素采取具体的组织形式（如各种委员会、民兵、游击队）。在这种形势之下，加强十倍地宣传**建立以工会为基础的工党的主张**，将能够产生更实在的效果，把庇隆主义者的工会中的激进派扭转到这个方向来，——它将由于相互作用而加速整个国家的革命过程。

因为从政治观点来看，由于它现在走进了死胡同，妨碍了大部

分属于革命的工会主义的活动，到头来将会或至少暂时会失去群众的积极兴趣，而使主要依靠军队的公开或隐蔽的独裁政权得到暂时的和相对的稳定。

在玻利維亞，我們看到革命群众运动的新高潮，它表现在 ROSCA 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右翼在农民和矿工中間所遭到的残酷失败。但是由于缺少一个足够强大的革命党，这个高潮有可能再一次为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左中势力（埃斯登索罗）所独占，而得到玻利維亞总工会中間派领导机构（萊欽）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左派的支持。

革命群众运动的力量使得革命的基本胜利得以保持下去，并且胜利地击退了反动派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亲帝国主义右派势力的一切进攻。由于革命党力量的薄弱，而使革命不能够以成立工农政府告終。

鉴于埃斯登索罗—萊欽的中間派联盟有可能重新取得政权和目前拉丁美洲的有利形势，群众不可避免地会重新起来。必須利用这个形势把整个矿区置于工人（委員会和民兵組織）的有效管理之下，在农民民兵組織和农会的压力之下普遍实行土地改革，并强制实行一項經濟計劃，它将考慮到国家的实际資源（包括劳动力在內）和工人阶级国家的援助及与工人阶级国家的交易。

玻利維亞总工会特別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在委員会和民兵組織的协助下）解决政权問題、土地改革問題和經濟計劃問題的口号，在这些条件下将再一次成为适时的口号。这种可能的和必要的发展的关键仍然在于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党的力量，特别是加强党在矿工和农民中間的力量，党应当把日常活动和领导工作的主要部分放在这方面。

在委內瑞拉，依靠革命群众而掌握政权的政党必会面临着来

自帝国主义和来自群众的压力，群众迫切要求根本改变和实现当初他們进行革命所要求的真正結局。这个国家以往的經驗證明，所有的政府不論它开始的时候表现多么“革命”，結果必然屈服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压力及其在委內瑞拉的无比丰富的石油和矿产中的巨大利益。

民主行动党是一个类似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秘魯)或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玻利維亞)那样一种异常組織，以急进的小資产阶级为领导，它业已分化为亲帝的反动的一派和比較能够接受急进的基层的影响的一派。如果没有建立工农民兵組織和委員会，决不可能迫使党和政府扩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实行真正的土地改革，把本国的石油和矿产富源收归国有，頒布多种經營和迅速发展經濟的計劃，从国家的巨大經濟資源获得利益，从而有效地捍卫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必然要发动的新的进攻。

革命馬克思主義傾向性組織在民主行动党左派內招收成員的工作应当导致主張成立以工会为基础的工党。

在古巴，古巴革命已成为整个拉丁美洲革命的最前哨，它的成就和教导是很多很重要的。

古巴的革命說明了，游击队的功效，它依靠迫切要求实行根本土地改革的貧农，同时动员城市无产阶级和小資产阶级，包括在一定阶段內，在人民的同情与保护之下，組織人数有限的小队采取武装行动。

尽管领导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而且缺少一个群众性的革命政党，但是在革命群众(农民、无产阶级和急进的城市小資产阶级)的推动之下，同时在面临着与现在已被推翻的血腥独裁政权极度妥协的买办势力的情况下，古巴的革命正在迅速有力地发展为不断的革命。

古巴革命的领导机构在清除了一整批的赤裸裸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之后，目前已成为一群接受群众不同程度的革命影响的急进民主主义者，也就是说，尽管他们的社会成分和思想是非无产阶级的，他们不得不超越资本主义的界限并严重地破坏了它的平衡状态。但是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推翻这个制度，按照它现在的样子，没有建立一个同群众的民兵组织、委员会和工会联结起来的群众性革命政党，要推翻这个制度是不可能的。

根据土地改革已经达到的范围、对外国帝国主义企业实行国有化的一些措施，彻底清洗了国家机器，以及建立了民兵组织和人民法庭等方面来看，古巴革命已经大大超出资本主义的框框，但还没有完全粉碎这个框框，而代之以建立在国有化经济和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新型的国家。在目前阶段，重要的还不在于完成推翻封建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和社会措施，而在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和扩大民兵组织和人民法庭的组织，和建立作为地方政权机关的公社和委员会的组织。

在这种情形之下，可以根据在国内和国际上巩固革命的需要，宽缓地采取实现有效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经济措施与社会措施，不致过早地挑起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应，和引起生产失去平衡。古巴革命胜利发展的关键在于：在国内，迅速成立具有明确的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纲领，并包括全国一切革命人士的群众性革命政党；在国外，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国家，成立捍卫古巴革命的国际组织。

古巴革命在所有这个地区的反应和影响是巨大的并且将继续扩大。因此可以预料到美国帝国主义和拉丁美洲买办垄断寡头会采取残暴的行动，用尽一切办法来打倒古巴革命政权或迫使它屈服和走向资本主义。

因此，古巴革命的安全，最后决定于在拉丁美洲国家有效地保卫住古巴的革命，并向美帝国主义明确表示，对古巴进行任何军事干涉，一定会在全拉丁美洲掀起一场大风暴，使古巴的革命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蔓延开来。必须迅速地在全拉丁美洲开展组织“保卫古巴革命委员会”和成立“志愿队”的运动。

### (三) 殖民地革命和第四国际

#### 十一、結論

殖民地革命的最积极的局面之一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直到昨天他们还遭受到帝国主义和买办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贫困、没有文化、消沉)已经形成不可改变和不可抗拒的运动，要争取符合于人类现有可能条件的物质、文化和社会水平。

从这个观点出发，这种要求实现最高文明愿望的革命觉醒已在人类中间产生了质的变化，例如，由于这种觉醒的结果，妇女和家庭的地位现在已经在发生根本的变化。全人类已经从这个质的变化得到了好处，这个变化是由长期生活在文明边缘的群众的革命所引起的，这个革命通过以上事实已促使总的运动朝着新的社会主义文明的方向发展。

事实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工农群众正在飞快地取得政治上的成熟，迅速地跳越过几个阶段。

由于有了自己的经验，得到了其他落后国家部分群众所取得的胜利的鼓舞，得到了现在正在进行的革命的胜利的鼓舞，得到了工人阶级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经济成就的鼓舞，殖民地群众(他们越来越可能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和我们的运动)将能够找到一条使他们的政治觉悟得到迅速进步的道路，他们的先锋队的重要阶层将

会直接接受人类最先进的理想和綱領：第四国际的理想和綱領。

可以說，殖民地革命在历史现阶段居于世界革命的先鋒地位，这决不是言过其詞。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也充分意識到，先进資本主义国家迟迟未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所带来的缺陷，它未能提高群众的思想水平，未能建立眞正的群众性的革命馬克思政黨，未能克服运动中和工人阶级国家中的官僚主义，未能迅速建設立即有利于群众而不是不久将来才有利于群众的社会主义。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背离目前历史现实和尽量利用目前历史现实的問題。现在已經明显，世界革命的过程是从外国、从殖民地和附属国以及从现有的工人阶级国家向着欧洲和美国（它可能是最后的国家）的資本主义国家发展的。

第四国际，列寧与托洛茨基的第三国际的革命传统和原則的继承者，在这些条件之下，很自然地，只能是在革命活跃的地方，在群众和世界上最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进行斗争的地方，开展它的主要活动。

由于正当的历史原因，在一整段时期內，第四国际的发展是集中在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方面，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它一直是把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看做是世界革命的第一号中心。

现在第四国际作为一个国际組織，必須根据殖民地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部分来重新組織它的活动，在一整段时期內，把它的主要努力放在这方面。

国际的前途就在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黑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以及日本，这些地方有立即和迅速取得胜利的可能。

第四国际必須表现自己有能力在所有这些地方組織有效的力量，沒有任何宗派主义，把自己同群众革命运动联結起来，并对群

众的願望提供有效的回答。

的确，第四国际已經在殖民地革命的許多中心起着虽然有限然而重要的作用。第四国际在理論上和实践上支持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这一有力的行动，把阿尔及利亚革命提到最高的水平。在古巴，(第四国际)古巴支部和出席拉丁美洲青年代表大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代表团的行动使我們的运动在古巴革命內部贏得重要的虽則是分散的影响。在阿根廷，(第四国际)支部在上次大选中同庇隆主义工人运动中的重要势力結合起来了。

所有这一切表明，在下一段时期，第四国际有可能同重要的群众运动結合起来，并且领导或与其他势力共同领导某些殖民地革命的国家或地区的革命运动。

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已极端墮落，前者听命于垂死的帝国主义；后者听命于保守的苏联官僚机构，殖民地革命的陣地，已为在战略上和实践上敢作敢为，在策略上机警巧妙的第四国际的革命組織广开門戶。

只有同群众和世界上最受压迫的人民的斗争密切地并且最終地結合起来，第四国际才能証明它在历史上是完全正当的，并发挥它作为领导革命的先鋒队的作用。

## 5. 苏共二十大以来的斯大林主义危机

一、“非斯大林化”是斯大林的继承人为克服斯大林統治的后期所积聚起来的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經驗主义的行动，这些矛盾在苏联本身和在“人民民主国家”已达到爆炸性的頂点。在 1956—57 年，危机不仅在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是尖銳的，而且在資本主

义国家的共产党也是尖銳的。

赫魯曉夫領導机构于 1957 年 7 月成功地巩固了它在苏共党內的领导地位，它采取了一系列的經濟和政治措施，并为工人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了一个重新聚合的路綫，力图克服危机，以便确立一个可以受它控制的实现“非斯大林化”的范围和界限。这个重新聚合的路綫就发表在各国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除外)領袖于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在莫斯科通过的宣言里。

这个文件指出了斯大林的“优点和缺点”，对过去的解释則限于讲斯大林一生后期的“个人迷信”(它尚不及赫魯曉夫向二十大所作的报告)，并且譴責了想追究苏联國內社会分化的任何企图，因为这将会不利于官僚主义政权。这个文件还重申“和平共处”的政策，亦即把共产主义运动从属于苏联外交需要的政策。

因此，(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所规定的路綫仍然属于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属于世界各国共产党“一党独揽”制度(*monolithic system*)的范围内。不論在工人国家或各国共产党內，它形成了一个防御的路綫，一个反对工人民主的屏障。

赫魯曉夫領導机构力图在一个新的水平上稳定官僚主义政权(比起斯大林时代是自由民主的)，并重新确立各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权威。

到了苏共二十一大(1959 年 1 月)的时候，这些努力在关于重新确立官僚机构的統治地位方面已获得了一定成就，并在关于工人国家政府結構和各国共产党内部关系方面引起了很大的变化。官僚主义領導机构为适应新的形势而采取的这些努力已为斯大林主义危机的发展和走向政治革命开辟了新的道路。

但是，在苏联的領導机构、官僚机构和群众之間，在官僚机构

的各个阶层之間，由此而建立起来的平衡状态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考慮到在“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存在着不利于苏联官僚机构的新的力量对比的話，則在苏联領導机构和其他工人国家及共产党之間的平衡状态也是很有限的。

一切改革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官僚主义特权，向沒有給工人民主带来即使是一点点有价值的东西。这一点，苏联工人只有通过自己的行动、通过把斗争提高到政治革命的水平的时候才能够得到。自从斯大林逝世以来，苏联国内的整个演变，不論其范围如何广泛，从来沒有超出官僚主义制度的框框。因而这种广泛性本身就強調了实行政治革命的必要性，这个革命将把官僚机构作为一个其利益与群众利益不同的社会阶层赶下台来，并重新建立一个适应苏維埃社会巨大的經濟和文化成就的苏維埃民主。在这三、四年的一一定稳定时期內，新的矛盾已經成熟起来，代替了或者盖过了一部分旧的矛盾。这些新的矛盾一般地比旧的矛盾更高一級，它們將給予官僚主义制度的危机以在苏联具体实现政治革命和建立新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所不可缺少的政治形式。

二、除了共产主义世界的这些內部矛盾之外，现在还有一个使它担心的全新的事实。强大高涨的革命运动几年来第一次在世界各地发展着，革命斗争的先鋒已摆脱苏联官僚机构的控制，它們正努力寻求一个不受它控制的社会主义学說。两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前两个主要的革命运动：阿尔及利亚革命（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在这里已不再有任何发展的机会）和古巴革命（斯大林主义者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只是因为他們做了运动的尾巴并公开表明他們沒有接管这个运动的意图。在黑非洲也有同样的情形）。

于是全世界的共产党人第一次看到莫斯科的领导地位（这个领导地位甚至在第一共产国际以及后来在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以后

仍然是被承认的)受到了挑战——挑战的不再是小的先锋集团，主要的也不是思想性的，而是站在反对资本主义世界斗争最前列的革命群众运动。于是强大的革命运动暗地里提出了建立新的国际革命领导的问题。此外还加上这样的事实，即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在实际上谴责了斯大林对南斯拉夫人所采取的行动之后，并没有能够成功地使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回到莫斯科的轨道上来，从而在所谓共产主义世界中仍然留下了一个伤口。

### 目前共产主义世界中的主要矛盾

三、在工人国家的群众起来、殖民地革命兴起和新的世界力量对比(在群众和国家的水平上)的影响下，目前共产主义世界正在发展着新的矛盾，它已使苏联领导机构对世界的领导权和政策成为问题，从而为走向共产主义更新的新阶段作了准备。

中苏的争论，即使是按照目前所表现和发展的形式，是这些矛盾中最突出和最严重的表现，它已使共产主义运动对以下这些主要问题的政策成为问题，即：关于国际关系，关于同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关于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关于夺取政权的道路，关于在资本主义已被推翻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等等。

中苏的争论并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想求得理论上的阐明而引起的，而是由于改造中国社会的需要和在殖民地革命压力之下提出的問題而引起的。在很早以前，苏联共产党就已经很明显地成为官僚机构的政治工具并且是极端保守的，中国共产党尽管也具有重要的官僚主义的特征，但它对于世界革命的压力要敏感得多。因此，中共和苏共之间的对立虽然不是(工人国家之内)一个革命

的党和一个保守的党之間的对立，这个对立对于世界革命斗争具有重大的影响。

从此以后，各国共产党对下列問題观点的一致性已或明或暗地发生問題了。

### (甲) 战爭危险与和平共处

关于国际关系問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来，在赫魯曉夫領導下的苏联領導集团的路綫正如在斯大林領導之下的一样，不論是在“和解”时期还是“冷战”时期，是沒有什么不同的，即：不惜任何代价(包括牺牲世界革命运动在內)同世界資本主义达成協議，同时共产党和和平运动則在資本主义国家內施加压力以便取得政策上的轉变，使其有利于苏联的外交主张——这就是战争結束以来各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針。在資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代替推翻資产阶级政府以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是“爭取和平”和同資产阶级勢力达成協議。

斯大林和赫魯曉夫之間的不同只是由于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工人国家的变化。在斯大林时代，苏联還沒有核武器，故而发动了斯德哥尔摩呼吁书运动。在赫魯曉夫时代，宣传的是裁軍，它是作为可以实现的結果而提出的，它仅仅是保証两个阵营之間的經濟竞赛和思想斗争。

共产党及其同路人所遵循的机会主义、和平主义和小資产阶级的方針，沒有受到其他許多共产党特別是南斯拉夫人的挑战。由于国际条件和國內条件不同，中国正在进行不断的革命，因而中国的领导机构在国际关系的水平上对苏联的基本方針提出疑問。中国人贊成国与国之間的和平共处和裁軍建議。但是他們反对——而且十分正确地——莫斯科的关于資产阶级內部和平勢力反

对好战势力的想法，他們也不同意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有实现裁軍的可能性。他們提到战争是資本主义固有的現象，要人們不要受資产阶级领导人的和平建議的欺騙，认为在这个問題上不应当在群众中散播幻想，认为应当利用裁軍建議的被拒絕来教育群众，引导他們进行反对資本主义的斗争。

于是，不用明明白白地对資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方針下結論，中国人十分正确地反对了莫斯科的基本观点，虽然他們自己的某些論点(如称美帝国主义是“紙老虎”，过低估計核战争对于人类的危险性)可能有缺点或者是危险的，他們后来对这些論点已多少作了一些明确的改正。

## (乙) 对殖民地革命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 国家民族資产阶级的态度

在这个問題上，苏联的领导机构仅仅是从外交上的考慮出发，而不是从反对帝国主义和阶级团结的观念出发。因而在碰到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問題时，苏联政府为了希望同戴高乐达成協議，长期以来就认为阿尔及利亚問題是“法国的事务”。相反地，中国政府承认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

苏联的领导机构努力寻求和支持那些贊成它的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路線的民族資产阶级或其中的一部分人。它促使共产党去支持这些“同盟者”并把工农群众的斗争摆在从属的地位。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印度的克拉拉邦和伊拉克共产党对卡塞姆政府的态度。为了使这样做法名正言順，赫魯晓夫的“理論家們”只是重複斯大林关于这些国家处于資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和关于資产阶级在这些革命中的进步作用的話。

由于中国自己的經驗和由于中国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資

产阶级政府的关系，中国人沒有正式地抛弃他們的党二十多年来所持的革命阶段論的基本观点，而是提出了“不断革命論”的观点以鼓励这些国家的工农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依靠而且反对资产阶级的领导。且不管中国政府有任何外交政策上的考虑，这不是一个绝对明确的和原則性的态度問題。但是在这个問題上，中国人的方針也是指向正确的道路。

### （丙）走向社会主义的議会道路和平道路

赫魯晓夫从二十大开始，就已經明确地提出一种观点，确定了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特別是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的活动是通过和平的和議会的道路夺取政权，而一笔勾銷了关于摧毁资产阶级政权的問題。关于在遭到资本主义或其中一部分人的激烈反抗时，这些道路将証明是行不通的保留提法，只不过是一种文字上的裝飾，因为共产党的政策的基础完全放在議会道路和平道路上面，如同社会民主党一样，共产党仅仅是为了这个前途而組織起来的。

受到許多共产党领导热烈欢迎的这种观点，已引起党内群众的不安和反抗。在这个問題上，中国人对这个模棱两可的公式提出了与赫魯晓夫相反的提法。他們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要进行反抗，并坚持关于资产阶级議会必将成为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障碍的理由。他們还坚持关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国家的必要性。

### （丁）建設社会主义的“模型”

战争刚刚結束以后，特别是在“冷战”开始以后，当时“人民民主国家”在结构上是一模一样的，它們奴顏婢膝地抄袭苏联的模

型，各国都提出“在一國之內建設社会主义”（极度工业化、农业强迫集体化等等）。

第一个反对这种奴顏婢膝地抄袭（它重新恢复和扩大了一切斯大林主义的錯誤）的是南斯拉夫人，他們走他們自己的道路。1956年，特别是在匈牙利和波兰，又出现了其他反抗行动。最后是中国人——特別是由于“公社”——他們采取了建設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

于是有三种建設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型”面对面地存在着：苏联模型，中国模型和南斯拉夫模型。

这三种模型各具有根据本国发展条件所固有的特点，他們的出发点不同，甚至关于社会关系的观点也不同，因而工人国家的群众有可能来对照他們的观点和判断他們的成就。

苏联的模型受到重視是因为它的資格老，并且在經濟和技术方面已取得了成就，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尽管自从斯大林逝世以来实行了各种改革，它的主要特征是官僚机构在苏維埃社会中的势力，它在各个領域里的无上权威，它的极度保守性，以及在这官僚机构中占优势的个人利益的倾向。此外，它的斯大林主义的过去（特别是强迫农业集体化和可怕的清洗）仍然欠下东欧工人国家和西欧工人运动的債。

中国的模型特別是以公社的實驗为其特征。尽管由于領導的观点和中国經濟文化的落后而产生了官僚主义，然而公社的實驗含有在集体基础上而不是在純粹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动员群众的企图。公社的實驗是为了通过这种集体的努力使整个中国社会摆脫极端落后状态。同时，它在社会方面特别是在使中国的妇女从极端卑賤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这方面获得了非常巨大的进展。中国的模型对于正在摆脫殖民主义桎梏的国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他們

从中可以获得关于通过呼吁群众的集体参加来发展本国的宝贵教训。相反的，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却害怕中国的模型，他们从公社的例子中看到了它到头来对官僚机构的权威具有潜在的危险，因而力图诋毁它，诬蔑它和斯大林的强迫集体化是一模一样的。

南斯拉夫的模型尽管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它却是第一个企图——**在企业一级和在某种程度上在地方和行政区域一级**——依靠城乡群众的主动性和自愿，让工人在这些方面参加监督和管理，以便有意地反对官僚主义倾向。这个政策的局限性似乎在于南斯拉夫没有全国性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保持着没有其他流派的一党制）。然而正是由于依靠群众反对官僚主义倾向才使南斯拉夫能够取得重要成就。这个实验在农业经济方面也已证明是有成果的，它试图促进农业的逐步集体化，并照顾到其技术可能条件和小农业主的自愿贡献。南斯拉夫模型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之所以受到其他工人国家和共产党的反对，特别是因为它是作为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具体创例。

#### （戊）工人国家的计划的配合不充分

在苏联和其它工人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已不再存在曾使苏联——南斯拉夫矛盾达到破裂点、然后又引起紧张局势特别是与波兰和匈牙利的紧张局势的那种错误行动和粗暴作法。但是，矛盾和紧张关系继续存在，并且由哥穆尔卡最近在波兰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反映出来。

经济互助委员会并不是各个工人国家的经济的全球性计划组织；它只保证某种分工。这一点的原因是，每一个工人国家的执政的官僚机构，首先是苏联官僚机构，具有首先是民族的利益，并且想要取得它们认为对它们自己在本国的地位是最有利的结果——

甚至在損害其它国家的情况下这样做。在东欧，指出这种危险的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而处于最不利地位的領導，即波兰的領導。

各个工人国家的經濟发展将使国家計劃的占主要地位的“民族”性和这些經濟具有国际計劃的必要性之間的矛盾愈来愈尖銳。这种矛盾的发展将是使苏联对东欧国家的領導权受到怀疑的一个重要因素，結果，它也将有助于斯大林主义危机的发展。

\* \* \*

这些新的斯大林主义矛盾斷然結束了工人国家和共产党的机构的磐石般的一致性。除了南斯拉夫的情况以外，正是在整个时期沒有发生决裂情况的共产主义世界的中心出现了巨大的矛盾，并且彼此对抗，整个說來这些矛盾开始制訂一个在国际和國內方面从革命政策，而不是苏联领导人的机会主义政策：工人的控制和管理，社会主义在农村地区的进展，工人国家之間的平等与合作关系，对殖民地群众的支持，包括反对他們自己的民族資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通过反对資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爭取和平。

但是，今天反对苏联的政策和領導的群众力量都沒有以完全前后一貫的方式提出它的反对意见，沒有在对斯大林主义的全面的基本的批評中把所有这些矛盾集合起来。相反，共产党和工人国家的各个領導之間的对抗的立場明显地糾纏和交錯在一起。因此，阿尔巴尼亚人由于中国人的一些立場和方法而支持他們，而这些立場和方法跟作为——例如——巴西人支持中国人的原因的那些立場和方法是非常不同的。因此，为了决定我們的运动的正确的干涉，必須避免任何全面的簡單化的并列，这种并列可能导致对于在斯大林主义危机中表现出来的不同趋向的錯誤估計，非常重要的，在每一个情况中都要知道怎样正确地区別每一个趋向关于逼迫它的动机的特点和它所特有的倾向、方法和立場。

此外，所有这些力量都沒有正式怀疑各党的磐石般團結的概念，沒有保卫在黨內抱有不同傾向的權利，更不用說在工人國家建立几个工人的權利了。

在不同的方面，我們看到出現了工人國家的进步和“在一个國家建設社会主义”的政策之間的对立，这仍然是所有共产党的领导的方針和思想中的中心問題。在客观上，这个局势，特別是中国革命的局势，第一次向党的领导提出了在相結合的三个方面的永远革命的問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順便解决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迅速（“飞速”）发展，在一国范围已經胜利的革命的国际扩张。

因此，斯大林主义的矛盾已达到一定程度的政治成熟性，它非常有利于更为具体地提出政治革命和使共产主义运动复兴的問題以及重新建立新的群众性的国际革命领导的問題。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場决不是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場，但是这些立場表明了它的巨大可能性，并且开辟了像托洛茨基主义在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工作方面。我們的运动最大程度地利用这个特殊的方面的条件是：充分地了解中国的立場取得的进展，以便前进建立沒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目前的限制的、前后一贯的共产主义倾向，向全世界的共产党战斗分子以及向在共产党影响以外的其他革命力量提出一个全面的前景。

## 八十一個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會議

四、在作了两次嘗試（第一次在莫斯科，然后在布加勒斯特）而沒有取得任何持久的結果以后，俄国人和中国人在十月革命四十三周年的时候在莫斯科举行的會議上努力寻求一个折衷办法，以

結束他們的爭端。由于所爭論的闡明影响到整个共产主义世界，他們不得不让一切忠于斯大林主义的党的领导参加他們的努力。

八十一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會議已經由于它开得很长——三个多礼拜——而證明与斯大林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在斯大林时期，一致意见是由于追随他們“天才”而自动地达成的。磐石般的一致已为討論所代替。但是这并不是民主在这些党内复活的一个迹象：討論是在渴望避免像在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所做的那样向战斗分子和工人透露他們的困难和分歧的领导人之間秘密进行的。

除了會議开得长以外，它所发表的文件表示了寻求一个可能是持久的折衷協議的决心。

一般地說，看来已在苏联官僚机构的主要立場上达成協議：这个文件是以通过“和平共处”和裁軍爭取和平为中心的，中国人反对了这些意见，但不是清楚而直率地反对。文件重复了苏联的公式，但是关于每一个立場，都提出了各个政治主张、保留意见和考慮，并把中国人所保卫的立場考慮在內。它特別不再是資本主义分裂为贩卖战争派和爱好和平派的問題，并且用与戴維营心情毫无关系的、有利于北京報紙的字眼有力地強調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

中国在“不断革命”方面退却了：我們现在看到一个新的提法出现了——“民族民主国家”——一个沒有阶级性的国家，对这个国家的定义不是取决于生产关系的性质，而取决于它的政策在显著改变着的性质，在这个公式的背后，我們事实上再次发现旧的斯大林主义的理論：在資本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专政正当中的革命，一个既不是資本主义社会也不是工人国家的社会阶段，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的一种社会。

作为补偿，中国人在他們肯定最关心的問題上取得了非常重大的让步，这个問題就是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資产阶级的态度。这些資产阶级的“两面性”——既反对（但是非常不均衡地）帝国主义又反对工农群众——受到譴責。文件在这一点上远不是正确的，但是它包含着中国人在他們与不发达国家的关系的問題上可以有效地加以利用的公式，这些国家在經濟上仍然依靠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里，民族資产阶级不是寻求改善群众的情况，而是从这些国家生产的剩余价值中取得更大的一份。从殖民地革命目前在世界革命中所占的地位来看，很明显，这不仅是向中国人所作的重要的让步，而且还是在世界政策规模上在对帝国主义的关系方面的左倾步骤——不管它可能是多么胆怯的和矛盾的。实际上，对中国人所作的这个让步可能由于它所牵涉的后果而證明是非常重要的。

文件或多或少重复了二十大就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問題所說的話，俄国人对这些話作一种解释，中国人作了另一种解释。在这一点上沒有新的发展；沒有任何东西会阻止在一有机会时就重新进行討論，像在过去那样。

关于公社問題——作为社会向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种形式，中国人給予公社以占压倒优势的地位——文件的沉默表明分歧繼續存在。中国人所获得的东西最多不过是：这是一个考慮到各国的民族特点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正确”运用建設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的問題。这是不够的，如果人們記住这一点的話：对中国人來說，公社制度是要普遍实行的。

決議以一种不同的和不平等的方式譴責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后者被称为是次要的和沒有具体指名道姓的危险。相反，南斯拉夫被猛烈攻击为修正主义者，更有甚者，錯誤地指責他們宣称

馬克思列寧主義“過時”，對社會主義陣營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進行“破壞工作”。這些無節制的攻擊證明官僚主義者面對着在莫斯科會議上派有代表的黨和國家的矛盾，多么害怕南斯拉夫的态度——不管它看來可能是多么有限的。

在波兰人提出的關於在工人國家之間進行更密切的規劃這個問題上，他們得到了滿足。

文件似乎表明，在“指導黨”這個問題上沒有任何改變：蘇聯共產黨保持它作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公認的先鋒隊等等的稱號。當中國人想要反對蘇聯領導人的政策時，他們從來不把这个提法放在心上。

可以指出，在宣布舉行會議和宣布與會者名單的官方公報中，蘇聯共產黨不再列在第一位，而是按照字母次序列在土耳其和烏拉圭之間。在像目前這個世界那麼等級化和官僚化的世界里，這個小的跡象可能具有象徵性價值。

會議通過的文件表明，事實上分歧並未消除，而是“一項同意保持分歧的協議”，如果這項協議是十分謹慎的話。在會議期間，中國人雖然處於少數，但是得到了若干共產黨領導的支持。而且，其他的領導起了調解的作用。

國際局勢以及使中蘇發生分歧的總的條件還不會使這種分歧緩和，反而會促進這種分歧，並且會使其比過去更為尖銳。因此，我們在指導我們的運動時必須要看到這種前景，就是在共產黨世界內可能重新發生衝突，重新發生分歧，出現愈來愈重要的預示緊張局勢和危機的跡象，而在現在不可能確切地斷定其動向，其確切的形式以及從而再次引起危機的政黨。

八十一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會議表明，世界革命的發展和在工人國家內生產力量的加強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並沒有停

止促使产生斯大林主义危机，在官僚政权的范围内通过官僚领导之间的协议不可能找到解决办法。这些只会损害局势本身所提出的要求，即恢复工人民主和恢复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共产国际。

## 苏联社会的問題和矛盾

五、在斯大林死后苏联领导表现的朝提高生活水平方向努力的总的的趋势得到了保持和发展。苏联领导必须考虑在斯大林时期遭到粗暴压制的主张平等的趋势，它必须把很低的工资提高，虽然不平等的差别仍然是很大的。群众生活条件的改善使最基本的要求消除或者减少了，但是产生了新的要求。劳动者越来越感觉到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力量和他们自己仍然很低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巨大矛盾（请看在讨论苏联人造卫星时发表的各种谈话）。这就是为什么赫鲁晓夫坚决地许诺要超过美国水平的原因，这也是他争取“和解”的原因，以便把大量军事开支中的一部分移用来满足群众的需要。

购买者对消费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严格，以前对质量是忽视的，因为只对重工业、军事需要及与此有关的物品“空间导弹等等”注意质量。

必须指出，在哈萨克斯坦出现的运动中，工人十分重视社会性质的需求：托儿所、戏院、电影院、运动场等等。

在企业生活方面，当局采取了各种从本身看可以被认为是开明的措施（企业中某些工会组织有了权力，把某些机构的管理权交给了企业和工会）。不管工人在时间仍然未定的将来如何利用这些措施，总的来说所以采取这些措施首先是需要改善管理，因为目

前的管理仍然是官僚形式的。这些措施是同在整个經濟中、在計劃中采取的分散措施一致的，因为旧的高度集中的形式同高度发展的和广泛的机构是不相称的。

官僚主义所以成为无数批評的对象是由于它的领导的形式和方法，而不是——至少不是公开地——把它当为一种社会現象。为数众多、遍及許多城市中心的苏联工人阶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要求实行企业民主化，这种要求通常会形成一种桥梁，通过它提出更为一般的政治性的要求，目的是要在这个工人国家內恢复苏維埃民主。

由于农业經濟仍然是苏联經濟的薄弱环节，领导方面試圖刺激集体农庄庄員的个人利益来改善农民的处境，同时又以利用“处女地获得生产来对他们施加压力。用这两种办法取得了平平的成就，而且只要农民是和官僚主义的当局打交道，情况就只能是这样。

知識分子即使收入已經仍然是一个有很大特权的社会阶层，但是一直要以它表明自己順从当局的意旨为条件。在艺术和文学作品方面，經過一个时期的解冻以后，赫魯晓夫的领导一方面摆出自由主义的样子而且放弃斯大林特有的某种荒謬的作法，一方面加紧对知識分子的控制。它担心，可能会通过这些知識分子而对官僚主义政权提出政治性的批評。“党的文学”、“党的艺术”这样一些观念仍然保持下来，虽然范围比斯大林时代放宽了一些。重要的事实是，知識分子抗拒恢复控制。此外，除了官方的文学和艺术产品以外，还存在以半秘密的方式流传的不是順从正統的产品。

在青年、特别是大学青年中，新的潮流、絕對不是順从正統的新傾向已經成熟起来。正是从他們身上将产生为真正“回到列宁时代”而斗争的革命力量。这些傾向的存在已經以各种形式并在

各种情况下表现出来，但在目前尚处于相当于萌芽的阶段（为重新发掘俄国革命的真正历史而进行的研究以及反对干涉匈牙利的情緒）。

各級官僚政治、特別是最高几級的官僚政治的最駭人听聞的、和过分的特权受到了一些限制，同时也保持某种稳定，一种能够在明天还存在下去的保証，这是斯大林时代所沒有的。不会再有大规模的清洗。“在哪行精通哪行”成为越来越正式的問題。最重要的考虑是一个人在他的职位上的“效率”如何，否則就会有降級的危险。

目前的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整个官僚政治都能在政策方面有发言权。只有少数地位很高的人員与党中央委員会进行的討論是有关联的。不过同主席团（前政治局）比較起来，这个組織恢复了它已完全失去的某些权利；就是由于中央委員会，赫魯曉夫才得以制止使他在主席团处于少数的“反党”傾向。包括最高苏維埃在内的国家机构只是执行中央委員会决定的工具而已。

社会关系緩和的新情况使党的机构——在政治上把苏联社会凝聚在一起的唯一因素，同社会各阶层比以往更加隔絕了。然而由于这个机构，更具体地說来，就是中央委員会是国内唯一真正的政治机构，苏联社会的巨大政治危机大概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在那里表现出来。目前的中央委員会，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情况以外，全都是一些新人物，他們沒有什么政治的經歷，在政治上沒有什么真正的从属关系。

苏联领导人对党报上反对中国人鼓吹的观念所进行斗争的重視和坚持，以及在全党各組織就这个問題提出的警告，使得人們认为，在苏联共产党内部存在同意中国人的观点的潮流，或者在“和平共处”政策及其結果方面轉向同一方向便說这是前斯大林主义

分子、拥护旧的所謂“反党”傾向的党羽的問題，这种說法是沒有任何根据的。看来倒不如說，这是新的阶层所表示的意见，从而証明自从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經发生一种变革：第一个工人国家內发生的斯大林主义危机的新阶段正在臻于成熟。官僚主义的絕對統治賴以建立的基础是群众在政治上的原子化，现在替代这种状况的是群众中間某种提出要求和先鋒中建立一些研究和討論中心的傾向。苏联經濟的跳跃式的发展使得行政机构无法保持穩定，并且正在迫使它作出調整；它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就使自己受到批評。

苏联報紙不斷公开批評行政中的問題。苏联社会的动力經常冲击官僚主义保守主义。殖民地的革命正对苏联社会发生强烈的影响。

## 資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情况

六、在这些党中間，1956—1957 年的危机在各地許多地方都以引人注目的形式呈现出来，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进而撤換领导人或重要人員。后来开始出现一場傾向性的斗争。然后，总的來說，党的領導恢复了它們对共产党組織的控制。但是自从 1956—1957 年危机以来，可以看到各地的共产党，比較重要或不那么重要的共产党內的危机加深，即使这种危机的各个方面不再是引人注目的。

在共产党是群众的党的那些地方，党同劳动群众的关系都沒有因为进行了同“个人迷信”有关的討論而大大恶化。但是始終存在一种危机，表现为領導的权力削弱，这些党内比較重要的阶层对于領導奉行的政策表示怀疑，以及到目前为止在基层組織中間一

些自发的反对的表示，他們在国内的某些情况助长这种反对的时候，就作出这种表示。

至于那些在群众中間影响微弱的較小的共产党，1956—1957年危机在各地的表现几乎都是党员退党和党明显地丧失影响。然而从那时以后可以看到相反的发展。例如在像英国和澳大利亚那样，由于工人阶级中間和同工党的关系发生的某些剧烈的变化，某些共产党可以得到新党员并收复他們失去的地盘。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像在丹麦那样，党以前一个主要領袖拉森建立了一个中間党社会人民党而在选举中主要是以牺牲丹麦共产党为手段而获胜。

从现在起，若干因素会使斯大林主义的国际危机和每个共产党內的危机加深，这些危机就是，提出莫斯科政策所未能解决的問題的資本主义危机，由于事态进展和群众活动而引起的群众运动，中苏爭端以及更为普通的斗争——官僚政治的内部斗争。

这些因素现在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殖民地革命的发展使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消失了。最明显的例子是阿尔及利亚，在那里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为了使自己成为法国共产党的工具及其甚至在阿尔及利亚問題上的“民族”政策的工具，几乎取消了自己的存在。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共产党都受到了它們自己国内的群众运动的压力，虽然程度有所差別，同时它們受到了来自莫斯科或北京的压力。这种情况使这些党内产生了分歧的潮流，反对意见的趋势（印度、巴西）和有时造成分裂（伊拉克）。

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特別是大党，受它們贊同克里姆林宮政策的态度，受它們自己的政策的右翼和机会主义性质的影响要大得多。在这些党内可能会发生新的广泛的危机，其原因

不是由於它們受到了新的重大危機特別是蘇聯本身的危機的刺激，就是由於工人階級運動及其對這些黨的中下層幹部產生的影響有了新的增長，而這些幹部只有在群眾的壓力使他們有實際的可能採取一項富有戰鬥性的政策，左翼反對派的政策的情況下才會決心表示反對意見。

由於中蘇分歧對各國共產黨的影響的結果，我們將會越來越多地面臨政策隨國籍的不同而異的政黨，因此在每一種情況下需要有適當的方針。在莫斯科的影響占主導地位的黨內，必須對右翼和機會主義的政策進行鬥爭，辦法是確立根據左翼反對派政策制定的行動綱領與之對抗。在特別受北京影響的黨內的或黨的趨勢內，我們將會看到一種新型的中間偏左主義，如果我們不對其採取正確的態度，在某個時期內這種中間偏左主義可能會妨礙我們自己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以這些黨已經取得的進展作為起點，提出奉行這種方針的激進分子和潮流必須進行不斷的理論和政治鬥爭，這就是說，必須超出已經達到的境地而進入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境地。

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從這一总的考慮出發，即共產黨世界的矛盾將會繼續發展、國內和國際問題將會在其中起作用、所有的共產黨不管它們目前的政策如何，將會成為第四國際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思想發展的越來越有利的地盤。

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重要共產黨內，可以看到不斷發展的斯大林主義危機的各種不同現象：

具有最富斯大林主義色彩的領導和最強大的工具的法國共產黨裝出看法一致這種十分虛偽的外表。在它的黨員和幹部中間充滿了嚴重的不安。領導知道存在着反對派，他們“正在等待他們的時刻”（多列士語）。法國政治局勢的惡化或者國際斯大林主義中

产生的公开危机的表现将不会不在这个党内引起重大的危机。

意大利共产党一贯遵循右翼政策(在需要时会左倾)，而对内部政治生活采取一定的自由主义。

印度共产党从没有停止过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喀拉拉邦的失败以及中苏纠纷不能不使它的分歧加深。

巴西共产党在过去曾经历过好几次很严重的危机，现在再一次为一场巨大的联系斗争所分裂，在这场斗争中，由于巴西的政局所造成的分歧意见和中苏争端搅起的问题联结在一起。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过去也经历过好几次严重的危机，它在最近一个时期经历了一些突然的变动(不超越支持苏加诺这一政策的总限度)，大概可以把这些变动解释为是反映了党的领导人物之间的分歧。

即使中苏争执的以公开危机形式出现的明显可见的影响目前只限于巴西共产党以及少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这一争执——中苏两方的领导都没有能解决它——最后会不可避免地使存在于各国共产党内的各种矛盾滋长起来，并倾向于孕育出巨大的危机来。首先是因为这一争执引起有关各国共产党在国内和国际上的总政策的种种问题。其次是因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有着重大影响。

## 第四国际与斯大林主义危机的新阶段

七、现在正在成熟的斯大林主义危机的新阶段证实了前几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根本分析和几次大会的主要展望。这使得我们的运动更迫切地需要利用这一新阶段，来——在斯大林主义人士中，他们在资本主义国家和工人国家内都是接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

工人积极分子的最丰富的后备——推进我們的思想，来加速在工人的国家中成立第四国际的分部，成立群众性的革命馬克思主义政党，并从而为在工人的国家中进行政治革命和恢复对群众运动的国际领导作准备。

(甲)在苏联和工人国家中。第四国际的 1938 年綱領和第五次世界大会的提綱中拟定的大部分項目仍然留在确定工人国家的行动綱領的議程上。

反对社会不平等，因为已經消失的只有少數十分昭彰的弊端。在这方面，“恢复列宁准则”空前地要求把薪金限制于一个熟练工人工資的水平。

反对政治压迫，这种压迫并未随着抑制秘密警察的无限权力而消失。在苏联，并不是所有的团体和机关都是不受国家权力控制的自由机构。恢复工人民主仍然是政治革命的主要任务：恢复基本自由(集会、結社、言論自由)，工会組織独立自主，在苏联組織多党的权利。沒有这些权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苏維埃和真正的苏維埃民主。

沒有苏維埃民主，就不可能改組苏联的經濟，把它置于生产者有效管理下。

恢复苏联、布尔什維克党以及共产国际的历史的真实面貌，不錯从科学的誠实态度方面說是一項当务之急，而且从政治上說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必要，以便让苏联的群众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重新见到真正与十月革命初年列宁主义政策連結在一起的方針。

中苏对于苏維埃政权有必要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談判并为防止新的世界大战而努力这一点是沒有疑問的，但中苏的爭执使 1938 年綱領上的要求具有迫切的当前意义，1938 年的綱領要求采取一种革命的国际政策，要求无条件地支持工人运动和殖民地

群众的运动，反对任何想实行秘密外交以牺牲任何国家的群众利益而求得同帝国主义达成全球协议的企图。

(乙)在群众性的共产党内。第三次世界大会所确定的工作方针已为下列两件事证明是正确的，一是斯大林主义危机在现有组织中出现时所表现的形式(而不是由这些组织中的大规模分裂来证明)，一是1956—57的危机年头所表现出来的结果，即倾向于把自己组织起来在各共产党内进行派系斗争的反对集团的形成。走向在共产党内形成和组织派系的道路，完全不同于社会民主党内的道路，因为它们需要以进行长时期的秘密、非法工作为前提条件。

不同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之间的愈来愈明显的矛盾表现，不能不有助于任何一个共产党内派系的形成，因为每一个党员首先是或者应该是一个共产党人，然后才是法国的、意大利的、苏联的、中国的、南斯拉夫的，等等。在这个问题上，首要的要求之一是，把争论中的问题以文件形式完全地老老实实地编出来交给党员，办法是甚至把对立领导的全文也予以公布。这是党员们能够自己进行讨论，自己作出判断，而不是由于对纪律滥加解释而遵循他们本国领导的见解的第一个条件。

这样一种观念必然导致成立一个共产主义运动国际组织的必要，必然澄清建立一个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思想。自第三国际解散以来各国共产党关系的演变的特点是苏联官僚制度的一连串失败(组织共产党情报局、双边关系和现在较多或较少几个党的领导人偶尔举行的会议)。所有这些失败都证明，官僚主义越来越有必要同时也越来越难于回避组织一个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国际新领导机构的客观需要。八十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以其自己的方式不自觉地承认了组织一个以

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世界党的必要，在目前，在国际工人阶级运动中，只有第四国际代表着这样一个党，不仅在理论上是，而且在实际上也是。

老老实实把情况提供出来，在党员群众中进行民主讨论，举行国际会议讨论分歧意见——这些东西就是各共产党内的普遍要求，同时，我们提出我们关于把群众性共产党中的左派力量大规模地联合起来的主要立场。这样一种纲领的总方针由于国际局势的重大问题和由于已在苏中之间发生的分歧意见而变得越来越具体了：通过剥夺资本主义的政权从而解除其武装来争取和平；无条件地支持殖民地人民的革命和帮助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者创建独立的工农组织来实行具体的阶级行动；谴责走和平和议会道路的思想，回到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主张的观念上去；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根据一次过渡纲领并依靠一切工人组织法或统一战线的策略来夺取权利。

\* \* \*

结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局势发展越来越证实托洛茨基主义的论断，那就是斯大林主义，即共产主义运动从属于苏联官僚制度这种现象是与任何伟大的革命发展不相容的。南斯拉夫的革命很快就和斯大林主义决裂了。接着，在苏联和在东欧其他的工人国家中，在群众的眼前要求上产生了一连串的矛盾，这些矛盾引起了爆发（波兰和匈牙利的十月事变）。尽管赫鲁晓夫领导想方设法，想用一种以苏联经济和技术的巨大进展为基础的、缺乏活力的“改良主义”来缓和这种危机，但是新的矛盾却仍在成熟，特别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发展。

在那时以前，伴随着每一个这种危机而来的是包含在第四国际总纲领中的有限要求，或者是朝着这个方向的要求。目前，斯大

林主义国际危机的新阶段提出了一大堆問題，这些問題是世界革命問題和国际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問題，在这些問題背后，还有新的群众性的国际領導問題。正在成熟的斯大林主义危机的新阶段因此将大大有利于托洛茨基主义及其組織——第四国际的进展。

## 附录一：

### 第四国际简介

密歇尔·巴布洛

它是什么組織

它的目的是什么

第四国际是由列昂·托洛茨基及其战友在 1938 年 9 月創立的組織。

它的历史实际上是和十月革命的命运的历史、苏联的历史以及第三国际的历史分不开的。

1917 年，俄罗斯工人和农民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維克党的領導下，取得政权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

但是这一胜利是在非常困难的和对于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繁荣发展不利的情况下取得的：俄国当时是一个在經濟和文化上都十分落后的国家，农民占人口絕大多数；在 1918 至 1921 年間，这个国家深受內战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之苦；革命处于孤立状态，因为欧洲或世界其他地方并沒有别的无产阶级成功地战胜它的阶级敌人从而也取得政权。

因此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設是在很不利的国内外环境中进行的，这种环境从一开始就影响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性质和演变。

那时的落后而孤立的俄国在經濟和文化上的种种困难，甚至在列宁在世时就已經使工人国家发生了官僚政治的变形：各级苏维埃、各级工会和布尔什維克党本身都有变为从属于国家政治和

經濟机构并有为其吞沒的趋势，这些国家机构开始逃避群众的直接控制并排除群众参与管理。

除了工人阶级的各种組織屈从于国家的影响的这种官僚主义化之外，在列宁治下还有一个不同于无产阶级的社会阶层在萌芽发展，这个阶层和无产阶级的經濟水平和社会地位相比是享有特权的，而且越来越有势力：这是一个官僚阶层。

列宁在他世的最后几年，已逐渐注意到这种危险，他是第一个力图和这种现象进行斗争的人。特别从 1921 年开始，党内和国内的民主問題和反对官僚主义化的斗争使布尔什維克党产生了派别，这些派别归根結底反映了在发展中的苏維埃社会中新的社会力量的冲突。

现在所謂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根源就产生在 1923 年左右那段时期，当时托洛茨基接替列宁领导布尔什維克党内为爭取无产阶级民主、反对初露苗头的官僚主义化和新发生的斯大林主义的斗争。那一时期的文件充分証明了这一点，特別是托洛茨基的《新方針》<sup>①</sup>，乃是无产阶级民主和革命政党內民主制度的真正的宪章。

早在 1923 年前即已开始的布尔什維克党内反对官僚主义化的斗争，接着很快就发展到全国，并越出国外发展到整个第三国际，这一斗争在直到 1928 年为止的一整段时期內都在繼續进行，也就是直到托洛茨基在 1927 年被斯大林开除出党并在 1928 年被逐出国外，在土耳其的普林基波島上避难为止。1923 至 1928 年的年代是布尔什維克党内左派反对派形成的时期。

历史将使人們回忆起，左派反对派在党内以及在某种程度上

---

① 1923 年 12 月在《真理报》連續发表的一組文章。

也是在第三国际內繼續进行斗争，对于使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运动存在下去的思想和实践水平是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的。因为这表明，斯大林主义远不是如某些人所认为的，是列宁的布尔什維主义的自然的和好像是有机的延續；斯大林主义为了得到发展和成功，不得不在多少年中繼續不断地和布尔什維克党中整个一个派別进行斗争，这一派包括有党的最优秀分子，布尔什維克的精华部分，他們在列宁領導下曾繙造十月革命并且創立和領導了第三国际。

斯大林主义只是在实际上毀坏了列宁的布尔什維主义思想和組織結構才达到强施其統治的目的。

从 1923 至 1928 年，俄国左派反对派圍繞着下列一些思想和政治問題进行斗争并形成为一个派別，这些問題的巨大重要性无论怎样也不会估計过高的：

反对党和国家官僚主义化，爭取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反对斯大林的“在一国建設社会主义”的理論（1924 年秋天初次形成），爭取世界社会主义革命；<sup>①</sup> 反对新經濟政策的难以控制的发

---

① 托洛茨基及其战友忠于馬克思和列宁的教导，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在国际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取得完全胜利。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其生产按人口計算将比最发达的資本主义更多、更好和更便宜的制度，在一国范围内建成是难以設想的，不論它有多么富足。資本主义只有在国际劳动分工的基础上才取得了发展。 社会主义是一种生产力远比最发达的資本主义为高的制度，就更要求有一个国际的，实际是世界規模的基础。

托洛茨基主义者并不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国内取得胜利 和在 单独一国内开始建設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他們所不同意的是社会主义在一国之内能够 取得完全的胜利的理論，他們并且反对一种“民族社会主义”的自給自足經濟的方針。

这个問題的重要性不仅限于术语方面。实际上它决定了革命无产阶级的整个策略。 斯大林主义使国际无产阶级的行动从属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設。 第四国际却正相反，认为保卫苏联和完成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最好的方法，是通过爭取其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来不断扩大社会主义經濟基础。

展，爭取計劃經濟；<sup>①</sup> 反对第三国际在英国 1926 年大罢工<sup>②</sup> 和在中国 1925—1927 年大革命<sup>③</sup> 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爭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执行列宁主义的政策。

我們可以看到所有这些綱目都在左派反对派的最著名的文件即它的 1926 年政綱中得到充分闡明，政綱的签署人中有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是預定提交 1927 年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

流亡使列昂·托洛茨基得以在第三国际和一般的国际革命运动的更大范围内传播俄国左派反对派的思想。

于是开始了我們现在可称之为第四国际的史前时期的一个新阶段，国际左派反对派的形成阶段，在各大洲很多国家中建立了許多小組和进行接触。这一阶段从 1928 年持續到 1933 年，到希特勒登台为止。

在这一阶段中，国际左派反对派为苏联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的民主改革而进行斗争。它希望許多事件的压力和广大群众对官僚机构的压力将足以促使共产党产生“回到列宁”的运动。

在德国，从 1928 至 1933 年，无产阶级——組成社会党与共产党两个大党——与法西斯主义之間展开了决定性的斗争。

国际左派反对派意識到这一斗争的历史重要性，号召两党自

---

① 不管斯大林神話怎么說，历史的事实是，計劃經濟的概念是托洛茨基早在 1923 年就已提出来的。从 1925 年开始，俄国左派反对派就有条不紊地为草拟一个加速国家有系統的工业化的計劃而战斗，来反对斯大林—布哈林的以在当时鼓励富农发财为基础的路綫。

② 在这次大罢工中，斯大林从上面与英国工会的改良主义官僚組成一条統一战綫，这使这些官僚得以背叛——沒有进行有組織的抵抗，并对英国共产党也沒有带来任何好处——英国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

③ 当时斯大林支持蒋介石并命令共产党 屈从于国民党——一个由蔣領導的中国資产阶级政党。

下而上的統一戰線采取战斗的政策，目的在夺取政权。可是共产党却正相反，它听从克里姆林的指揮，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政策，坚持分裂工人运动，并使有关希特勒所代表的危险和与之斗争的最好办法的看法更加混乱。我們在这著名的“第三阶段”中是不偏不倚的。<sup>①</sup>

国际左派反对派，在一系列至今仍不失其正确性的重要文件中，闡明了法西斯的性质、社会民主党的阶级性质和统一戰線等問題。它竭尽全力在德国共产党內和第三国际內喚起和激发良好的反应，以避免造成希特勒获胜的灾禍。然而，德国共产党連同第三国际与克里姆林宮，对于这些呼吁仍完全置若罔聞。

希特勒在 1933 年的胜利不仅决定了德国共产党的命运(它一直沒有从这次遭难中恢复过来)，并且也决定了整个第三国际的命运。鉴于在历史紧要关头的經驗，这些組織已无能力作出良好的反应，說明它們本身已无可救药地官僚主义化了。国际左派反对派得出結論，从此以后需要为建立新的革命的馬克思主义政党和一个新的共产国际而努力。

于是，开始了第四国际史前时期的另一个新阶段，時間是从 1933 年至 1938 年；在这一阶段中发动了組成一个新的国际即第四国际的运动。

的确，那个阶段是不利于把广大群众團結在一个新的国际所提出的思想、政綱和組織的周围的。德国法西斯的胜利的后果波

---

① 在这一阶段，斯大林曾提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論，把社会民主党視同法西斯主义，还提出了“来自下层的統一戰線”的政策。这二者就使得实际上不可能与社会民主党人組成任何統一戰線，同时还在工人思想認識中縮小了法西斯主义的危险。

在这种“过左政策”造成不幸之后，斯大林接着又在 1934 年轉向“人民陣綫”这一相反的政策，即从上面与改良主义的官僚和所謂“自由”资产阶级，如法国和西班牙的急进派建立联盟。

及整个工人运动，一項新的世界大战的远景正出现在地平线上。

而且，凡是群众轉向革命攻势以堵塞或打倒法西斯主义的地方，如 1934 至 1939 年的西班牙，1936 至 1938 年的法国，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領袖們都在“人民陣線”中与資产阶级政党合作，使运动遭到失敗或受挫折。总的来讲，1933 至 1938 年期間突出显示了国际革命运动的普遍衰落和接二連三的失敗。

那么国际左派反对派为什么还要坚持宣传和組織一个新的国际呢？

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因为国际工人运动的这种演变証明：传统的领导的不可挽回的全面破产，从而迫切需要一个新型的领导。而为了这一目的，一旦其必要性得到历史的証明，就必须着手发动。现在需要开始认真地为未来作好准备，把所有确信国际左派反对派綱領正确的革命馬克思主义者組織在单一的世界政党內，这一綱領不是人为的，而是国际左派反对派敢于在苏联和全世界的阶级斗争烈火中鍛造出来的。

我們是在这样的时刻开始組成一个新的国际的：由于历史事件一再証明而使我們确信旧的领导的破产，并且我們自己已精心制訂出一个不同于工人运动中任何国际流派的完整的綱領。

而且，我們还确信，把我們團結在一个国际組織中的这一綱領的确是当代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綱領，与社会党的和听命于克里姆林宮的各国共产党的政治行徑是根本不同的。

至于說到广大群众尙沒有跟随我們这一点，我們不认为这足以推延宣布一个既成的事实：即我們作为一个革命的馬克思主义国际組織的存在。

为了使群众拥护我們，我們必須向他們举起十分鮮明的旗帜，必須為他們提出范例，而不是去等待那种好像是自发产生的新領

导。

当然，只要我們的群众基础仍这样有限，我們并不妄想能够指导阶级的行动。我們今天仍然只是明天的群众性共产国际的胚胎。当初在 1938 年 9 月通过決議不顾一切地宣告第四国际誕生时我們也是这样想的，当时正处于帝国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反动的高潮时刻，并且已經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

第四国际成立大会所提出的主要政治文件称为《过渡綱領》，主要是由列昂·托洛茨基亲自起草的。

这一綱領清楚地說明一个事实，即第四国际作为一个組織是从当今的国际工人运动内部产生的，它全心希望使自身进一步与整个运动合成一体，而不是要成为一个宗派或是一般的宣传小組。《过渡綱領》的目的实际是要坚决领导群众的革命行动走上夺取政权的道路。

《过渡綱領》是打算在对于社会主义來說资本主义客观条件已經成熟，和受了传统的社会党和共产党领导人影响的群众的落后政治觉悟之間架起一座桥梁。

《过渡綱領》包括有整整一系列辯証地互相联系的口号，这些口号从群众的最迫切的經濟和政治要求出发，但目的在于把斗争提高到夺取政权、爭取建立工农政府(无产阶级专政之前的最后一个阶段)的水平。

这些口号远不是武断和“知識分子式”的，而是实际上对那无产阶级連續不断地进行斗争的资本主义客观条件作了透彻分析的結果。而且，这些口号还考慮到当代的国际工人运动的經驗，甚至(在方式上)工人的心緒状态。

《过渡綱領》的概念是彻底革命的和辯証的，根本不同于社会党与共产党的綱領。

这些党有一个最高綱領，設想要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社会，还有一个最低綱領，坚持基本的經濟和政治要求，以及在資本主义制度結構內进行改革。但是在这两个綱領之間沒有桥梁，缺乏以一連串辯証地相互联系的过渡性要求来連接最低綱領与最高綱領的中間环节。

其实社会党和共产党在**实际行动**中已經把他們的最高綱領擱到希腊历卡伦茲日了<sup>①</sup>，只是在“重大場合”，为了把群众煽动吸引到他們这边来，才重新提一下。他們在实践中只采用在資本主义制度的結構內行动的最低綱領。而我們知道这是什么緣故。

因为事实上，社会党尽管还拥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基层，却是由服务于資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机构領導的；而共产党則是由听命于克里姆林宮的官僚机构領導的，即政治上听命于苏联的居于統治地位的社会阶层——苏維埃官僚阶层——的领导。由于这个原因，各国共产党所关注的，不是首先促进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把他們的法碼加在本国民族资产阶级一边，使后者能采取一种有利于克里姆林宮的外交政策的对外政策。

《过渡綱領》則正相反，它反映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运动的思想和經驗，虽然是从工人阶级的最基本的要求出发，但真正的目的却在于促进工人阶级去进行最大可能的革命活动。

我必須說，《过渡綱領》中有些口号，諸如与通貨膨胀作斗争的活的工資計算法、与失业作斗争的活的工时計算法、工人监督、工厂委員会、工人监督下的国有化、工人民军队等等，在 1938 年看来似乎与群众的想法离得很远。但是因为这些口号无论如何是符合

---

① 这是一种幽默的說法，原文为 the Greek Kalends，Kalends 为古罗馬历的初一，古代希腊历中沒有 Kalends 这个名称，所以說“希腊历卡伦茲日”意思就是“永远不会有那天”。——譯者

資本主义客觀情況的，一向通過亲身的經歷接受教育的群眾，也善于時時刻刻在他們的鬥爭中把這些口號變成他們自己的口號。二十年後，過渡性綱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具有驚人的適合時宜的特點和富有青春活力。這對於那激發起綱領的概念的精神來說特別真切，因為它是唯一的一個綱領，能指引一個先鋒隊真正下決心去動員群眾進行鬥爭，不是為了改良，而是為了進行反對資本主義政權和制度的革命。

必須採取一個過渡綱領，和 1938 年的過渡綱領一樣，目的在於有效地促進這樣一個鬥爭。

在第四國際成立約一年之後，如我們所預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

從思想觀點來說，第四國際對於這樣一個事件比之任何其他工人組織有較好的準備。特別是自从希特勒登台後，我們的運動曾數次強調指出這一走向戰爭的必然趨勢。我們說過，那一次戰爭基本上是又一次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凡爾賽條約的勝利者和失敗者之間要求重新瓜分世界。這一次，假定說與戰爭是怎樣開始的無關的話，也會在一定時刻把蘇聯卷入戰爭。但是這並不會把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變成一次“正義”戰爭，也就是說，這不應導使革命運動去支持帝國主義最後的同盟國蘇聯。

根據 1934 年我們的組織的國際書記處擬出的“戰爭與蘇聯”提綱，革命者的責任是在一切帝國主義國家內堅持“革命的失敗主義”，不管這個國家是蘇聯的敵人還是盟友，只有蘇聯自己進行的戰爭應認為是“正義的”戰爭。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从根本上指導我們的路線。

列昂·托洛茨基曾比任何人都先預見到有簽訂德蘇協定的可能性，這一協定事實上是在 1939 年 8 月簽訂了。但是，不管我們

怎样指責這一協定，因為以當時簽訂協定的外界狀況來說，它使無产阶级迷失方向，雖然如此，我們並不改變對苏联這個變了質的工人國家的基本態度：它對帝國主義的或本國的反動無條件防守，也就是說，這是與克里姆林宮的政治領導人的這一個或那一個政策无关的。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們嚴格地採取這一個態度。

1940年8月，在群众支持方面很薄弱的我們年輕的国际，受到了一個比處於孤立狀態（這是預見到的）更可怕得多的打击：列昂·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几年前他逃亡到那里）被一個苏联共产党的人員刺殺了。我們从此喪失了革命的最強有力的智者和革命斗争中最堅強最值得視為模範的人物。

戰爭日益激烈，并且因苏联的加入而變得更加複雜，這對我們組織產生了強大的壓力。我們必須同時在兩方面战斗，既要反對民主陣營和帝國主義陣營中被愛國熱潮引起的群众的錯誤想法，又要反對帝國主義的鎮壓和克里姆林宮的政策和鎮壓。

要和“民主的”或是法西斯的帝國主義对抗，就必須堅持“革命的失敗主義”的路線，也就是不論這個國家的軍事效果如何，必須堅持反對戰爭和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宣传的路線。

為對抗克里姆林宮（反法西斯的“民主國家”的新盟友）的政策，必須把兩種政策結合起來，既要保衛作為一個工人國家的苏联，又要无情地批判克里姆林宮向那些同羅斯福、丘吉爾和戴高樂結盟的所謂“民主”國家的共产党宣传的机会主义的、沙文主义的和階級合作的政策，還要進行革命宣传，爭取在首次出現的適當時機推翻苏联的蘇維埃官僚阶层的政治制度。第四国际所执行的这样一种政策并未有助于将群众團結在它的旗帜周围的工作或从双方的鎮壓下救出群众。但是我們认为，这一政策是忠于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而且在类比的范围内，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具体条

件下的相当于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所执行的政策的。

第四国际为执行这一政策，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特别是在被納粹占領的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和受蒋介石独裁政权統治的中国。我們被納粹枪杀或在集中營中消灭的牺牲者數以百計，特别是在法国、德国、波兰、希腊、荷兰、奥地利、比利时和其他一些地方。

我們在战时丧失了我們运动中的大批领导干部和在本国享有声誉的具有悠久历史的革命战士，如我們的法国組織的總書記馬瑟尔·希克同志死于德国集中營，比利时的勒索瓦勒同志和雷昂同志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意大利的布拉斯哥同志在“解放”的时候牺牲于斯大林的鎮压下，希腊的鮑利奧博洛斯同志于 1943 年在希腊遭法西斯枪决，牺牲的还有德国魏德林同志和其他許多同志。

納粹在欧洲大陸所敢于举行的唯一的一些公开审判是在荷兰和奥地利举行的，审判的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和亲托洛茨基主义的战士。由于这些审判的結果，有几个人被枪决了。在美国、英国、錫兰和印度这些站在“民主”一边的国家，只有托洛茨基主义的領袖們被监禁，因为他們始終一貫地进行反对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在人类最黑暗的这一段时期中，几位托洛茨基主义战士的态度是真正英雄主义的态度，据最客观的观察者的报道，他們在各方面都和他們的俄国同志們(斯大林鎮压的牺牲者)一样可敬。

我要举出几个例子来。

德国同志魏德林是在欧洲淪陷时期中唯一出版的一份定期刊物的主編，这份刊物鼓吹一种与德国工人一視同仁地实行国际友爱團結的政策。这份刊物的名称是《工人和士兵》，在法国、比利时等地的德國士兵中发行。有一天，巴黎的盖世太保逮捕了一个法国女同志，接着又拘捕了另外三个同志，其中之一即魏德林同志，

他当时正秘密地住在巴黎。这四个同志的遭遇属于当时最离奇的遭遇之一。

这些同志之一被拘后解送巴黎盖世太保中央总部，他跳越三层楼的窗户逃跑了。另两位女同志送往德国的集中营。其中之一侥幸活下来，现在住在英国，和一位英国同志结了婚。还有一位，在 1944 年冬在德国有过一次不祥之兆的逃跑后，又被捕获，受刑后发疯了；在流放中死去。至于第四位同志，即魏德林同志，在他的伙伴逃跑后的第二天，被解到巴黎的波瓦·德·文森枪毙了。

但是他并没有死。他被当作死人留在森林里，有人发现他还活着，就把他送到了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医院。我們接到他从那里寄来的信，就决定并安排了試圖營救他出来。但在那最后关头，医院里的一个人員預先通知了盖世太保，盖世太保得以在我們可能干預之前就把他迁送到自己的总部去。于是它們第二次杀死了魏德林同志，这一次是最后一次。

我再举一个前希腊共产党书记、希腊同志鮑利奧博洛斯的例子。他在 1943 年被法西斯匪徒枪毙之前，对执行死刑的士兵用他們的語言发表了讲话，在士兵之中引起了一場真正的兵变。士兵們拒绝对他和他的同伴們开枪，于是軍官們不得不用自己的手枪来枪毙他們。

最后，我要举另一个例子，我想这几乎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例子，这就是数周前才死去的比利时工人同志、以矿工为职业的加洛阿同志的例子。这个同志被送到著名的布痕瓦尔德死亡集中营。有一天，党卫軍士兵一边笑一边带来一大群人到集合起来的犯人們面前，这群人是犹太人，他們是行走着的骷髅，奄奄一息，污秽不堪，身上长满虱子。

党卫軍士兵已准备好要用毒气熏死这些人，他們說，除非这些

犯人中(他們自己已极度虛弱)有人有这种耐心和勇气来替这些悲惨的人們一个个地洗淨，才能免这些犹太人一死。犯人中各种宗教信仰和各种政治观点的人都有。但是沒有人願干这件工作。

等了一会，好，有一个人。加洛阿同志，这位卑微的矿工，他在日常生活中从沒有因任何功績而使自己与众不同，走出了行列，平靜地向党卫軍要求，如果他把他們身上洗淨就免这些长滿蟲子的犹太人一死。这正是他日日夜夜所干的活，极其簡單，但又需极大的頑強和克己精神。

我沒有机会在加洛阿同志逝世之前向他致敬，但我要在这里代表我們的全体国际組織向他表示崇敬的悼念。

斯大林为了要撫慰“民主”阵营中他的帝国主义同盟国而在1943年解散了第三国际。第四国际于是在1944年2月大战高潮时，在被占領的法国举行了一次国际會議，聚集了欧洲几方面的代表，在当时极其违法的情况下，會議好不容易才进行了六天。

第四国际成功地經受了战时意識形态和組織方面的考驗，并因之表现得更坚强了。

1946年，它召集了一次新的国际會議，會議除了有欧洲大陆的各个党派以外，英国和美国的同志們也参加了。

1948年举行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所有各大洲的代表都出席了。大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各种发展所造成的国际关系拟了一张对照表，并采納了新的规章，重申該組織的特点为受民主集中制原則所支配的一个世界党。

从此，第四国际每三年定期举行世界大会一次：第三次大会在1951年；第四次大会在1954年；第五次大会在1957年。这几次大会之所以重要不但因为与会人数一次比一次多，反映了第四国际組織上的进展，而且还因为由这几次大会拟定的文件所表明

的第四国际的理論和政治工作的日益深化。

1951年举行的第三次世界大会，在第四国际战后历史上是占重要的地位的。在对国际形势重新做出估計时，大会肯定：在帝国主义和所有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之間——工人国家、殖民地革命、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革命运动等——全球力量的对比关系几乎是不可抗拒和不可变更地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变化。从在美帝国主义的势力仍然表现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所作的这个估計来看，其中就充滿了整整一系列革命的內容，包括苏联官僚阶层突发的危机在內。第三次世界大会，基于坚定的理論和政治考慮，更进一步在大型的群众組織——社会民主党的組織或是斯大林主义的組織內部开始了所謂打进去的政策。

1954年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大会拟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論及曾經决定斯大林主义兴起的条件和从那时起开始改变的将招致斯大林主义衰落和垮台的条件；并且还論及打进去的政策。

最后，第五次世界大会就共产国际对国际形势的估价和瞻望，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的发展以及建立新的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政党的策略等方面已达到的認識，进行了綜合，并加深了認識。

\* \* \*

现在第四国际在組織上和政治上的主张是什么呢？这是个什么样的組織呢？目的何在呢？

首要的是我們是一个国际組織，一个唯一的世界党，它是以民主集中的方法和各大洲的約三十个国家中的民族的党进行工作的。

国际的总的政策是先由其在所有各国中的党彻底的民主討論后，再由世界大会多数表决决定的。我們的組織按照形势和政治急迫性把最广泛的民主討論和坚决的行动一致，辯証地結合在一

起。

以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以列寧關於革命无产阶级組織的思想为基础的国际組織的概念，后来由于第二国际和以后的第三国际的痛苦經驗而不为人所信了。有些人就此制造一种假理論：认为建立一种民族至上的只和其他民族組織保持“兄弟般联系”的組織是再好不过的。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主张是把国际具体地看成一些个别国家組織的算术上的集合体，它們只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合作。因之，他們說，他們要避免受到官僚主义机构的控制，而要多多考慮民族的特点了。

而如果说第二国际的收場不好的話，那并不是因为它作为一个国际，即作为一个以革命的馬克思主义为基础和以民主集中制来管理的唯一的世界党在起作用；而是因为实际上它已堕落成为一些个别的民族組織的集合体了，这些民族組織都受它們自己的官僚机构所統治。

至于第三国际，它的变质只是由于它受一个单一的政党——苏联共产党的官僚机构的控制。

实际上关于民族独立的爭論經常涉及民族的官僚机构的存在問題，这种机构是很不喜欢有一种国际的民主的控制加之于它的。至于說到民族独立有利于保存民族特点的話，那就必須強調指出：在我們这一帝国主义时代中，如果不把一个特定的民族情况拿来和正确分析过的背景參照来看，同时又对国际形势不了解，就不可能彻底了解一个特定的民族情况的特点。特殊只是和一般比較來說才有的。

每一个国家的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們，在成为一个民主国际組織的主要部分之后，由于这样一些傾向在国际的(主要就其世界观、政策及其組織结构來說是国际的)組織內部保持着一种互不偏

袒的态度，可以依靠真正从国际范围考虑問題和制定政策方針的办法，以及依靠糾正可能发生的民族、甚至民族主义的性质的偏差的办法，来得到好处。

国际的思想和組織在政策、組織和斗争中表现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团结——最难达到的团结，它是在各国的民族范围内和民族歧视和压迫进行斗争而达到的。但是，我們相信这种思想和組織仍要保持最高水平，以达到消灭資本主义和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因此，我們是一个民主国际組織，其目的在于通过宣传其思想和在真正的群众运动中生根的战斗者的行动为手段来促进建立一个拥有各国的革命馬克思政党的群众性国际。

而面对着資本主义以及在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在建設中的社会主义制度，我們现时的政策是什么呢？

我們认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兴起的資本主义大大地受了震动；資本主义和工人国家、殖民地革命、大城市革命运动等所有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之間的全球力量对比，还没有停止向資本主义不利的方向发展；从理論上来讲，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之下，資本主义只有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或不經一战就投降二者之間作出抉择；鉴于美帝国主义的力量虽已削弱但仍远不可忽視，不經一战就投降实际上仍然是不可能的；革命无产阶级更进一步削弱帝国主义以及必要时更迅速地繳他們的械以遏制一場原子战争不可避免的毁灭，其最好的办法是去推动革命斗争，在各地攫取政权，特别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美国和欧洲資本主义特别是在近年来所經歷的确实的經濟繁荣，从长时期来看，并不能抵銷失去的殖民地，殖民地革命不可抗拒的潮流使殖民地一个接一个地获得了自由；这种經濟繁荣也不能抵銷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經濟力量的逐渐加强。更重要的是，

这种繁荣远不能意味着资本主义有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只是一种机遇的巧合并且即将告终了。

资本主义还决没有摆脱它的周期性危机。如果危机在目前只不过是采取了“衰退”的形式，还不像 1929—1933 年的真正的危机那样，那是因为受垄断资本家和国防经济大幅度的扩张所控制的国家插手其间起了较大的作用，美国尤其是如此。但是，在资本主义和工人国家二者之间的经济竞争中，后者已获得不可抗拒和不会倒退的有规律的进展。资本主义开始有比以前还要大得多的经济困难，资本主义的安乐阶段已属于过去了。

特别是在战后头十年，最使资本主义削弱的是接着 1949 年中国革命胜利而来的殖民地革命的惊人的胜利。这种稳步的、不可抗拒的和不会倒退的使资本主义殖民统治瓦解的趋势，从长时期来看，是在一条灾难性的道路上动摇了资本主义的均势，并且在这种意义上讲，已经决定了它的历史命运了。殖民地革命实际上只是标志着我们这个世纪的更为普遍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方面。以在我们运动中使用这个名词的意义来说，它实际上有不断革命的意思。

即使殖民地革命目前是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它们力图限制革命的范围，将其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和改革的范围内——即摆脱帝国主义而独立、国家统一、土地改革；而就连这些任务也证明是那些领导不能有效地解决的，并且，在一定的阶段，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和他们国内的群众起冲突，群众要求的是更深刻的社会革命。

从这个观点看来，这些领导在历史上讲是过渡的，并将为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先锋所代替；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才是唯一能完成民主任务和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任务的。

我們的运动无条件地支持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那就是不管它的政治領導的阶级本质如何。因此，譬如我們无条件地支持納賽尔反对帝国主义，尽管納賽尔代表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新兴的工业民族资产阶级的核心，并且还在国内镇压工人运动。同时，很自然，埃及的托洛茨基分子远还没有放弃反对納賽尔的革命宣传，事实上正在努力創造一个和納賽尔主义无关的独立的革命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政党将为在埃及建立一个工农政府而斗争，并成为将来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合共和国的先鋒。

我們的运动承认殖民地群众一般地起着先鋒队作用，并且号召城市无产阶级积极支援殖民地革命，以便消除存在于殖民地群众革命自发性的程度和城市无产阶级相对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两者之間的危险的距离，特别是在有关殖民地革命的問題方面。

在这个問題上，把全部錯誤都归諸于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够的——虽則事实上，它們应对此負主要責任；也有必要向城市无产阶级直接呼吁：要它注意自己是落后于殖民地群众，并提醒它別忘了自身对殖民地的兄弟的責任。

我們时代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发展已采取了不同于馬克思主义創始人和不同于列宁的路綫。现在很清楚：在俄罗斯这样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所开始的革命，就好像是从周围向中心发展的。革命在到达資本主义的欧洲之前，首先要把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卷进去，并且将会以赢得对世界資本主义中最大和最重要、也是看来很可能最后垮台的美国資本主义的胜利而告完成。

另一个削弱資本主义的因素是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逐渐和日益加速增强的經濟和文化上的力量。这种加强也反映在軍事实力和潜在力量方面。

这些国家的經濟經常是以比資本主义國家較高的比率进展(几乎是一倍)，并且是稳步前进——沒有經歷过由于“**衰退**”或危机所造成暴跌——这一事实，具有历史重要性：在形成政治上的发展方面，它将越来越加重要。这一事实还进一步証明：作为这些国家的社会和經濟結構特点的**統計和計劃經濟**具有历史的优越性。

从真正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标准的观点来判断，不論它們的政治制度可能是如何地变质或不像話，还是可以証明我們称呼这些国家为**工人国家**是正确的。因为**統計和計劃經濟**决不是資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有机发展的結果，而实际上是資本主义社会和資产阶级遭到革命性毁灭的結果。

更重要的是历史在下述方面还没有提供任何証明，即向着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国家——特别是在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无須統計和計劃經濟。那就是說在我們当代的革命具体现实中，統計和計劃經濟既表现为革命的結果，又表现出在建設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期就远比資本主义更能发展社会生产力。

就是这个原因，我們的运动对历史性地战胜帝国主义和当地反动派而得以实行統計和計劃經濟是无条件地加以保卫的。与此同时，我們的运动革命地反对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的**政治制度**，这些政治制度并沒有被民主地組織在苏維埃、工会和政党中的无产阶级所掌握，而是掌握在社会特权阶层、官僚机构的手中。

我們的运动反对这种官僚警察制度，爭取如列宁在世时企图建立的真正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我們的运动反对当权的官僚阶层，从事于宣传由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的群众进行革命来推翻官僚制度。我們认为：如果資本主义、殖民地和附属国等国家的客观条件对推翻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社会制度有决定性作用，那末，在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现存的客观条件，对**政治上的革命斗争**高

潮也有决定性作用，这种政治上的革命不是以在这些国家內推翻社会制度为目的，而是以推翻政治制度为目的。

这就是 1956 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意义，它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政治革命的开端，其目的不在于恢复資本主义，而在于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我們认为显然将从苏联(苏維埃官僚制度的堡垒)开始，在所有这些国家內以各种形式和道路进行政治革命。

我們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概念包括的并不只是民主苏維埃、甚至和工人国家无关的自由工会以及承认在其内部有权形成思想派别的革命的馬克思政黨；而且还包括有权組織一些党派，只要它們尊重工人国家宪法上的义务。这最后提到的权力，对我们說来是社会主义民主大厦的柱石，因为，实际上，它决定苏維埃、工会和革命的馬克思政党的民主本质。

我們的运动认为使得斯大林主义得以产生和巩固的历史条件目前已大大地改变了，并且事实上，目前正在发生导致斯大林主义垮台的无可挽回的危机。从这种观点看来，譬如尽管赫魯曉夫改变論調、后退、甚至再加上他犯的罪过，他都不能成为第二个斯大林。但是，斯大林主义不可避免的垮台，(將是我们当代革命进程完成的表现)，不会以简单的“进化”“改良”的道路出现，而是要在一定的时期由群众不可避免地掀起革命浪潮才行。

一般說来，我們对发展的看法仍然有深刻的革命性，并且是乐观的。我們的运动，对于和解、“和平共处”的“新道路”以及和平演变很不相信，我們认为阶级斗争将会发生，但是，在力量对比方面，越来越有利于反对資本主义和苏維埃官僚机构的革命。所有的問題都将通过斗争——包括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和革命——来解决。

确实，我們对这两种辯証的統一的形式——革命一战争的互相貫通有清楚的認識。在这种辯証的統一形式中，革命的每一次重要进展都是通过反对帝国主义反革命战争的斗争而取得。而政治革命則仍然是反对苏維埃官僚机构和由其支配的警察和军队等机器的斗争的起决定作用的方式。

为了大胆的面向我們时代的特点——高涨中的斗争，即在反动和保守力量同社会主义革命力量之間的一場你死我活的斗争，必須要建立常設的、国际性的、适当的組織；这一組織将最高度地綜合国际工人运动的智慧、特点和战斗力、它的传统、它的經驗：具有符合我們这一世紀中叶的要求的高水准布尔什維克品质的真正革命的馬克思主义政党和在所有人类历史中最珍奇的动力。这就是我們运动的目的。

为了要更快地达到目的，我們决定不但是依靠我們独立的活动机关这唯一的办法进行工作；还要在广大群众的組織之中，不管按国家來說这些組織是社会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进行耐心的和长期的工作。我們对这些組織沒有存幻想，我們也不是去在那里改造它們。我們只认为这些組織是工作的范畴，因为工人阶级真正积极的一部分是組織在这些組織之中的。

我們这一时代的工人阶级并不是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的沒有任何經驗和容易接受革命宣传的工人阶级。它在一定的工会和政治团体中有自己的机构。我們忠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为共产党人所规定的任务，我們决定分享这个阶级的具体經驗，从运用这經驗开始工作。在阶级的政治上的成熟方面，不幸的是无法跳过几个阶段来創立一个群众性政党：只有当这一阶级凭着它本身现有的組織經驗和重要的、一再出现的历史事件的經驗，而他自身摆脱了旧的精神状态，它才能試图进行一次思想上

和組織上的重新編隊。

我們的運動相信：通過它目前在每一個國家的真正群眾運動中公開地出現並參與其事的策略，它對階級的自发革命的重新編隊，提供了積極的貢獻。因此，我們感覺到：我們現在在做所有客觀條件允許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先鋒去做的事，因之，是在盡我們最大的力量，為人類社會主義的未來做好準備。

(1958年8月)

## 附录二：

# 对莫斯科會議的綱領的 革命性的批判

列維奧·麦丹

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一个會議。显然，这个會議旨在阻止斯大林逝世以后和苏共二十大以后所出现的离心倾向，并制訂一个代替斯大林时期的新的理論体系。1960年11月的會議具有类似的目的：1959—1960年的爭論，特別是苏联同中国之間的爭論，确实使1957年重建起来的團結遭到了威胁。

要对这样一个富于变革的时期作出有效的概括性結論，这是一項艰巨的任务。这项任务对于那些用經驗主义的方法行事的人几乎是完成不了的。这些人冒着眼看他們由于形势所迫而勉强进行的一些建設处于朝不保夕的危险。但是，在莫斯科完成了一件最不平凡的工作。这次會議，无论从代表团的数量，从它所付出的劳动的时间，从它的討論的广度和尖銳程度，以及从它最后通过的文件所使用的語气來說，都远远地超过了1957年的會議。后来的各种評論，尤其是某些領導人的評論，都肯定了这次會議正式通过的文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sup>①</sup>

正像在会前几个月中苏的爭論中那样，在莫斯科會議上也提出了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全部或者几乎是全部重大問題，或者說得

<sup>①</sup> 赫魯曉夫在他对苏共中央委員會所作的報告中，說这是极大地丰富了国际共产主义思想的宝庫，这个決議……是一个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馬克思列寧主义文件。

更广泛一点，关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性阶段的各种重大問題。因此，对于會議所选中的解决办法，应当不仅仅看作是(或主要不是)过去的总结，而且应当从它給了国际反对资本主义陣綫中的各个阶层在进行短期或长期的斗争时带来了前景这个角度加以評价。

我們要請讀者們原諒，我們將大体上遵循前一篇文章的梗概来分析这些問題，虽則这未免有重复的毛病，但是，这种做法将便于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 和平共处、战争和革命

对国际形势的分析，特別是決議的第一章，鮮明地反映了过去几年来的重大事件。因此，这种概括的估計比 1957 年的文件更为明确，尽管它还不如中国人过去几个月来在各种文章和演讲中常见的若干提法那样明确。事实上，不应忘記，尽管美帝国主义遭到很多失敗，他們还有許多可怕的箭可以射出<sup>①</sup>。

同 1957 年比較，有一个着重点显然是不同的。美帝国主义被称为全世界的头号敌人(“最大的国际剥削者”，“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国际宪兵”等等)。而三年前仅限于說“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和“美国某些侵略集团”。自从首脑會議失敗以后，在这个有限时期內所出现的形势，对于使用某些激进的語句，特别是中国人所要求的那样，例如对艾森豪威尔的作用的爭論，再也沒有多少反对的意见了。

更有意义的是，这种論斷的重要性已被一些正式的評論家們特別加以強調。

---

① 赫魯晓夫在对苏共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坚持这一观点：“帝国主义仍然拥有可由它支配的巨大实力，仍然握有强大的軍事机器。”

“資本主义总危机已經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两个阶段的特点在于：它不是与世界大战相联系而产生的，而是在两个体系的竞赛和斗争中……而产生的。”<sup>①</sup>

乍看起来，这种論断似乎是再明白不过的眞理，是可以立即被接受的。但是，这种論断是同另一种論断相联系的。即：

“帝国主义者所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結果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事实，絕不意味着走向社会革命的道路一定要通过世界大战，特別是在我們这个存在着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时代。”（1960年莫斯科声明第五章）

因此，在这里，我們看到了以爭論的方式提出的前述論断，这种論断实质上否定了中国人提出的某些論点。虽然，提出战争是革命的必要的先决条件这样一种“理論”是荒謬的。但是不应忘記：第一，在上面引用的決議第一段（它同第二段是矛盾的）似乎认为，归根結底，战争所造成的变乱是产生帝国主义当前危机的根源，而这种变乱是从中国的革命开始的，这个革命是最近十五年来产生資本主义世界危机的基本因素；第二，問題是，不应滿足于一般化的論述，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现阶段是否存在各种发展的趋势，因而战争和革命必然会交織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战争——革命的进程。但是，在这个問題上，这个決議除了有它明显的正确方面以外，它的論断是含糊不清的。因为，归根到底，它掩盖了最近几年来所发生的、以突然的分裂、尖銳的冲突，几乎是从未間断过的各种局部战争，以及不断出现的全面战争的新的危险为标志的历史进程的真正革命內容。

因此，我們就接触到“共处”和到底战争是否不可避免的爭論

---

① 这一段及下一段引文均譯自1960年12月6日《團結報》意大利文版。

問題。

1957 年會議实际上是重新提出了二十大的論點。新決議要解決的是更为廣泛得多的問題，它不但要重申一般的看法，而且特別要解答自从国际工人运动內部出現了爭論以后，尤其是中国人表明了立場以后，所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和保留意見。

我們已經看到，关于战争將会引起革命的論斷已經遭到駁斥。中国人在許多演讲和文章中所表达的关于帝国主义本性并沒有改变的中心思想再次遭到申斥（确实，怎能否定这样一个基本的真理呢？），但立即加上新的因素，因而这样說：尽管帝国主义的本性并沒有改变，但从今以后，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如所周知，这种看法的主要論據是：世界上新的力量对比的出現，能够有效地防止帝国主义者由于他們的制度的邏輯所驅使而发动的全面冲突。

由于中国沒有直截了当地否定战争可以避免的論點和共处的論點，他們現在可以在这个問題上裝得若无其事。但是，他們却不能掩飾他們的退却。正如我們在前一篇文章所強調指出的，这种分歧主要是在：強調了某些論點而不是強調其他的論點；使用一种調子而不是使用另一种的調子。因此，完全用不着怀疑，八十一一个党的文件——特别是在这一点上——基本上代表了赫魯曉夫的看法而不是中国人的看法。

这种估計已进一步为其他各种因素所証实。因此，在关于可能发生核战争的后果問題上，決議一方面重申“帝国主义国家如果发动战争，人民将会消灭資本主义，并把它埋葬掉”，<sup>①</sup>但是，另一方面却特別強調这样一场冲突所具有的灾难性，強調首要的任务是要通过斗争来避免这场冲突；并且沒有对中国当场提出的任何

---

① 无论如何，这种讲法（第三章）看来是突然加上去的，并且是用假定的提法，而且并不怎样坚持，这样做必定是为了避免掉“修正主义的”跋。

論據作出让步<sup>①</sup>。同时，在关于裁軍問題上，基本上也是苏联的看法，认为裁軍是可能的看法比中国的看法占优势。中国的看法认为，归根到底，裁軍运动不过是一种宣传的策略<sup>②</sup>。最后，还有一种讲法，根据这种讲法，为了要消灭战争，“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完全胜利”不再是必要的了。这也就暗含地駁斥了中国人的論点：反动势力即使处于被孤立的境地，他們仍然不会降服。<sup>③</sup>

但是八十一一个党会議不能忽視国际工人运动中提出的、反对共处理論的某些基本論点——这些基本論点已部分地反映在中国的观点中——的論战力量，以及，对共处的內容，特别是在有关否認共处的“調和”性质方面，作出一系列詳細說明，如同某些共产党在自己的代表大会決議里所做的那样。

“和平共处的路線是动员群众开展积极行动反对和平敌人的路線。

各国之間的和平共处，并不像修正主义所断言的那样，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間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思想和資产阶级思想的調和。相反，它要求工人阶级、所有共产党为爭取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而加强斗争。”(1960年莫斯科声明第三章)

要制訂一种公式，使它在紙面上能解决各种矛盾，調和对立的看法，往往是可能的。但是事物的实际发展如何，却尚待証明。因为，共处的思想，它本身可以成为陈旧的真理的一种說明，或者不

① 参看列維奧·麦丹：《中苏爭論反映出来的我們时代的問題和前景》(1960年《第四国际》秋季号，第11—20頁)一文中的看法。

② 参看，比如，1960年6月7日的声明。从报告的內容看来，赫魯晓夫坚持实现裁軍的可能性(同上，第12頁)。

③ 参看中国共产党《红旗》杂志，1960年4月号中的一篇文章。

过是一种可以随便充塞內容的空洞的辞藻，要不然，它本身就具有某种邏輯，这种邏輯以某种方式通过國內或国际的政治斗争具体表现出来。

现在，讓我們先把寧願通過和平而不願通過新的大戰的道路走向社會主義這個問題撇開不談。這是一個無聊的，但又是經常不斷地被提出來的問題，特別是在針對革命運動而發生爭論的時候。<sup>①</sup> 抽象地說，沒有人竟會瘋狂到“寧願”用新的大戰的道路來代替和平的道路。但是，讓我們无数次重申，這不是一個表示願望的問題，而是分析各種客觀趨勢，根據最有希望的前途予以決定的問題。從這一點看來，莫斯科會議堅持一般化的提法，提出折衷主義的辦法，允許在一定範圍內作不同的解釋（達成一致這是必要的），總之，一面說戰爭是會爆發的，同時說帝國主義將會分崩離析而沒有力量發動這樣一次戰爭，可以說他們的這種說法是對的。<sup>②</sup>

但是，所缺乏的正是具體的分析，根據這樣一種分析來確定（用一般政治分析中所難于避免的那種大體上的準確性），在最近的將來，什麼因素必然會占上風，因此，什麼是最有希望的前景，而工人運動應為此作好準備。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運動在上屆大會通過的文件中採取了更為嚴肅的立場、而不滿足於臆想出來的詭辯理論。儘管帝國主義遭到了削弱，儘管它在核導彈武器的某些方面處於劣勢，但是它仍然具有必要的力量來挑起一次全面的衝突。由於它的制度本身的矛盾日益尖銳化而使它遭到經常不斷的壓力而不得不這樣做。恰恰是因為帝國主義的危機，從其总的

---

① 參看反對托洛茨基同我們的運動的論戰（1960年秋季號《第四國際》第18頁及腳注25）中有引文；並參看《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誌1960年10月第10期雷曼在社論中的老式斯大林主義的攻擊。

② 參看我們在1960—1961年冬季號刊登的文件。

趨向來說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冲突的危险特別加深。因为美國領袖們深知，時間对他們是不利的，作为一个統治阶级，他們絕不会不使用最后垂死掙扎的手段就甘心情願地退出历史舞台。

另一方面，赫魯曉夫和他的追随者們坚持列寧的共处原理，但是，除了少数引語以外，列寧某些看法的意义却被遺忘了。列寧的論点实质上并不像一些在不利的条件下参加革命战争的某些极端分子所看的那么簡單化。它重申这个基本的真理，即不能从热战的角度來設想国际資产阶级同第一个工人国家之間的斗争，而会有不发生战争的“共处”时期，工人国家必須尽可能地利用这种“共处”的时期。

托洛茨基对共处持有类似的看法。<sup>①</sup>

显而易见，在八十一一个党会議上并不是这样解释的，在这次会議所通过的文件中，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样，似乎把共处当作从資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总的概念。而这种概念有其本身內在的邏輯性及其相应的实际的含意。

这些含意之一是，如果战争甚至在不推翻資本主义的情况下就能避免的話，那末，反对战争的斗争就可以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甚至可以包括資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在这里，我們就碰到斯大林主义政策和斯大林主义以后的官僚領導集团的政策之間的新传统矛盾的問題。同时，我們也碰到这两者同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运动之間的最大分歧之一。

为什么說这是一个矛盾呢，因为要不是认真地爭取同資产阶级的某些阶层結成联盟，就是要以阶级斗争的形式来进行反对战

---

<sup>①</sup> 在 1922 年布尔什維克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談到“一段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共处和同資产阶级国家进行事务性的合作”。(參看伊薩克·多依歇：《沒有武装的預言》，第 31 頁)

爭的斗争。前一种做法对不断发展的群众斗争不能不是严重的限制，經常为此付出代价，特別是在西欧的某些国家。后一种做法則会使拟議中的联盟不能为那些被爭取参加这个联盟的人所接受。这是同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最大分歧之一，因为革命的馬克思主义一直认为，要真正避免一次新的全面战争，其不可缺少的条件，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即使不必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一系列有决定性的国家內这样做。

赫魯晓夫在八十一一个党代表會議以后所作的报告中更加明确地闡述了他对共处概念的最本质的看法，他說：

“苏联在同美国經濟競賽中的胜利，整个社会主义体系对資本主义体系的胜利，将是历史上根本的轉折点，这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将发生更加革命化的影响。那时即使最怀疑的人也会明白：只有社会主义能为人的幸福生活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因而他們將做出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选择。在同資本主义的經濟競賽中贏得時間，是现在的主要任务。”<sup>①</sup>

这些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也許不过是从来沒有人像他那样明白地說出来罢了。自然，赫魯晓夫对殖民地人民和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并不是无知的。但是对他來說，这几十年来在同資本主义所进行的历史性的斗争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现在是将来也是苏联經濟的发展，以及在“和平”競賽中苏联的生产能力超过美国的生产能力。这个公式的邏輯的結論是：要尽可能爭取同国际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合作，希望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长期合作并且接受对革命运动采取某些控制的必要性，只要这样做会被认为是有利於达到总的战略目标的

---

① 參看《和平和社会主义問題》，1961年1月第1期。

話。<sup>①</sup>

中国人爭論的目的，归根到底就在于反对这种战略的某些具体做法。但是，他們的弱点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們声称在总的方面接受(共处)这个概念，但是，又不肯接受这个概念必然具有的含意。

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既沒有无视也沒有低估苏联和其它工人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客观和主观意义上作为一个革命的因素的重要性。但是在集体主义制度的历史的潜在优越性变成經濟上在一切方面占压倒优势以前，同时尽管社会主义建設的范例愈来愈具有吸引力，却仍然不是一个很充分的因素，就在这个时候，需要进行在世界范围内打倒資本主义的具有决定性的战斗。决定性的因素将是世界許多地区的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資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以及更先进的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反对資本主义的斗争。只有在上述的最后一种斗争取得胜利，而且还要取决于在国际資产阶级武装力量最优良的堡垒中所取得胜利的程度，才能确保不受核战争浩劫的悲惨的威胁。这种威胁今天仍然籠罩着那些已經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是，坚持这种主张，并为其具体实现而进行斗争。还有另一种理由，即世界各地革命斗争的开展将会调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无穷尽的力量，从而能把任何官僚主义的污垢从根鏟掉。毫无疑问，基于同样的理由——从相反的利害观点考虑——官僚主义者“宁願”并企图把“共处”的看法和概念强加于人，其实，这个概念絕不是阶级斗争“根本”的形式，它实质上只不过是在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把社会主义在一国取得

---

① 赫魯曉夫路綫的根本意义，已刊登在 1960 年秋《第四国际》内上述文章中。

胜利这一旧理論作一种极端的引伸。基于同样一些基本的理由，三十年前，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沒有接受后一种理論，今天，他們也絕不接受前一种理論。

### 殖民地革命和“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

最近几年来的混乱现象，特別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混乱现象，以及中国对赫魯曉夫路綫某些方面所进行的批評，使得八十一一个党的會議比 1957 年那次會議更加重視殖民地革命的問題。1957 年的決議只是一些仓促提出的綜合材料，而去年 11 月八十一一个党的會議的決議中却有整整一章，不仅对这种形势作了概略的分析，而且还闡明了群众斗争的前景和各个共产党的行动。<sup>①</sup>

我們自然可以同意會議文件中的一系列論述。除了本章开头部分的概括性总論外，我們也不否认，“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殖民主义奴役制度的瓦解，就其历史意义說来，仅次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同样，文件比过去更及时地譴責了现代殖民主义；现代殖民主义是老殖民主义国家、特別是美帝国主义正在用以使已經获得独立的亚非国家仍旧处于它們的剥削和霸权之下的工具。<sup>②</sup>

但是，一当文件提出现阶段殖民地革命动力的問題及其发展的趋向与前途时，分歧就变得明显了。

在对现代殖民主义所进行的譴責中，认为帝国主义者在力图“收买資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这种說法，肯定是錯誤的。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腐朽的退化现象，而是一个社会现象。虽然，殖民地資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在力求以“积极的中立主义”来保障自己，但

① 參看 1957 年決議第 1 章及 1960 年決議第 4 章。

② 在文件的其他部分，基本調子却是宣传性的，而有时候甚至是煽动性的。

另一些人却預见到一种同宗主国的有产阶级結成聯盟的新形式，可以作为巩固那条反抗群众运动的压力的陣綫的办法，那怕这种巩固只是暫时的。

如果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決議起草人在語言上的疏忽，那就錯了；实际上，它已經是根据下述分析而提出的总路綫的一个反映，这种分析认为民族資产阶级具有积极作用，认为它即使在现阶段也是一种領導力量。

是的，文件宣称民族陣綫必須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它还明确地提出了民族資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这种观点。但是，尽管文件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它之所以提出上述观点，显然是前几个月那許許多爭論的結果，而其目的則是，再一次为各种各样的解釋及今后在中途可能提出的改变大开方便之門——它却肯定了“一切爱国民族力量的伟大作用”(其中包括資产阶级，至少是包括它的某些阶层)，肯定了資产阶级仍然能够具有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这种进步性。<sup>①</sup>

关于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所进行的革命的性质，文件称之为“民族的、反帝的、民主革命”以及“反帝、反封建革命”；資产阶级仍然具有领导作用的这种可能性便从这里产生了。然而首先一个关键問題恰恰就是：从民族資产阶级的結構、成分及其社会經濟关系来看，民族資产阶级抑或它的某些阶层，难道能够始終一貫地进行文件本身所說的那种包括根本的土地改革和“清除帝国主义統治的經濟根源”等等在内的革命嗎？虽然民族資产阶级存在着上述弱点，但八十一一个党的會議仍然承认这种可能性，而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則視之为一种抽象的、与现实不符的公式。从尼赫魯的

---

<sup>①</sup> 決議把“殖民地和附属国”同已“从殖民枷鎖下获得解放”的国家加以区分，而明显地限制了民族資产阶级在第二范畴內可能發揮的作用。

印度到納賽尔的埃及，还有伊拉克，即使不把巴西或委內瑞拉計算在內的話，經驗迄今已有了很多，而且重要。在帝国主义极端脆弱的国际形势下，虽然某些民族資产阶级已經能够在爭取形式上的政治独立和实行某些重要的反帝措施的斗争中站在前列，但革命的进程却半途而废(就算還沒有公开地倒退)，这正是因为民族資产阶级还没有真正能够解决諸如土地改革、工业化以及消灭帝国主义的經濟基础等等重要任务。

八十一一个党会議并沒有能够完全漠視从那些經驗中作出的判断，事实上，在決議中的确有这样一些段落，这些段落归根到底是決議中主要的新东西。他們承认，取得独立以后，“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銳化，民族資产阶级越来越倾向于同國內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妥协”，而“人民群众确信，消灭长期落后状态和改善他們生活条件的最好道路，就是非資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但此后，这种趋势又将向着什么样的社会經濟形式发展，并在什么力量的領導下发展呢？

他們的回答是，“在现代的历史情况下，正在形成有利于在許多国家中建立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的國內和国际条件”，也就是说，这种国家一貫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軍事集团，反对现代殖民主义，爭取进行土地改革和保証“人民有广泛的權利和民主自由。”

于是，这里我們就面临一种新的生命，一种社会政治形式，它既不属于資本主义类型，又不——或者還沒有——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类型。关于領導力量，文件談得就更模糊不清了。因为，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一样，資产阶级墮落的倾向受到了譴責，并談到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絕對重要的作用”(?)而上述資产阶级或它的某些阶层所能繼續起的作用却一点也沒有被明显地排斥，对无产阶级领导的需要也未清楚地指出。古巴的情况将有助于表

明，在爭取建立“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的斗争中，絲毫也不排斥同资产阶级結成联盟。①

迴避这个真正的重大問題，便足以暴露八十个党会議这一“发现”的本质。沒有作絲毫的努力来表明，爭取实现“民族民主”的可能性来自非洲或拉丁美洲社会的客观趋向；②他們只限于提出目标和制定公式，而这种公式的錯誤性质就不言而喻了。虽然事实上可能产生一段非常短暫的过渡时期——如果不是以星期或日来計算的話，最多也不过以月来計算，——在这期間，国家的社会性质还未固定下来，那里不存在这样一种发展，即它既不再属于資本主义性质，而又未变为集体化的或社会主义的。③一个相反的假設事实上可能意味着对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的根本标准加以修正，不仅如此，它将必然地同现实相矛盾。

这一事实已經提到过了，即已获得独立而无产阶级領導尚未建立起来的国家，已經不能解决那些对于它們的解放与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問題，当然更談不上已經踏上“非資本主义型式”的道路了。不用回顾越南与朝鮮的情况了，新近的、大家議論紛紛的古巴的例子，就已从相反的观点，用有力的論据，駁斥了八十个党会議的那套站不住脚的理論。

很自然，決議热烈地为古巴欢呼，但几乎是奇怪地迴避了卡斯特罗式革命——它被說成一次“完全是人民的”革命——的特点問

---

① 我們自然是指布拉斯·罗加及其同事在1960年夏代表大会上的解释。

② 关于文件有意含糊其詞与躲躲閃閃的特点，从下述事实可以找到新的例証，即“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之假說只是以“許多国家”的名义提出，而沒有加以任何具体的說明，甚至連一个例子也沒有举出来。

③ 參看在弗拉霍維奇关于八十个党的會議的報告中，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对“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这一公式所作的大体上正确的批評。（《倒退一步》，南斯拉夫出版社，贝尔格萊德，1961年第71—72頁）

題：这些共产党的“賢人”們真的沒有怎么动脑筋！<sup>①</sup>但是，姑且不談那种轉移人們視線的宣传，如果真有一个国家足以作为“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的典范的話，那就是古巴。在古巴，卡斯特罗領導集團“为政治独立和經濟独立不断地进行斗争”，实行土地改革，清除帝国主义統治的根基。我們立刻同意，在古巴我們面临着“非資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但它是什麼呢？——也許不是合乎八十一一个党会議的公式的那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是一种历史性的新形式？我們运动的领导为去年十月那些决定性的措施所直接作出的清楚的回答是：——至今，无产阶级运动中的各种倾向也可以或多或少的正确性作出了这一回答，尽管是为了各种不同的目的——在古巴，不仅是帝国主义的統治，就连統治阶级的霸权也一起被推翻了，集体主义式的关系已經确立了。換言之，古巴的革命已不间断地由反帝的民主革命过渡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建成了已經开始从事社会主义建設的工人国家。<sup>②</sup>

现在，真相已經大白，他們是企图以可笑的遁辞来完全掩盖古巴的真实情况，并費尽心思去构思出一条公式来挽回自己的面子。<sup>③</sup>这不仅仅是关于社会学的观点的正确性的問題，这里关系到战略路綫和总的看看法問題。

---

① 在上述報告中，赫魯曉夫沒有怎么特別提到“人民”取得了政权。（決議第 13 頁）

② 參看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关于古巴情况的決議，《第四国际》1960—1961 年冬季号，第 48—50 頁，及本期有关文章。

③ 在莫斯科，关于古巴宣布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消息是被尽可能的掩蓋起来。事后为了辯解，就拉出了一些公式，在这方面，作为一个例子，可參閱 5 月 3 日《團結報》的社論和后来埃斯卡兰特在 5 月間較晚一些时候在《團結報》上所发表的一些声明。

显然，自此之后，布拉斯·罗加談到了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建設社会主义。很可能，經過数月的推迟，面对着一些无法找到遁辞的事实，共产党正在准备来一个轉变。

像拉丁美洲所有的共产党一样，古巴人民社会党一直不断地重复着一种令人作呕的說法，說什么这种革命不應該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應該是“民族的、土地解放的、爱国和民主的，并且是反帝和反封建的革命”；还說什么有必要同“关心解决这种革命任务的民族资产阶级共同进行工作”。<sup>①</sup> 这条路綫已經證明是破产了的，这里无需再加以說明：卡斯特罗派的领导已經远远超过了罗加和他的同志們的目标，幸好当时在山里搞革命运动时他們不是处于领导地位，否則古巴将仍然处于巴蒂斯塔的統治下，或者按最好的設想，代替他的也不过是弗朗迪西或貝坦科尔特之流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理論方面，卡斯特罗向《團結报》的記者发表談話时，已經宣布了在整个拉丁美洲要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合作的这种理論的死亡<sup>②</sup>。

因此，八十一一个党会議的文件提出的程式，已为在发展中的崭新的革命所有力地粉碎了，它忽略了对正处于沸騰状态的非洲大陆的真正特殊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从这里可能出现不亚于在拉丁美洲所显露出来的那种崭新的发展——并頑固地坚持它的陈旧的机会主义的主张，或者逃避在殖民地革命的领导力量的性质問題上采取明确的立場，繼續无视在新阶段中把这一革命不断地发展，即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一关键問題。但是，所有这些都包含着深刻的邏輯性：这恰恰就是赫魯晓夫提出問題的一般方法的邏輯所在，是他关于“共处”和从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

---

① 这是布拉斯·罗加在去年夏天人民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理論。让我们再提另一件事情，也是在去年夏天，人民社会党和7月26日运动的右翼的官僚分子攻击参加哈瓦那青年大会的第四国际拉丁美洲部分的代表是“挑衅者”，“罪名”是他們提出了反帝和反资本主义的方案，这些方案在几个月后被卡斯特罗执行了。

② 见1961年2月1日《團結报》。

的邏輯。

如果將赫魯曉夫路線——這一篇文章已經談過這一路線——作為基點，從邏輯上隨之而來的將是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進行合作，和尼赫魯、納賽爾、蘇加諾之流進行合作——這種合作不只限於國家之間的關係上，而且要擴展到各共產黨的政策上。這是一條陳舊的路線，在古巴，這一路線沒有妨礙革命取得勝利，這是因為布拉斯·羅加的黨在革命中只是處於無足輕重的地位，但是這一路線已經在伊拉克和印度尼西亞造成了損害，它過去妨礙了，目前仍然妨礙著像印度和阿根廷這些國家群眾運動的不斷成熟。儘管對這一条路線作了本文所提到的一些修正和保留，它仍然作為制訂八十一個黨會議的文件的根據，唯一比較新的東西——“獨立的民族民主國家”——也僅僅是一種主觀的想法而已，從最好的方面設想，它可能作為一種宣傳手段，但歸根結柢，它相當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初期出現的“進步的民主”，或者歐洲中部某些共產黨所設想要建立的，將促進進步的民主並對壟斷資本加以控制的國家。這一提法和其它提法的最基本的东西都具備著相同的概念、相同的總的觀點。

### 先進資本主義的舊矛盾和新矛盾

八十一個黨會議的文件在分析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形勢和解決所謂通向社會主義的民族道路時，比起 1957 年會議的文件，並沒有顯著的修改或補充。

正如那一次的分析一樣，這次的分析仍然是一般化，和經常使用宣傳的口吻，雖然不斷地重複那些昭然若揭的真理，但却遠未能使人能夠掌握住某些現象中的帶有本質性的具體因素。至少，一些參加莫斯科會議的黨，在過去數年中已經根據相同的論証制訂

出远为透彻的文件<sup>①</sup>。

我們可以列举一些例子。在第一章中，为了企图对資本主义世界的形势完全加以否定，并将之描繪成一幅几乎是灾难性的图画，因而不光強調了真正显示这一制度的将要崩潰的一些现象，而且像下面的表述也加了进去：

尽管某些資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有一定的增长，但是，資本主义的矛盾无论在本国或国际范围内，都在不断地尖銳化。……資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性质日益加深。

我們可以同意：归根結底，資本主义的矛盾正在尖銳化，資本主义的生产是不可能合理化的，我們上一届的代表大会也得出了这样的結論。但是，在得出这一結論之前，必須对这些年来的一切现象，特別是对那些相对地說是新的现象进行分析（这些现象甚至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都感到惊异），并必須准确地指出他們的特定的局限性和特定的矛盾。当由于殖民主义的崩潰和帝国主义的世界性危机而被大大削弱了的西欧出现了生产扩展的阶段，生产經常以不断的、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时，只提出“在某些国家”，“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有一定的增长”，并匆忙地加上“却并未改变資本主义的矛盾在不断的尖銳化这一事实”，“資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性质日益加深”，这倒是逃避事实的輕而易举的办法。这样的論断已被降低到像宣讀口头禅一样，这簡直是將战后时期最“崭新的”现象（再說一遍，这也是最令人惊异的现象）輕輕放过，而沒有作出任何努力来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

文件的其它一些章节提到了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一可資討論的

---

① 例如，意大利共产党的某些文件就是这样。在草拟这一文件（指八十一一个党会議的文件。——譯者）的这部分时，曾經受到了意共这些文件的影响。

問題：

在個別國家中，工人階級只是依靠頑強的鬥爭才使自己的一些切身要求得到滿足，而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中，生活水準依然低於戰前水準。……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包括某些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仍然存在着經濟不發達的、群眾生活特別貧困的地區，這樣的地區甚至還在擴大。（第一章）

並繼續說：

對工人的剝削和廣大農民群眾的貧困化的進程正在加劇……。

這裡也存在着將甚麼東西都塞進同一個口袋的傾向，一方面給人以正在趨向貧困化的印象，但是卻不對這一趨勢加以明確的斷定，並小心翼翼地不提出一些具體例子，不說出正在發生上述現象的是那些國家或者是那一種類型的國家<sup>①</sup>。

但是，竟然想出這樣一種解決的辦法，它一方面參考了蘇聯經濟文件的傳統的分析方法<sup>②</sup>，另一方面允許多列士和法國總工會繼續持有他們關於貧困化的理論而不致發生矛盾，並且允許陶里亞蒂和意大利總工會反對他們。

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形勢的特點過分簡單化和不加批判地沉迷於關於群眾貧困化的某些公式，這種做法所帶來的後果，比乍看起來更為嚴重。因為，自然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各種類型的資本主義國家當中，並不存在著本質上的區別，即使在最發達的國家當中，引起崩潰的最富於爆炸性的因素依然是群眾的匱乏和貧困。這樣，在最近這些年頭特別是在某些西歐國家中（例如意大利和比

① 文件所述的先進國家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是 指那些 國家並不都是明確的。

② 在蘇聯，絕對貧困化的理論很流行，見 1954 年底出版的《經濟手冊》。

利时)所呈现出来的这种趋势，是一种阶级冲突再次加剧的趋势，但是这种趋势是产生于和过去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說，出现当前的运动不是由于貧困，而是由于最高度发达的資本主义的特定的矛盾、由于“繁荣”和正在不断扩展的新的需要(这似乎只是同不断发展的技术有关)以及由于劳动者要求冲破阶级异己的鎖鏈，并成为生产过程中自觉的因素，这种日益增长的願望——但文件却完全忽略了这一趋势。当然，关于这一趋势将发展到什么程度(它只是在现在才具体化起来)，以及关于它在发展中可能出现的节奏，是有些东西可以討論的；但是一个忽略了这一趋势的文件，对了解工人运动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分必須以之作为行动依据的条件，与其說是一个帮助，毋宁說是一个障碍。

关于共产党在先进資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西欧的战略路綫、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道路等問題，八十一一个党会議的文件只是再次重复了 1957 年的提法。主要的着重点是放在反对垄断資本和爭取更进步的民主的斗争上，这一方面，个别党的代表大会和欧洲党的代表大会已經詳細作了规定。尽管世界資本主义的危机已經加深，資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正在加剧，而工人国家所显露出来的吸引力正日益扩大——文件对于所有这些明显的因素并不是沒有觉察到——而共产党的領袖还没有将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的任务向工人阶级提出来。他們的战略目标仍然是爭取一种民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垄断資本的权力将被打倒——通过对主要的經濟部門实行国有化和民主化——但資本主义的政权却保留下來。关于說明所有这一切怎样才能实现这一艰巨的任务，让陶里亚蒂之流的精明的策略家来担当吧！让他來說明如何在不用破坏现政权結構的情况下，亦即是不用推翻整个资产阶级，不用建立起无产阶级作为当政的阶级，就可以对现政权的主要神經中枢施加打

击。<sup>①</sup>

我們不会坚持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問題：決議原原本本地重复了 1957 年的理論，这是二十大所制訂出来的理論的忠实的回声，我們的运动已經反复地批判了这种理論。在这里，我們只要提一下如下的事情就够了：当世界上已經談論到各种情况，并发生了各种事件时，決議仍然停留在一般化的阶段上，它沒有試图提出一些有助于指导实际斗争所必需的假設或者事例。一些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党，如意大利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却对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采取了同样的观点这一事实本身，就應該使人看到采納这种观点的真正根源，而就連那些最热衷于議会道路的人也必須承认，法国的戴高乐主义正是对他們的理論的一种否定，并且，不應該将这种經驗不声不响地放过去。

显然，如果对这样一个关键性的問題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则决不会只是对它进行一些詭辯就草草了事，而是應該对所提出的各种假設給予一种更加正确的回答。特別是关于行动的目的問題，并不在于去猜想资产阶级究竟接不接受民主方法这种不測事件，而是根据以往的經驗和客观的趋势，作出它可能选择这条或那条道路的預測。对于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來說，无庸置疑，第二条道路远远背离了更加可能出现的前景，應該依据这种前景来制定切实的方針；各国共产党虽然抽象地提出了不排斥实行革命的摧毁这种設想，但却根据一种“和平的”、“民主的”和“議会的”道路来进行指导，实质上，这就是一种从内部实行轉变、用旧的形式来套新的

---

① 这样的公式本质上是机会主义的，但如果根据列宁主义的方法作为一种过渡的形式来想像，它还被当为是有意义的东西。这样的解释已經被明确地加以排斥。根据提出这一路線的人的意图，“进步的民主”的阶段，被想像为可以客观地出现的。

內容的做法。<sup>①</sup>

不用說，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人和其他支持他們批評議會道路的人已經完全退却了；文件的這一部分沒有反映出去年的爭論。<sup>②</sup>

第五章也談到了工會團結和克服工人隊伍中的政治分裂的問題。工會團結，尤其是在某些國家內（如法國、意大利和比利時），無疑是一個迫切的問題，同時，無產階級政治上的團結也可能出現一種明顯的進展。但是，在若干典型的西歐國家（首先是英國和德國，也包括各個小國）內，這個問題並不是一個組織上分裂的問題，——實際上，工人階級的絕大多數都追隨一個單獨的政黨——社會民主黨的領導經常處於絕對的優勢。這種情況繼續發生的原因何在呢？採取什麼途徑、通過什麼樣的中間階段以及運用什麼策略手段，才有可能扭轉這種形勢，從而使新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的領導能夠占上風呢？這便是已提出的若干真正的問題；除了一般地號召團結——儘管這種作法在理論上是正確的——之外，還必須就這些問題提出答案。

但是，在八十一個黨的決議中却找不出這樣的答案來。

### 領導國和領導黨不存在了嗎？

甚至關於“社會主義體系的加強和勝利”那一章，也沒有提出什麼新的、值得重視的東西，這一章又一次談到了蘇聯及其他工人

① 在上回提到的報告中，赫魯曉夫談到了“拿議會的形式來為人民服務，並將新的內容灌輸到這一形式中”。（同上，第16頁）顯而易見，這是拋棄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所談到的必須完全摧毀舊的形式，並建立起新的，一種在歷史上嶄新的形式的列寧主義的觀點。

② 隆哥在他向意大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所作的報告中談到了一些共產黨的代表對和平道路的觀點採取保留的態度，他們說明，由於在他們的國家裡，目前（原文如此）不存在任何民主生活方式，因此對和平道路的觀點“難于理解”（見1960年12月19日《團結報》）。

国家的性质的当前特征；在 1957 年已經談过的关于工人国家之間具有平等地位的謠傳；以及显示經濟发展的老一套征象。有重大意义的是提到了“国际分工制度不断趋于完善”，这是符合当前的新阶段的，因为各成員国之間已經处于一种新的关系之中。显然，现在各方面的事情比 1957 年时大大的发展了，而 1957 年时所用的公式只能結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除此之外，文件几乎沒有明显地反映出近年来在苏联、中国及人民民主国家中已經提出和还在繼續提出的那些爭論得最厉害而实际上也是最迫切的問題。應該对农业問題、集体化的方式、速度以及如何刺激增加生产等問題加以考慮。文件提到了——但是，这不完全是談农业方面的問題——“关于物质利益的列宁主义原則”（为了避免任何困难，在同一节中，紧接着又提出“要尽量加强精神刺激”），也有一小段談到了在人民民主国家中，“农民自願从小私有财产过渡到大的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农庄”。而对于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間的那些显著的分歧，对于中国公社的巨大和議論紛紛的試驗所产生的无数困难和矛盾，以及对于在会后数个星期就在苏联明显地出现的危急局势，決議也只字不提。

但是，显得更空泛的是，关于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內在辯証关系，在文件中几乎是完全消失了，而在 1956—57 年間这种关系曾經以指責和爭論的明显的形式表露出来。只是在两三个地方暗中提到斯大林主义时期出现了退化现象，并暗示已經达到了消除这种现象的目标。“人民內部矛盾”似乎已被忘記了。<sup>①</sup>

---

① 文件中关于“不論建立何种形式，无产阶级专政（声明原文此处有“永远”两字。——譯者）意味着扩大民主”这种說法至少是过于馬虎了，特别是在 1956 年已經对此譴責过。

更重要的是談到有关反資本主义的战斗队伍的內部关系，有关各个工人国家之間和各个共产党之間的关系的那些段落。文件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的强调远远超过了 1957 年，并且指出了殖民地革命的发展的特殊作用。同时，任何有关使人相信领导国家这种理論的表现都被仔細地消除了，虽然苏联和苏共的先鋒作用仍然得到了承认。<sup>①</sup>

赫魯曉夫特別坚持这一点，并且认为不可能“由任何一个中心来领导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因此，官僚主义的领导者們并不打算恢复斯大林主义时期的共产国际——或者是声名狼藉的共产党情报局——的那种組織形式。但是，文件却清楚地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即以举行各国共产党的代表會議来作为商討問題和互相启发的一种正当的形式；并且，要建立起对所有与会党都具有約束力的紀律原則。<sup>②</sup>

我們当然不会贊成重新建立列宁主义式的共产国际。而更糟糕的是，从會議的筹备阶段、到會議的进程、以及会后公布消息的做法，都清楚地表明他們仍然打算采用的老办法。根本的問題和重大的分歧只是在“上层”进行討論，不仅不征求下层党员的意见，甚至还不老实地告訴他們各种不同的观点，而只是要他們接受既定事实的結論。<sup>③</sup> 这完全照搬那些最正规的官僚主义传统。

---

① 1957 年的決議仍然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上，第 182 頁），但是最近的決議——对苏联采取了更为一般化的提法，（如“最强大的堡垒”等等）——只說苏联共产党“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先鋒队”。似乎这是苏联共产党自己提出来的修改，据了解，好像中国对此提出了非議，坚持要用过去的提法。

② 赫魯曉夫认为必須特別强调最后一章中的这一部分：“每一个党的全部活动都必須严謹地和忠实地符合于會議的各种決議。”（同上，第 19 頁）

③ 他們花很大的力气企图否认資产阶级報紙所发表的意見分歧，會議參加者之一，意大利的阿利卡塔激烈反对那些可能需要“带有毀謗性議論”的人。（1960 年 12 月《再生》杂志第 12 期第 932 頁），我們所要的不是带有毀謗性的議論，而只是要文件的

同时，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所进行的猛烈攻击以及这种攻击所采用的形式，足以表明出席會議的那些官僚主义分子所关心的是什么以及他們所抱的是什么目的的另一个迹象。像过去一样，不在这里提出有充分理由的批評，也不对南斯拉夫联盟的真正主张进行考察：他們光是一味地戴帽子和貼标签，甚至采用了含糊的带威胁性的詞句。而八十一一个党中有些党一回国，就赶忙变本加厉地散布純粹是斯大林主义式詭辯权术。<sup>①</sup>

第四国际并没有掩饰它认为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理論和内外政策所应当进行的批評。但是，八十一一个党却着重譴責他們所做的那些事情当中最正确的事情：譴責他們坚决地維护某些让工人参加工厂管理的試驗，譴責他們在最近的綱領中所提出的对过渡阶段的矛盾所作的某些大胆的分析。正是因为这班官僚主义分子企图把某些非常重要的論断繼續当作清规戒律，所以他們甚至不願討論这个綱領，而宁願莫名其妙地中伤它，或者用一大堆詭辯的名詞把它埋葬掉。<sup>②</sup>

文件也对修正主义或教条主义的倾向进行了比較一般的批

---

抄本和发言等等，就是說要忠实的公正的消息。与此相反，他們却小心翼翼地限制这些东西的发表，例如，就连中国共产党人的文章也不让发表。

① 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所使用的辞句比較起来，八十一一个党的決議的措辭是十分溫和的。而且，中国人在莫斯科會議前后都曾經猛烈地掀起反南斯拉夫运动，因此，毫无疑问，他們在起草決議的这个部分时施加了影响。奇怪的是，与此相反，赫魯晓夫在他的报告中甚至沒有提到南斯拉夫人。隆哥在他向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匆匆地提了一下这个問題，他提醒說，譴責并不排斥“聚会、会见和联合行动”。

② 特別是在已經提到的弗拉霍維奇的報告中，已經提出了南斯拉夫对决議的答复。有些批評是一針见血的：例如，对他們采取秘密外交的方法來討論工人运动中的問題所进行的批評，对逃避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問題所进行的批評，以及对决議的性质所进行的批評；当然，除了譴責他們对南斯拉夫联盟的态度而外，还允許对决議进行各种不同的解释。在战争、共处等国际問題上，众所周知的南斯拉夫观点又被重提了；这种观点是和我們运动的观点根本不同的。

評。但是，在这方面沒有任何新東西。這些都是目前一再重複的那套老公式，而且所開的藥方是：如果每個領導都宣布自己忠實於代表會議的那些理論，那麼，它就始終能夠使運動朝着一定的方向發展。

### 暫時的解決辦法

在八十一個黨舉行代表會議以前，發生了大家都知道的爭論。從若干與會者的報告和正式文件本身所承認的某些事情可以看出，這次會議出現了激烈的和長時間討論的場面。<sup>①</sup>

几乎在一切根本的問題上都出現了不同的主張，而“中國的”路線儘管顯然居於少數，但也得到若干代表團的支持。<sup>②</sup>

但是到最後，不僅決議被一致通過，而且這種努力成功了：使各個黨在隨後幾個月里採取更加一致的態度，而不要時而產生刺耳的分歧和暴露前一個時期的那些爭論。在某些問題上，顯然進行了妥協；在另一些問題上，解決的辦法包括採取或重複有充分伸縮性的公式；而在其他問題上，中國共產黨人實行了退却（或者暫時接受了多數人所制定的紀律）。

正如我們已經提到過的，在闡明會議的結果和運用文件的方針當中，有不同的側重點：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和意大利共產黨採取截然相反的立場，比如說，前者是斯大林式的保守主義的第一個前

① 例如，可以參看已經提到的隆哥在意大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上的報告，以及法國共產黨領袖們所提供的各種材料（他們提到中國和阿爾巴尼亞對法共的攻擊，等等）。我們注意到，12月1日的公報談到“各自的意见和主張”，同時，決議的最末一句指出，“各國共產黨……的進一步團結，是聯合工人階級的一切力量的最重要的條件”等等。

② 除了阿爾巴尼亞以外，澳大利亞也支持中國人，而印尼人在世界工聯北京理事會上所表現的親華立場也是眾所周知的。日本人、印度支那人和朝鮮人（以及中美洲的若干共產黨）對中國人也頗有好感。

哨，而后者目前却成为赫魯曉夫主义的先鋒。<sup>①</sup>

中国人方面已不再采取 1959 年和 1960 年时那种好辯的态度了，而強調已經恢复了的團結、尤其是同苏联共产党之間的團結；他們不再提出自己在共处問題上所抱的保留态度，并且避免提到領導国。<sup>②</sup> 甚至对某些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資产阶级所进行的批評，就算沒有完全取消，也是大大地減弱了：的确，自从中国人同印尼达成協議以来，现在一直同苏加諾保持着一种新的好关系。<sup>③</sup>

但是，尽管如此，分歧并未消除。他們除了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进行宗派主义的議論之外（在这个問題上，中国人仅次于阿尔巴尼亚人），毫无疑问，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群众的革命斗争的貢献，毛澤东比赫魯曉夫有更高的評价。分歧几乎經常表现在着重点的不同上，而不是表现在立場的截然不同，但是，只要讀一讀有关的文章、发言稿和文件，事情就明白了。

在会后这段时间中，对世界局势的估計，存在不同的看法更加明显了。中国人对国际力量的对比进行了更加乐观的判断，而今年春天所发生的那些事件——从加加林的飞行到对古巴所进行的可耻的討伐——自然使他們更加强这种看法。<sup>④</sup> 这种分析的实际含义是清楚的：中国人认为，苏联及其他工人国家应当利用这种比較有利的条件，在若干关键性問題上以更大的勇气行事。<sup>⑤</sup> 但是，

---

① 陶里亚蒂在 1961 年 4 月第四期《再生》杂志第 361 頁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明确地批評了阿尔巴尼亚领导集团所采取的方法。

② “以苏联为首”这种慣用的辞句已經完全见不到了。

③ 这就証实了甚至在这个問題上，中国人的某些立場的經驗主义和随机应变的本性。（但另一方面，在同尼赫魯的关系問題上的爭論仍然繼續存在。）

④ 《人民日报》在五一节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說帝国主义陣營“奄奄一息”。

⑤ 根据英国的报刊透露，对于目前时代的描述似乎是会上爭論的主題之一，中国人贊成这样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包括目前是一个“战争和革命的时期”这样一种观点，而苏联人却喜欢目前流行的那种观点（參看決議第一章）。从赫魯曉夫对决議中的

又一次在对美国领导集团的看法上，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分歧：中国人对肯尼迪从来不抱松懈或“等待”的态度，他們目前直截了当地把肯尼迪描写得比艾森豪威尔还要坏。<sup>①</sup>

但是，不会由于出现了这种新的分歧，八十个党为团结所作的努力就注定不会持久。局部的分歧可能因时局而变得尖锐或消失，而折衷的方案则会助长阴谋活动和宣传性的捏造。更重要的是如下事实：莫斯科決議对于我們目前經歷的这个历史时期中的若干重大問題絲毫未提出答案，而实质上是在逃避或者歪曲这些問題。这些問題实际上是存在的，需要加以切实的解决，而不論可能采取什么方案或策略手段，它們都会不断地一再抬头。八十个党的团结迟早終会因各种事件而遭到破坏和分裂，分歧必然会出现。

（譯自英文版《第四国际》1961年春、夏季合刊）

---

那个定义加以强调这一点，就可以间接地证实这种爭論；那个定义虽然也很平凡，但是它在反对另外一个不同的定义中却显然具有重要意义（參看決議第三頁）。

① 在这里，成問題的是毛澤东在4月28日所发表的讲话，从那以后，中国报刊便經常重复这番話（例如，可以參看《人民日报》所載的上述文章，以及該报所載的另一篇文章[1961年5月9日新华社电訊稿]）。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一、第四国际和苏联**

**二、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

**三、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告全世界被剥削群众书（1948年5月11日）**

**四、第四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宣言（1951年8月 - 9月）**

**五、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

**六、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文件：（1957年10月）**

    1 . 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书

    2 . 斯大林主义的衰落和垮台（决议）

**七、第四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文件（1961年1月）**

    1 . 宣言

    2 . 世界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3 . 世界经济的趋势和前景

    4 . 殖民地革命

    5 . 苏共二十大以来的斯大林主义危机

**附录：**

**一、密歇尔·巴布洛：第四国际简介（1958年8月）**

**二、列维奥·麦丹：对莫斯科会议的纲领的革命性的批判**

[附录页](#)